

不平等的发展

(美) 罗斯·托德

与世界经济
发展理论
丛书



Theorie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不平等的发展

——论外国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埃及〕萨米尔·阿明 著
高钰 译

与 长 增 济 经

与
发
展
理
论



商 务 印 书 馆
2000年·北京

Samir Amin

UNEQUAL DEVELOPMENT

**An Essay on the Social Formations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1976

根据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 1976 年版译出

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丛书

出版说明

增长与发展是经济学永恒的主题。在以往,增长与发展这两个词并无语义上的明显区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经济学界将宏观的短期分析延伸为长期分析,于是产生了增长理论。增长理论强调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研究国民生产总值的因素与增长的途径。以后,随着附属国、殖民地纷纷独立,兴起了对其今后经济发展道路的研究,逐渐形成了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吸收了增长理论的一些原理,但更强调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的根本转变,以及转变的途径和政策。至此,增长与发展两词有了不同的含义。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学虽有不同的研究领域,但两者是密切联系着的。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又有向发达的现代化国家迈进的宏愿。因此,我们既需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要了解和借鉴国外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理论、政策和经验。这样,适时出版国外著名经济学者有关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中译本,便既是学界的殷切期盼,也是我馆责无旁贷的义务。

在学界的大力支持下,我馆自60年代以来已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有关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的国外著名经济学者的著作。30年

来,集腋成裘,初具规模。但是由于这些著作过去均以单行本印行,印量小而分散,既不便于学界的考查研讨,又不利于学术的积累薪传。故此,我们从这些单行本中精选了一些重要著作辑成丛书,使其相得益彰,蔚为大观,以飨学界。

由于本辑著作都是在原有的单行本基础上辑选而成,版式格式难见一致,译文体例无法统一,对此尚希读者见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8年7月

译者序

《不平等的发展》是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的一部代表作。阿明发表过一系列论述非洲和第三世界经济发展道路、资本主义主要矛盾和帝国主义等问题的著作。1970年发表的两卷集《世界规模的积累》论述了帝国主义和不发达问题，本书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分析资本主义体系的全貌，反映了作者关于发展问题的思想核心。

《不平等的发展》一书的副标题《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可以说明全书的主旨以分析不发达问题为中心。但本书不仅是作者对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道路的剖析，而且是对整个资本主义南、北世界（即“外围”与“中心”）进行历史的和地域的纵横描述。这不是一部单纯的经济著作，而是一部联系现实世界的政治经济学论著。全书的结构安排，正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说：第一章旨在谈资本主义的起源；后四章谈社会主义的起源，其中二、三两章分别分析中心和外围资本主义的规律，第四章集中说明依附性问题和“不发达的发展”，最后在第五章里作者阐明了他对世界发展前景的看法。他说：“外围国家摆脱中心国家政治统治的每一个行动都导致冲突，而令人考虑到社会主义前景的必要性”。他认为，在全世界范围设想的过渡必须以外围的解放作为开端，真正的发展（而不是“不发达的发展”）应该是民族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阿明从第三世界国家的立场出发抨击西方大国的剥削，揭露资本主义制度，谴责帝国主义，他的学术思想不但在非洲和整个第三世界，而且在西欧、北美的学术界都有一定影响。

阿明是“依附论”思潮的著名学者。这一思潮在六十年代形成于拉丁美洲和美国,尔后发展到其他许多地区和国家。它主要从宏观方面探讨第三世界的不发达问题,批判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观点和发展理论,强调第三世界不发达的根源主要在于它受到来自美国等西方大国的控制和剥削,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是统治—依附结构,在这种结构内,外围的发展只能是“不发达的发展”,不可能出现成熟的、自主的资本主义前景,因此它们如不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走向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摆脱其依附地位而获得真正的独立。依附论观点中维护第三世界利益的反帝反殖立场以及寄希望于社会主义等方面无疑是有贡献,但对战后国际经济关系中的许多新因素和新发展的认识、对第三世界力求减少依附性和增强自主性的估计、对第三世界发展进程和发展道路的设计,在若干方面未免失之过偏。而且依附论学者中存在不少不同的观点和主张,多方面的论战和交锋持续不断。这一思潮是值得我国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所以,从研究依附论思潮而言,本书也是一部重要的著作。

阿明在1931年9月生于开罗,1957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57年至1960年担任埃及经济发展组织的高级经济学家,1960年至1963年担任马里政府计划化技术顾问,1963年起任教于法国普瓦蒂埃大学、巴黎大学和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1970年起担任联合国非洲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1980年6月起担任联合国未来非洲战略局负责人。曾访问我国多次。

阿明的著述丰富,除大量论文外,重要的书籍著作包括:《马格里布的经济》(1967年),《象牙海岸资本主义的发展》(1967年),《现代马格里布》(1970年),《世界规模的积累》(1970年),《被封锁的西非》(1971年),《西非的新殖民主义》(1973年),《不平等的发展》(1973年),《非洲的农业和资本主义》(1975年),《帝国主义的

危机》(1975年),《帝国主义和不平等的发展》(1976年),《阿拉伯民族: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1976年),《价值规律和历史唯物主义》(1977年),《当代阿拉伯经济》(1980年),《在当代历史和危机中的阶级和民族》(1980年),《毛主义的前途》(1981年),《今日阿拉伯经济》(1982年)等。近著有:《对战后时期的再认识:一项学术历程》(1994年)、《全球化的挑战》和《资本主义的幽灵,对当前学术时尚的批判》(1999年)等。

本书此次重印,阿明特地为此作了中文版序,并进行中文版的出版授权。中文版序言中作者对本书出版以后的二十多年中世界形势的新变化进行了分析,表明了他自己的观点。

为便于读者阅读以及了解本书的概貌轮廓,故译编了本书章节细目取代原仅有仅列章名的目录,谨此说明。

高 钰

1988年于北京

1999年补记

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新的挑战

《不平等的发展》中文版序

几十年前写的《不平等的发展》一书一直被认为是对依附理论的一大贡献。它说明“不发达”是资本主义扩张的产物，并批判社会主义国家和激进第三世界国家想赶上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企图。我这两个观点至今并无改变。只是从那时以来历史已继续发展：资本主义进入了一场危机和全球主义的新阶段，社会主义的和激进的经验垮了台。因此，外围各国人民和工人阶级正面临新的挑战。

所以，我在《不平等的发展》中文版的这篇序言里就要集中谈谈过去 20 年间出现的那些新问题。

我们看来都同意一个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时期已经过去。但我们也有别于主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不把这种变化归纳为“冷战的结束”。我认为，这种变化是由形成战后时期（1945--1980 年）生活与斗争的三种社会模式的垮台所界定的。这三种社会模式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苏联模式以及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与现代化计划。

“回复”到这些模式是不可能的，这种回复的愿望只是失去活动能力的集团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怀旧表现。“重塑”也无济于事，因为全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身都已发生深刻变化，今非昔比。

我们看来也都同意我们过去 15 年间经历的发展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认为经济应服务于人民，而不是人民服务于经济。

这种发展可以相当简单地概括如下：我们谈到日益增大的社

会扭曲现象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前东方集团国家和南方国家中出现很大转折。贸易中重现大规模永久性失业，福利国家衰败，被排挤和贫困化的新现象已成为图景中的永久性特点。前东方集团国家和南方国家的形势尤为显著。某些经济强劲的南方国家是少数例外，值得进一步研讨(但无论如何，这种例外是相对的，这些国家中也能看到同样的现象，只是尚比较克制)。

我们不同意主导观点所说这种发展是“过渡时期必须付出的代价”，说最终会导向使人人受益的一种新型的、据说更健全、更强劲的经济。

可是，我们能不能说这种社会扭曲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扩张史上的一种新现象呢？或者说战后时代是这段历史中的一种例外，那是由于法西斯主义失败以后的大国关系比前更有利于劳动阶级和世界各国人民呢？如果是那样的话，当前形势就是回复正常(即回复到马克思理论所说的积累与贫困化的法则)。

第三世界已分裂为新兴国家集团(它们已进入工业时代，甚至具备在世界市场竞争的能力)和贫困化的、被排挤的国家集团。具体来说：

(1)东亚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还有其他东南亚国家(首先是马来西亚和泰国)，加上中国，正在取得加速的增长率，而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地方的增长率都在下降。这些国家(地区)都在积极地竞向世界市场提供工业产品。这些国家(地区)除了经济强劲以外，受严重社会扭曲的影响较少(这一点需要按各个实例加以界定和讨论)，脆弱性较少(由于东亚所特有的地区内部关系的加强，程度上类似于欧洲共同体内部的情况)，并且具有国家有效干预的特点，在推行全国发展战略方面起关键作用(即便这些全国战略转为外向)。

(2)拉丁美洲国家和印度的工业能力也是同等重要的。可是，

它们的地区一体化较差(拉丁美洲为 20%，而东亚或欧洲共同体为 60%)，国家干预较不一贯。这些地区的增长率仍然较低，已很严重的不平等现象的强化尤为突出。

(3)总的说来，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及伊斯兰世界仍然陷于过时的国际分工。它们仍然是初级产品出口国，这是由于它们没有进入工业阶段，或者是由于它们的工业脆弱无力、缺乏竞争力。这里的社会扭曲现象主要表现为贫困化和被排挤的人群大量增加。那里毫无地区一体化进展的迹象(非洲内部或阿拉伯内部)。增长实际上是零。虽然这个集团中包括“富”国(人口稀少的石油出口国)以及贫穷或赤贫的国家，但并不包括积极参与形成世界体系的任何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真正十分贫困化的。

区分活跃外围国和贫困化外围国，并不完全看它们工业生产的竞争力。还有一个政治差异。活跃外围国中的主导力量以及背后的整个社会(不论其社会矛盾如何)都有计划目标和实现的战略。中国、韩国的情况显然就是这样，某些东南亚国家、印度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较低程度上也是这样。

这些国家计划同帝国主义的计划相对抗，帝国主义目前主宰着世界，而这种对抗的结果将形成明日的世界。另一方面，贫困化外围国则既无计划(尽管诸如伊斯兰的政治讲话作出种种口头主张)又无自身的战略。其结果，它们的思想由帝国主义国家所左右，帝国主义掌握着为这些地区提出“计划”的绝对权力(例如非加太一欧经共联盟，美国和以色列的“中东”计划，欧洲含糊的地中海计划)，这些计划事实上不受任何当地计划的反对。所以，这些国家都是全球化的被动对象。

这些国家集团之间不断增大的分野打破了“第三世界”的概念，结束了万隆时代(1955—1975年)的共同战线战略。

可是我们将看到，对于如何评估资本主义在前第三世界国家

扩张的性质与前景,并没有总的一致意见。有些人认为,最强有力的新兴国家正处在“赶上”的过程,不再是“外围国家”了,即使它们在世界等级层次中仍处于中间水平。别的人(包括我)认为,这些国家代表未来的真正外围国家。中心—外围的相对,从1800年到1950—1980年间,与工业化经济和非工业化经济之间的对立相合,在今天则以新的、不同的标准为基础,这些标准可以通过对西方大国掌握的五种垄断进行分析来加以界定(金融全球化,技术创新,取得世界资源,通讯与信息手段,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贫困化地区的情况怎样呢?这种现象是否没有历史先例?还是相反地体现资本主义扩张的一种永久性倾向呢?(这种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因权力对比较少不利于整个外围地区而暂时有所抑止。)有论者认为这种例外情况是由于第三世界——尽管组成的国家多种多样——在反殖民主义斗争方面、在有关初级产品的要求方面、以及在推行自身现代化与工业化(西方大国对此力图阻止)的政治意志方面的“团结”。正是由于在这些方面取得的成功不均衡,所以第三世界的凝聚力和团结力都消蚀了。

主导的意识形态声称“别无选择”,说世界各国人民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所谓理性和效率要求。我们认为,资本(即“市场”)必须被迫适应人民与社会进步的要求。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新东西是什么?

今日总的经济形势中的若干主要特点已经被界定并且得到认真研究。因此,我们如果勾画出最重要的那些特点,那就够了:

- 一、同一基本选择——新自由主义——影响了世界上几乎每个政府的经济政策。在西方大国和欧共同体内部,这些选择涉及对确定目标的取消管制、更加放松劳工市场、对私有化不加限制(包括对传统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削减社会

福利支出、强调反对通货膨胀(以收紧银根政策和提高实际利率作支撑)、不加限制地开放国际资金转移,等等。在许多南方与东方国家中,这种选择由于实行严厉的“结构性调整”计划(在有些情况下实行所谓“休克疗法”)而得到强化。然而,这种一般性说明必须受一些重要的区别的限定:那就是东亚国家和地区(韩国,中国,台湾,以及较低程度的东南亚),它们实际上没有参与新自由主义的游戏。这些国家(地区)实行了其他国家弃而不用的一贯的工业化政策,政府干预对这方面的要求提供大力支持,所以实际上是“有计划的”。

二、全世界几乎每个国家都正在经历一场危机,而东亚再一次是例外。其征象包括:虚弱的经济增长(许多东欧国家和第三世界贫困化地区是零增长或负增长),生产投资疲软,失业率上升和就业不稳、同时“非正式”就业活动增加,等等。我们已经提到,伴随着这一切的是分配不平等的现象加剧。经济持续停滞,虽然官方仍在集中谈论“衰退”与“回升”。

三、出现金融化现象,即:短期、投机心理占了上风而牺牲了有利生产性投资的长期选择。

四、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国家政策也随之从属于这种无约束的全球化冒险,这由于基本的新自由主义选择而无法控制(灵活的汇率、金融自由转移,等等)。

这些因素加到一起几乎在各地造成发展速度各不相同的经济:某些部门、地区和公司(特别是大跨国公司)增长速度强劲,利润丰厚,而其他则处于停滞、后退或解体。劳工市场则四散分割以适应这种形势。

我们再问一句,这真正是一个新现象吗?还是一种多速度系

统,事实上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上是常规的呢?这种现象只是在战后时期(1945—1980年)因例外的原因而有所减弱,当时的社会力量对比推行了有计划的政府干预(在福利国家、苏维埃国家和万隆时代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它通过组织地区间和部门间转移而方便了增长的普遍化和生产力的现代化。

这些变化至少在两个方面带来了决定性的长期效果:

- 一、大公司当然并不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新发展。但是,可以正确地指出,大公司演变的某些方面是新的。直到现在,大公司(甚至是跨国公司)首先是(特别就资本拥有者而言)全国性公司,其活动则超越了母国国界。为了公司的调度部署,它们需要本国政府的主动、积极支持。今天,它们已强大到可以不考虑(有时是反对)政府政策的设想来发展自身的扩张战略。所以,它们要政府政策从属于它们自身的战略。反政府的新自由主义论述掩盖了这个目标,把保护这些公司所代表的私人私益这一特有目的合法化。要求的“自由”并非人人享有的自由,是公司牺牲他人以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从这个观点来看,新自由主义的论述完全是意识形态性质的和不诚实的。
- 二、另一个方面更加直接地关系到当前的技术革命,工作进程现在正发生极大变化。装配线生产(泰勒制)正由新的形式所取代,深刻地影响了社会阶级结构及其对工人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认识。这里我们也发现与劳工市场分散分割有关问题的重要因素。

金融化可以分析为危机的产物。过剩资本在现存结构下无法从生产系统的扩大中寻找出路,对统治阶级是一个严重的危险——资本大规模贬值的危险。所以,危机治理要求提供金融出路以避免这种最坏可能的结果。

高额利率、灵活汇率、第三世界与东欧国家的外债、美国的赤字、私有化与养老金金融化都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但是，奔向金融化并不是解决危机的出路；相反，它导致陷于停滞性螺旋之中，因为它使分配不平等更形恶化，并迫使公司玩弄金融游戏。就这个意义来说，金融化并不仅仅是金融机构（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主宰的同义语；它还意味着各公司管理阶层把金融设想放在主导地位。

我们在上文各方面都可看到的东西方之间新的分裂，肯定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理论提出挑战。

“亚洲奇迹”值得大书特书。亚洲（或亚洲/太平洋地区）作为未来新兴的中心取代欧洲/北美主宰世界的地位，中国则作为明天的超级大国。

比较冷静地说，亚洲现象使人们认为值得认真关注，虽然我感到有些匆促。这些看法质疑世界资本主义扩张中固有的两极分化理论（这一理论往往不幸地混同于对“依附论”的庸俗解释），也质疑作为对付两极分化挑战的脱离战略。据说有证据说明赶上是可能的，而且认为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化，这更有可能实现（对这种论点的庸俗解释，这最终意味着出口导向战略），认为幻想式的脱离造成了苏联的灾难。

所以，内部因素，包括“文化”因素，可以说明有些国家成功地使自己成为积极塑造世界的一员，而其他国家则一败涂地，陷于违背自身意愿的贫困化和脱离主流的境地。

如果我们要在讨论这些复杂问题上取得真正的进展，我们必须明确地区分对内部社会结构以及对世界体系中活跃力量的不同层次的分析。如果我们不想做不花力气、不得要领的论战，那么那样进行使问题明晰更为可取。例如，我认为苏联演变的原因主要是

由于该制度的社会选择(“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计划)。积极而有节制地参与全球化,同以出口优先为基础的经济战略是有很大不同的,两者建基于不同的内部统治社会集团。东亚国家之所以成功,正是由于它们使对外关系从属于内部发展——换言之,它们拒绝“适应”世界范围的主导倾向。事实上,这就是脱钩的定义,有些性急的读者把它混同于闭关锁国。

两极分化,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其他方面,没有一劳永逸、毫无改变地作界定。一个半世纪中由于工业化国家与非工业化国家之间的不同对比,它的表达方式也肯定变化了——这种对比事实上受到外围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挑战,迫使中心国家适应外围国家工业化(不管多么不均衡)带来的变革。这个事实能否以此肯定所谓东亚正在“赶上”中心国家的说法呢?这个结论未免操之过急。我在这里提出的论点导向非常不同的结论:通过西方大国五大垄断的行动,全球化的价值法则产生了新形式的两极分化,使得强大外围国家的工业居于从属地位。中国如果进一步结合进国际分工的话,也逃不脱这种演化。

关于欧洲建设的问题,也必须在这种全球架构内重新加以评估。我感到遗憾的是欧洲左翼内部对这些问题的辩论往往局限于欧洲的范围,或者最多是西方大国的范围。除此以外,只能听到一些善意的希望(特别是关于南北关系的主题)。

① 欧洲建设问题是作为一个共同市场计划开始的。在世界经济扩张阶段(直到1975年前后)中这项计划容易取胜,现在当资本主义进入结构性危机阶段后,这个计划就越来越困难了。我认为,超越共同市场走向多方面经济一体化意味着首要优先应是欧洲的政治一体化。可是,政治一体化同坚持本国现实相冲突,而且欧共体各国的左翼(以及右翼)在这个问题上有内部分歧。在这种情况下,优先实行共同货币(欧元,马斯特里赫特)可能促进必要的

政治一体化呢还是会造成欧洲各国间的矛盾爆发？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欧洲左翼内部讨论和意见不一致的热点。

② 在欧洲，新自由主义纲领是统治派力量赞同的（不但是右翼力量，而且是选举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党人，虽然他们的赞同有时有所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个可能的社会抉择（在整个欧共体内建立一种新的、进步的社会和解）似乎不能提上日程。然而，关于新欧洲社会条约会是什么样的辩论却已开始，把这个辩论进行下去并且界定其战略选择及前景是很重要的。除了内容不确定的“奇妙”名称（“新凯恩斯主义”？）以外，事实上要的是什么呢？是不是1，一种社会“堡垒式的欧洲”，还是2，一种开放社会的欧洲（如果是这种情况，它应如何处理同美国、日本、以及外围国家的关系呢）？

③ 欧洲的统治利益（大公司），如同在日本和美国，把它们的战略界定在不受约束的全球化背景中。但在全球范围内它们并不是能向美国霸权挑战的活跃分子，也没有能力提出对南北关系的另一种看法。

④ 还有一点是，欧洲内部的新东、西关系自发地纳入了使东欧“拉丁美洲化”的架构，而不是把它平等地结合进来。东、西方的欧洲左翼力量会不会联合起来提出一个不同的战略以满足实现一个进步的、泛欧社会条约的要求呢？

⑤ 自由主义的选择和东欧的拉丁美洲化使得欧共体的内部平衡向有利于德国的方向倾斜。长期而言，“德国式欧洲”能够被英国、法国和俄罗斯接受吗？同时，赞成本计划就使美国的全球霸权长存下去，因为德国如同日本，起的是在世界问题上同美国联盟的地区国家的作用。

对危机进行全球性治理

对危机进行经济治理的要求在以上谈到的经济政策中作了表达。然而，对体系的这方面治理，如果没有适当政治形式的支持，是无法自行进行的，因为新自由主义产生的只有混乱，并导致似乎无法解决的冲突不断加剧。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只是治理危机的一种方法（这一点引起了不同意见，这方面的含义应于澄清）。

我们可能全都同意政治生活结构在战后时期过去以后发生了深刻变化。

政治生活与政治斗争传统上是在合法性没有疑问的政治国家框架内发生的（可能对政府发生争议，但对国家本身不会有争议）。在这个国家内，政党、工会、若干主要机构（即商界领导）以及媒体界定为“政治阶级”的领域形成了该体系的结构基础，政治运动、社会斗争和意识形态潮流在其中表现出来。

显然几乎在世界各地，所有这些机构都已失去它们的部分或全部合法性。人民“不再信任它们”。取代它们的是占据中心舞台的各种“运动”，集中反映环保主义者、妇女、争取民主或社会正义、主张群体特性（民族群体或宗教群体）的种种要求。这些运动的地位、它们的组织或无组织型式、它们的表达方法（在某些情况下纯粹是夸夸其谈，在别的情况下则通过诸如党派和选举等政治生活渠道进行，有时候则诉诸暴力恐怖活动或其他方式）因国而异，因时而异。所以，这种新政治生活的一个特点是极端不稳定。这些要求与运动和激进批判（批判实际现存的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方式，或者适应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管理阶层的方式，值得具体加以讨论。这些运动中，有些参与或可能参与自觉地、有组织地反对统治权力的社会计划，相反，其他一些则对于反对这种计划没有兴趣。

统治权力知道怎样分而治之，而且确实做到了。对有些运动进行操纵或者明里暗里的支持，对另一些运动则进行坚决反对，这就是这些新的、混乱的、受到鼓励的政治生活的统治手段。左翼也应作出自身的分析并且在制订其动员和行动战略时牢牢记住。

统治势力的新自由主义进攻的重要主题之一是全面反国家的思想。

我们已经注意到这种进攻是为大公司的私有利益服务的，大公司设法使自己从可能的政府干预中脱身，因为政府可能对它们以外的其他利益作出呼应。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世界真的可以作为不要政府的纯粹市场活动。大公司本身，以及总的资本，需要一个至少能作为警官的政府。这种警官的作用，在国家范围和世界范围，随形势不同而变化。

在最广义的外围国家中——亚洲与拉丁美洲整合有力的外围、东欧的潜在新外围、非洲与伊斯兰世界的贫困外围——有用的警官行动排除了任何认真的民主企图。在这里，民主的主题被讥讽地用来打击对手（社会主义对手或平民主义对手），但从不用来反对盟友或代理人。在这方面实行着双重标准。可是，有时政治危机的暴力在于它表现某种民主的外表，就是我称之为“小小的低密度民主”，假平民主义的、假选举的民主，作为对付“过渡”的一种方式。独裁时代和专制政权，不论是军事的、神权的或其他的，远没有结束。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数人民的愿望同当前政策产生的结果之间的矛盾、国家无力对付全球化产生的力量（国家的统治阶级对此却俯首接受，甚至甘心情愿）以及传媒操纵的种种可怕影响已经产生了影响民主思想与实践的真正危机。

一般来说，真正现存的当代资本主义是在“低密度民主”体系内运行的。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贬低对基本选择的主要斗争而赞

扬对日常生活的管理，以此肯定这种形势的正确。非政府组织激增，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把全世界各国人民非政治化的战略的一个回答。这种重组远没有构成有力的市民社会基本结构来面对国家，却由资本统治力量与社会管理阶层作伴。强大的市民社会是和广泛的政治化、生动活跃的阶级组织（党派、工会等等）并驾齐驱的，一个国家的强大得益于它的真正民主。软弱的国家最易导致民主和市民社会的削弱。

没有能在全全球范围活动的警官，这种管理体系无法运行。就这方面来说，所有的统治力量都认为美国（装备远程控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美国军事力量）将能完成这种职能。这些资本统治力量提出的全球化同美国霸权之间没有矛盾。日本、欧共体以及组成欧共体的任何国家都没有任何真正的野心去削弱这种权力，即使在一些欧洲国家里，有时会有“如果事情不是这样，倒也不错”的感觉。反国家的谈论是针对所有国家的，除了握有政治与军事霸权的美国。

有一项全球管理的全面政治战略。这项战略由美国执行，得到西方大国的支持。这一点肯定是矛盾和矛盾分析所在，需要加以讨论。不能借口说我们对手有一贯战略就是回复到陈旧的“阴谋理论”，因而回避辩论。阴谋是没有的，但是对手的确有一项总战略。

我认为，这项总战略就是通过支持割裂国家形式的社会组织来最大限度地分散潜在的反体系力量。斯洛文尼亚，车臣，越多越好！在这个背景下，利用或操纵人们追求特性的要求，极受欢迎。

所以，群体特性的问题——种族的，宗教的，或其他的——是中心问题之一，必须以最认真的态度和责任感来进行辩论，特别因为在这个领域，情况和意识形态及政治立场极为多样。一般化是我们必须设法避免的危险。

基本的民主原则意味着真正的尊重多样性，不论是民族的、种

族的、宗教的、文化的或意识形态的，必须充分得到尊重。多样性除了通过真诚实行民主，不能用任何其他方式来对待。否则，必定会成为被对手根据自身目的加以利用或操纵的一种武器。

从历史上看，左翼力量在这一领域往往有欠缺，当然，并不总是这样，也不像今天常说的那种程度。其中的一个例子是铁托的南斯拉夫，这实际上是各民族在真正平等地位上共处的一个楷模。另一方面，罗马尼亚则不同了。在万隆时代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往往成功地团结不同种族和宗教群体反对帝国主义敌人，而非洲各国的第一代统治阶级往往是真正跨种族的。然而，这种权力却很少善于民主地处理这种多样性，并保持成就（如果有成就的话）。他们的民主倾向产生的结果同他们治理社会面临的其他问题，同样令人遗憾。危机来临时统治阶级无力对付，就采取不顾一切的紧急手段，往往退入人群，作为延长它们“控制”群众的一种方式。

可是，甚至在许多尊重基本自由的真正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即便没有其他国家，也没有理由不去设法推进民主），群体的多样性总是肯定得不到恰当的处理。加拿大，英国在爱尔兰，民主的美国对黑人的种族主义（或者在很不民主的巴西以及一般也很不民主的拉丁美洲对土著人民的态度），这提供了若干同前苏联不民主政权一样的例子。还可以提出许多其他例子。所以，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很真实的问题，或者无视被压迫各国人民的权利，即便压迫程度有所不同。我们不能不支持尊重多样性的完全合法愿望，这是现存体系没有做到的。

所以，很有必要对特性问题和文化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严肃的辩论。我认为（许多人并不同意），文化主义的成功同民主处理多样性的缺点成正比。所谓文化主义，我指的是主张那些分歧是“首要”的，应予“优先”对付的（例如对阶级分歧）；有时甚至认为它们是“跨历史”的，即：以历史不变因素为基础（宗教文化主义往往是

这种情况，它很容易滑向愚民和盲从)。

为了在纷纷提出特性要求之中看得更清，我提出一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标准来讨论。进步运动提出的要求总是结合反对社会剥削以及在各方面争取扩大民主的斗争。所以，在现阶段，进步运动应有助于使人们看清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管理的社会计划的现实，也就是要明确地拒绝支持、容忍或无视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目标、对工人和各国人民的统治、“低密度民主”的管理、对专制而驯顺政权的支持，等等。另一方面，那些声称“没有社会纲领的”(认为那不重要)或者“不敌视全球化的”(当然也不重要)运动——更不用说那些认为民主对它们格格不入的运动——则是完全为统治资本的利益的服务的赤裸裸的反动运动，实际上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而且，统治资本知道这一点，支持这些运动，即使媒体利用它们肆无忌惮的内容来谴责受害的各国人民。这些运动被利用，某些情况下甚至被操纵。

最后，我要回过来谈谈根据资本全球化统治计划部署基本设想的未来形势。

根据上面所谈的，一种大形势可能有多种变项，例如：

①欧洲变项：德国式欧洲？有欧元或无欧元？东欧的拉丁美洲化？欧共体的割裂(或弱化)？等等。

②亚洲变项：以日美为中心的亚太地区一体化？以中国为中心的没有日本的东亚地区一体化？等等。

无论如何，“大”计划已经根据新帝国主义地区化(按照“分担负担”的方针)制订出来了，把地理上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南方地区在主要西方大国后面作了界字：

①美国/加拿大/拉丁美洲(这一地区界定开始于墨西哥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被结合)。

②美国/以色列/波斯湾石油生产国/阿拉伯国家。

③欧共体/马格里布/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④欧共体(或德国)/东欧。

或者另一种可能是：德国/美国/东欧/前苏联。

⑤日本/东盟。

或者：日本/美国/亚太。

这里还有两个情况可能值得进一步讨论：

①新帝国主义计划是否可能同大约 15 个地区极和小地区极的兴起相容呢？它们享有本地区的“特权”，但继续作为开放全球化中忠实的接力站。首先是美国的副手德国和日本。其他还包括南美的巴西、中东的以色列、南部非洲的南非、西中亚的土耳其(和/或伊朗)、以及东亚的韩国；它们得到二等地区国家如埃及、尼日利亚、肯尼亚、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的支持。

②一些小地区极有没有可能对全球化/美国霸权“造反”或者因发展自主权而发生冲突呢？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呢？例如，如果南美南锥共同市场计划同自由主义教条拉开距离的话，巴西和南锥共同市场就可能会提供一个例子。

在这个总背景下，很容易想象一个资本主义扩张的新阶段，其基础是活跃外围的加速增长(中国、东亚、印度、拉美)以及东欧、前苏联和欧共体的增长更新，而非洲和伊斯兰世界则仍然处于灾难。世界上各个有力地区之间加强交往肯定有助于这一计划。可是，我认为(不一定所有人都这样看)，我们越朝这个方向发展，有关地区之间的交往就越加强，以西方大国五大垄断为基础的新的两极分化就越增多。在这种前景下，地区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不会减少；相反，中心与新外围之间的距离会拉大。

不乏以相反形式打破形势部署的情况，例如：

①可以预见阶级斗争再起，而且已经可见(法国 1995 年，韩国 1997 年 1 月……)。运动将扩展并不断侵蚀统治资本进犯的实力。

因此,为我们将本文下一部分考虑的可选择方案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②某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和盟主集团也可能采取行动来改变这种模式的方向,使之更有利于它们,从而扩大了它们的主动权。我首先想到了中国——特别是,如果赋与其计划具有显著本国特点的社会团结由于当前被排除的民众力量参与而得到加强的话——而且也想到韩国、印度和巴西。还可能有别的国家有可能发生这种演变。

一项可供选择的方案的概貌:服务于人民的经济

体现尊重工人与各国人民利益的任何可供选择的方案,必须通过人们的斗争在他们的本国社会里加强他们的权力作为起点。

没有这种发展,谈论可供选择的方案则只是善意的希望、书生的学究行为和愿望。根据“理性”或一般利益向现有权力当局提出的“辩诉”决不可能有效,因为这个权力当局实行的政策从它们捍卫的社会利益的观点来看是足够理性和有有效能的。它们产生的结果(失业,不平等,排他)正是它们真实的目的,而研讨这些问题的政客们的夸夸其谈则纯属伪善。我们也不能依靠斗争的自发性来指望其产生一个坚持一贯的可选择方案。

所以,对于社会变革的所有分析者和行动者来说,对于可选择方案的内容进行极其负责的讨论始终是必不可少的。幸运的是,这类辩论为数众多而且常常内容丰富。然而,它们往往是在一国或一地区(欧洲、拉美、阿拉伯世界,等等)内进行,因之这些问题与解决办法的全球角度往往缺乏。其他的辩论常有相反的弱点:世界问题不联系本国问题,后者常被忽略或简单化。

目前有一种企图,要强使舆论接受这样的看法:全球化要不要由你——要,就不加约束,满足大公司的需要;不要,就甘心作闭关

锁国的蠢事。全球化如同其他事物一样，可以体现为许多可供选择的可能，由任何特定时刻国与国之间力量对比平衡或不平衡以及各该国内部的社会关系作界定。

正如民众阶级的加强对于一国范围可供选择方案的出现是绝对必要的条件，外围各国（活跃的和贫困化的）人民的加强在世界体系内是重要的。怎么做到这一点呢？肯定不是通过“人道主义的”言词（或干预），也不是通过“合作”，因为它是在最善意的圈子里发展的。

在这个实例中，正如在内部事务中，我们是在处理力量对比，这只能由有关各方（即外围各国，不论活跃的或贫困化的）来加以修改。我认为应强调优先建设大地区集团。然而，这些区域不应按它们在新帝国主义计划中的现状作界定（作为对每个西方大国成员负有特殊义务的区域，即：作为无约束的全球化的工具），而是相反，作为对抗全球化的集团，有能力迫使重新谈判南北方关系问题。显然，我们都想到拉美、非洲、东南亚集团，因为这些地区中没有一个国家具有足够的份量来修改无约束的全球化所强加的重大限制。惟一的例外是洲一般的大国：中国，印度，或许还有巴西，或俄罗斯。我提议的地区化似乎是反对西方大国五大垄断的两极分化影响的惟一合理和有效的方式。在这五大垄断的具体基础上，有可能界定我所提议的地区化计划的重要方向，即：该计划应为之服务的优先重点。

当然，只有当民众的民族民主领导集团取代了统治买办集团而使外围国家中的政权性质本身发生转变的情况下，我所主张的国际秩序的转变才会可行。

在这一点上，有可能再看看有关世界秩序的主要问题，以便提出重大的谈判方向和目标，可以组织有控制的相互依存，至少在以下主要问题上服务于世界各国人民：

①重新谈判“市场份额”以及进入市场的规则。这项计划当然对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提出了挑战,后者在“公平竞争”的言辞背后完全充斥着保护全世界寡头的特权。

②重新谈判资本市场体系,以便在南方与北方结束金融投机活动的统治并把投资纳入生产性活动。这项计划对所谓世界银行的职能、甚至其生存提出挑战(世界银行实际上是针对南方的北方银行或者美国银行)。

③重新谈判货币体系,以便建立地区安排和体系,保证汇率相对稳定,并组织它们的相互依存。这项计划对国际货币基金、美元本位制以及自由浮动汇率提出挑战。

④开始一项全世界范围的税务体系,包括对开发自然资源的所得进行课税并根据合适的标准和目的在全世界进行再分配。

⑤全球非军事化,从削减最强大的大规模毁灭性武装开始。

⑥联合国的民主化,办法是建立一个对会员国中民众社会力量更具代表性的第二全体大会。

总的考虑,上述勾画的建议体现了建设服务于世界人民的经济的一种方案。

这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辩论这一点很重要。我的认识是它以无可否认的冲突关系把两者因素联合起来,在现阶段,在资本主义设想和独立于资本主义的设想之间实行妥协(如果有人希望,则可以把这描绘为反制度的)。这是从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漫长过渡中的一个阶段。

萨米尔·阿明

1999年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前资本主义形态	3
第一节 生产方式	3
第二节 社会形态	6
第三节 社会各阶级：各个问题的联结	12
第四节 国家和民族集团	15
第五节 远距离贸易以及封建关系的解体	19
第六节 贸易社会形态发展的障碍：阿拉伯世界与黑非洲	24
第七节 纳贡制社会形态发展的障碍	38
第二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	45
第一节 中心资本主义形态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45
第二节 中心资本主义形态中的资本积累	57
第三节 自由中心式积累的条件：货币制度的作用	61
第四节 自主中心式积累的形式：从周期到危机形势	74
第五节 国际关系与中心地区资本主义国家形态的相互联系	84
第三章 从专业化到依附	109
第一节 国际专业化的基础	109
第二节 不平等交换的理论	113
第三节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主义	128
第四节 外向积累和依附性	160
第四章 不发达的起源与发展	166
第一节 向外围资本主义过渡的理论	166
第二节 不发达经济社会的外向性	170

第三节 贫穷化	201
第四节 依附	208
第五节 对过渡的障碍	243
第五章 外围地区的当代社会形态	248
第一节 当代外围地区的历史形态	248
第二节 外围形态的一般特点	285
第三节 争取一项过渡的战略	317
参考书目	332
人名译名表	364

导 言

直到十九世纪末，一种全世界性的文明开始成形。可是，在历史进程显著加快的二十世纪头七十年间，世界分割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情况仍然很明显；相反，它们之间的差距继续扩大，并使得刚开始形成一个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制度经历了第一批危机。

1917年的俄国革命，1930至1950年间发生的中国革命，越南和古巴的革命，都是以社会主义名义超越了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许多阶段。马克思在上世纪中叶表示的担心欧洲建立起社会主义时资本主义在亚洲可能仍处于上升时期的考虑，并不能得到证实。实际上发生了相反的情况。可是，在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却通过许许多多间接的和未曾料到的途径开始了一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挑战。

对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建立的那套价值准则体系的基础的这场挑战，反过来对“既有体制”和大学的传统社会科学提出了疑问。传统的社会学，不论是功能主义的和结构主义的，都是作为对付历史唯物主义而发展起来的，它有着同样的意识形态基础，它设法显示“全球性和谐”来为既有秩序作辩解。政治学在新闻学与形式主义之间摇摆。至于社会心理学，则继续回避其真正问题——如何建立起联系个人与社会的桥梁——威廉·赖希是个例外，他是一个没有什么追随者的先驱。在互相隔绝的情况下构想出来的所谓“基本学科”的弱点，导致了多学科结合方面的弱点，例如地理和历史。地理学家们满足于罗列事实，而他们学科的根本问题——

自然条件如何对社会形态产生作用——却几乎始终不予置答。历史学在性质上仍然只记述些奇闻轶事：如果起不了重要作用，那就无足轻重。在这种普遍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之中，如果说传统经济学似乎在各部门社会科学学科中状况最不错的话，那是由于两大原因：第一，由于经济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主导地位，因此“经济主义”就成了主导的意识形态；第二，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管理主要是，并且因此是一种经济管理。

由于对发展经济学的批判而使我提出了下列命题，这个命题认为：当一个制度发展过快和新陈代谢时，这个进程首先不是从它的中心、而是从它的外围开始发生的。可以提出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命题——在大量前资本主义制度的外围地区产生了资本主义，以及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

本书第一章谈资本主义的起源，后四章谈社会主义的起源。第二章提出中心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律，第三章提出外围资本主义的规律。以这一双重分析作为武器，我在第四章里说明依附性的机制并指出“不发达的发展”的过程。然后在第五章提出了资本主义世界外围社会形态的清单。

第一章 前资本主义形态

第一节 生产方式

“生产方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含义上并没有从最早区分的社会形态直到资本主义的整个文明史时期的历史顺序。我建议划分五种生产方式：(一)“原始—公社”方式，这先于其他一切生产方式；(二)“纳贡”方式，它对于仍然存在的村社之上加了一个社会和政治机构来通过榨取贡赋以剥削这一村社；这种纳贡生产方式是前资本主义阶级最广泛的形式，我还从中区分(a)它的早期形式，和(b)它的发达形式，诸如“封建”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之中，村社对土地的支配权被封建领主取走，村社仍保持为家族村社；(三)“奴隶制”生产方式，这是一种较不多见的形式，虽然在一些地方是存在的；(四)“简单小商品”生产方式，这种形式虽属常见，但实际上从来没有成为任何社会形态的主导方式；以及(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公社生产方式是为萌芽状态的阶级分野提供基础的最早生产方式。它们保证了原始共产主义过渡到正式的阶级社会。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特征，如居伊·多夸所说，是劳动分工和剩余产品的“原始否定”。由于从否定(无阶级)到肯定(阶级社会)的这种过渡是缓慢而渐进的，所以公社生产方式为数众多、各式各样，由自然条件而定。但是原始公社的生产方式都具有这样的特点：(1)劳动的组织，部分地以个体为基础(核心家庭)，部分地以集体为基础(以“扩大的家庭”为基础，如部族或村庄)，主要的劳动手段——土地——由部族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自由地给予部族所有成员，

但要根据严格的规则(对分配给各个家庭的土地的使用,等等);(2)没有商品交换;(3)产品在本集体内部根据与血缘组织密切联系的规则加以分配。

在这些公社内,取得土地对每个人不一定是平等的。在最原始的公社里,那是平等的,但是在其他公社里,取得土地的权利是分等级的,有些家庭或部族有权得到较好的土地——例如坐落位置方便或面积较大。正是在那个阶段可以观察到萌芽状态的阶级分野。这种特权按惯例总是同政治和宗教权威的等级制度密切相联的。黑非洲提供了这类生产方式的广泛范围——有些(特别在班图地区)只有很少等级,而其他地方则极不平等,诸如在塞内加尔流域的图格雷加纳的阿散蒂以及尼日利亚北部的豪萨,等等。可是,在所有这些人中间,农民可以取得土地:只要他属于一个部族,就有权利得到这个部族的一部分土地。其结果,无产阶级化(即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就不会发生。

纳贡生产方式的特征是社会分为两大阶级:组织在村社内的农民阶级,以及统治阶级,后者垄断着有关社会的政治组织的机能并从村社中征收贡赋(不以商品的形式),当这种生产方式成为一种先进形式时,几乎总是成为封建的——那就是说,统治阶级夺取了村社的土地支配权。

封建生产方式意味着:(1)社会组织成两个阶级:地主阶级(它的财产是不能脱离的)和农奴——佃农阶级;(2)地主占有剩余产品,把它作为一种权利(“应得权益”)而不是通过商品关系而取得;(3)在“领地”内部没有商品交换,领地是这类社会的基层组织。如果封建主因任何原因而要赶走一些佃农、“解放”他的农奴——换句话说,使他们无产阶级化——时,这种生产方式就有分崩离析的危险。纳贡生产方式下隶属于村社的每个农民拥有使用土地的基本权利,这就使得这种分崩离析不可能发生。

奴隶制生产方式把作为奴隶的劳动者变为主要的生产资料。这种奴隶劳动的产品可能进入限于本村社(宗法奴隶制)的非商品转移的循环渠道,或者进入商品循环渠道(希腊—罗马式奴隶制)。

简单商品生产方式的纯粹形式的特征是自由小生产者之间享有平等以及他们之间组织起商品交换。没有一个社会曾经主要以这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然而,经常有一个领域被简单商品关系所支配——特别是手工业生产的领域,当它同农业生产充分脱离联系之后。

纳贡生产方式是最常见地接替公社方式的一种形式;这是一个规律。这个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公社的继续存在与它又被国家所否定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而且,由于这种情况,占有剩余产品的上层阶级就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混淆起来了。这种情况就不可能把生产关系简化为法定的财产关系,而使我们不得不把生产关系从它全面、原始意义上来视为从生产组织中产生的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生产方式有时不精确地被称为“亚细亚”方式,它存在于四大洲:当然有亚洲(中国、印度、印度支那、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古典时代的亚洲)以及非洲(埃及和黑非洲),欧洲(克里特和伊特鲁里亚的前古典社会)和哥伦布到来以前的美洲(印加,阿兹特克等)。

封建生产方式表现为纳贡方式的一种“边缘”状况,其中,村社已特别衰落,因为它失去了土地的支配权。这种边缘性质使我们能把封建形态说明为“中心”纳贡形态的“外围”。奴隶制生产方式也同样处于纳贡形态的边缘(只在例外时出现),它在次序上不是中心而是外围,简单小商品生产方式的情况也是这样。

第二节 社会形态

这些生产方式没有一个曾经以纯粹的状态存在过：历史上的各种社会称之为“形态”，它们在一方面把各种生产方式结合起来，另一方面组织本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联系，这表现在存在着远距离的贸易关系上。

因此，社会形态是具体的、有组织结构，其标志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其周围联结着从属于它的错综复杂的一组生产方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简单的小商品生产方式联系于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纳贡生产方式（不论是“早期的”或“封建的”），联系于一个奴隶制生产方式，或者甚至联系于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样地，奴隶制生产方式可以是不占统治地位的，当它联系于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纳贡生产方式（或者甚至联系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1865年以前在美国）时，总是这样的；或者在例外情况下，它可以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例如在古典古代的社会形态中）。

一切前资本主义社会是联结一些同样因素的社会形态，其标志是：（1）一个公社生产方式或纳贡生产方式占优势地位；（2）在有限领域内存在简单商品关系；（3）存在远距离贸易关系。当一个社会内封建生产方式并不存在或处于萌芽状态、而且没有简单商品关系，那么这样的社会形态只是未发展的公社或纳贡生产方式同远距离贸易关系的结合，这种社会形态是“非洲”型的。

远距离贸易不是一种生产方式，而是独立社会形态联系的方式。它和一个社会形态内部贸易之间的区别即在于此，后者是由简单小商品生产方式或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典型商品交换所构成的（这是这些社会形态的因素）。可是，内部贸易也可以是远距离贸易的延长。

远距离贸易使彼此不了解的社会之间建立相互关系,就是说,它把一个社会不了解生产成本的其他社会的产品带来,把无法找到代用品的一些稀有货品带来,使得从事这一贸易的那些社会集团握有垄断地位而从中获利。当一个社会形态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够先进,由于自然条件方面的困难,或者由于村社的有效抵抗,而使统治阶级从本社会形态内的生产者身上可以榨取的剩余产品比较有限的时候,这种远距离贸易就能起决定性作用。在这些情况下,远距离贸易通过其允许的垄断利润,使得部分剩余产品从一个社会转移到另一个社会。对于从这种产品转移中得利的社会来说,这样的转移活动是极为重要的。有关的文明可以完全依靠于这种贸易,因而贸易路线的改变可以造成整个地区沦于衰败,或者反之,也可以在生产力不发生任何重大升降的情况下使该地区趋于繁荣。

所以,对一个具体社会形态的分析,必须以分析该社会形态产生剩余产品的方式、剩余产品从其他社会形态转移来或者向其他社会形态转移去、以及这些剩余产品在各受益者(阶级和社会集团)之间的内部分配情况为中心。一个阶级分野的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是生产力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分工程度)已足够产生“剩余”——换句话说,生产已超过为保证劳动力恢复所需要的消费水平。“剩余”的这一概念在不同生产方式内具有不同形式——诸如贡赋、实物地租等等的非商品形式,或者商品形式。后者即称为“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剩余价值按照投资资本的比例分配时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就是“利润”。由于一个社会形态是包括若干生产方式的一种有组织综合体,因此该社会形态所产生的剩余不是划一的,而是不同来源的剩余的总和,重要的是,对任何特定的社会形态,必须知道其主导的生产方式是什么,从而知道其主导的剩余形式是什么。然后我们需要了解某一社会

依靠本身为自己所生产的剩余的程度，以及它依靠从别的社会转移来的剩余的程度(换句话说,远距离贸易的相对重要性如何?)。这种剩余在形成该社会形态特点的各生产方式中有关的社会阶级之间的分配情况，以及在这些生产方式联结有关的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分配情况,使我们了解到有关社会形态的真实“面貌”。

因此，对一个具体社会形态的分析要求我们找出某一生产方式如何凌驾于其他生产方式，以及这些生产方式是如何相互联结的。

前资本主义文明史上最为广泛的一组社会形态是纳贡生产方式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社会从原始共产主义出来后就向宗法的形式发展。正是这种发展促进了纳贡生产方式的出现。奴隶制和简单商品的方式是和占统治地位的纳贡方式相联系的，在有关社会里所占地位的重要与否取决于以贡赋形式榨取的剩余的相对重要性。如果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生产力发展的程度)有利，贡赋就大。征收这种贡赋的国家阶级、皇家宫廷，把相当一部分贡赋进行再分配，为供应它奢侈品的工匠提供生计。这些工匠往往是小商品生产者。手工业生产也可以组织在企业内，那里的工人都是奴隶或自由的雇佣劳动者，生产商品。一个商人阶级插入了国家、村社、工匠和企业主(不论是奴隶主与否)之间，并组织这些贸易循环。因此，这些次要生产方式同主导的纳贡方式的联系，就必须以原始剩余的循环来进行分析(正如弗朗斯瓦·魁奈所做的那样)，原始剩余还要加上可能产生的次要剩余(如果企业内的工人是奴隶或者雇佣劳动者)。在这个剩余循环上可能还要加上从外部转移来的一项剩余，如果存在远距离贸易而且被有关社会形态内的商人所主宰的话。在内部来源的贡赋不大的情况下，一个纳贡社会可能是贫穷的:可是，如果它赖以得利的外部来源的剩余很丰富的话，那它可以是富裕的。一些以控制远距离贸易循

环为基础的社会的状况正是这样。这种社会的存在和繁荣，依靠它对其他社会形态(它们产生原始剩余然后转移出去)通过这个社会的中介而相互建立的关系进行垄断控制。这里，我们就有了一类可以称之为“纳贡与贸易”的社会形态。这种关系甚至可以倒转：在该社会形态的水平上，转移来的剩余供养(简单商品生产等)次级循环，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一阶级可以对这种转移来的剩余征收贡赋。

第一类纳贡社会形态即富裕的纳贡社会形态(以大量的国内剩余为基础)，是包罗一切伟大、久远文明的社会，特别是埃及和中国。第二类即贫苦的纳贡社会形态(其特点是少量国内剩余)，包罗古代和中世纪的大部分文明。第三类即纳贡和贸易的社会形态，在不同地方表现出不同的时间长度，决定于贸易路线的盛衰：古希腊，处于盛期的阿拉伯世界，以及黑非洲大草原的一些国家是最突出的例子。

与这类社会形态相比，主要是纳贡类型(纳贡与贸易类型是边缘例子)，那么以奴隶制和简单商品方式为主导的社会形态就是例外了。

以奴隶制方式为主导的那类社会形态不是普遍的，而且实际上在任何地方都不表现为阶级分野的起源。奴隶制生产方式只有在同商品交换相联系的情况下(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才具有广阔的天地。在希腊，我们发现远距离贸易是文明的起源。由于这一贸易的利润，就有可能以奴隶劳动从事商品生产，这就使该社会形态的重心转移。起初，主要的剩余来自外部；然后，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内部生产的剩余日益重要，奴隶生产的某些商品开始用于出口。亚历山大的帝国，以及它的罗马继承者，扩大了这种非凡社会形态的版图。它向东扩展，遇上了根深蒂固的纳贡社会形态，难以通过，于是其重心向北和向西转移到缴纳贡赋较少的地区。即使

在这个王国地区，那里的奴隶制、简单商品生产和对内对外贸易都得到格外发展。但是，公社生产方式（在西方）和纳贡方式（在东方）都仍然存在。这种社会形态之依附于其外界——奴隶的来源地——使其地位脆弱。同埃及和中国文明之久远相比，罗马奴隶制文明的时期是短暂的。蛮族破坏的废墟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纳贡社会形态：即封建欧洲的形态。

简单商品生产方式的优势是更加例外的。在新英格兰，它只存在于1600年至1750年之间；在布尔人的南非，存在于1600年到1880年之间；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存在于白人移民开始到现代资本主义兴起。小农和自由手工业者的这种社会并不附属于纳贡或奴隶制生产方式，而成为主要的社会组织方式，如果人们不知道它们是英国（以及其次在荷兰和法国）封建关系解体的副产品，那就令人难以理解了。由于这种解体而陷于无产阶级化的穷人都移居他乡，他们在移居的新土地上建立的理想模式就表现出这种异常的背景。这类社会形态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向正式的资本主义形态发展。

因此，社会形态的概念实际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累积的。正如达西·里贝罗和席尔瓦·米切莱纳所表明的，它是在一种社会形态的结构内发生的，并使我们能以此标明各个历史阶段。

然而，社会形态的这种历史序列并不是独特的。主要的、最常见的发展路线首先向我们展示一系列公社制形态，然后是一系列纳贡制形态。但是这一主线在纳贡制形态可能出现技术进步（即使是缓慢的）的情况下就相对地受到“堵塞”了。一条次要的边际的发展路线展示了一系列公社制形态，然后是封建制形态（它是纳贡制一类的边缘类型）并具有强大的商品成分（奴隶制商品或非奴隶制简单商品），这证明这一发展路线的原始性，或者换句话说说是

外围性。遵循这一路线,生产力的发展再次同社会关系发生矛盾,其结果就是资本主义形态的产生。

社会形态的历史序列,同它们所结合的生产方式之缺乏序列相对照,表明:在结合进属于不同时代的社会形态中的同样生产方式之间寻找任何类似之处——例如在非洲奴隶制或罗马奴隶制之间、以及同十九世纪的美国家奴隶制之间——那是荒谬的。

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都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优势为其标志。这些社会形态的一切产品都是商品,而只有先前生产方式的剩余结合进去的那些产品才能较早地采取这种形式。在所有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存的手段不是交换对象(从而把“自给经济”应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剩余往往以商品以外的形式来转移(作为贡赋或实物地租)。而且,由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标志是不同生产方式的稳定共处,按等级层次联系和安排在一起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往往是排他性的,摧毁其他一切的。但是,可以看出:决定这种排他性倾向的条件,在于它必须以扩大和加深国内市场为基础。这适用于中心国家资本主义形态的情况而不适用于外围国家资本主义形态的情况。在后者,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宰并转变其他的生产方式,剥夺它们自身的独特功能以便使它们从属于它,但不是激烈地摧毁它们。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也表现在另一方面。它组成了一个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一切社会形态(中心与外围都一样)都按照一种单一的、有组织的、有等级层次的体系来安排。因此,并没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世界市场,而只有一个市场,即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东欧位于它的边缘。

第三节 社会各阶级: 各个问题的联结

对一种社会形态进行分析, 意味着搞清该形态内剩余的产生与流通, 就显示了“阶级”与“社会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有阶级划分的生产方式都决定在该生产方式内既对立又联合的一对阶级: 在纳贡制方式内是国家阶级和农民, 在奴隶制方式内是奴隶主和奴隶, 在封建制方式内是封建主和农奴, 在资本主义方式内是资产阶级和无产者。这些阶级中每一个阶级的定义都以其在生产中完成的功能而定。对生产活动这样的强调不能简单理解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纳贡制方式中的国家阶级并不拥有土地, 土地是属于村社的。封建主只享有对土地的支配权, 而村社掌握使用权。但是国家阶级和封建主都组织并计划生产, 因此以这种方式“统治”了生产活动。公社制和简单商品生产方式都只是决定一个生产者阶级, 事实上是一个社会阶级, 那就是说, 根据生产活动下定义的一个集团: 隶属于村社的农民阶级, 以及自由小商品生产者(农民和手工业者)阶级。至于剩余的流通过程, 当流通的剩余采取商品的形式时, 我们就能划定另一个阶级: 商人阶级。当剩余不是采取商品形式流动时, 承担这一职能的就是该生产方式中的统治阶级, 它通过国家阶级代理人征收贡赋或者要农民直接向地主支付实物地租。

由于一种社会形态是一组生产方式, 因此每一个社会实际上提供两个以上阶级的一个复杂集团的图象: 在封建时期的欧洲, 有封建主、农奴、自由农, 生产商品的手工业者和商人; 在帝国时期的中国, 有朝廷和“士绅”、官员、公社农民、自由小手工业者、企业主雇来生产商品的雇佣手工业者以及商人; 在古典古代, 有奴隶主和奴隶、自由小农或公社小农以及商人; 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 有资产

阶级、无产者和小商品生产者。

一个社会不能简化为它的基础结构。后者(换句话说,就是一个社会的物质生活)的组织方式要求进行某些同主导的生产方式有关的、同组成该社会形态的各种生产方式的联系有关的政治和思想职能。这些职能可以直接由上述阶级直接进行,或者由依附于它们的社会集团来进行。一个特定社会的真正结构将由这些集团显著地标志出来。其中最重要的是“官僚机构”,它保证国家的运转:它有一个文职分支(贡赋征收官、警察和法官),以及其他分支(军事的,宗教的,等等)。但是这样规定的官僚机构不能和纳贡制生产方式的国家阶级或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资产阶级”混淆起来(即使是广义地)。官僚机构并不完成对生产进程进行直接统治的职能,而国家阶级则指导这一进程本身,计划并组织生产,如同在中国和埃及。国家资本主义的情况也是这样,在那里,国家资产阶级指导企业,决定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俄国“科技治国论者”和“官僚”之间的内部斗争反映了这一区别。

一个阶级和为其服务的集团之间的矛盾这个例子,表明还有另一个问题有待澄清,那就是:一种生产方式不同“情况”之间的关系。既然社会不能简化为它的基础结构,那么后者(经济问题)与社会的上层建筑(政治—意识形态问题)之间的关系又如何规定呢?在一切生产方式中,这种关系都不是同样的。当然,不论生产方式可能是什么,经济问题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如果我们同意物质生活决定社会生活的一切其他方面的话——换句话说,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剩余的相对数量,那么它就决定文明的水平。可是,重要的是,应分清这个归根到底的决定同某种情况下经济问题还是政治—意识形态问题起主导作用的问题。

在所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剩余的产生和使用是十分明显的。所以,生产者能同意从他们那里征收自己生产的剩余,而

且只有当他们处于“异化”的情况下才知道自己在生产，并相信这种征课对于社会和“自然”秩序的生存是必要的。因此，政治一意识形态问题必须采取宗教的形式并控制社会生活。而且，在这类情况下，如果剩余不被“正确地”使用，那就是说：如果剩余被掠夺性的侵略者或“昏君”所“滥用”而不能保持、再生产并发展国家和文明的话，生产者就会起来造反以便建立一个“公正的政府”，因为自然秩序和神圣法律都已被破坏了。当保持和发展这种社会秩序要求特殊的社会集团（诸如文职或军人官僚政治集团，或者为纳贡制国家阶级服务的神权政治集团）恰当地活动时，那么这些集团就在有关社会的政治史上占有中心地位。对这种历史的实际观察家们以为自己所见到的就是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结果，那他们就和他们所研究的社会一样成了同一异化的牺牲品。

相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剩余的产生是模糊的，难以了解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论〉中主要的东西是它表明剩余价值如何转化为利润。思想狭隘的“经济学家们”从这种转化中看到一种正式的矛盾（所谓的〈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的矛盾）。这只代表他们是经济异化的牺牲品。马克思揭示这种转化的影响，是要促使利润来源于剩余价值的现象趋于消失，促使“资本”这一社会关系看起来是一种“物”——一种体现这一社会力量的生产资料。这种“物”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具有“生产性”。马克思对此使用的名称“拜物教”是十分合适的。因此在外表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似乎和劳动一样是生产性的。工资似乎是劳动的“公平”报酬（而事实上，工资代表劳动力的价值），而利润则是资本所提供的“服务”（冒风险，通过节制而进行储蓄，等等）的补偿。社会再也不能控制其物质生活的演变了：后者看来成了象物理法则、自然法则一样支配它的“法则”的结果。“经济法则”——有关商品、劳动、资本等等的供给与需求——就是这种异化的见

证。因此，“经济科学”作为一种思想出现了——“普遍和谐”的思想——把“社会法则”降为不受社会组织影响的自然法则的地位。当经济问题被神秘化所掩盖时，政治却解除了神秘：它不再采取宗教的形式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宗教是“经济主义”，或者用日常的通俗话语来说，就是金钱崇拜，就是不管需要地为消费而消费。当前文明的全部危机即在于此：因为这种思想使社会在时间上目光短浅，看不到未来。与此同时，政治成了公开坚持的理性占上风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活动的社会集团都自然而明显地为社会服务而显得都不是社会的主人。

对这些问题联系方式的分析，补充了社会形态的分析。把这些分析一起加以考虑，就能使我们了解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力量。实际分析可以任意用不同数量来进行社会“分类”：二类（“富人”和“穷人”）或三类（加上“处于贫富之间的人”）或者十五类或二十类（职业类别或收入类别）。极而言之，按照这种方法，最后可以把每个人分为一类，这样就符合于取代社会科学的这种思想的个人主义要求了。而社会的力量就变得不可理解了。

第四节 国家和民族集团

对一种社会形态的研究，必然会导向考虑国家的问题，考虑如何规定构成一个特定社会形态的、确切标明的社会集团的定义。传统的社会科学回避了这个问题，有关国籍的神秘基础也对我们无助。斯大林把这一社会现实限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规定一个国家存在的前题是有着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市场。这种阐述是不能令人同意的，因为很清楚，中华帝国或古埃及并不仅仅是各民族的总合，而是在这方面和野蛮的高卢或日尔曼以及和文明的印度都很不相同的。

我要为两个概念规定定义：“民族集团”和“国家”。前者的先决条件是人群的共同语言和文化以及同一地域；而且，首先是意识到这种文化的相同性，即使这不是完美的，这个“省”与那个“省”之间有着方言或宗教信仰的不同。国家的先决条件是民族集团，但要超过它。根据萨德·扎赫兰的看法，除了上述特点以外，还有一个社会阶级来控制中央国家机器并保证居民生活在经济上的统一，在这个时候——就是说当这个主导阶级组织剩余产品的生产、流通和分配而使各省的命运结为一体时，国家就出现了。

因此，在一些地区，当灌溉的控制必须实行全国范围的行政集中和生产计划时，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阶级就把一个帝国转变为一个国家（如果它本已有了相同性）。中国的例子（尽管它有明显的地区不同），以及埃及的更好例子，是最有说服力的。如果民族相同性没有达成，或者尚无经济统一，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帝国，而不是一个国家——例如印度。

国家阶级并不是国家的现象发源时所具有的唯一前资本主义阶级。纳贡和贸易形态或奴隶和贸易形态中的商人阶级可以完成同样的职能。在这种事例中，通过这个阶级所控制的剩余产品的流通而带来了统一。古希腊或阿拉伯世界构成这类国家的例子。在希腊，存在一个国家，虽然缺乏一个中央政权，这个中央政权尚在孕育之中，其形式就是希腊各城市之间的同盟和联盟。在阿拉伯世界，民族的相同性（即共同的语言和文化，虽然在帝国内部存在某些少数例外的小块地区）因经济统一而得到加强，这在阿拉伯世界兴盛的年代里，在商人和军人宫廷统治阶级（形成一个商人—武士的单一阶级）的领导下，通过商品、思想和人员的流通而表现出来。一个阿拉伯国家的确曾经存在过。

当缴纳贡赋的下层处于不稳定时，以这种方式建立在商人阶级之上的国家就是不稳定的。因此可以说，如果国家是可以在任

何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而且不一定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那么国家的现象是可以逆转的;它可以昌盛,也可以消失,决定于起统一作用的阶级是加强它的力量呢还是失去这种力量。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有关社会就后退而成为一个民族集团的综合体,可能会日益分化。这里,阿拉伯世界的例子也是很说明问题的。因为大部分剩余来自远距离贸易的利润而不是社会自身内部所产生的,因此这种剩余的盛衰也证明是阿拉伯文明和阿拉伯国家的盛衰。贸易的衰落造成了商人—武士阶级的衰落。有一系列主要的历史事件标志着国家退步的这些阶段:十字军以及贸易中心从阿拉伯城市转移到意大利城市;巴格达于十三世纪在蒙古人进攻下陷落;然后是十六世纪奥斯曼征服,使同期内贸易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与此有关的还有欧洲同季候风的亚洲与黑非洲建立直接接触,从而剥夺了阿拉伯人的中间人地位。

在黑非洲也有类似现象。沿撒哈拉南侧的整个大草原地区,加纳、马里和桑海的历史大国和豪萨城市的基础都是纳贡和贸易的社会形态。这里,当时至少有国家发展的萌芽阶段。但是,由于穿越撒哈拉贸易的结束和整个大西洋地区奴隶贸易的发展而使得所有这些社会形态很快解体。

阿拉伯国家的消失,使得那些能完全靠内部产生剩余而生存的国家重又获得生机,那就是:永恒的埃及国家。掌握着埃及国家复生的社会阶级是官僚地主贵族。这个国家阶级在十八世纪通过阿里·别依、在十九世纪特别通过穆罕默德·阿里来重新掌握指导和计划经济并组织其征课的剩余进行流通的职能;换句话说,它恢复了对国家经济统一形式的控制。

在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方——十五世纪以后的摩洛哥和突尼斯,阿布德尔·卡德尔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十九世纪在马赫迪主义统治下的苏丹,在也门或黎巴嫩——成立国家的企图没有取得

多大进展，在有些情况下是因为它们遭受外国干涉的打击（例如在阿尔及利亚和苏丹），但是主要因为当地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尚不可能榨取足够的剩余来供养一个可能承担组织国家的阶级。那个阶级的命运决定于它有没有能力通过大规模的贸易来取得来自国外的剩余——从而也就是取决于该社会的外部环境。而这里的剩余为数极少，不足以促成经济统一；它的流通范围极小，所以上述社会都仍然是各地区的一个综合体而不足以结合起来组成一个国家。

基于同样的原因，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各邦在撒哈拉贸易消失以后，即使作为萌芽状态的国家也无法生存下来。

封建欧洲的社会形态也没有成为国家。在这里，内部剩余比较大，但是这种剩余根本不会流通到它发源的采邑范围以外，至少在中世纪早期是如此。可是，从十三世纪以后，特别是在十六世纪之中和以后，在大西洋欧洲（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远距离贸易由于增加了外来的转移价值而增加了剩余量。实物地租让位给货币地租，这刺激了手工业者简单货币生产的繁荣，这增加了远距离贸易的影响。上述四国的绝对君主制集中了比重越来越大的剩余，依靠重商主义时代商人的帮助来保证其流通，并集中他们领域中的土地来组成国家。

虽然国家肯定比资本主义更为古老，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在国家的发展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在这种生产方式之下，经济集中的程度发展到空前的高度，因为不仅是剩余，而且是所有的生产都成了商品生产。劳动力本身也成了商品，而且，通过国内移民而使人民更加紧密地一体化。商品形式的资本带来了市场的一体化，加上一个集中的货币体系和财富的流通。

因此，国家的存在意味着主导的阶级可以在有关的社会里追求全国领导权，意味着它已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阶级，有全国范

围的组织和等级，有别于由一些并列的独立集团组成的那些主导阶级。这种一体化在历史上被视为富庶的纳贡制的国家阶级；在例外情况下，在商人阶级所主宰的社会出现巨大繁荣的时期在商人阶级身上发生过；尤其是，这种情况也出现在资产阶级——至少在主要的资本主义结构中。

第五节 远距离贸易以及封建关系的解体

在有关资本主义起源的辩论中，有两派观点互相对峙。对其中一派来说，资本主义之产生，是由于十六世纪地理大发现和大西洋贸易的结果；对另一派来说，资本主义是由于封建关系之解体而产生的。

实际上，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实质上有两个：无产阶级化和货币资本的积累。虽然，货币资本的积累发生于东方、古代和封建世界的所有贸易社会，它却从来没有导致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因为缺乏可以得到自由劳动力的供应。这种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把一部分农村人口从乡村社会中排除出来——就欧洲而言，是由于封建关系的解体。但是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正是由于缺乏这种联结，因此我们不能说“古代世界的资本主义”或者“东方帝国的资本主义”。

用“重商主义资本主义”的名称来描述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之间的欧洲历史时期（1600—1800年），或许造成了许多分析上的错误。这是一个含糊的名称，因为这个时期实际上是个过渡时期。在那个事件以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就过渡到了资本主义。但是在工业革命以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际上尚未存在。那个时期的标志是：（一）封建生产方式在当时的社会形态内继续占优势；（二）远距离贸易的繁荣（主要是大西洋贸易）；（三）后者的发展对

封建生产方式的影响，封建生产方式解体了。只有这第三个特征使这段时期成为过渡时期。由于封建生产方式是纳贡制生产方式的特殊形式，因此远距离贸易可以使之解体。

当然，货币与贸易早于资本主义。只要生产者获得了剩余，以及当包含这种剩余的产品因分工而有可能进行交换的时候，货币与贸易就出现了。但是并非所有的交换都是商品交换：在前资本主义时代里，在单一社会（同一村庄中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内部的小生产者（不论是结合为集团的或是独立的）之间发生的大部分交换，都是在没有任何专业商人充当中间人以及往往在货币不起任何作用的情况下进行的。

可是，只要当这种剩余的很大部分集中到掌握强大特权的阶级之手（封建主、君王权贵等）这种剩余就能用于远距离贸易——往往用来交换其他社会生产的奢侈品。于是，一个中间商人就能利用他的垄断地位来沟通不同社会而从中获利。然而，他所赚取的利润根据的是主观价值（社会效益）的差别，这是在两个互不了解的社会中不均等地估算出来的——那就是说，交换稀缺产品的社会并不知道相互的社会生产成本——不应当和商业资本所赚取的利润（或收益）相混同。

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贸易才会成为工业生产那样的资本主义活动，而且，商业资本最后才会作为总资本的一部分。从那时起，商业资本就参加到平均利润中来。因此，商业资本的利润来自一种社会形态中产生的剩余价值的再分配，来自这种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之转变为资本的利润。前资本主义的商人从享有垄断而得到他的利润。在远距离贸易中，这种垄断有可能把一项剩余从一个社会转移到另一个社会。正因为涉及的是一项垄断，因此完成这一职能的往往是一些独特的社会阶层——专长于这一活动的特殊阶层或民族集团（“民族—阶级”），例如中世纪欧洲的

犹太人或西非的迪乌拉人。一些城市可能构成一些社会，起到相距较远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中间人的作用：例如腓尼基城市和希腊城市，十二至十六世纪内的意大利城市，豪萨城镇等。当商人们并不聚集在独立城市中或阶级中，或者并不以民族或宗教来区分时，他们就组织成一些不开放的团体，例如欧洲的“商业冒险家”组织或者过去存在于中国的商行。

这种垄断的完整程度是和进行贸易的距离以及和有关商品的稀缺成比例的。如果专业化商人所影响的社会形态内部存在商品交换的话，这些商人也会把自己组织成垄断势力的，不过那是不稳定的，而且不会带来象远距离贸易那样的巨大利润。

这种贸易总会带来货币财富的集中。但是这种集中不是资本主义。只要常规的编史学把货币和资本混为一谈，把贸易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它就会到处发现资本主义——在古代中国，在中世纪的腓尼基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中间，等等。那么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只有“欧洲的资本主义”有所建树呢？为了答复这一点，有人就求助于宗教（马克思·韦伯和新教伦理），或者求助于种族（日尔曼民族的民主特性，或者更微妙地说，欧洲的“希腊传统”）。

实际上，货币财富集中到商人手中并没有自动地导向资本主义。要使得资本主义发生，还需要打破那种社会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远距离贸易对此也有作用。这种“打破”能导致无产阶级化，那就是：使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开，以便打开自由劳动力市场的道路。这种“打破”在欧洲发生了，但是没有发生在中国、阿拉伯世界或其他任何地方。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情况怎么样？

要回答这些问题中的第一个，我们需要更加仔细地观察封建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由于蛮族的欧洲同古代文明的地区相比是

落后的,那里不能建立一个成熟的纳贡制生产方式:因此封建主义就作为一种萌芽状态的不完全的生产方式而出现了。由于没有一个坚强的中央政权来把剩余集中起来,这就赋与地方的封建主更多的直接权力来统治农民,土地支配权成了他们的。而在具有伟大文明的充分发展了的纳贡制之下,国家则保护村社。在那些文明中,只有在衰落的时期,当中央政权受到削弱时,社会才变得封建化,而这种封建化看来是一种后退,一种对理想模式的偏离:农民造反摧毁了封建主,结束了他们的“滥用权力”,重建了国家的中央集权,从而重新确立了纳贡制。

封建社会的落后性也意味着商业部门获得更大的独立性。逃避封建专制的农民,后来还有封建主为了使生产组织现代化而驱逐的人们,在自由城市中形成了一个无产阶级,供控制这些城市的商人们任意支配。自由手工业工人和雇佣劳工的商品生产发展起来了,两者都是由商人支配的。

所以,商人们在远距离贸易方面的所作所为能够比他们的同行在纳贡制社会形态中的成就更多。从十六世纪以后,美洲的大西洋贸易导致新的重商主义制度产生了一个外围。这项贸易不再仅仅包括收购当地社会可以提供的产品;这些社会被直接征服,以便使它们可以组织起来生产向欧洲销售的商品。在贯彻这一目标时,商人们得到新生的中央集权君主制的支持,他们支持商人的雄心壮志,通过他们的繁荣所带来的财力可能性,提供了吸收专业人员队伍和行政管理集中化的方便。

这种以美洲不独立生产者为基础的贸易所带来的新财富的流入,反过来对这种社会形态的封建部分产生影响,加速了封建关系的解体。为了得到新商品,封建主就必须使自己的剥削方法现代化,榨取更多的剩余并使之转换为现金。这种现代化使他们把过剩人口从土地上赶走,正如英国圈地运动中所发生的那样。实物

地租逐渐被货币地租所取代。

封建农业演变成为资本主义农业，或者通过封建主自身成为资本主义地主，或者通过解放农民而使一个新“富农”阶级得以出现。所有这些重要的社会现象加在一起，似乎肯定了这样的看法，即：那是由于欧洲农村社会的内部演变才产生了资本主义，大西洋贸易在这一过程中并不起决定性作用。

为了了解这些变化的性质，有必要象P. P. 雷伊那样表明资本主义形态怎样把所有权同土地结合起来并改变其意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纯粹形式只意味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相应的两种收入形式：资本的利润和劳工的工资——正如封建生产方式只意味地主和劳动农民两个阶级以及地租和农民自留粮两种相应的收入形式。但是，决定社会产品各成分如何产生和分配的法则，这两种生产方式则是不一样的。利润的先决条件是资本，换句话说，是把属于社会劳动产品的生产资料占为私有；而地租则来自某一特殊阶级把并非社会劳动产品的自然资源加以垄断。资本的先决条件是雇佣劳动力，换句话说是自由劳动力、一个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的出售。相反地，地租的先决条件则是劳动农民缺乏自由，就是说他被“束缚在土地上”——这种形式不一定是法律上对他的自由加以限制，而更加一般地意味着他还能得到土地。资本实质上是能动的，马克思从中推断出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这保证各个资本的均等收益，然而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则实质上是静态的，各块土地的地租都不同。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纯粹形式，其先决条件就是资本家自由取得自然资源，马克思强调土地所有权的非资本主义性质（例如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可是，资本主义形态并不是在真空中发展的，也不是无中生有的——它们首先是在过去存在的形态中成形的，是在早先生产方式的特殊关系所没有控制的新部门（工业部门）中产生的。最后，当资本主义

在整个形态中占了统治地位时，它就完成了对农业的变革(农业中的土地所有制曾经是资本主义的障碍)。所以，地主(或者地主的职能)不再在农业中起决定作用，他的地位被资本主义农场主所取代(或者当地主本人承担起农场主的职能时，农场主的职能就取代了地主的地位)。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形态中，不再存在任何封建的、前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地主”，而只存在农业资本家了。

因此，远距离贸易和封建关系的解体这两大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货币财富之集中于一极，就产生了潜在的资本：这首先发生在商人中，然后在新的农业资本家中。但是，只是由于封建关系的解体解放了劳动力的供应并使农民无产阶级化，才使潜在的资本成为真正的资本。农民成为雇佣工人，受雇于新实业家或者资本主义地主和乡间的农场主。

第六节 贸易社会形态发展的障碍： 阿拉伯世界与黑非洲

关于远距离贸易与前资本主义关系解体之间相互作用进程的意义，如果我们把欧洲的发展情况同其他前资本主义形态的情况相比较，就可以较容易地理解。

阿拉伯世界的例子是：在这种社会形态里，远距离贸易起了格外重要的作用，但却不能发展起本地的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这样呢？

阿拉伯世界半干旱的边境地区绵延数千英里，象带子一样横贯旧世界，穿越大西洋与季候风亚洲之间。它在这个地区占有的区域同欧洲隔着地中海，同黑非洲隔着撒哈拉沙漠，同土耳其和波斯“世界”隔着陶鲁斯山脉、库尔德斯坦和伊朗西部。阿拉伯世界同伊斯兰世界不是等同的，后者从广义上讲包罗这个半干旱地带的

全部，人口分为四个民族——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波斯人和印度—阿富汗人。这个伊斯兰世界只在边缘上涉及一部分季候风亚洲(孟加拉、印度尼西亚)，在更晚近的时期里涉及一部分黑非洲(西非平原和东部沿海)。阿拉伯世界不能视为一个种族现象，因为阿拉伯化的过程包罗混和了多种多样的民族。阿拉伯世界只在它历史上的一个短时期内(只有二百年)组成一个比较中央集权化的政治实体，在那个时期里(公元750年至950年之间倭马亚朝和第一次阿拔斯朝时代)，语言上的统一远不如今天那样先进。然后阿拉伯世界分裂为若干比较稳定的地区性政治实体，直到后来它们被奥斯曼外国统治者控制以前，它们没有再统一起来(当时只是表面的统一)。

至于它们在殖民地以前的社会形态，阿拉伯各国并不构成一个同类的整体。阿拉伯世界同中世纪欧洲很不一样。它总是分为三大地区，在社会结构、政治和经济组织上很不相似：东部(马什拉克)，包括阿拉伯、叙利亚(即现在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以色列诸国)和伊拉克；尼罗河地区(埃及和苏丹)；以及西部(马格里布)，从利比亚展延至大西洋，包括现代的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诸国。在整个地区中，唯有把阿拉伯世界一分为二的埃及始终是农民文明。在这块半干旱地区的其他地方，农业活动总是很不稳定，从农业生产者那里可以征课的剩余总的说来非常微薄。农业生产技术必定不很先进，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农业人口的生活水平接近于仅足糊口，因此社会组织的形式必然带有原始集体主义的特征。并没有足够的基础来征课大量剩余而可能产生一个封建阶级结构或者甚至产生辉煌的文明。

然而，马什拉克(特别是它，可是马格里布也一样，虽然后者是在较小程度上)一直表现出丰富的文明，而且肯定是城市性质的文明。这一“奇迹”怎么会发生的呢？我们如何解释这种明显的异

常：富庶的埃及(这片干旱地区中唯一的大片绿洲)一向是个农民国家，它在近代时期以前城市发展较少，甚至在它古代文明的伟大时期中也是这样；而在历史上有着同等光辉时代的马什拉克却始终是一个大城市地区？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从它真正的背景上把阿拉伯世界视为伟大的通道地区，是旧世界各个主要文明地区之间的某种转换点。这个半干旱地区分隔开三大农业文明地区：欧洲、黑非洲、季候风亚洲。所以它总是起着商业的作用，通过它作为唯一中间人的地位，使原先相互没有直接了解的各个农业社会建立接触。阿拉伯世界的文化所赖以建立的社会形态在性质上始终是商业性的。这意味着维持城市生活的剩余主要并非来自剥削本地区的农村居民，而来自它的中间人垄断地位所保证的远距离贸易活动的利润——就是说，这一收入最终来自其他文明社会的统治阶级榨取农民所得的剩余。

这种类型的贸易形态，是马什拉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特点。此后，该地区被结合进帝国主义范围(这在奥斯曼时期只是表面地开始)，在伊拉克的阶级结构上带来决定性的变化，但是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只带来较小变化。在阿拉伯世界的另一端，在马格里布，这个类型的社会在法国殖民征服以前始终是该地区的特点。马格里布的殖民地化开始早于马什拉克，而且影响更深，这对现代的马格里布带来决定性的变化。在这两个地区之间，埃及仍然是个例外，它是很好结合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农民纳贡制形态。

伊斯兰是在沙漠地区的阿拉伯诞生的，它的人口是一批游牧民族，专门从事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同南阿拉伯、埃塞俄比亚和印度之间的大规模贸易。由于有了这项贸易中取得的利润，才有可能建立赫贾兹这个城市商人共和国。这些城镇对周围小块农业绿洲

地区的统治(它们在半农奴基础上加以剥削)完全不是商人统治阶级的主要收入来源。至于游牧民族的自足经济则和商业活动并存着,它提供后者以人力和牲口,但是不贡献任何剩余。因此,沙漠文明是它所联结的东罗马帝国和季候风亚洲文明的先决条件。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源源流入远距离贸易的剩余一旦枯竭,或者商路一旦改道,沙漠就会死亡。这在历史过程中曾经数度发生过,而沙漠民族在每一次都成为征服者并努力生存下来。

被阿拉伯人首先征服的那部分“文明世界”是肥沃的新月地带——沿阿拉伯沙漠北边的叙利亚和伊拉克。阿拉伯人对这一带地区很熟悉,因为古代东方的社会大部分是同阿拉伯人一样的商业社会。在这个半干旱地区,肯定有一些农民,而在这个地区以南则根本没有。但是这些都是山区农民,他们始终在黎巴嫩、安萨里耶山、陶鲁斯山和库尔德斯坦的山区坡地上活动,那里的降雨量刚好够他们生存。那些农业地区虽然号称“肥沃”,却是太穷了,不足以提供必要的剩余来支持一个光辉的文明。所以他们仍然保持“原始状况”,生活在比较隔绝的村社之中,小心提防地保卫着自身的独立。但是文明却在这个区域边沿的两个特殊地区发展起来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地中海沿岸。美索不达米亚由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提供的特殊自然条件而发展起第一个真正的农业文明。那里出现的社会组织类似于埃及,建立在城市向邻近农村收取剩余的基础之上。如同位于沙漠边缘的所有农业文明一样,它生活在蛮族破坏的经常威胁之下。确实,它曾在公元十世纪和十一世纪被土耳其—蒙古侵略所摧毁,直到1918年在英国统治下的和平的庇护之下才重新建立。西面的海边,由于农业奇迹不可能出现,腓尼基和叙利亚的城邦从别处得不到资源,只有从船只或商队装运的远距离贸易。因此,来自沙漠的阿拉伯人在这里感到相当安逸,他们在大马士革建立了他们倭马亚朝的新首都,就把麦迪纳贾

易文明向西北转移。他们这样重新取得对商路的控制以后，就再次享有大规模贸易的利润并复兴了他们的文明。

肥沃的新月地带的统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真正破裂。但是这始终是一种具有差异性的统一；然而，这种差异性不在“文化方面”，更不在种族方面。这个地区里各族人民的融合是古已有之，要在这样虚弱的基础上来分清这个与那个民族，那是无济于事的。这样一类文明地区的特点，其实质在于：它使分隔的两个地区取得接触的商业作用，在于：辩证地看，它既是统一的，又是割裂的。它是统一的，因为它使人们不断地来来往往，传播风俗与宗教，一种旅客的混合方言成了主要的语言。它是割裂的，因为它的基础是对立商业城市之间的竞争。这里主要不在于详细的事态发展，重要的是有没有一个单一的正式政治权威。如果这样的权威很强有力，当然它就会对各城市之间的竞争加以限制，时常保证首都的优越地位。那就是以大马士革为中心的倭马亚朝，以及后来以巴格达为中心的阿拔斯邦。为了维持其统治，它必须支配一支吸收邻近游牧民组成的雇佣军。至于农民，他们力求在山区保持隔离，半奴役性地依附于地主（总是居住在城市中的遥领地主——商人、朝臣，等等），居住在城市附近地区——或者例外的是下伊拉克，它组织为“罗马”型的商品生产和奴隶劳动的种植园。从公元700年到1900年的一千二百年中，肥沃的新月地带就这样既统一又分裂，经历了一个盛衰相继交替的时期，决定于联结拜占庭和西欧的对印、对华贸易商路。

肥沃的新月地带很快地阿拉伯化了。早在伊斯兰入侵的前夕，当它还处在基督教的时期，通过阿拉米语的胜利而使它在语言上统一了。阿拉米语本身就是一种闪米特语，所以可以毫不困难地让位给阿拉伯语。这个地区的语言统一许多世纪以来实际上能保持完整，如果我们不把一些只有口音不同和一些习惯口语不同

的说话方式看作不同语言的话。这里说的是非常纯粹的阿拉伯语，而从耶路撒冷到土耳其边界的特点则是同样的“叙利亚”口音。巴勒斯坦是这个马什拉克的一部分，没有更多情况。

但是，马什拉克深刻的文化统一并不意味着没有差异性，例如在各个城市同各个小块农村地区之间。乡村各区已经相互隔离一千二百年了，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没有什么影响。它们对于帝国当局要统治他们的企图，用武装和宗教不满来加以抵抗。因此，在马什拉克，唯一真正的农村地区在宗教上都是不信国教的：黎巴嫩山区分为马龙派天主教徒和什叶派穆斯林；安萨里耶山区和叙利亚的德鲁斯山是阿拉威派的老家，下伊拉克都是什叶派人口。很早就分裂了穆斯林世界的什叶派异端发现山区的自由居民社会是一块乐土。在这种情况下，它发展了一种比“正统的”逊尼教义自由得多、更具批判精神、以及甚至带有平等的精神。这也是它成为下伊拉克暴动农奴的思想的原因（卡尔马特教派暴动）。

我们不能在这里谈论“封建主义”，即使在大规模贸易下降时期中“半封建”形式确实发展过。在平坦的乡村地区，城镇人士可以更容易地统治；因此他们习惯于靠剥削农民贡赋来弥补他们在远距离贸易收入方面的损失。贝卡、巴勒斯坦、胡姆斯、哈马和中部伊拉克的平原就以这种方式有时被贪婪的地主所控制，特别在奥托曼时期（从1500年起），这是一段商业衰微的漫长时期。更晚得多的时候，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因灌溉工程而有可能进行的对农业地区的现代方式剥削在大庄园占有的地区发展得更广泛了。

然而，这里重要的不是乡村而是城镇。这里有一些巨大的城市，当商业开始衰落时它们的规模确实已极为庞大；它们都属于古代、中世纪以及资本主义时期以前人口最多的现代城市，比西方城市要重要得多。阿勒颇、大马士革、巴格达、巴士拉和安蒂奥克

都有几十万居民。它们在最兴盛的时期里包罗了本地区的大多数人口,当时该地区超过五百万居民,这比二十世纪初那里的人口还要多。这些城市是朝廷和商人的中心,周围聚集大量工匠和职员。它们是商业城市,象意大利的城市那样,在中世纪西方与它们遥相呼应,或者象汉萨同盟。这些城市所积累的财富表明了它们的辉煌文明。但是这种积累并没有导向资本主义,这正是因为乡村地区与世隔绝而并没有“封建化”。马什拉克的城市就这样保留了它们的商业的而并非资本主义的性质,从而组成一批相互竞争的小世界:它们非常先进的手工业生产向它们的商贾行旅足迹到达的那些远方市场去寻求出路。这个占统治地位的城市世界的文化统一是很卓著的。这些城市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中心,逊尼正统派的城堡。

在阿拉伯世界的另一个极端,在马格里布,也可以找到同样的结构。在那里,游牧民和垦殖民从无可记忆的时候以来就进行着斗争以占有挤在海洋、山岭和大沙漠之间的一小条领土。罗马帝国在疆界沿线构筑了一系列堡垒哨所,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把柏柏尔垦殖民的地区往南推移,柏柏尔人原先侵入了游牧民和半游牧民(他们也是柏柏尔人)驰骋漫游的土地。早在阿拉伯人到来之前,罗马帝国的衰落使得游牧民得以从垦殖民手中收复了一些领土。

当阿拉伯人到来的时候,他们在山区农业人口中遇到了在他们之前其他人所经历过的同样抵抗。然而,他们逗留在这些地块的边缘而在平原建立了城市。这些城市,正如在东方一样,如果在大规模、远距离贸易中得不到难以从垦殖民那里抽取到剩余的那些资源的话,是不能生存下来并且繁荣发展的。由于要从贸易中寻求收入,因此驱使阿拉伯人越来越远离家乡,跨过地中海,还跨过撒哈拉。在南方,他们遇到了柏柏尔游牧民,后者也同他们有同

样的利益，想成为繁荣商业的队商。这些柏柏尔人比农民的阿拉伯化要快得多，他们对阿拉伯人的城市文明没有兴趣。伊本·卡尔顿对中世纪马格里布这些社会形态的性质作了完美的分析。他的智慧与精确性可以使今天阿拉伯世界的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羡慕，他分析这些社会形态不是建立在向本地区农民抽取剩余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大规模贸易的利润基础之上的。正是以这个方式，马格里布所有的大邦都建立在黄金贸易之上的，这些黄金都来自西非。许多世纪之久，在发现美洲之前，西非是向旧世界西部地区输送这种黄色贵金属的主要供应者——供应罗马帝国、中世纪欧洲、古代东方以及阿拉伯世界。这种黄金贸易滋养了撒哈拉以北的阿尔莫拉维德、阿尔莫哈德等邦，滋养了大沙漠以南的加纳、马里和桑海各邦。这些社会形态的结构非常相像，伊本·卡尔顿同当时的阿拉伯旅行者（例如伊本·巴杜塔）都把它们列为同一类型。

城市和游牧民之间的联盟，以及把农民排除于文明邦之外，是马格里布文明的特点，正如肥沃的新月地带一样。如法国对马格里布进行殖民化服务的思想家们设法从种族矛盾——柏柏尔农民反对阿拉伯游牧民——的角度来解释这些特点，并把马格里布的衰落归于阿拉伯游牧民的蹂躏，说他们破坏农业和工程而导致其衰落。对阿拉伯东方也有类似解释，那里的衰落也归因于游牧民造成的破坏。然而，我们看到，阿拉伯文明的辉煌时代（在东方以及在马格里布），其标志不在农业方面的伟大成就，而在贸易与城市的繁荣；至于贸易的繁荣，则往往是由于伟大的游牧部落的统治损害了在该地区无足轻重的农民。

马格里布之出现衰落在于商路的改变。随着商路由西向东转移，我们注意到文明中心的相应转移，向撒哈拉以北，也向撒哈拉以南。因此，在最早时期有北方的摩洛哥和南方的加纳和马里；后

来，黄金之路向突尼斯转移，再往后向埃及转移，而南方则出现桑海和豪萨等国的繁荣。在马格里布，农民据点之保持其自主性是由于他们坚持柏柏尔语言和文化，正如在阿拉伯东部，语言虽已阿拉伯化，但他们设法通过宗教上持异议而保持其自主性。

埃及的历史则很不一样。统治阶级可以从世界上最古老的农民民族之一来抽取巨大的剩余，从而提供了文明的基础。国家的中央集权在这里推行很早，而且采取极端的形式，这既有“自然的原因（组织大规模灌溉工程的需要），又为了要保护埃及绿洲免遭游牧民的危害。为了生存，埃及总是设法固守于本国之内，依靠众多的人数来击退游牧民的侵扰。当埃及征服尼罗河流域以外的领土时，它的动机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身的农业文明，它在游牧民和半游牧民地区的中心建立据点——东部在西奈和叙利亚，西部在利比亚。可是，埃及在古希腊时期以前从来没有过任何真正的大贸易城市。法老的首府建立在田地之中，在人口稠密的乡村地区。

因此，埃及传统社会形态的类型是建立在和马什拉克和马格里布相当不同的基础之上的。后两者的农民据点是自主的，并不很深地结合进其文明之内，而且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马什拉克和马格里布还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村社的组织。埃及农民的那个阶段早在四千年前就过去了。埃及的社会形态并不是城镇和商人占压倒优势的类型，而是有农民纳贡制的农村类型。在这种纳贡制形态中，农民不是以保持其村社相对自主的集团而受压迫，而是各自以家庭小单位受压迫，因此自身向着一种真正的封建制形式发展。后者我赞成称之为一种发达的纳贡制形态，它同中国相类似，有别于西方封建制的只在于它的国家中央集权，征收剩余的统治阶级势力强大，组织成国家。

在亚历山大入侵以后，埃及成为一个行省，作为建立在大规模贸易基础上的帝国的一部分：这是它在古希腊世界、然后在拜占庭

世界、最后在阿拉伯世界的处境。在这些帝国的兴盛时期，当时远距离贸易蓬勃发展，埃及经历了商业的城市文明。但是这种文明仍是“外来”之物，是建立在朝廷和商人的城市中的，这种城市文明一直到它们经历的远距离贸易开始衰落以后才真正地埃及化。这些城市是希腊时期的亚历山大，阿拉伯时期的福斯泰特以及后来的开罗。埃及的农村世界仍然处于这一切以外。就它来说，唯一的变化是过去它把剩余缴给以法老为中心的本国统治阶级，而现在则缴给外国朝廷。

但是，埃及在语言上阿拉伯化了。然而这发生得较晚，正当阿拉伯人的贸易帝国正在失去存在的理由的时候。当时国家又一次不得不闭关自守，阿拉伯统治阶级不得不使自身埃及化，对农民更多地关注。而农民则接受了伊斯兰教（虽然这发生得很缓慢）和阿拉伯语言（接受得也很慢，科普特语过了几个世纪才消失）。但是，埃及人在阿拉伯化过程中保持了很强固的自身特点。他们从不称自己为“阿拉伯人”（他们总是认为这是“野蛮人”的同义语），而始终称“埃及人”。而且埃及保持自身的独创性，不在语言方面，而在文化和价值观方面，埃及的价值观是农民的价值观念。

由埃及向南，苏丹既属于黑非洲也属于阿拉伯世界。在它的北部，来自东方、来自红海之滨、同本地区黑人土著通婚的阿拉伯游牧部落建立了一个游牧的牧民文明。此外，这些游牧民不但成为穆斯林而且采用了阿拉伯语言，他们成了埃及和南方地区之间的贸易中间人。然而，苏丹的中部地区保留了他们以黑非洲共同的乡村氏族社会为基础的传统农业文明。例外的是，这些黑人民族采用了阿拉伯语言，虽然其他在西非地区，同样的民族只接受了伊斯兰教而没有阿拉伯化。这种阿拉伯化无疑是由于北方阿拉伯游牧民对这些地区实行长期而彻底的优势统治的结果。后来，在十九世纪埃及被征服时，从穆罕默德·阿里（1810—1848年）和继

承他的那些赫迪夫(君主)时期一直到英国占领(1882年)和马赫迪领导的起义(1882—1898年),又在这种优势统治上头增加了埃及军事官僚政治的统治。但是,这里的臣民,阿拉伯化的黑人农民却把他们的自治乡村组织一直保留到我们的时代,那在埃及早已被遗忘了。只在很久以后,在英国人时期,在殖民剥削的某些地区,特别在吉齐拉,才产生一种真正的农业资本主义;农民被无产阶级化了,制度有利于游牧民的头人,殖民政权赠给他们在灌溉工程下耕作的土地。总起来说,这个过程与同一时期在伊拉克所进行的情况相类似,当时伊拉克处在英国托管之下,从而产生了一个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的)、与传统(不论是非洲或阿拉伯传统)格格不入的农业经济。

阿拉伯半岛的南部是由一批真正属于阿拉伯传统的社会形态所构成的。农业从来没有在这里的文明发展中起过决定性作用,除了在也门高原,那里的季风风使农民社会得以存在,虽然是在相当艰苦的条件下;这个地区的文明是城市与商业文明。马斯喀特和桑给巴尔的海运“王国”提供了它的特点:一个城市贸易国,作为地中海世界、黑非洲东岸和印度之间的中间商而取得收入。也门的农民处在游牧民包围之中为海运贸易商服务,就象肥沃的新月地带的农民那样,以宗教异见(如同叙利亚的阿拉威派,他们是什叶派)为庇护而保持了有限程度的自治。

这就是阿拉伯世界:基本上是一个商业集团,埃及是唯一的“农民”社会的重大例外。在这个世界里,统治阶级在城市,由朝廷官员、商人、宗教领袖所组成,在他们周围就是东方城市中典型的手工业者和小职员的小世界。统治阶级是联结整个集团的因素;在各地它都使用同样的语言和同样深奥的伊斯兰文化(而且,那是正统的——逊尼派)。这个阶级是极为流动的,它可以从丹吉尔迁至大马士革而完全得其所哉。就是这个阶级创造了“阿拉伯文

明”。它的繁荣是和远距离贸易相联系的。后者是它同游牧部落、商队护卫队联盟的基础。这说明了农业地区的孤立，它保持自身的品格：语言上是柏柏尔，宗教上是什叶派，在阿拉伯世界的文明中不起重要作用。除了在埃及以外，农民很少参与体制，在纳贡方面只是插曲性的，为数很少。这个阿拉伯世界因此既多样又深刻地统一的——统一于其统治阶级。它不能同中世纪的封建欧洲相比，后者在性质上是完全“农民”的。无疑地，欧洲之朝着各国分立的形态发展，原因即在于此。因为欧洲的统治阶级是靠取自农民社会的剩余而生活的，他们必然强调欧洲各国人民的多样性。与此相对照，在阿拉伯世界，由于农民没有起到这个作用，因此保持了统一。可是，也正由于这个原因，阿拉伯文明是脆弱的。贸易衰落，国家随之灭亡，这些国家所赖以建立的城市也是同样下场，一个贫困的游牧民世界历尽苦痛，同样贫困的小小、孤立的农民社会无法防止衰败。

黑非洲的例子也表明远距离贸易本身并不导致资本主义。

这里的重商主义以前的阶段从开始延至十七世纪。在这个长时期中，黑非洲和旧世界的其余部分之间建立了关系，特别是跨过撒哈拉，一方面从横亘达喀尔与红海之间的热带大草原，另一方面到地中海。一些社会形态出现了，但是如果不从整套社会形态相互关系的背景上来看就无法了解。在那个时期，非洲整个说来同旧世界其余部分相比并不显得低劣和软弱。非洲内部发展的不平等，和地中海两岸撒哈拉以北地区看到的情况是相应的。

可是，复杂的社会形态有时采取国家的形式，而几乎所有的情况都以明显的社会分化为基础，证明很久以前在原始村社中即已发生退化的过程，这种复杂的社会形态在黑非洲早已是典型的了。如果说在有关传统非洲社会的讨论中存在很大混乱，那是有许多原因的，主要有四大原因：（一）缺乏过去的文件和活材料，过去的

材料几乎全部是阿拉伯旅客所谈的情况；(二)关于生产方式的概念和社会形态的概念之间常有的混淆；(三)非洲历史不同时期之间的混淆，特别是这段前重商主义时期和随后的重商主义时期之间的混乱；(四)同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有关的对非洲的思想偏见。

前重商主义时期的非洲社会形态是独立地发展的，虽然这一发展同东方和欧洲地中海世界形态的发展走平行的道路。我们已经看到，在大西洋沿岸与中亚之间绵延横贯旧世界的半干旱地区分割了三个区域，那里的自然条件导向了原始阶段的农业，这三个区域是：季风风亚洲，热带非洲和欧洲温带区。这一地带兴起了辉煌的文明，几乎都是以远距离贸易为基础的，例如希腊和阿拉伯帝国。在这一地带的两侧，独立的社会形态平行发展(封建欧洲的社会形态以及热带非洲的至少一些社会形态，特别是坐落在紧靠撒哈拉以南的苏丹—萨赫勒地区)。因此，非洲的这一部分就和欧洲一样完全结合在世界历史之中。

在这一点上，横跨撒哈拉的贸易所起的作用是很清楚的。这一贸易使整个旧世界——地中海、阿拉伯和欧洲——从美洲发现以前的主要产地(上塞内加尔和亚山蒂)取得黄金。这一贸易是热带非洲社会组织的重要基础之一。国王授命下的金矿开采提供了统治阶级一个手段，使他们能够从撒哈拉另一边取得稀有的奢侈品(织物、地毯、香水、枣和盐)，还特别得到他们为确立和加强其社会和政治权力所需要的东西(马匹、铜、铁条和武器)。这一贸易因此推动了社会分化的发展、国家与帝国的组成以及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工具的改进，技术与产品的适应，等等)。作为交换，非洲供应的主要是黄金，加上一些稀有产品如宝石和象牙以及一些奴隶。只是到了最近，一些欧洲历史学家才设法把这一平等与独立的双方之间的贸易同重商主义时期发展起来的掠夺性的黑奴贸易混淆起来：南马格里布人口中黑人极少(只有几十万人)，而比较之下

美洲有上亿黑人，这就足够说明这种观点是多么缺乏根据。而且，由于这个原因，随着商品一起传播的思想在这个地区也乐意地得到接受——特别是伊斯兰教思想，它在塞内加尔河两岸很早就出现了。这一贸易的重要性，它作为平等交换的性质，以及非洲社会形态的独立性，这些在当时阿拉伯的著作中很清楚地显示出来。如果我们看到北非和西非的社会形态在技术发展上大体处于同一阶段，那就比较容易理解阿拉伯商旅所写的记载中的赞美之词了；它们的结构是类似的，在当时世界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也是类似的。了解这些社会形态结构的关键就是王公贵族对黄金开采的垄断和穆斯林商人对黄金的销售之间的联系。这些商人时常组织为一种等级，组成一个宗教少数派。

许多世纪以来，地中海世界和热带非洲的社会形态就是这样紧密地相关的。商路从西到东的逐渐转移，反映在北非和西非大草原地区文明和大国的相应转移，我们可以看到加纳、马里、豪萨城市、博尔努、加奈姆和达尔福尔力量相继发展的情况。新生的欧洲重商主义资本主义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也引起了非洲的一场危机。这一转移在十六世纪敲响了意大利城市的丧钟，与此同时它毁灭了阿拉伯世界和苏丹—萨赫勒地区的黑非洲国家。几个世纪以后，大西洋欧洲的代表出现在非洲的沿海。非洲贸易重心的中心从大草原内地转移到沿海，是欧洲重心的中心从地中海向大西洋转移的一个直接后果。但是，欧洲与非洲之间的新的交往是要为不同于以前时期的一种职能服务的，并形成了重商主义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活动。

如果非洲社会形态在十七世纪以后继续自行发展，那么它们会变得怎么样呢？显然人们无法知道。它们在早期(重商主义阶段)被结合进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它们又在那个阶段分裂出去了，很快就开始退步。可是，看来前重商主义时期的非洲大规模贸

易虽然在一些地区很突出，可是它是和比较贫困的公社制或纳贡制社会形态相联系的，所以不可能由自身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第七节 纳贡制社会形态发展的障碍

阿拉伯世界和黑非洲的例子表明大规模贸易并不产生资本主义，而且大规模贸易本身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这些社会形态标志着远距离贸易的巨大发展以及农业社会内部产生的比较小的剩余。中国或埃及的情况不是这样，它们的文明从来不是依靠贸易的。关于这些文明的发展为什么会受到阻碍，了解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尝试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观察亚细亚生产方式时进行的。这些观察表现出非常深刻的洞察力，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却满足于不断重复那些话而不愿花工夫来改正那些由于马克思时代的知识状况而产生的缺点和错误。今天我们知道古代埃及和中国的村社居民所受的限制并不大于中世纪欧洲的情况；埃及和中国的居民社会几千年来所受的压榨并不比欧洲居民社会几百年前所受的少；现在仍然强大的居民社会模式还是向黑非洲去找而不是在亚洲找。所以，不可能从居民社会的存在及其对衰退的特殊抵制中寻找纳贡制社会形态发展受阻的原因。

无论如何，在旧世界，文明似乎出现于四个地方，即使不是同时，至少是大致在同一时期；这四个地方是：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这四个地方都位于较热地区的四条河流的流域，这不是偶然的。自然条件在开始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灌溉促进了提高生产率（按每个农民家庭的年产量）和更高的人口密度。因此它为头一次真正的人口集中以及商品、人员和思想的流通提供了方便。

在所有四个例子中，一定的文明所具有的形式都是类似的。那

是纳贡制的形式：居民社会里出现了神权政治和官僚主义类型的一个国家阶级，并坚持自身是社会上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组织者。我们必须从这一点得出结论：最早阶级分野的社会形态不是奴隶制而是纳贡制。

自然条件造成这四种文明经历了不同的命运。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流域是非常容易受到打击的：因为它们被人口众多的地区所包围，它们的财富招致游牧民、半游牧民以及定居该地区的山民（那里的农业依靠下雨）的打击。他们曾数度被毁，他们已不可能以有系统和不间断的方式取得进展，不论是指灌溉技术和工业，或者指政治和行政组织。相反，埃及和中国则享有有利条件。埃及在西面和东面有沙漠为屏障。中国不是在旧世界的中心而位于旧世界的东端，而且在它的西面有难以逾越的大山、高原和沙漠，因而比较隔绝。因此，埃及就能在有保护的情况下发展其纳贡制文明，而且很快达到充分发展的文明形式。中国还享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它能牺牲原始民族而向南扩张；这些原始民族也与西方相隔绝，但不能象印裔欧洲人成为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的威胁那样对汉民族形成威胁。中国不但象埃及那样很快达到纳贡制文明的高峰，它还能够扩大，在它南部诸河的沿河一带建立与原先特点相同的农业文明的新地区。

对于这两个纳贡制文明的中心，需要有些说明。首先，这两个文明确实称得上是中心，因为它们包罗了世界人口的很大部分：埃及在公元前两千年有几乎一千万人口，而中国很快就达到一亿人口，当时人类的其余部分还不到此数，分布在千百万平方英里的地方。其次，在这两个文明中，村社很快削弱，当国家权力日益强大时村社就几乎消失了。居民社会只是作为家庭而存在下来，但丧失了对于土地的支配权，土地转到了更广更高的社会之手，它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国家。第三，在全国范围组织起来的国家阶级并

不是特别“专横的”，虽然普遍有这种看法。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国家阶级，它考虑公众利益并组织有益的大规模公共工程。与治理尼罗河的工程相比，金字塔也为其减色，前者所需要的劳动量几百倍于后者。这个阶级在一国内组织起来，仍然相对开放，达到它的社会升迁性很大，如中国官宦集团所表明的。同欧洲封建主义的暴力历史相比，这些文明中权力滥用的情况是有限的，它合乎“专制的”称号只是偶然的：当蛮族入侵者统治国家的时候——即使在这些情况下，那些蛮族很快就会同化并变得文明了——或者在国家崩溃的困难时期，封建割据纷起，于是这些文明就类似封建时代的欧洲了。第四，这些社会形态在发达情况下所特有的国家权力使得纳贡制方式在内部具有明显的统治力：远距离贸易，手工业生产（不论是自由民还是奴隶所经营的），有雇佣劳动的那些部门的生产——全都处于国家的密切控制之下，国家对它们征税。确实，对这些部门来说，社会是专制的，但对农民来说不是这样。在封建时代的欧洲，情况正相反：国家很弱，任凭城镇“自由”繁荣，而封建地主住在农民近旁，可以无拘无束地自由压迫他们。第五，这两个发展良好的纳贡制社会形态的模式能够消化生产力取得的进步。纳贡制方式所规定的生产关系可以适应广泛范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只有在外界引进资本主义方式的时候才显示出来。因此，充分发展的纳贡制方式的历史进程原则上是为时颇久的。可是，这种对进步的适应性，与后进的、欠发达社会形态可能达到的进步相比，意味着相对受阻的发展；在那种社会形态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显露得更早些，迫使超越前资本主义关系而向前推进。

无论如何，埃及和中国仍然是两大创始的模范，它们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和组织的基本源泉。

与这些纳贡制的中心形态同时并存的，在西方三个纳贡制文

明点之间的交流导向了外围贸易形态的建立，这三个西方文明点即：腓尼基城市、叙利亚城市和阿拉伯城市。西亚和南欧的半游牧部落王国设法重建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或印度河文明提供的模式——但是没有多大成效，因为它们的物质基础很脆弱。它们能征课的剩余为数很小，因此，居民困苦，国家中央集权很弱，经常受到地方自治的威胁。希腊在学习了受埃及影响的这些王国之一（即克利特）以后，就设法充分发挥其形态的外围性质。这个希腊社会商业职能的突出增强，加上它难以从国内得到适量的农业剩余，使希腊沿着一条新的道路发展，那就是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这种使用奴隶劳动，成为在希腊社会以外进行劫掠奴隶的先决条件，其结果是丰富了商品生产并使这个社会的发展超越它仅仅作为一个贸易中间商的作用，创造了它自身再生产的条件：奴隶生产成为购买更多奴隶的手段。罗马把这种社会形态扩展到地中海流域的整个地区。

这种奴隶制社会形态缺乏纳贡制社会形态的弹性，因为它的先决条件是存在一个取得人力的外围地区。同它进行贸易交往、甚至受它控制的强大的纳贡制社会并不出售人口。因此欧洲——凯尔特、日尔曼、斯拉夫——的蛮族外围就是取得奴隶的外围地区。结束罗马帝国的不是奴隶暴动，而是蛮族的打击。蛮族在罗马帝国废墟上立足以后，就取代了奴隶制方式，建立了封建制方式，这是纳贡制方式的一种变化形式。蛮族首先在自然条件有利的地方建立，最后通过奴隶制方式进入新的地区。

和原先充分发展的纳贡制方式相比，封建变化形式始终很软弱。这种软弱性和外围性，却成了它的力量。在欧洲封建制开始时，这意味着适量的剩余以及没有政治的、行政的和经济的中央集权，两者相辅相成。这种低水平的中央集权能力使处于萌芽状态的商业部门享有自由。在它们的刺激下，农业有了巨大进展，而农

业所生产的剩余自然地增大起来，因此日益发展的贸易和封建关系的解体这种辩证法可能发生，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的兴起。

在旧世界西部这种罕见的演变途径同它东端发生的情况之间的类似之处是惊人的。日本“奇迹”的问题从来没有从中心与外围关系的角度来看。可是类似之处是突出的。在日本所处的地区里，中国是各方面都已完备的模式——只要自然条件许可，这种模式就忠实地再生产出来：在越南、在高棉时期的柬埔寨，以及在朝鲜。可是在日本，自然条件形成了严重的障碍：全国的封建割据，贸易城市的自主性，这些都限制了国家中央集权的程度，因此日本和欧洲之间虽然远隔千里，却具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确实，在日本受到外界震动以前，日本社会并不导致资本主义。但是一旦时机到来，它就安然成为资本主义。事实上，如果日本不幸已被结合进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地区的话，这种演变就可能不会发生。它没有受到这种命运之苦，因为它当时是一个穷国。相反，中国拥有大量集中的剩余，就吸引了欧洲和美国的贪婪。而且，资本主义在日本的诞生过程是由外界的震动所开创的，因此就使它具有一种特殊的形态：特别强调国家的作用。

印度次大陆的演化也属于这一图式。印度河流域的纳贡制文明很早就已被毁，但是印度—雅利安入侵者在更大的疆域内重建了这种文明。这个进程是缓慢的，因为那块疆域很大，而且恒河流域必须逐步由大自然和原始居民来加以征服。这一进程也被印度向西方开放以及由此而招致的不断入侵浪潮所干扰。在印度南部的死角里也逐渐建立了一些纳贡制形态。因此，印度发展到纳贡制方式是比较晚的，是在它遭受殖民统治以前不久。这里，例外的情况是，在这一进程尚很年幼的少数地区，村社继续在繁荣发展，正是这些情况往往使观察者认为村社的存在是纳贡制方式的前提条件。

为什么不是所有的纳贡制方式的外围社会都产生资本主义呢？我们已经在阿拉伯世界和黑非洲看到了原因何在。拜占庭帝国及其奥斯曼继承者也是纳贡制外围社会形态——或者更精确些说：一批社会形态。实际上，纳贡制方式从来没有在这个地区彻底地成功扎根。这个地区的一些地方（在巴尔干、高加索、叙利亚和北非）继续组织牢固的村社。君士坦丁堡以及后来的伊斯坦布尔所征课的贡赋总是被这些村社的暴动所破坏。这个地区的其他部分则处于停滞，因为它们往日繁荣所倚的奴隶制或商业基础已经萎缩了：希腊和东部城市都有这种情况。这些地方的商品生产转移到首都去了，成千上万的希腊、埃及和叙利亚手工业者都被驱赶到那里去；一个大国在首都就能集中到征课的贡赋来支持这种商品生产。这里的例子是一个纳贡制社会形态设法穿透一个进行有效抵制的较老的基础。可以理解，这样的社会形态是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在伊朗和中亚细亚，纳贡制形态由于自然条件以及被蛮族入侵者的威胁太大而始终很穷，不能达到资本主义。

哥伦布以前的美洲所兴起的阶级划分的社会形态，正如在旧世界一样，属于纳贡制类型。这是印加人、阿兹台克人和玛雅人的情况。由于他们的大陆人口稀少，他们与世隔绝，没有外来的危险，这些社会形态看来达到了高水平的发展，堪与旧世界的埃及和中国相比美。我们无法知道这些社会形态往后可能会如何发展，因为从十六世纪以后它们被西班牙暴力所征服，尔后这些社会形态即行破裂而被重商主义资本主义外围的特殊形态所取代。

至于在欧洲移民基础上构成的、没有以往基础的那些新土地上的特殊社会形态（新英格兰和加拿大，布尔人的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既不属于外围地区的范畴，也不属于纳贡制的范畴，也不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它们是例外的社会形态，从一开始

构成时就同欧洲的中心资本主义发展具有密切联系。我将把它们称之为“年轻的中心地区”。

已经表明，前资本主义形态，不问其种类如何，都是由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中心形态(纳贡制形态)和一系列外围形态(奴隶制、封建和贸易形态)所组成的。纳贡制形态主要由它自身的内在动力所说明。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自我中心的并构成了进化的正常道路。外围地区的前资本主义形态是由于它们自身的内在动力和充分发展的纳贡制形态对它们施加的影响之间的相互作用。围绕两个很早出现的充分发展的纳贡制形态的中心，即埃及和中国，以及后来出现的第三个中心，即印度，各类外围结构逐渐形成并相互间沿着动荡的边界建立关系。因此，人们可以列出地中海和欧洲各外围地区(希腊、罗马、封建欧洲、阿拉伯和奥斯曼世界)，黑非洲地区，日本，等等。正是在这些地区之一的欧洲，资本主义诞生了。

第二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

第一节 中心资本主义形态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我已经规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是一个阶级独占地拥有作为社会劳动产品的生产资料。这种某一阶级独占的拥有，虽然在历史上采取了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的形式，也可能采取集体的形式。当社会劳动所生产的生产资料不被社会整体所掌握而被社会的一部分所掌握(然后这一部分成为“资产阶级”)，那里就存在着资本主义。当生产力发展水平对生产资料(它们本身就是产品)来说已经进步到不能再简单地由个体生产者来掌握的时候，资本主义就出现了。传统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制造自己的工具。产业工人不能制造自己的工厂。结果，控制社会的中心手段就从掌握自然的生产资料转变为掌握本身即产品的生产资料——设备、机器、工厂。

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三大特点为标志：(一)整个社会生产采取商品的形式；(二)劳动力本身成为一种商品，这意味着：已经同生产资料分离的生产者成为无产阶级；(三)生产资料本身成为商品，它在物质上体现一种社会关系，它们被一个特定的阶级所独占——换句话说，它们成了资本。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生活主要与商品无关，在资本主义方式下，整个经济成为一种商品经济。这种情况反映在传统的经

济理论中,它的出发点是“供给与需求”,这就成为商品与市场存在的前提。这种理论据说是一种无所不包的经济科学,并不局限于任何特定的历史阶段,而事实上它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视为一切文明的共同特点,它实际上就是这样观察事物的。但是,这妨碍了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起源及其发展规律。它失去了科学性,成为一种意识形态。

把价值的领域扩大到整个经济生活,就改变了价值规律表现的形式。在前资本主义形态内,在商品交换盛行的部门,价值规律表现形式很简单:交换关系(相对价格)相当于体现在交换产品中的社会劳动平均量。生产资料(它们本身就是社会劳动的产品)为数不很多,并在事实上属于生产者自己。简单商品生产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形式,结果,价格相等于价值。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社会劳动所生产的生产资料不但为数很多,而且它们被一个阶级所独占,所以它们在社会上起着主导的作用。生产者所提供的剩余劳动在统治阶级各成员中按他们对该阶级的重要性来加以分配,这个重要性根据他们的资本总量——他们所控制的社会资本份额——来衡量。因此,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差不多就很复杂,从价值得出价格的方式有可能进行剩余社会劳动的再分配。

资本主义所进行的相对价格的制度的确可以不求助于价值的“媒介”而加以说明,这已经由皮埃罗·斯拉法做到了。这种说明的形式是列出一组反映各不同工业间关系的方程式。每件产品的成本就是不变资本组成成分的成本总额(物质投入——即消耗的每项投入的实物量——乘以各项价格);工资(劳动量乘以工资率);和利润(与投入值成比例,投入是“资本”的具体形式)。这组方程式解开以后,就能得出相对价格的矢量而不需要经过价值的中介阶段。可是,这组方程式仍然只是说明性的,因为它的组成在

一方面要假定产品与劳动力都是商品(换句话说,存在剩余劳动,而且其数量已肯定),另一方面,这种剩余劳动按投入资本的比例来加以分配。因此,这组方程式的组成,要假定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这个说明表明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因为相对价格的矢量决定于工资率和利润率;它表明经济合理性不是一个绝对值,经济合理性不比社会关系合理性更重要,后者决定收入在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分配,换句话说,即社会劳动时间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分配。尽管如此,这个说明并不能使我们了解资本主义方式如何开始和如何发展的,因为它假定这一生产方式是已定条件。

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本身为这个目的提供了必要的概念体系,它从适当的角度来进行说明的任务,不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而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如果价值之转化为价格(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的这一点)可以加以批判,那只是因为它还仅仅是初步的轮廓。转化的体系分析得并不完全:不变资本的各要素是按它们的价值而不是按它们的价格考虑的(《资本论》第三卷是在马克思去世以后出版的,从这方面来说,它只是一份粗糙的草稿)。找出价值转化为价格的一个完整的数学体系是可能的,但只有承认平均利润率不能相等于剩余价值率。

利润率实际上决定于一个价格体系中某些产品(产品甲)的价值与其他产品(产品乙)的价值之间的关系,这不同于把产品甲(实物量)的价值与产品乙的价值之间的关系作为剩余价值率的价格体系。这种不一致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掩盖利润根源并使资本看来本身具有生产率的原因。正是由于认识到这种经济学上的异化,我们才能抓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发展规律。这种认识意味着按组成主导阶级的各个社会集团所控制的各部分社会劳动的比

例来考虑剩余劳动的分配逻辑以及竞争规则和资本流动性，这是利润率平均化的先决条件。这种竞争也留下了资本主义方式的突出特点，那就是与这个制度有关的生产力进步的“内源”性质，因此当一个企业主实行一种先进技术时，其他企业主就不得不步他的后尘。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进步的“内源性”使它似乎是一项“外在依据”，因此使社会失去了对它自身发展进程的控制。

如果我们不分析价值向价格的转化，我们就不会去恢复社会对它自身的控制，这就意味着不超越资本主义而向前进，而且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前景。早在十九世纪，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就认为社会主义一旦把最初对资本家的剥夺完成以后，它在“合理的”经济选择上会同资本主义类似。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以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反对把社会主义降低为“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它实际上包含着国家资本主义的幼芽。

利润的商品形式之普遍化以及价值从简单方式变为复杂方式，把商业利润降为资本利润的共同标准。当然，商业利润的范畴早于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商业利润是来自垄断的一种收入，因此不受严格规章的制约。当一些社会通过垄断商而进行接触时相互毫无所知，特别不了解它们所交换的产品的实际社会生产成本时，贸易垄断所取得的利润可以非常高。它相当于把剩余从一个阶级（有时从一个社会）转移到另一个阶级，一个外国商人的阶级——这种最初剩余是地租，或者以更加一般的名词来说，就是贡赋。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主宰时，剩余的主要形式就是资本利润。商业活动不再是一种垄断，而只是象别人那样的资本主义活动，它的领域扩大到所有的产品。资本主义生产者知道这些产品的社会生产成本。因此，竞争就使投入商业的资本参与利润的一般平均化。商业利润成为商业资本的利润，它象其他资本一样得到平均利润率的报酬。肯定，商业资本的报酬仍然是一种转让，

它来源于其他方面在生产中产生的剩余价值。但是这种转让后来却被平均利润率所限制，它到头来决定于剩余价值率。

同样地，商品形式的普遍化改变了其他前资本主义活动开展领域。农业是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主要活动领域。地租是封建剩余采取的主要形式，前资本主义社会主导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是这些封建关系的法律表现。马克思表明，土地归私人所有是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障碍，因为它使地主（如同垄断分子）得到手段来保证其他地方生产的一部分剩余价值以绝对地租的形式转移给他们。可是，如果资本主义尊重土地私有制，这就不仅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老生产方式同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有产阶级反对压迫阶级而结成的联盟），而首先是因为它在这种土地私有制中具有重大利益。只要生产者没有从这种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脱离出来而成为受资本所支配的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土地私有制在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重商主义阶段中完成了这一职能。地主受商品交换扩展的刺激，自己也成为商品生产者。起先在英国后来在欧洲大陆、先于产业革命的农业革命，反映商品交换扩展至农业生产，货币地租之替代实物地租只是这一进程的直接表现。竞争扩大到农业生产，而随之而来的现代化则要求把过多的农民劳动力排除，他们脱离了农业生产而无产阶级化了。

雷伊把绝对地租称为“被统治的封建生产方式同统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方式”，它是否受决定所支配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里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剩余价值向地主转移是可能的，因为工业中资本的有机构成要比农业中的高，所以剩余价值率相同的话，如果投入的资本额相等，则农业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大于工业的，农业是一种“轻型”活动。土地私有制阻碍利润平均化扩展到它所控制的地方，决定地租的正是被平均化机制所扣

压的这样保留的剩余。实际上，马克思作的这种解释我看似乎并不必要。即使农业中的资本有机构成和工业中的平均数相同或更高，垄断的土地所有制将使农产品的价格结构同工业产品的价格结构相比包含一种转移价格——一种真正的转移，而不是仅仅从平均化过程中预扣的——而有利于垄断地主，这构成了他们的地租。这并不决定于工农业比较资本有机构成的差额，而只是决定于一种社会关系：决定资产阶级和地主之间社会与政治权力划分的力量对比。除非土地所有制本身消失，地租是不会消失的。资产阶级进攻土地私有制的办法是开辟用于农业生产的没有地主的新土地，即对土地私有制控制的农产品，用不受垄断土地所有制限制的、可以自由取得自然生产条件的农产品与之竞争；这就是英国市场在十九世纪向北美小麦开放的意义。资产阶级也用外围地区的农产品来同资本主义中心地区的农产品进行竞争，前者肯定是被土地私有制所控制的，但它的劳动力报酬较低而剩余价值率较高。

只要土地私有制继续下去，地租就会继续存在，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压倒优势，地租采取了资本利润的形式——“投资于”购买土地的资本的利润。在前资本主义形态中，土地是一个阶级排除其他阶级而垄断的东西。在资本主义形态中，它受到买与卖的支配。它的价格——一种新的范畴——就是它能产生并转化为资本的“地租”。从那时起，这种地租就显得是用于购买某块土地的资本的报酬。

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形态中，农业生产不再占有超越社会生产中有限地位的程度。因此，农业土地就可以供经常的、方便的商业交易而不再受到农民阶级所阻挠；对农民阶级来说，农业不仅仅是一块生产场地，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农业地租没有了，因为资本主义农业企业家的利润——他们有权取得的那份社会剩余价

值——必须酬答他们投入的所有资本，包括用来购买土地的资本。土地继续控制着一个价格，因为它是被垄断的。

每当取得自然的（或社会的）生产条件由于垄断而受到限制时，价值转移的问题就出现了。因此不可能在分析价格的基础上直接掌握这个问题。

虽然在发达资本主义制度里农业地租问题至少在数量上（即使不在理论上）失去了它的尖锐性，城市地租却日益具有更大的数量上的重要性。这个制度的思想家们声称：地租是制止人们在爱丽舍田园大街上栽种土豆的“合理”办法。实际上，问题很清楚，在爱丽舍田园大街上取得一块土地，这不是由社会所控制的，而是某一社会集团（即这些地段的主人）所拥有的垄断权。因此，由于这个事实而在有利于他们的情况下转移价值的数量，就完全决定于他们的社会权力。

至于矿物、森林、河流、湖泊和海洋等“自然资源”，只要取用它们也是受一种社会垄断所限制的话，那么情况也和上述相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表明社会劳动是价值而不是财富的唯一来源。后者意味着靠一定量的社会劳动所取得的有用物品（对社会有用，而不是对个人有用）的数量。这种社会劳动不是在非物质的抽象背景下进行的，而是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进行的。自然与社会之区别决定了什么叫社会科学，它的定义就象人类之不同于动物界。如果社会控制了取得一切自然条件之权，它就能计划以合理的方式来加以使用，它就能选择取得这些条件的手段和方法，根据肯定的社会时间前景来利用这些自然资源，要在付出一定量的社会劳动下取得最大限度的效益。在资本主义制度里，取得自然财富是极为混乱无章的。某些形式的自然财富是可以自由取得的，因此就被浪费而危害社会利益，正如环境问题所揭示的那样（空气、河流等等的污染）。由于这些资源能自由取得，就不去精打

细算地来使用：因为对资本主义企业来说，这是一种“外部储蓄”，而在社会范围内，这些资源的耗尽象征着“反污染斗争”的真正代价（公共当局承担的清洁费用，卫生服务的额外支出，人员的强制流动，等等）。其他自然资源是有所有权的，资本主义的企业主所支付的价格将决定于资本家阶级以及对于取得这些资源握有垄断权的集团之间的社会关系。例如，就底土资源而言，这一价格有很大变化，决定于现行法律是否把地面所有权同底土所有权分开，决定于土地是私人拥有还是公共所有，等等——即，决定于规定经济活动结构的社会条件。

当我们考虑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阶段时，采取了进一步的步骤。重商主义时期（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时期，其特点就是建立起资本主义方式的两极——货币财富的集中以及无产阶级化）是一个过渡时期：一方面，价值法则仍然以其简单形式表现于小商品生产部门，但另一方面，货币财富的集中已经出现于不受价值法则制约的一个部门——即垄断性的大规模大西洋贸易部门。产业革命，即在重商主义时期产生的两极会合与融合，为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打开了通道：货币财富成为资本，使成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了的”劳动力在它的控制下干起活来。十九世纪（直到大约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特征是中心资本主义形态的工业形式。资本的主要形式是工业资本，由一般相当于各个企业的独立单位（主要是家庭企业）所组成。竞争对复杂形式的价值规律提供了广泛的活动场所。但是这种活动有一些障碍，特别是在农业中，由于土地的私人所有制而使农业继续受到地主阶级的社会垄断。因竞争的结果而发展的资本集中化在十九世纪末使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性质发生了质变。资本垄断形式的普遍化表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现在已经超越了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因为垄断首先是对利润平均化的障碍。所以价格不再决定于以

价值为基础的一般规律。价值规律的活动场所缩小了。价格体系中不再存在任何合理性,即使是表面的合理性。价格决定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社会力量对比,决定于控制各个经济活动部门的财团之间的社会力量对比。直到这个时候,在决定相对价格时起作用的只是占统治地位的整个资本家阶级同其他阶级和社会集团之间的社会关系。从那时起,就不再存在单一的利润率了,而是至少有两种利润率:一种管垄断部门,一种用于虽被垄断部门所统治而仍然流行着竞争的部门。因此,旨在从经济领域对国家进行干预的政治就具有一个新的方面。

资本主义制度面对着要超越它的社会主义,还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它唯一的出路是国家资本主义。通过国家所有制取代社会集团所有制,所有的生产都集中到全国范围,这就使生产关系提高到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它恢复了资本的社会性,过去,由于资本小块地分散到私人拥有的份额之中而使资本的社会性被掩盖了。它利用社会计划作为管理经济的一种方法。现在,怎么可能不把价格作为纯粹的常规呢?因为全社会的产品成了单一的商品,而劳动力则是唯一的其他商品。正是这最后一点标明了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界线。它符合于一种阶级界线——仍然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以及象纳贡生产方式时期那样成为国家阶级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分界线。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革新,也符合于保持经济对政治与思想的控制;国家资本主义在计划问题上找到的解决办法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办法——使得不同经济部门的“资本”(即:各部分资本)在平等基础上得到“报酬”的“价格”决策。当俄国经济学家们采用这一公式时,他们就在事实上回到了资本主义方式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过去由于私人垄断势力的兴起而受到动摇。

让我们扼要重述一下。资本主义推测本身是没有合理性的。

合理性事实上总是相对于一个特定的生产方式，决不会超越该生产方式特有的社会关系结构。在资本主义方式的充分发展的工业形式上，这种合理性是受到下列因素的局限的——一方面，受到规定剩余价值率（即劳动力剥削率）的社会关系所限制，另一方面，受到来自控制某些自然资源的资产阶级和地主之间的次要社会关系所限制。随着私人垄断资本的出现，就有了第三种限制——那是由统治的资产阶级内部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

根据这些基础作出的经济推测的结果从社会观点来看是不合理的，而一俟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要求由整个社会来管理生产力时这种不合理性就显出来了。正是在这里找到“环境”问题的内容。使用这个（不精确的）名称，只是要证明：这个问题被社会感到某种不快，而没有得到科学的理解。它包括两套事实，属于这个制度的不合理性所表现的三个方面：①“人力资源”的浪费；②自然资源的浪费；以及③“经济推测”必然受限制的时间前景。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人们是劳动力，而不是其自身的目的：所以它的内在规律是要设法减少这种劳动力的成本，要使剩余价值率达到最大限度，要伸展到经济学领域以外——伸展到企业“外部储蓄”的范围——这被错误地描述为“社会成本”或“人力成本”（教育、保健等），这里有关的经济异化反映在选择“成本”这个名称（正如“人力资源”的名称说明人是一种资本的“资源”）。国家资本主义是受同样的规律所推动的：劳动力仍然是商品，经济异化在持续。社会主义的定义则是社会主宰那三重关系，即：用于生产周期再生产的社会劳动时间，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社会劳动时间，以及不用于劳动的时间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以这种办法就能主宰积累过程，相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则是积累过程主宰社会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考虑到或不考虑到自然资源的耗尽，决定

于不受社会制约的社会关系的偶然性。决定产品相对用途的产品“价格”，在不同情况下，包含或不包含社会维持和更新这些资源储存所需要的余额。因此，例如以国情统计的经典项目来衡量的高积累率，以及最后以这些项目衡量的社会产值增长率，是通过消耗自然资源和牺牲未来而取得的。

一个社会希望控制其未来，首先就必须有长远的目光——有长远的“时间观念”。这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其中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经济的而是政治—思想的因素。可是，这些社会无力战胜大自然，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因而产生它们的宗教异化）。这些社会建造金字塔或大教堂，换句话说，建造传之久远的丰碑，其目的不是为人服务而是为神服务。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要求已经不再提出来了；但是，虽然资本主义把人从神手中解放出来，却没有把人从他们自己手中解放出来。它所能提供他们的一切是一种异化的思想，一种“消费社会”的思想，一种不提真正的人类需要而只谈“发展”消费的短期观点。时间观念的缩短是剩余价值率主导作用的结果。正是剩余价值率决定了积累的速度，因此最终也决定“贴现率”，选择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作出的。它似乎把理性交给不合理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7%至15%之间的贴现率对于最多为十至十五年时期内进行选择的不同可能性实际上是类似的。事实上，“经济计算”只是对资本主义企业自发活动的方式在思想上给以认可而已。即使把它变换为全国范围或“社会”范围而且把一些“参考价格”考虑在内而以此清除最有害的后果，它的近视目光却毫无改变。我们文明的危机完全集中在把人的时间进行这种荒谬的压缩之上。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文明陷入了教育“目的”和生产制度目的之间的矛盾。在一个迅速前进的世界上，教育本身无法同适应于特殊职业要求的教学技术相竞争，我们不可能知道在二十年以后后者是否仍然需要。所以，教育应当

塑造一些有能力在以后和终身使自己适应和前进的人,而且,反过来,他们又能使经济发展适应于他们所主张的速度。但是这不是“教育计划”的目的:教育计划是经济主义异化的牺牲品,它试图把塑造人类视为一项成本(资本主义企业的外部储蓄之一)因而设法使它的产品适应于经济的需要——而制度本身对这些需要在超过十年或二十年后的情况并不了解。

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合理经济计算不能以这些原则为基础。首先,我们要记住,对整个社会来说,只有根据价值的计算,即根据社会劳动时间的计算,才是有意义的。任何以“相等于资本报酬”的价格来进行核算都是无意义的。(“资本货”生产和消费品生产之间的)社会分工的组织以及从这种分工的一种已知结构转为另一种结构(相当于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更高水平)所需的时间(即最终决定于训练和改造人们所需要的时间:技术训练,生产改组,等等)必须从作出单一选择的观点——即在一定的时间内能把必要社会劳动时间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办法——来加以考虑。后者必须由社会根据其了解未来的最大能力来决定。至于必须生产的有用物品,一定要同社会所表示的需求带有清楚而持续的关系而根本与价格无关(因此也不管市场和收入分配——在那个阶段,收入分配必定是不平等的):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在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之间进行选择,而不是继续陷在不同“商品”之间的无谓选择上,劳动时间(尽可能地长)则不加讨论。确实,对资本主义来说,那个制度的目的不是要最大限度地增加生产,而是要最大限度地增加剩余价值,这就决定了经济主义的异化。最后,自然资源都应加以考虑,而且在一段规定的时间内,一部分产品必须用于维持或重建自然资源。这一部分保持尽可能的小,然而却决定着不同可能性之间的抉择;可是,它将决定于科学进步,如果将来有可能使用另一种资源来满足同样的需要,那么现在耗尽某种资源是可以的。这

就是所谓的“重建”自然资源。所以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马克思关于在社会主义政权下各个工人不能“得到他的劳动的全部收入”（一些天真的社会主义者是这样设想的）的看法。

第二节 中心资本主义形态中的资本积累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有别于一切以前的生产方式，在于它占有的生产资料本身就是支配生产过程的社会劳动的产物，而不再是占有天然的生产资料。这一特点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个质的飞跃，它反映在关于“资本”的通俗定义之中，即：资本是物质设备（“资本货”），并反映在“资本主义技术”这个措辞不当的概念之中，常规经济学通常用它来形容这种质的飞跃。常规经济学声称其分析所根据的事实是：设备的生产早于消费品的生产，消费品是有了设备才有可能生产的。这种“绕圈子”的生产途径构成了“边际主义”的基础，并使庞巴维克把“资本生产率”基于“对未来的折扣率”（“时间的代价”）。实际上，这是一个无意义的概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是生产品与消费品的同时生产以及这两大社会生产部门的社会分工。对于这两大部门之间的联系的分析，是对积累进行分析的核心。事实上，这种社会分工决定了而且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社会劳动总生产率（以某种方式分配的劳动总量所取得的效用）——正如它决定了社会收入的分配一样。因此，在一个自主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内的决定性环节是消费品生产同旨在生产消费品的生产品的生产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中心——欧洲、北美和日本——的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一个特征。它提供了“纯粹”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抽象定义，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作了这样的分析。苏联和中国的发展进程也可表明是以这一联系为基础的，虽然其采取的形式

在这些情况下(特别在中国)是创始性的。

马克思表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剩余价值率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间具有一个客观的必然关系。剩余价值率从根本上决定国民收入在社会上的分配结构(工资与表现为利润形式的剩余价值之间的划分),从而决定需求结构(工资构成群众消费品的大宗,利润则全部或部分地“储蓄”起来以从事“投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表现在社会分工上:劳动按照适当的比例分配于《资本论》第二卷中再生产模式的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这一客观关系虽然是马克思的基本论点,却往往被人忽视,例如在讨论到利润率的下降趋势时。提出这个论点时往往说,资本有机构成的增加可能被剩余价值率下跌的增多所补偿,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制度的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一直在继续不断地得到克服;如果我们认为剩余价值率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客观特点表现为这种方式。这种积累的理论模式要比以后提出的所有实际模式丰富得多,因为它表明“实际工资”不能任意规定,从而使社会力量对比具有客观性。

这种客观关系表现为经济活动与失业的同时波动。剩余价值率增加到超越客观的必要水平时,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就导致危机。降低剩余价值率会减慢经济增长并造成劳动力市场有利于资本的情况。这个调整过程的图式——它符合于产业革命到三十年代大危机的资本积累史——是更为复杂的,这是因为工资变动的副作用对技术选择的影响,从而反映经济制度的次最佳性质。充分就业的倾向(这并不排除,而是相反地意味着永久性失业的余地很小)和失业的同时巨大波动都是这个制度的作用。今日资本主义发生的内部变化已经使这种机制失去了调整其功能的作用。资本的垄断化以及全国范围的劳工组织已经有可能进行“计划”而减少同时的波动。如果工人阶级同意在这个结构(即这个制度)内不

越雷池一步——换句话说，具体说来，如果在国家的领导下，劳资双方接受一项“社会契约”，把实际工资的增加同生产率的提高联系起来（两者比例由“技术官僚”来制定）——那么就可以保证一个准充分就业的稳定状态。当然，除了社会上的一些部门由于拒绝接受这种“契约”而可能出来捣乱：这可能是那些中、小企业，它们是集中化的受害者，而它们拥有进行政治讹诈的相当不容等闲视之的力量；此外，对外关系也无法纳入这类计划的范围。生产的世界性（表现在跨国公司的份量不断增加）以及劳、资组织仍然处于一国范围内，两者之间的矛盾不断增大。这类社会契约所表现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在民族国家的疆界上遇到了局限性。

这种模式反映了这个制度的实质。它不考虑外部关系，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在一个独立的国家结构内进行的，而是说这个制度的实质关系不用考虑那些关系即可掌握。而且，发达地区同世界体系中外围地区的外部关系，总的说来，同中心地区内部交往关系相比，在数量上是很微小的；此外，我们将会看到，那些关系是原始积累的问题而不是扩大再生产的问题。大众消费品和奢侈品之间区别的历史相对性，在这里也能清楚地看到。严格说来，那些商品应被视为奢侈品，对它们的需求产生于被消费的那部分利润。工资所产生的需求是随着经济成长而增加的——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增加。而在资本主义历史开始时，这一需求几乎完全指的是必需品——食物、衣着和住房——目前它更加广泛地指的是小汽车、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大众”商品类型的历史发展对于我们有关的问题方面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这个制度初期的需求结构是有利于农业革命的，因为它在国内市场上提供了粮食的出路（在历史上，这种农业改造采取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形式）。而且，我们知道纺织工业和城市发展（“建筑业繁荣，万事繁荣”）在积累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耐用消费品（它们的生

产消耗了大量资本和熟练工人)只是在农业和非耐用消费品工业已达到高水平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这种分析在说明我的论点时起了重大作用。我还要补充三点看法。

第一点,自主中心式积累,即制度不向外扩张的积累,如果实际工资按照已知的可计算速度增加的话,那在理论上是可能的。现在,这个制度的内在倾向是使实际工资的水平保持不变,只要工人阶级不靠工会斗争来争取工资增加。如果实际工资不按必要速度增加,积累就要求市场有稳定地对外扩张来作为补偿。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的扩张主义的基础。在整个十八世纪,一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由于中心地区的实际工资增加得不够,因此必须有某种形式的扩张主义来把某些职能转移到外围地区去。可是,自从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以来,中心地区的实际工资即以更快的速度增加,这就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主义采取一些新的形式(帝国主义和输出资本)并使外围地区发挥新的职能。

第二点,自主中心式积累使得处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倾向于排他性,即:摧毁一切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作为各种社会形态中的例外,中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往往同它的主导生产方式相一致,而一切以前的社会形态则是各种不同生产方式的稳定结合体。

第三点,自主中心式积累是利润率下降倾向表现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制度对这种倾向的反应是垄断和帝国主义,结束了利润的平均化。但是,外围地区(资本流到那里去寻求较好的收益)的利润“补偿”,以及中心地区利润率的不断下降,加上对自主中心式积累结构的追求,加深了吸收过剩资本的困难。资本主义制度克服这个困难的方法是通过垄断资本主义来组织对剩余的吸收。要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对它的困难问题的反应,就必须使用一个新的

概念,即“剩余”,它比剩余价值的概念要更广。

这种分析和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分析之间所存在的基本分歧的一个例子,是围绕巴伦和斯维齐所著《垄断资本主义》一书所展开的讨论中提供的。这本著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它考虑了有关今日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心地区正在克服的一些重要的新事实: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之间的根本的、永久的和不断加深的矛盾。增加剩余的倾向(它是当代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和垄断资本政策的结果)并不和利润率下降的倾向相矛盾——相反,那是后者在现制度里表现的方式。有些评论者反对巴伦和斯维齐的著作,因为它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仍能活动。他们赞成宗教式的、称心的启示录灾难的观点,认为一个黄金时代会奇迹般地到来,而不赞成情况继续不断变化的烦人前景,因为那就必须不断进行新的分析。

第三节 自主中心式积累的条件: 货币制度的作用

货币理论是骗人的“经济学”所喜爱的领域。因为金钱掩盖了实质的关系即生产关系,而把表面的关系即交换关系推到前列。实际上,银行制度只起了消极调整需要的货币量的作用。确实,它也起了积累机制的积极作用(在实现剩余价值的过程中),但是正是这种作用却使当前的货币理论无所怀疑。

主观的价值论只能以一种同义反复的方式回答货币的价值问题:它说,货币的价值就是它能使人购买的商品价值。实际上,货币有四项重要的职能:它是价值的衡量手段;它是具体的流通手段;它是法币的特许手段;它是价值的储存手段。边际主义理论强调货币作为流通媒介的作用,从中导出了所有的其他职能。凯恩斯

理论强调货币作为“贮藏手段”的职能，认为这是货币最特殊的职能。今日的经济学家们（林达尔、缪达尔、隆德贝格、哈罗德）把一种补充的次要作用归于积累机制的两项职能，而芝加哥学派（米尔顿·弗里德曼）则回复到数量理论。马克思是开创关于货币在积累中的作用的真正讨论的唯一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某种程度上与马克思持同样的立场）。

从古典思想到凯恩斯和米尔顿·弗里德曼

自相矛盾的是，被凯恩斯称之为“古典的”经济思想，象凯恩斯主义本身一样，把经济发展机制中的决定性作用归之于利息率，可是把银行制度的作用却看得相当微不足道。

对于凯恩斯所攻击的作者来说，储蓄和投资是经济中真正的因素。但是，这些数量所表达的货币形式对于可能的不均衡状态的真正原因增添了一个失调的新原因。据说有一种“自然”利息率保证着经济均衡。考虑到“以当前为主”的现有储蓄额，按照这种利息率，则相等于考虑到资本生产率的必要投资额。

现在，这种分析不但是同义反复的，因为费希尔和庞巴维克都没有把资本生产率的存在建立在“以当前为主”以外的任何基础上，因此所谓的“自然”利息率不过是将来的折旧率而已，而且，决定“自然”利息率的机制，在储蓄供求曲线的相交点上实际上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凯恩斯对这一点说得很清楚：当资本需求量变化时（某些革新需要更多投资），收入也就变化了，从而储蓄的供应也有了变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求诸于历史——今天现有的资本供应据说是由昨天的收入分配和收入量来决定的——就把逻辑上的困难避开了。

无论如何，最早的边际主义者并不注意货币情况。他们认为货币情况使得货币市场上的利息率“趋向”于“自然”利息率，“是不

言而喻的”。当威克塞尔说明银行机制中的累计活动使得货币利息率偏离自然利息率时，他就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这个分析后来被缪达尔、凯恩斯和卡斯尔所接受，它可以用来说明经济周期。

这里根本的设想是利息率决定了储蓄额和投资额。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储蓄主要决定于资产收入的绝对额和相对额。投资对利息率的变动只是稍有反应：它主要决定于生产能力适应于消费能力的程度。

在凯恩斯的著作中也可找到同样的对照：对利息率的作用过于强调，而对银行系统的作用看得不足。储蓄和投资之间的不平衡最终被归结为流动性偏好，认为这种偏好阻止利息率降到最低水平以下：利息率决定于考虑到银行的货币供应量在内的流动性偏好状况。然后均衡力量决定了相对价格，使得不同资本的边际效率始终相等于这种利率。从那时起，利息率和资本效率之间就不再存在任何差距，结果就没有进一步的净投资。瑞典学派的均衡状态已经达到了，在那里，货币利率等于自然利率，利润等于零。但是这种均衡很可能是一种就业不足的均衡。的确，不论货币发行量有多少，利息率不能因为流动性偏好而降到某个水平以下。所以银行体系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因此许多凯恩斯分子谴责货币扩张的政策，当利息率达到了最低水平时，货币扩张只会产生通货膨胀，甚至是在没有充分就业的情况下。

这种分析是根据流动性偏好的思想，即贮藏钱财的倾向。“对流动性的需要”是什么意思呢？一方面，这是手头掌握现款来支付当前交易的需要。一个企业家准备在多大程度上支付必要的资金来使他的当前生产进行下去呢？显然，当他支付的这些费用没有使他的利润减少到零以前，他是会这样做的。另一方面，这是贮藏现款的需要。但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名企业家一旦有了他所需要的储备储蓄的保证，他就没有贮藏现款的愿望了：他进行

储蓄,为的是投资。所以,问题不在于为什么利息率不能跌到某个水平以下,而在于为什么资本的边际效率水平会跌得如此之低。在这一点上,凯恩斯的解释仍然是含糊的。

可是,凯恩斯理论中特别令人失望的是:其中谈到银行系统之无效能不仅在某一点上——而且是在所有方面。有人可能以为货币的作用是被动的,因为它的供应量要适应于流动性的需要。现在,凯恩斯认为这种供应量是僵硬的。面对起伏波动的需求,正是这种僵硬性决定了利息率的当前变动。确实,利息率的变动有时是由于货币量适应了需求。但是这些困难只是暂时性的,并不能解释利息率在一个长时期内保持的平均水平。

使问题按需要作调整

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 MV (货币量乘以流动速度) 适应于 PT (价格水平乘以交易量) 的情况是怎样发生的。总储蓄并不构成一个同类的总体:我们必须区分生产性储蓄(企业家为了以后扩大生产而储蓄的款项)和储备性储蓄(消费者为了将来花在最后消费品上的款项,或者企业家为了保证目前生产水平和正常生产配置所需要的全部生产开支而留存的款项)。

正是这种流动资金的数额构成了对货币的首要社会需求。银行体系通过短期信贷按这种需求来调整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商业银行应企业主的要求而提供他们短期信贷。这些信贷只用于为经济的当前活动提供资金,就是说,使企业主的收入与支出在一段时间内勾开。

整个问题就是:对货币的这种社会需求是否预先决定了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否认为支付习惯会稳定下来(在短期看来是这样的,虽然在长期看来,由于越来越要求货币周转而使银行技术的改善加速了货币周转),国民收入的数额是否预先决定了的,或者换

句话说，经济活动和价格的水平是否预先决定了的。如果银行真的能通过注入或抽走货币来限制这些水平，那么说银行制度“按需要来调整货币流通量”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这里，我们也需要知道活动水平和价格水平是否基本上决定于货币量，还是这些水平最终取决于其他一些经济因素。凯恩斯说货币供应量完成了一个基本的自变量的职能。这种设想是无根据的。但更加严肃的问题是这样的：什么力量决定了资本边际效应的水平？凯恩斯在这一点上无话可说。实际上，这种效能指的只是投资利润率是和社会生产能力同消费能力之间的一致程度直接相联系的。如果社会的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投资利润率就立即降到零，因此，不管利息率水平怎么样，经济活动都会收缩。

那么，经济活动的水平基本上取决于货币量以外的一些因素。价值水平的情况是否也是这样呢？

数量论同货币值的联系是和货币量密切相关的。虽然象费希尔方程式里表示的这种机械的联系今天已经被人丢弃，但并不是说“数量主义”的每一点痕迹都已从经济理论中消灭了。甚至有过一种企图，想通过数量论同主观价值论的联系来拯救数量论。因此，冯·米泽斯宣布：货币量的增加意味着某些收入已经增加，由于个人收入增加时货币的边际效用下降，价格转而上升。这种说法是很有根据的吗？货币量的增加通常是生产已经增加，因为额外的货币已经通过具体的途径进入经济。需求的增加总是相应具有供应的增加。

经济理论似乎已经采取了一条相当新的道路，那就是研究货币满足“对于流动性的需要”所起的作用。流动性分析是否已经大大消灭了数量论呢？有理由对此表示怀疑。在凯恩斯的模式中，当货币供应量和利息率确定之后，流动性偏好的水平就决定了将要贮存的货币比例（最终要“活动的”那部分货币）。由于利息率决定

了投资额(因为资本的边际效能是一个不取决于货币量的自变量)和国民收入的数额,所以经济制度中的一切因素都存在,除了价格的总水平(根据数量论的公式,它必须由实际国民收入和活动货币量之间的比率来决定)。所以,凯恩斯总是这么一个二流的数量论者。因此,当流动性偏好的影响不再感觉到的时候,纯粹的和简单的数量主义又再度露头了。这种看问题的方式使凯恩斯体系容易结合进古典派体系,在这种方式中,货币量是其他因素加以适应的因素(对凯恩斯来说,货币量决定国民收入水平和价格水平,而不是象“古典派”所主张的只决定价格水平),而不是其本身取决于对货币需求量的变量(换句话说,取决于收入和价格水平)。这种结合是由莫迪格利阿尼在一项总的模式中进行的,它应受到诺加罗针对数量论的一切责骂。反数量主义的立场事实上是和任何一般均衡论不一致的,因为在体系中必须有一个自变量。芝加哥学派(米尔顿·弗里德曼)已经回到了数量论。于是,一旦数量主义的设想被接受时,就使它把一切调研导向通往经验主义的唯一方向,这使它只注意表面现象:寻求货币量和制度内各种变量(“永久性收入”)之间的直接相互关系,对“追求现金”的“心理”分析,以及其他种种虚假的问题。

如果一切形式的数量主义都被排除,关于货币价值如何决定的问题却仍然有待解决。既然如此,我们可以区分两种情况:可以兑换黄金的通货,以及不能兑换黄金的通货。在第一种情况下,生产黄金的成本肯定在决定总价格水平的机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可是,如果通货是不能兑换黄金的,那么黄金的价值所构成的安全界线就不再存在了。直到此时,信用的扩大并不能“超越”需要的限度,因为提供的信用不会是企业主所要求的。只有在没有任何真正后盾(例如战时发行的纸币)的购买力分布的形式才会使货币量增加。由于收入与生产之间的不平衡而并非由于货币量

所造成的价格上涨使之有必要放弃货币的自由兑换。当银行不再以固定价格购买黄金时，信用的扩大或者购买力的问题才能不受任何限制地出现，因为黄金价格也卷入总的涨价运动之中。所以，货币供应量基本上取决于对货币的需求量这一点似乎已经消失了。

信用膨胀已经成为可能，至少在一个独立的全国货币体系的范围之内。事实上，由于通货膨胀造成对外国际收支的变化（通常造成赤字），还由于在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范围内黄金继续是最终的支付手段，因此一国的国民经济政策就有同别国的政策发生冲突的危险。

货币在积累过程中的地位

因此，货币制度被动地完成了一个重要的“技术”职能：即把货币供应量按照表现为“均衡状态”（即假设为简单再生产）的货币需要量作调整。它也完成了另一个职能，这个职能在性质上更有决定意义，虽然它完全被传统的理论所全然忽视——即有可能进行扩大再生产的职能。我把这称之为货币的“积极”职能，从而把注意力导向货币机构的作用，这些机构完成计划者的职能，计划者着眼于未来而大力调整供给以适应需求。

资本主义的积累在事实上要求数量不断增加的货币，这不仅因为国民生产总值在不断增加，而且因为为了使储蓄可以转化为投资，所以不断需要新的货币在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以前就投入流通。新投资在投资的时刻还没有出路，因为一个已知时刻所存在的所有出路不能够超过当时的生产量。但是新投资扩大了生产就很快产生了这种新的出路。可是，为了投资，企业家就需要掌握一定数量的货币。所以，看来以前存在的一些出路必须能使他售出他的那部分产品，售出产品的价值为的是扩大生产，以使用货币形式

“实现”他已完成的“储蓄”，即他的附加资本。这个问题看来是无法解决的，因为企业家找不到这种出路，因为当他想出售时存在的出路不能超过现有的生产量，而企业家必须在今天找到相等于明天生产量的出路。在现实中，企业家手中掌握了价值相等于用于积累（它在明天将产生其自身的出路）的额外数量的货币，那就够了——不论这些货币来自何方。

罗莎·卢森堡分析了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的纲要以后，认为她已经发现：只有存在外部（即资本主义方式的外部）出路的先决条件情况下，有力的均衡才有可能，因此当资本主义方式征服了全世界时它会发现自身面对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所以自动地垮台了。罗莎·卢森堡的错误在于她没有考虑货币起到了恢复有力均衡的手段的作用。

我们可以用马克思自己的例子：取一个扩大再生产的模式，其中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和第二部类（消费品的生产）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五分之一在第一阶段中“储蓄起来”用于第二阶段初期的“投资”，不变资本（C）和可变资本（V）增加的比例与第一阶段相同。因此我们这里有一个扩大再生产的广阔模式，它不通过任何技术进步（在一个阶段同另一个阶段之间任何部门的有机构成 $[C/V]$ 没有任何改变），而是通过取得劳动力的增加而实现的。

在第一阶段，我们看到：

$$I. \quad 4000C_1 + 1000V_1 + 1000S_1 (400ScI + 100SvI + 500S'_1) = 6000M1$$

$$II. \quad 1000C_2 + 750V_2 + 750S_2 (100Sc_2 + 50Sv_2 + 600S'_2) = 3000M2$$

我把每个部门产生的剩余价值分为三个成分：为本部门积累的目的而储蓄的成分，它以生产资料进一步投资的形式来实现

(Sc); 为以后购买更多劳动力的目的而储蓄的成分(Sv); 以及消费掉的成分(S')。这些成分都列在括号内。

这个时期内生产资料的生产(6000)比同时期表现的需求(4000+1500)超过I所生产而未曾消费掉的剩余价值量(500)。同样地,消费品的生产(3000)比这个时期表现的需求(1000+750+500+600)超过II所生产而未曾消费掉的剩余价值量(150)。

但是,在下一个阶段里,均衡的方程式成为:

$$\text{I} \quad 4400C_1 + 1100V_1 + 1100S_1$$

$$\text{II} \quad 1000C_2 + 800V_2 + 800S_2$$

除了生产资料的简单更新,在第二阶段开始时扩大生产机构的要求吸收了第一阶段中I的过剩生产。事实上,(4400+1600)-(4000+1500)=500。同样地,第二阶段中由于使用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产生的对消费品的需求,会吸收第一阶段的过剩生产,因为(1100+800)-(1000+750)=150。

因此,第一阶段的部分生产在第二阶段中被吸收了,如此等等。

马克思的例子中所作的设想——两大部类的积累率不同,有机构成不变——并不重要。安娜—玛丽·洛拉格奈已经表明:即使我们设想两大部类的积累率相等而且有机构成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逐渐增加,假如规定某种比例,有力的均衡是可能的。

这种模式表明没有“必要的外部出路”问题,只有信用问题。企业家们在一定阶段内必须掌握他们在下一阶段生产实现以前事实上不能获得的货币手段。如果从一个阶段至下一个阶段规定某种比例(M_1 与 M_2 之间, C_1 与 C_2 之间,等等),这种实现是可能的。

如果在第二阶段期间继续保持这些比例,企业家们就能够在这个阶段末偿付他们先前得到的预支,如果货币体系使他们得到一笔大于前一笔的、相当于第三阶段期间均衡需要的新预支,等

等。

如果不断增加的货币量(以不变价格)投入这个体系的话,没有外部出路也是有可能取得动态均衡的。这笔新货币通过黄金生产或者通过银行而到达企业家手中。马克思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分析了一百年前额外的黄金进入经济的通道,我不准备再重复这些内容了。我只想说,新的黄金生产使得一种特殊的销售成为可能:黄金生产者用自己的利润(以黄金的形式)购买其他企业主的产品,或者为了供自身消费,或者为了扩大生产。因此企业主们就能出售自己的“剩余产品”(其中体现着他们的实际储蓄)并以货币形式实现旨在发展其工业的价值。他们可以用这些货币来购买生产资料和雇佣工人。出路的可能性存在着,但是需要一种特殊的货币机制以便使之得以实现。今天,银行可以通过信用渠道无中生有地制造大量额外的货币。熊彼特已经说明这笔货币掌握在企业主手中可以如何扩大生产。

可是,即使银行体系提供的这种服务也不属于根本性质的。确实只有当投资产生了自身的出路时,这种预付的资金才能收回。如果这不发生,发行货币并不解决额外生产缺乏任何出路的问题。

因此,货币体系完成了一项微妙的任务,注意使企业主的期望保持在“合理的”限度以内并计算动态均衡的或然性。它起到一个计划者的作用,监视着动态部门均衡的保持。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从一开始就规定信用的集中化。信用在资本主义以前即已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组织了集中化的银行业,使银行货币的使用普遍化,并使信用问题的集中体系在全国范围体制化,作为积累的一个重要条件。

当代货币体系活动的条件:爬行式通货膨胀

数量论声称:唯有货币数量增加,才能带来价格的普遍增

加。如果草草地加以考虑历史事实的话，确实似乎证实了这种理论——虽然黄金生产的实际成本由于发现了更丰富的金矿而下跌足以说明十九世纪的巨大价格运动。1914年以后，阿夫塔利昂表明汇兑率也能决定总价格运动。现在已经同意：一次普遍的价格上升可能由于总货币需求扩大而通道不畅带来的供应僵化所造成的。这种情况往往见之于战争时期、备战时期或重建时期，当时消费品生产受到限制或者处于成本不断上升的条件之下，而收入（这没有真正的等同成分）则由国家分配。并且认为：在竞争机制活动不佳的情况下，各社会集团之间为争夺自身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而发动的斗争，可以产生价格普遍增加的气候。在所有这些事例中，货币扩张处于价格上升之后而不是之前。

由于这种情况，经济学家们或许为了摆脱数量论而设法忘却他们以前特别感兴趣的事例，即：货币发行超过需求而窒息了流通渠道和造成了价格上涨。这是唯一可以称之为通货膨胀的事例，因为这是物价上涨具有货币根源的唯一事例。

在可以兑换成黄金的结构内，通货膨胀是不可能的。在这种制度下，由于生产黄金的相对成本下降或者生产一般商品的实际成本上升，很可能出现物价的普遍上涨，但是不可能设想流通渠道在这种情况下会堵塞。事实上，信贷是银行根据需求而提供的。这些信贷是用来资助新投资的。这种新投资或者产生它自己的出路——借户能偿还银行（在这种情况下价格不上涨，因为生产按收入分配的同样比例而增长）——否则它不这样做就会发生危机。只要银行不想停止兑换，它就会避免超过一定限度来发放信贷，因为它知道，由于生产与消费之间不平衡的真正原因，超过某一点的新投资就不能再产生其自己的出路，即使借户愿支付高额利息率。

至于黄金，这也不能堵塞流通的渠道。如果新的黄金生产率提高，那么，或者是以固定价格购买这些黄金的中央银行看到自己

的储备在增加而它提供的信贷没有增加，或者是囤积者购买这些黄金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不论何种情况，黄金被生产者出售而投入流通。

虽然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通货膨胀，这同取消汇兑是不一样的。

基本上说，竞争情况下发生的变化大大改变了总的价格运动的路线。在十九世纪，只要竞争是常规而垄断是例外，企业主就无法提高价格，否则会失去顾客。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就不会发放“太多信贷”，因为，一方面，既然企业主并不期待价格上涨，他们就不需要额外的现款，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关注的是维护兑换，它要防止商业银行发放超过现款需求的信贷。所以，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当国家发行纸币购买力而没有实际的均衡手段时，才会停止兑换。

除此以外，由于竞争产生了新技术而使实际成本下降，这反映在价格下跌的长期趋势。这种趋势被普遍涨价的周期缩短所抵消，那是因为黄金生产成本的大幅度下降。如果我们研究一下1800年至1900年间的批发价格曲线，我们看不到用巧妙的统计办法就会出现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这并不意味着，在更加频繁地被战争所打断的某些时期，涨价的趋势有时并不抵消形成本世纪整个背景的普遍下跌趋势。在其他时期里，革新的巨大浪潮相反却可能有助于加剧这种价格下降的运动。

二十世纪的情况已经改变。垄断统治了生产的主要部门。现在，垄断势力不愿降低价格。它们之间的竞争使用了其他方法。因此，正是由于在新的结构条件下价格抵制任何下降，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它不可能回复到金本位。发生的第一次困难浪潮完全停止了兑换。

从那时以来，对涨价始终没有障碍。这是否意味着这种涨价将会继续？不会的，因为如果企业主要提高价格水平的话，他们必

须要求银行增加给他们的信贷。由于兑换已经取消，中央银行可以自由决定同意或拒绝执行这一政策。在这个有限的意义上，货币与信贷管理成为一种上世纪闻所未闻的现实。

但是如果中央银行执行一项符合企业主愿望的政策，那么价格上涨会无止境地继续下去吗？我们很可以问一句：为什么垄断势力不愿不断涨价，为什么 1914 年以来价格上涨并未继续不断，为什么价格急剧上涨的时期之后接着是价格稳定化的时期（当然，除了价格上涨不是由于企业主的行为而是由于真实的原因：生产成本增加，或者如战时所发生的分配货币收入与真正的生产不相称）。如果价格上涨并非毫无阻隔地继续不断，那是因为实际工资水平保证产品按取得最大限度利润的价格加以销售。在上世纪，工资是一项固定不变的数据，如同价格一样，企业主脱离了竞争者，对此就无能为力。今天情况不一样了。垄断资本家设法影响这两个以前独立的因素。只要工人们拒绝自身的实际收入下降而调整到这一水平，“工资膨胀”就不可避免。但是价格上涨该责备谁呢？是拒绝使工资调整到最适合于企业主水平的工人呢，还是拒绝使利润调整到工人能接受的工资水平的企业主呢？

阶级之间在划分收入上的斗争今天是在垄断势力和工会的对峙处于体制化形式的背景下进行的。只要工人阶级接受“比赛规则”（换言之即社会民主主义思想），那么把实际工资调整到某种计算好的水平以保证自主中心式增长的平衡就成为一项社会契约的主题。这种调整是通过名义工资的定期增加而取得的。只有当这些增加太大时才会引起价格上升。因此，“爬行式通货膨胀”是有关当代自主中心式增长的均衡问题基本法则的表达方式。这种制度要求废除兑换以及当通货膨胀率快于其他国家时对货币的对外价值进行调整。

第四节 自主中心式积累的形式： 从周期到危机形势

危机形势的波动起伏——不论采取周期形式（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情况）与否（例如那时以来的情况）——都是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之间固有矛盾的表现，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这种矛盾通过把资本主义市场扩张得更广更深而不断加以克服。当目前的经济理论证明其能够超乎现象的货币表现时，有时就能抓住这种矛盾的动力——“乘数”与“加速”联合作用的狭隘“经济主义”名词，它们掩盖了矛盾的根源。然后它以机械的、简单化的形式来重述马克思的分析。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固有矛盾的历史发展规律是越来越糟，三十年代大危机罕见的规模表明了这一点。但是这种趋势并不导致这个制度“自发毁灭”，因为这个制度总能通过组织垄断势力并使国家吸收增加的剩余来加以应付。根据这种观点，进行世界范围积累的历史条件是极其重要的。当代的科学技术革命，加上东欧逐渐结合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可能将大大改变这种世界范围积累的条件。资本主义扩展到外围，外围的结构调整到中心的积累要求（即：中心与外围之间“国际专业分工”所采取的形式）也必须符合分析危机形势的重要性。

积累所采取的周期形式很早就成为经济研究的主题。可是，很长时期中，由于当时的经济理论信奉的是“市场法则”（根据这种法则，货币形式的储蓄投资——它们一定经过这种形式——由于金融市场而自动出现），周期的“原因”就从货币、企业主心理或生产的技术条件中寻找，换句话说，从所谓“外部”或“自”变数中寻找。这种观点必然是一种表面的看法。它引起关于周期“理论”的

纷纷出现——马尔萨斯、西斯蒙第、(特别是)马克思是三个重要的例外。但是边际主义批评家却对“市场法则”的有效性不加怀疑而对马克思的分析毫不理解,错误解释,并且未经真正调查而加以拒绝,他们以购买力来作为货币价值的定义。

在上世纪末,威克塞尔研究了总的价格运动并设法找出总供给和总需求可以不相等的原因之后,不能不对“市场法则”的教条地位提出挑战。缪达尔从1930年以后,凯恩斯早从1928年以后,特别在1936年,进一步对“市场法则”进行这种批评。从那以后,对周期的研究就超越了心理和货币的老生常谈而研究从调整来自总收入的储蓄的机制到经济增长所必需的投资。

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并不沿正常的上升道路行进。而是走一条上升总趋势中伴有一连串周期性波动的路线。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外部”出路而仍能不断增长的可能性被马克思所证明,后来又^{被列宁所证明},他们反对罗莎·卢森堡的论点。从前段时期的收入中得来的储蓄在后来时期中可以加以投资并产生自身的出路,这就使资本主义市场深化而并未扩大。在这个意义上说,“市场法则”具有相对的有效性,如果不忘记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式意味着“储蓄”行为和“投资”行为之间在时间上的分离的话。信贷以及获得新的外部出路所构成的暂时好处方便了基本的活动——货币形式的储蓄的真正投资。从前段时期收入中得来的真正储蓄在投资以前必须采取货币的形式。十九世纪的黄金生产以及今日的银行体系使这种初步活动有可能进行。

但是“市场法则”提出的主要主张是错误的。投资可以产生它自身的市场——但它也可以产生不了。周期理论的特殊功能正在于决定投资无法产生自身市场的条件。

货币当然使经济体系取得灵活性,但是,由于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不平衡,它也可能使这个体系崩溃。使储蓄行为与投资行

为相分离，货币就产生了危机的可能性。这是否意味着它完全要对此负责呢？如果情况是这样，那就得说明为什么这种不平衡是周期性的而不是长期性的现象，为什么它在每次都能克服，为什么周期现象只突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不是使用货币的其他生产方式，例如简单商品经济。事实上，如果周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货币”现象，它恰恰也是其他一切经济现象。因此，基于信贷机制的一切周期理论只表面地涉及这个问题。事实上，货币在交换中并不起积极作用：出路（市场）必须已经存在；货币本身不能产生它。货币所能做的就是提供时间的过渡。严肃的现代理论最终都归结到这一观点，认为周期是发展的特殊形式，通过它，储蓄与投资之间经常发生的不平衡就能经常加以克服——这是马克思在分析中提出的概念。

周期的“纯理论”：货币的幻想

凯恩斯的分析一直被说明为“变形的”。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投资量通过乘数而决定国民收入的水平。这种投资量本身决定于两个自变量：一方面是利息率，另一方面是资本的边际效率。收入对投资没有反作用——或者更确切些说，投资只对收入成比例，而不是对收入增长成比例。其结果是：储蓄与投资均等的确立在国民收入水平上的均衡是稳定的均衡。

《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确实包含着周期理论的概貌。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下降伴随着利息率的上升，因为它导致流动性偏好的增加。投资突然萧条，总需求也随之萧条：国民收入缩小到从中得来的储蓄额不足以超过投资额减少的程度。可是，这种分析并不使周期理论有所推进，因为资本效率的突然下降仍然无法解释。

凯恩斯转向了心理学，说明在资本未来收益的问题上人们不

可能抱有无限乐观的期望。可是，如果当发展达到某一程度时没有客观理由说明这种收益水平会下降，这种期望就会符合一种实际的事态。

至多，偶然的“历史”原因可能不时产生一种心理危机，因而造成总收入的收缩。但是周期的规律性要求对经济动力本身的机制加以深刻的说明。

卡尔多、卡莱基等人放弃了凯恩斯关于储蓄倾向和投资倾向稳定价值的看法，他们建立起一些考虑到总收入中可能产生波动的模式。或许，哈罗德是迄今最好地分析联系国民收入与投资（以及投资与国民收入）所有因素的逻辑顺序的作家。他认为，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来自实际储蓄（它实质上决定于实际收入水平）与合意储蓄（它实质上决定于实际收入增长率）之间的基本矛盾。哈罗德在《贸易周期》一书中使乘数与加速按下列方式活动而建立起一种周期模型。一项初始投资带来了国民收入的增加，它本身又决定了第二轮投资（加速）。繁荣继续到乘数没有足够力量来消除加速的行动为止。这确实是在繁荣时期所发生的情况：消费倾向随着收入减少而按比例地缩小，因为这种收入中利润所占的份额增加得比工资所占的份额要快。

《资本论》中没有专门一章来集中讨论周期理论的一切因素，可是，马克思通过对今天所谓的“乘数”和“加速”的现象加以研究而揭示了这个进程的实质。在第二卷第二十一章，他说明：通过资本主义的扩散和深化，投资有可能产生其自身的市场。可是，在同一章里，他分析了今天所谓的“储蓄倾向”同总收入相联系的机制，随着收入增加，利润所占的份额也按比例增加——实质上确定用于储蓄和投资的收入。这一现象符合于哈罗德所谈的“乘数”的减弱。事实上，乘数只是投资与一部分收入之间的比率（那部分收入的分配与此有关，它是花费掉的，所以就是整个收入减去储蓄部

分)。当国民收入量增加时，随着利润所占的份额增加得快于工资所占的份额，一定量的投资所产生的开支额减少了。如果马克思认为乘数的这种减弱(其形式为：花费掉的收入[最后需求的来源]同供应的生产[这种收入分配的来源]之间的不平衡)从一开始就不阻碍发展，那是因为他以前已经分析过后来所谓的加速因素。

当他研讨固定资本的更新时，他提出：最终需求的增加在某些情况下(那些情况正是在一场经济萧条的末了同时出现的)可能引起一次突然的投资，这反过来通过它承担的收入分配会产生固定资本投资的新可能性。但是马克思立即否认这种固定资本更新现象(类似于加速)的存在是由于生产的技术要求：为了适应最终生产的任何增长(即使是暂时的增长)而建造经久耐用的机器的需要。他把这种现象归之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由于萧条结束时打开了新市场(同技术进步有联系的需求情况，即国内市场，或者国外市场)，需求的增加，即使是小小的增加，可能使固定资本投资再次似乎出现有利可图的前景。所以，一切保存起来的储蓄就突然涌向这种投资。新生产造成了使这种投资确实有利可图的收入分配。马克思认为在一个计划经济中，这些对技术的限制会反映在储备库存量的波动，但根本不能决定投资水平，这将使它摆脱目前依靠直接利润的情况。

马克思的分析实际上在这方面要更为复杂，除了分析“乘数”与“加速”之间的矛盾以外，还涉及工资周期性波动的次要问题；他的分析更为复杂，还在于这联系到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理论。在繁荣时期，失业减少，实际工资上升，机器设备使用率增加。在萧条时期就发生相反的情况。这两种机制使得萧条和繁荣的时期都延长了。多布认为《资本论》第一卷中谈到的这一现象是重要的，我则认为这并不说明马克思的思想。可是，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是以周期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在繁荣时期开始时，“反趋势”强于一般

趋势。在该时期終了时，反趋势已是强弩之末：掩盖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影响的剩余价值率之上升放慢下来了。利润率下降了。但是，虽然这一规律通过周期表现出来，它并不是周期的原因，周期的原因在于以下两种因素的联合影响：一是消费能力的发展，它并不象生产能力那样增长（由于利润所占的收入份额不断增加）；二是有利可图的直接前景，它引导投资并由于加速因素而延缓了乘数减弱的不良影响。

如果哈罗德在他对周期的研究中得出一个似乎正确的描述，那是因为他在一个实质问题上打破了凯恩斯的分析。哈罗德把投资倾向同收入直接联系起来而不通过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的双重中介。他的解释所采取的出发点只是生产能力（与来自以前生产的储蓄有关）与消费能力（与生产所带来的收入分配有关）之间的矛盾。他完全不管利息，认为那不会严重影响投资。他也不管心理现象，认为那是因变数。

希克斯象哈罗德一样是一位后凯恩斯主义者，但对传统的利息率要重视得多，他设法在哈罗德的分析同凯恩斯的分析之间建立一座桥梁，前者以投资倾向同总收入之间的联系机制作为基础，后者以利息与资本边际效率之间的矛盾作为基础。他认为，利息率的下降（如果资本边际效率保持稳定）带来投资的增加，从而带来收入的增加。但是收入的增加增加了交易所需的货币量。如果货币供应保持固定，如果流动性偏好保持不变，交易所需货币量的增加会转而促使利息水平上升。这些机制的时间发展，如果流动性曲线和储蓄与投资均等的曲线采取图式的形式，那就是周期。

这里我们是不是回到霍特里的乌托邦去了呢？适当地注入货币，加上收入的增加，假如流动性偏好保持在稳定水平的话，显然有可能在不提高利息率的情况下满足交易所需货币的增加。繁荣将继续下去，当然，除非资本效率下降——那么这一点就必须加以

说明，正如哈罗德和马克思已经说明的，这完全是由于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之间的不平衡。

希克斯接受了凯恩斯的假设，认为现在已经到达这一点：不论注入多大量的货币，由于利息率已经处在很低的水平，所以它不能降得更低了。因而货币措施无法扭转危机。可是，这种分析无法说明更加一般情况下的周期，十九世纪的周期，当时的平均利息率比今天的要高。当然，人们可以求助于资本边际效率：那么周期会看来是这一变数独立运动所产生的，在整个过程中利息水平比较稳定地保持在最低点上。可是，人们在这里会碰上开头的那个难题：正弦曲线的“心理”运动的根源何在？

当前垄断资本主义的成熟论和剩余论：

从周期到危机形势

因此，一个世纪以来周期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所采取的必要形式。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周期性不平衡产生于增长的机制，产生于储蓄积累的作用（到一定时期，储蓄同投资相比就变得太多了）。周期发展的成果是增长。不存在一种现象驾临于另一种不同类的现象之上——一方面是周期，另一方面是一世纪以来的总趋势。建立一个终点与起点相同的周期“纯粹”模型，那是幻想。运动的起点——突然的固定资本投资——在技术进步背景以外是无法理解的。

在打不开外部市场的情况下，唯有靠引进新技术才能使市场扩大。而且即使控制了外部市场，也不能解决世界范围供求之间的不平衡。为了说明世界性复苏，所以我们必须分析实施新技术的影响。在萧条时期，普遍的停滞为技术改进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因为带头引进革新措施的企业可以恢复它失去的利润。新方法普遍使用了，由于进步通常表现为加紧使用机器，所以新的需求出现

了。由于生产和新机器安装所要求的突然投资，生产再度上升。随后的发展就采取周期的形式，但是在这一运动终了时国民收入要高于开始时的水平。发生了一些新情况：新技术普遍采用了。其结果，产量增加了。资本主义市场靠这种手段而不断扩大，因此周期是必然贯串整个上升趋势的一个特点。

可是，在储蓄和投资之间周期性不平衡的机制以外，有一些真正的原因使这两大全面特性在长期说来比较容易地“加以调整”。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长期倾向保留了它自身的现实，即使这个现实只通过周期表现出来。如果储蓄与投资之间的不平衡变得长期存在，在周期期间，这反映在长时期的萧条和短时期的繁荣。如果相反地，平衡很容易达成的话，那就反映在短时期的萧条和长时期的繁荣。

使得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平衡或难或易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在大危机以后的年代里，关于“长期停滞”和资本主义“成熟”的议论颇多。凯恩斯当时发现了长期就业不足的可能性。事实上，根据凯恩斯的观点对成熟进行的分析最终带有货币的性质。纯粹由于货币的原因而阻碍增长的理论是难以接受的。由于这种情况，是否必须承认：自从马克思以来，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已经永远地放弃了；在十九世纪初，李嘉图认为他可以在历史范围的收益递减基础上预言一个“静止的时代”。静止状态的任何概念同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只表明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一定会越来越糟。关于全面不平衡的最终原因，仍然是：一方面，工资与利润分占收入（从而也是消费与储蓄分占收入）的矛盾，另一方面，资本货生产与消费品生产的划分问题。一定量的最终生产必须有一定量的中间生产。后者的数量只是估量生产合宜数量的最终产品所需要的投资量的一种方法。哈罗德放弃了利息率的货币分析和资本边际效率的心理分析，为了直接

专注于资本—产量比率(衡量生产的资本集约度,即资本货生产与最终产品生产之间的比率)以及总收入在消费与储蓄之间的分配,他非常接近于马克思的分析。

在十九世纪,当资本主义处在青年时期时,前资本主义经济的解体所提供的巨大可能性集中到有利于储蓄与投资之间进行调整的倾向。当时的经济衰退不如三十年代所发生的衰退那么深远和持续。但在当时,正当成熟论预言“资本主义末日”和“永久性停滞”的时候,同时,正当一个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的名目是“资本主义总危机”,事实上这是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灾难观。)被接受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的增长率却加快了,而且,增长失去了它的周期性特点。

最新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对这种发展提供了唯一的解释。巴伦和斯维齐开始了这样的最新分析,他们对“剩余的增加规律”和这种剩余被吸收的形式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考察。而且,与此同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说明为什么周期消失了。周期之出现,只是因为资本主义不能“计划”投资。现在,垄断资本主义如果得到国家的积极帮助,就能够在某种意义上以及在某些限度内这样做了。一旦资本主义从不加控制的加速影响下解放出来,周期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一种危机形势,它由国家和垄断势力(前者为后者服务)采取行动加以监视以减弱其波动。

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经典形式的周期只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消失而让位于许多靠在一起的、不定期的、范围较小的危机性摆动呢,而垄断资本则在上世纪末就已经出现了;为什么三十年代大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强烈的危机呢,如果说垄断资本主义要比竞争性资本主义善于“计划”投资。答案必须从国际体系的活动方式中去找。如果货币体系能适应于这样的情况:自由兑换黄金已决定放弃而货币当局和国家的整个经济政策一起都向这

个方向努力，那么垄断资本确实能把“投资”计划到一定程度。所谓“协调一致的经济”（即西方式的计划）只是意味着预感到这种新的可能性而已。现在，不但这种预感（如同所有预感一样）已经落后于现实，而且它能从中转变为行动的结构也是在国别的范围。在垄断资本形成以后很久，国际体系仍然由“自发机制”所调节。所以，在国际范围内，不可能有“协调一致”。在1914—1918年大战以后，英国和法国虽然在国内经济上最终放弃了金本位，但企图在对外关系上重新建立金本位，反映出国内秩序与国际秩序之间的脱节。由于国际秩序的自发性实际上不可能使国内政策协调一致，所以三十年代大危机之格外严重主要应由国际自发性负责。垄断资本使得国别范围内有可能实行对付危机形势的经济政策，但是如果这种政策得不到遵行，那也会造成周期波动加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维持了外部控制，这是第一次使得各国经济政策行之有效；正是在那个时候，例如法国就开始实行“协调一致的计划”。其后的繁荣（欧洲共同市场以及随繁荣而来的对外关系自由化）现在则损害了这些政策的有效性。因此，国际秩序的问题再次提上日程。战后所建立起来的“秩序”（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象征）根本不是什么秩序，因为它仍然以相信自发机制为基础。这种“相信”是受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所摆布的，因此建立一项世界性的经济政策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体系的缺陷表明经济秩序的要求同体制结构之仍然处于国别性质之间出现的新矛盾，这种经济秩序不能单靠国别经济政策来达成（因为资本主义现在具有重要的世界性范围）。如果这一矛盾不加克服，那就不可能排除极为严重的“危机事故”的可能性。

第五节 国际关系与中心地区资本主义 国家形态的相互联系

关于国际收支平衡的经济理论

国际收支的平衡至多只是一种趋势，它取决于国际结构的持续调整。就世界上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来看，这种国际结构就是指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区对外围地区进行不对称统治的结构。外部的平衡——国际秩序——之所以有可能保持，只是因为外围地区的结构形式适应于满足中心地区积累的需要，就是说，假如中心地区的发展产生并保持外围地区的不发达。无视这一重要事实，就会违背以全球协调的条件为基础的当代经济理论。

一国国际收支方面暂时性赤字，不论其原因何在，不论是短暂的还是结构性的，是否能通过该国自身影响其汇率水平、物价和经济活动而能加以消除呢？经济理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

亚当·斯密只容许价格机制进入国际平衡的结构。在这一点上，他一方面遵循博丹、配第、洛克和坎梯隆等人的重商主义老传统，他们认为贸易收支的不平衡可以由黄金的流动来加以补偿；另一方面遵循数量论的传统，它认为黄金的流动反过来决定总的价格水平。所以，不平衡应当靠它自身来消除。由此再迈一步，就宣布外部不平衡的唯一可能原因是“内部通货膨胀”——这是李嘉图领导下的金块主义者在十九世纪初要走的一步。博桑凯把贸易收支不平衡归于非货币原因（出口困难是由于战争，加上对外国的津贴款），他的论点不能说服他的同代人。

威克塞尔在十九世纪末提出了国际平衡机制中需求变化所起的作用。国际收支的赤字被认为是购买力的转移。这笔额外的

购买力能使有关的外围增加进口，而逆差国则不得不减少进口。国际平衡可以毋需改变价格而达成。这一革命性的理论是由奥林提出的，他声称：在这个基础上，德国有可能支付赔款。可是，象凯恩斯这样著名的思想家仍不愿放弃老观点，这足以说明关于价格作用的古典理论（与数量论有联系）继续具有影响力的程度。如果他说德国不可能支付赔款，那是因为他认为德国进出口的价格弹性作用将带来“反常”结果而不是“正常”结果。只是后凯恩斯主义者才把博桑凯所创始的方法的实质结合进国际平衡的理论中来。

观察问题的这两种方法——“价格”的方法和“收入”的方法——往往被说成是互相排斥的。但是它们只是同一现象——即：需求——的两面而已。需求决定于价格，还是决定于收入呢？瓦尔拉关于“一般平衡”的整个结构始终根据供求规律。由于效用论企图取代劳动价值论，因此第一批市场分析家，特别是萨伊，提出了需求法则。然后，供求对价格变化的反应就由商品边际效用递减作解释了。除了这些反应所起的作用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因素来取得平衡了。这种结构仍然很脆弱，因为萨伊和瓦尔拉忽略了由收入所构成的需求中的基本成分。他们使供求法则作出超过其能力的贡献。商品效用递减率很可能说明价格上升时需求下降，但只是在假定收入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现在，根据一般平衡的理论，收入分配取决于商品的相对价格。价格的任何变化就改变了收入。那么就求得求助于“周期性”分析以避免边际主义的恶性循环：今天的价格取决于昨天的收入，而昨天的收入取决于前天的价格。实际上，这样来求助于历史确实说明承认了边际主义的无能。

对于对外贸易价格弹性的分析同以前对供求的分析是一样的。它们设想交易双方的国民收入是稳定的，因此它们无法解释国际贸易的真正运动。

提出供求对一般收入变化的反应，提出外贸特别对国民收入变化的反应，是一场确确实实的革命。但是经济学家们仍然乐于指出：如果收入水平在某个时期有多高，某种产品的交易水平就有多高。这表明：在后来时期，收入、价格和交易的数量是不相同的。这提供了对发生的变化描述，但没有加以说明。

价格作用的理论。 关于价格作用的古典理论是在十九世纪初根据当时的现实(金本位)并在货币数量论基础上的设想背景下制订出来的。由于任何进口国可以选择购买外币(外国金币)或输出黄金(以金锭的形式)，国际收支的赤字不能使本国汇率降低足够程度以影响贸易比价和有利于出口。所以，不平衡最终只能在黄金外流中找到反映。这种黄金外流所导致的国内价格普遍下降以及结果导致出口价格的下降(与国外价格稳定相比)和进口价格的稳定，这不利于后者而有利于前者，从而最终使平衡得以恢复。这是由于贸易比价恶化所造成的。

最近发现贸易比价的变化一方面有利于(或不利于)出口，同时也降低(或提高)它们的单价。国内价格的提高，如同下跌一样，可能影响国际收支状况的改善或恶化，这取决于弹性的水平。就进口而言，情况也是一样，只是方向相反而已。对价格弹性不同组合的影响的分析，今天已经是常见的了。最好的阐述是琼·罗宾逊所作的，她考虑四种弹性：本国的出口供给弹性，外国的进口供给弹性，本国的进口需求弹性和外国的出口需求弹性。应当记得，早在凯恩斯以前，诺加罗批评了奥古斯丁·库尔诺的交换理论，他认为有待证明的是：价格弹性是贬值使之有可能消除赤字。

如果该经济社会是完全浑为一体的，那么进口价格的变化一定会造成一切国内价格的按比例变化，从而造成出口价格的按比例变化。较高的进口价格是否必然影响一切价格上涨呢？阿夫塔利昂表明汇率本身的水平，在某些情况下，对国内价格水平有影响。

不应当认为汇率只影响进口价格(通过成本的改变),认为只有当进口品进入制造阶段时贬值最终才影响其他商品的价格。阿夫塔利昂以历史例证来表明汇率有时确实通过货币收入的增加来影响一切价格。汇率改变对进口国收入(通过已取得的和先前已付款的商品库存)、对国外股票持有国、对出口国和出口生产国收入的影响总是能使价格按照这种汇率改变的相应比例而普遍升降吗?如果影响足够深远,如果货币收入的波动并不被货币囤藏的波动所抵偿,最后,如果整个货币收入投入市场(作为需求),那么这种情况将可能发生。在那种情况下,在贬值的作用穷尽以后,国际收支将完全同贬值以前相同。暂时得到消除的长期性不平衡现在又再度出现。历史上可以找到这类机制的无数事例,尤其是在拉丁美洲的货币史上。在十九世纪,那里连续不断地发生贬值,长期而言那证明是不可行的,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普遍的、按相应比例的物价上涨。这些经验证明:因货币操纵而造成深刻的结构性失调所导致的外部平衡的真正失衡,是不可能解决的。它们也表明:货币的国内价值和国外价值不能长期间相互不同。虽然确实存在与国际贸易无关的国内产品,“国内”部门最终仍然要受国外价格的影响,这是通过收入的渠道发生作用的。例如,马里法郎于1967年实行贬值,法国专家认为这将恢复对外收支的平衡,其结果,虽然冻结了工资,却使得一切物价按比例地几乎立即上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极端的例子,表明主要价格的结构如何影响一个受支配的经济社会。

确实,也能引述另一面的情况:在十九世纪的欧洲,金本位制和控制贴现率的强制货币政策证明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岂不只是因为长期的国际收支处于平衡、而不平衡只是一时的危机性事故吗?

汇率作用的理论。 假定货币不能兑换,汇率可以随国际收

支而发生巨大变动，这岂不使我们回到价格作用上来而不提数量论吗？的确，在这个例子中，汇率的改变带来进口品价格的改变，但是国内产品和出口品价格（同国内价格有关）并无理由改变。数量论者说，这是因为货币数量保持不变。还有人说，因为汇率并不总是必然影响国内价格。

这种分析需要完成。一方面，依靠价格弹性，汇率的改变可能具有“正常的”作用或“反常的”作用。另一方面，进口品价格也可能影响国内价格的水平，从而影响出口品价格，并以同样的方式——通过成本，通过主要收入状况，通过价格结构的传递。

这里，短期资本运动也可以阻止汇率（和价格）的改变，正如以前它阻止黄金（和价格）的运动。如果中央银行提高了利息率，这吸引外国短期资本，正如在金本位制度下由于同样原因发生的情况。在国际收支发生暂时赤字的情况下，它因此能阻止货币贬值（和随后发生的物价上涨），正如在金本位制度下它能阻止黄金流失（以及随后发生的物价下跌）。但是这种行动同以前一样受到相同的局限。如果赤字是结构性的、长期性的和深刻的，外资的流入就无法消灭它——由于在贬值时会在汇率上受到损失这个前景，因此许多投机者不满意于利率上升而取得小额利润，所以消灭赤字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最后，我们从价格作用的分析中得出什么结论呢？首先，不存在价格作用而只存在汇率作用。对外收支的不平衡并不通过货币量而直接影响价格。它影响汇率，这反过来又影响所有的价格。正是由于这一点，因此不论价格弹性如何，汇率的改变决不能解决结构性不平衡的困难，因为在某一时期的末了，事物又回复到它们开始时那样。第二，必须看到，即使在过渡时期，由于存在着严重的价格弹性，汇率的波动不一定能改善对外收支。

如果我们考虑到：在外围国家里，由于不可能以本国生产来替

代外国生产,进口品的需求弹性很小;在这些国家里,进口商的收入比该国的一体化程度,在比例上更为重要;这些收入对需求的影响又加上联系货币国内外价值的决定性心理考虑所补充;存在着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社会的价格结构传递到被统治经济社会中去的机制——那么我们就得出结论认为:十例中有九例,贬值无法解决长期性的国际收支不平衡,不论在短期内,或者尤其在长期内,而且,相反地,这种贬值将在短期内使外部环境更形恶化。

收入作用的理论。 威克塞尔和奥林以非常简单的形式提出了收入作用的机制。对外收支的赤字通过把购买力转移到国外来加以解决。这种新的购买力必须使受惠的经济社会比以前更多地进口。另一方面,这种转移不得不使赤字经济社会减少它的进口需求。至于在金本位制度下发生的黄金转移,这提供了对购买力转移的支持,如此而已。显然,如果我们认为自由兑换和灵活的汇兑已被禁止,那么,一方面作为购买力转移的不平衡,在另一方面就会对汇率发生影响。不平衡对汇率的这种次要影响可能会阻碍重新平衡化机制的作用——例如,通过价格上涨而取消了购买力的转移。但是这种机制实质上仍然保持同以前一样的性质。

奥林的理论比以前理论的优越之处在于它使我们能说明国际收支中发生的重新平衡化,不论贸易比价如何发展。根据经典的理论,那是由于贸易比价在某个方面发生的改变,因而重新建立了平衡。现在,经验已经多次证明:尽管贸易比价发生逆转,却出现了重新平衡。购买力转移的理论还有一个优点是它提出只能恢复平衡的倾向。并不能保证由对外收支盈余而取得的购买力增加将全部集中在进口需求上。

凯恩斯主义者的想法——把收入原始增加的乘数作用推到前列——是要把这一理论最终完善化。这是由后凯恩斯主义者特别是梅茨勒和马克卢普所做的。把这一机制简化到底就是这样的。

对外收支净额顺差的活动犹如一种独立的需求；它通过乘数机制的作用决定国民收入有较大增长，这在具有进口倾向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取得对外收支的重新调整。相反，对外收支净额逆差决定总收入会缩小，这会造成进口减少，从而使对外收支重新趋于平衡。

马克卢普和梅茨勒提出的模式使我们能同时考虑甲国国际收支变化对乙国的影响，以及乙国国际收支对甲国国际收支的反作用。让我马上举出一个有趣的事例：“支出”国和“收入”国国民收入的缩小是债务国无力偿债；因此，国际平衡的可能性取决于上述两个有关国家中消费倾向和投资倾向的价值。这个例子表明：对外收支的平衡只反映相互交往的经济社会中的结构调整，其条件是清楚的。关于不同倾向是些什么的问题，以及为什么它们是稳定的，影响它们的变化是什么，并不是一个“经验事实”的问题，而是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在现实中，使对外收支取得平衡的结构调整的含义是什么？这种调整正是通过倾向的变化，特别是进口倾向的变化，来表现的。所以，我们不能任意想象选择何种“模式”——我们需要知道倾向如何变化以及为何变化。

现代作者们在反对乘数分析时多半回复到传统的价格作用上去，至少在有关不发达国家的情况下。在经济萧条期间，即使本国货币坚挺（例如在货币体系严密的情况下），出口价格仍然下跌。难道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不发达国家证明直接的价格作用是可能的吗？认为在这些国家中，国际收支的波动通过国际货币运动的中介而造成价格的波动吗？完全不能！在不发达国家中，如同在发达国家中一样，价格的波动是受需求所支配的。例如，在一次经济萧条时期，不发达国家的出口品价格下跌了，这不是由于对外收支出现赤字，而是由于对这些商品的需求下降了，这种需求主要存在于国外。出口品的数量与价格都下降了，而且由于同样的原因。国

际收支的赤字对于造成这种下降毫无关系；相反，前者是由后者造成的。

因此，就调整国际收支的理论而言，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完全是否定的。首先，尽管表面上看来如此，价格作用在不发达国家中已不再生效，它在发达国家中是有效的。其次，汇率作用并不趋于恢复（国际收支的）平衡。特别在不发达国家中，汇率的改变往往只在规定的时期内有效，即在国内价格上升已经普遍并相应于汇率下跌的程度为止，而且往往在相反方向生效（由于价格弹性）。第三，收入作用只是一种倾向，而且意味着存在构成问题实质的结构调整。那么，并没有一种自动使对外收支重新趋于平衡的机制。可以肯定地说：总的说来，进口使购买力以货币形式转移到国外，而且这种转移自然使以后的出口成为可能。但是这种倾向在性质上是很笼统的。这好比说，在市场经济中，任何购买都会促成以后的销售。正如存在这种深刻的倾向并不证明“市场法则”之正确，它也并不证明制订一项自动国际平衡的理论是正确的。

平衡汇率还是结构调整？ 两个互相接触的经济体系的真正特点可能是：在汇兑自由的背景下，国际收支不能平衡。由于自动机制不起作用，看来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平衡汇率。事实上，所谓平衡汇率是一种在不限进口和长期资本“自然”运动的情况下保证国际收支平衡的汇率。如果说调整收入的机制只有活动的倾向，这等于只是说这种汇率并不总会存在的。更确切地说，当汇兑机制属于短期，而结构调整是长期的事，那么并不总会有平衡汇率，更不会有“自然”汇率和“自发”汇率。

但是人们得到的印象是整个十九世纪确实存在过一种平衡汇率。就一种观点来看，当时“平价”肯定是可以自由兑换成黄金的两种货币之间的“正常”汇率。发行银行按固定价格无限地买卖黄金就把汇率的波动限制在黄金点的狭窄限度之间。自由兑换成

黄金能使世界体系稳固得足以使结构调整的机制发挥作用。但是,这种结构调整(弱者屈从于这种调整,强者强制推行这种调整)却毫不和谐;相反,它反映世界日趋更不平衡。

可是,如果停止自由兑换,汇兑理论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由于这种理论的目的是解释两种货币价值之间得出的比率,人们对货币价值的总概念就最后决定他们对汇兑基本性质的概念。因此,边际主义(它规定货币的价值就是货币的购买力)在汇兑问题和购买力平价问题上得出这一理论。而且,正如它在国内范围以数量论告终,它也以国际数量论告终,决定国际黄金分布能保证汇兑在购买力水平上的平衡。

根据我的分析(我在分析中拒绝了数量论),有必要在决定货币的国内价值时分清自由兑换和不自由兑换的情况。在前者的情况下,黄金生产的实际成本最终决定货币价值的变动限度。在这个意义上,平价确实构成正常的汇率。当自由兑换被废弃,因此中央银行不再以固定价格无限量地买卖黄金时,这种价格本身可能被拖入总的上升运动,因而看不到那些现在似乎完全可以逆转的机制之间的联系。正如不再存在正常的价格水平,因此也不再存在正常的汇率。在货币不能自由兑换的地方,国际收支的结构性赤字使得货币贬值必须实行。

一种不能自由兑换的货币贬了值,就造成通货膨胀的浪潮,这使得形势又回复到过去的情况。事情再次明确:除非对外贸和资本运动实行控制,除非对实际的运动施加直接影响,否则长期性不平衡就无法避免。当货币已经不能自由兑换时,该体系不再具有必要的稳定性以等待收入作用耗尽其影响而恢复平衡。不平衡的倾向导致了永久的不稳定。

有些经济学家在给平衡汇率下定义时提出了又一个条件,那就是:它必须保证充分就业。就业水平与汇率之间建立的联系,从

根本上说，是非常人为的。它来自对凯恩斯分析进行几乎很可笑的简化。琼·罗宾逊以一种机械的方式把国民收入水平同利息率联系起来，因此她认为，始终存在一种利息水平可以保证充分就业——而凯恩斯则正确地坚持表明失业有可能成为无法解决的难题。然后，罗宾逊夫人以同样的人为方式把国际资本运动和利息率联系起来——而这些运动是由财产收入的绝对量和相对量所决定的，是由投资的获利前景所决定的，这些都是主要不受利息率波动的影响的。她接着表明：每一种利息水平（因此也是就业水平）都有相应的使国际收支平衡的汇兑水平。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一组变数中一个总是能任意决定的，因为其他变数会使自己按这一任意值加以调整）是“一般平衡”分析家们使用的典型方法。对经济学中的经验主义方法可以提出的一切批评都可能是这样。那完全是形式主义的，并且否认存在着基本上不可逆转的因果关系。

实际上，这种“平衡”汇率很可能是——在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则肯定是——一种“统治”汇率。每一级汇兑都相应于不同部门中投资的相对利润率的某种分布状况。但是，实际上并不是汇兑决定了不发达国家的外资吸收量。相反，资本流入决定于发达国家有多少自由资本可以处置，决定于总的“实际”情况使这些外部投资有利可图的程度；而且，考虑到国际收支的情况，它决定汇兑的“平均”水平——换句话说，这种水平有可能使输入资本的利息额和进口品的支付额决定于不发达国家结合进国际市场的程度；那就是说，决定于出口额（和这种结合程度相联）所容许的对外国商品的需求量。换句话说，汇兑的机制使不发达国家的结构可以按统治国的结构进行调整。从这个意义上看，“较好的”平衡（就是可以使这种结构改变的平衡）需要限制进口。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当金本位制所构成的保护解除以后，贸易或资本运动情况中发生的短暂变化也会导致汇率的改变，这造成不发达经济

社会中不同部门之间相对利润率的不同分布，这就影响外国投资的流向，最终影响统治的情况。但不发达国家的结构总是要按发达国家的结构进行调整。

危机形势国际传播的经济理论

国际收支“自动平衡”的经济理论形成了传统经济学建立危机形势国际传播理论的基础。

这一理论首先是由哈伯勒系统地形成的，他提出三个论点，以区分有关国家的货币制度作为基础。

首先，以互相接触的甲、乙两国受到金本位制的影响为例，从一国到另一国波动的传播完全是对称的。这种传播减少了起源国的波动强度，因为受周期影响的区域扩大了。在甲国的繁荣时期，它的进口发展得比它的出口更快。这个国家就面临黄金流失，减少了国内的通货膨胀倾向而在乙国内加强了这种倾向。

第二，如果乙国采取了外汇本位制，周期就不会从被统治国转向统治国，而是这种影响在相反方向上得到加强。在货币上被统治的国家出现繁荣的时期，该国以甲国货币支付它的国际收支赤字。信贷量在统治国并不产生激励性的影响，因为作为货币最终形式的黄金没有发生转移。但是另一方面，统治国经济繁荣的自然发展并不被黄金流失所遏止，而外汇流入被统治国则反映在该国信贷预付款的实际增加方面。

第三，在两国都有独立管理的货币的情况下，周期性波动则根本不再传播。互有接触的两个经济社会中的一个发生经济繁荣，就导致国际收支的不平衡，由于它不能靠输出黄金或外汇来加以调整，就只能靠改变汇率来加以调整。这种调整把过度的进口减少到可能出口的水平。

这当然是一种狭隘的货币主义式的分析。在十九世纪，殖民

地国家和宗主国使用同一金属货币。然而周期运动的传播方向始终是同样的：总是从宗主国传向殖民地。

后凯恩斯学派已经抛弃了这种货币主义的传播论。现在声称说：波动不是通过黄金和外汇的流动渠道而传播的，而是通过商品运动的渠道而直接传播的。一国发生的周期性摆动事实上以进出口的实际运动传播到另一国。某些国家的繁荣使它们的进口大于出口，这直接保护了其他国家通货膨胀倾向(这是经济乐观的特点)的发展。国际收支的赤字只通过外国信贷的办法来解决。不需要黄金或外汇运动。汇率不发生改变。在这些情况下，数量的机制并不发挥作用。

观察事物的这种新方法已大为流行，这是由于外贸乘数理论赋与它的精湛的形式。从这一观点来说，科林·克拉克对澳大利亚周期的研究是典型的。外贸乘数理论宣称：贸易顺差(出口盈余)同单独吸引投资的作用是同样的。但是这种理论仍然停留在说明性和机械的水平上。实际上，危机形势对贸易收支并没有明确的影响。繁荣带来了进出口的平行增长。它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有时它导致改善，有时则造成恶化。在经济萧条时期国际收支(不是商品贸易收支)往往有利于发达国家，这是事实，这是由于停止资本输出大大超过贸易收支的改善。同样地，对不发达国家来说，正是由于资本停止流入而不是由于贸易收支恶化，才使得国外收支出现赤字。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二十世纪所明显见到的收支赤字和收支盈余(决定于危机形势)之间的交替，在十九世纪(当时资本运动尚未具备其后发展的各个方面)并不存在。可是，即使在那时，却从未见到：欧洲的繁荣时期，通过欧洲出现顺差(这是反常的，但是常见的)而在大洋彼岸造成经济萧条——反过来也这样。

国际货币体系和当前的危机

我们时代的特点是在经济生活中最起决定性作用的公司(跨国公司)活动的世界性和这些机构、特别是货币机构(各国的经济政策是在其中决定的)的民族性之间日益增大的新矛盾。正是由于这种新矛盾的发展说明该制度当前危机所采取的具体形式,即它在货币领域内的现象。

国际清偿危机。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是使用三种储备:黄金;某些主要货币(美元与英镑)和次要的其他“硬”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条件地或无条件地给予的信贷。

1951年至1965年之间,按这种方式规定的全世界国际储备总额——不包括经互会国家,中国、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和古巴——从490亿美元增加到700亿美元,增长率为每年2.6%。在这同期间,国际汇兑按年率6%增加,这使相对的储备额从进口值的67%降至43%。1965年以后,这种倾向加强了:国际储备在1970年增加到930亿美元,但是这个数额不再高于世界贸易额的33%。

国际储备相对额的这种下降是危机的原因吗?并不一定,至少就资本主义中心国家而言,由于三个主要原因,即:(1)因为所需要的储备量并不决定于产生的汇兑量,而是决定于必须清算的差额,在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贸易结构很不平衡,而现在则程度大大减轻了;而且,在1913年,货币储备(主要由黄金构成)不超过世界进口额的37%;(2)因为不仅必须考虑国际清偿能力总额,而且要考虑它们的流通速度,正如国内货币形势那样;(3)因为已制定程序使必要的储备额减少,例如双边互惠安排——以这种方式安排的互助信贷上限从1961年的17亿美元增

加到1970年的160亿美元。

实际上，储备中各不同组成成分比例的日益不平衡产生了危机。储备中的黄金部分在1951年为340亿美元，1965年为420亿美元，1970年降至370亿美元；美元部分从1951年的42亿美元增加到1965年的148亿美元和1970年的328亿美元，1951年至1965年的年增长率为9.4%，1965年至1970年的年增长率为17.5%——比储备总额的增长率要高得多。1965年至1970年之间，国际储备中的货币成份（大部分是美元）从238亿美元（占总额的33%）增加至445亿美元（48%）。至于体系中的第三种成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的储备则继续保持适度：1951年为17亿美元（占总额的3.4%），1965年为54亿美元（7.6%），1970年为108亿美元（11.8%）。

国外持有美元数额的增加逐渐削弱了美国的地位，美国的黄金储备从1951年的243亿美元降至1965年的147亿美元和1971年的111亿美元。随着这种下降，美国的外债总额从1951年的83亿美元增加到1965年的252亿美元，美国同期的净外债（外债与发放给外国的信贷相抵）则从69亿美元增加到130亿美元。1965年以后，美国的形势以更快的速度恶化。美国当前的外债从1965年的290亿美元增加到1971年的640亿美元，而它发放的短期贷款同期内只从77亿美元增加到133亿美元。换句话说，在1951年时美国持有的黄金为它短期净外债的3.5倍，到1971年，前者则只是后者的不足22%了。

因此，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的作用，美国占据了一个特权地位：使它的本国货币被接受为国际储备，它不必担心自己的国际收支——换句话说，美国国际收支的赤字将由世界其他国家向美国发放信贷而自动解决。

这个体系的这种有利于北美洲中心国家的非对称性作用，只

要美国仍然掌握对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力地位，就会得到接受。事实上，只要美国在各个领域的工业优势表明它的对外收支永远具有盈余的倾向，世界上就会普遍存在“美元热”，这个体系也就可以运转。可是，从那时以来，欧洲和日本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而且在某些领域已成为美国的竞争者。同时，美国采取了一项超越其实际力量的世界性干预政策，美国人在越南的失败适为明证。这两个因素已经使美国的对外收支出现赤字。因此外国人积累起比他们愿意持有的多得多的美元。与美国持有的黄金相比，国外持有的美元现在看来显然无法兑现，而且或许用任何方法都难以恢复：对美元的信心已经动摇，国际货币体系正在崩溃。

对于世界货币危机的原因的分析，以及对解决办法的研讨，提供了有价值的教训。西方国家中最好的专家承认危机不是由于全面短缺国际清偿能力，而是由于国际储备中各个不同部分发展的无政府主义。可是，他们避而不分析这种无政府主义对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国家之间冲突的意义，每当有关的不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现象对力量对比的均衡提出挑战时，这种冲突就出现了。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或者没有效果，或者表示虚假的愿望说利益冲突已经解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中美国国际收支表现盈余的倾向并不说明特别“幸运的”结构平衡，而说明美国统治所强加的不平衡。美元作为全世界接受的国际储备货币，说明了这种统治。在过去十年中，这种形势由于欧洲（特别是西德）和日本的迅速发展而受到了挑战。新的力量对比不再如旧日的力量对比那么和谐，而是不一样了。这也表现在外部力量对比上的不平衡倾向，但是和以前的方向正相反：现在是西德、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表现盈余，而美国的国际收支则表现赤字。为美国辩解的人

例如金德尔伯格认为美国的国际收支并不是“真正”发生赤字，说它的赤字只是“表面的”，只是把美元用作储备货币的一种反映。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就不会有危机了。存在危机这个事实——表现为1971年的美元贬值——证明美元正在积累到超过经济代理人持有美元现款量的意愿。几乎没有专家承认危机反映了该体系长期性结构不平衡的方向的逆转，在六十年代期间天平倒向了另一边，因为这样做就需要承认该世界体系是以弱者向强者进行结构调整为基础的。

世界力量对比倾向的逆转当然并不是瞬间发生的，如果得出结论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失去它全部的活力，那就错了。因此关于美国国际收支发展问题上的矛盾继续令人迷惑不解。不可否认美国资本输出到欧洲去是美国赤字的因素之一，也不能否认这种资本外流至少部分地是由于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自由贸易协会对美国商品采取的歧视措施的缘故，美国公司在欧洲本身安家立足就绕过了这种措施。可是，这些措施是欧洲重建其地位的一种手段，是欧洲大陆武库中用来改变战后不利的力量对比的一件武器。这个手段与其他手段相结合已证明卓有成效。来自美国的资本源源流入，并不仅仅证明美国资本主义的活力，而且也证明美国国内面临资本积累的困难，这就是美国经济的不平衡。这最终导致美国经济增长率的放慢和欧洲增长率的加快，从而形成了力量对比变化过程中的一个因素。使欧洲人震惊的是，根据现已过时的原则所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使得美国人可以用很低廉的代价来提供资金以输出资本。确实，把美元用作国际货币，就使美国容易借到资金来资助他们在欧洲的投资。现在，支付给这些有所“强制”的贷款的利息率是不高的（不到3%），而他们进行投资所得到的利润率则很可观（在7%至15%之间）。这种把价值转移到居统治地位的中心大国去的机制是传统型的，这同中心和外围之间

的关系上所经常表现出来的情况以及在殖民地或新殖民地型的货币区所表现出来的情况并无二致。它之所以受到挑战，正是因为力量对比的发展情况不再能说明这种过份有利于美国的状况是正确的了。

提出的解决办法拒绝考虑长期性结构不平衡的方向发生逆转的基础是力量对比的变化，这说明这些办法的混乱和矛盾的性质以及其理论上的单薄。这些解决办法全是或者主张灵活变化、或者主张实行世界性货币之类的内容。第一类主张是无效的，第二类主张是不可能的。

如果这个体系遭受着结构不平衡之苦(情况正是这样)，那就无法实行灵活的变化，因为这会导致长期性的混乱。在一个固定汇率的政权结构内允许实行“爬行平价”或波动幅度，只能得出权宜治标措施而不是解决办法。至于采用一种世界性货币的问题，就是说，采用一种由一个超国家的权威机构所发行的金融手段，那就得设想问题已经解决，利益冲突已经在这个超国家的机构一级解决。回复到金本位——换句话说，共同恢复黄金的价值——在理论上会使国际清偿能力增加，但是这些清偿能力分布的情况仍然是不合适的，而且这种分布的发展仍然受制于力量对比。再者，这种体系不会使世界放弃采用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货币作为国际储备的做法。它已经向那些怀旧地向往十九世纪情况的人们指出：金本位制事实上也是一种英镑本位制，英镑是当时占统治地位国家的本国货币。所以，国际力量对比的任何改变会导致主要货币的位置从一种货币转向另一种货币。而且，难以看出哪个国家会希望发起这场全世界范围的黄金增值，因为两个主要受惠国将会是南非和苏联。如果黄金增值，只要黄金继续用作国际支付手段之一，那只会是由于当代爬行式通货膨胀需要这样。

关于世界性信用货币并不是一种新想法。凯恩斯曾在 1945 年

主张发行一种半自动的“班考尔”^{*}来应付国际上的不平衡。即使给予这种信贷要依情况而定，这种制度只能在下列情况下才能实行：由于不平衡是短暂的，发行机构所制订的货币政策可能有效；或者由于不平衡是结构性的，该机构就被赋与很大的超国家权力，诸如：使它能有效地制订有关各国增长政策所采取的方向并强行实施一项世界范围协调发展的政策。特里芬在凯恩斯放弃的问题上又捡起了这一空想计划。他设法使国际货币制度同国家货币制度的发展之间协调一致（国家货币制度过去以黄金为基础，它是一大批逐渐从属于一个单一中心——中央银行——的机构所发行的许多同等的信用货币），这本身并不是一个荒诞的想法。但是他所提议的世界范围的“唯一储备中心”将是各中央银行的银行，它所产生的储备形式将保证在数量和分配上都经常适应于世界贸易的需要，这种储备中心的提法是假设各国间的冲突不再发生。

因此这个制度仍然以黄金和主要的货币为基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提款权只是以这些主要货币提供的信贷而已，此无他哉。只要美元是唯一的主要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只是美国财政部的一个执行机构。一俟其他货币开始追求这一地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成为这些货币和美元之间发生冲突的舞台之一。1969年设立了特别提款权，根本未能改变形势。特里芬可能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定而大为愤慨，根据它的规定，这些特别提款权是按各国缴纳的基金份额而自动分配的，因此，其中的72%留给了美国和英国，而不到20%作为分给八十个不发达国家的“意外收

^{*} 班考尔，根据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提出的“凯恩斯汇划结算安排”中一种国际货币单位的名称。该项安排主张成立一个世界中央银行，它将和各国中央银行合作提供贷款，购买政府证券和提供国际资金。这项安排和主张最早是由凯恩斯提出的，后来由罗伯特·特里芬修改，所以也称为“特里芬计划”。此计划未获通过，原因之一是它要求各国中央银行向世界中央银行（即扩大了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移交一大部分权力。——译注

入”；特里芬也会对这些贷款用于资助各国的国内政策（实际上是美国对越南的战争政策）而感到厌恶。但是这些都不足为奇，因为这危机并不是各国同样具有的“旧民族主义”思想和一种世界秩序的高尚理想之间的某种抽象冲突的表现。它表现一种具体的冲突，使继承统治地位和一切有利条件的美元同要求“更平等地”分享这些有利条件的货币（首先是德国马克和日元）对立起来。

而且，欧洲的经验证实了这一冲突的性质。1964年以后，欧洲经济共同体考虑一种自由汇率的制度，伴以短期稳定化政策所保证的巩固货币的措施。可是，这类“协同措施”只有在没有重大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才证明有效。1968年的危机结束了幻想，现已同意：一种普通的货币——或者，就是按固定比率可以无限制地兑换黄金——需要一个单一的决策中心，保证整个欧洲的范围实行单一的经济与社会政策。

虽然，世界范围或欧洲范围并没有超国家的权威，可是却有一些跨国权威，那就是跨国公司。但是这些跨国公司并不组成一个具有单一目的的集团，而是形形色色的相互冲突的利益，它们的冲突跨越国界，而且超乎各国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之上。因此，不考虑跨国公司的战略而辩论国家冲突是不可能令人满意的，正如二十年前的情况那样。“欧洲美元”的出现（最初是在1957年观察到的），这些清偿能力的市场的发展，以及其后其他货币（马克、日元）的类似市场的兴起，证明了跨国公司所起的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资产的很大部分来自大跨国公司的金库，它们可以用美元支付（现在也可以用其他货币支付），由美国（或其他有关国家）的非本地居民所持有，存放在美国（或其他有关国家）之外。这些资产是极为流动的，它们不是大量的“小额投机款项”，就象过去大部分浮动资金的情况。它们的流动性是由于它们的来源（跨国公司）只需在国内帐目上就能毫无困难地转移它们。欧洲美元、欧洲马克、

欧洲日元等等进入国际储备的程度是巨大的；1971年，它约在120亿美元之谱。它们所促成的不同货币市场之间的交往联系肯定破坏了国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因此给货币体系带来了另一个不稳定因素。

所以，国际货币危机必须解释为更深刻的危机在当代所采取的一种具体形式。1950年以后整个中心地区出现迅速增长阶段的特点趋于结束。增长率放慢表明了这一点，“滞胀”（尽管有通货膨胀，仍有停滞）取代了通货膨胀伴随的增长。各国间的矛盾尖锐化了，正如跨国集团与跨国公司之间的矛盾尖锐化，随着这种发展，争夺国外市场的斗争成为一场战斗。与此同时，战后时期出现的力量对比的特点（以美国的统治为基础）变化迅速。因此就有了双重危机：生产与消费之间平衡的根本危机，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表面危机。

不发达国家和国际货币危机。不发达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问题上没有发言权。当然，形式上它们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但是在其他一些国际机构中，它们还占有几张所谓的活动席位，它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则纯属多余。每个成员国的基金份额用它的本国货币支付（至少为总额的四分之三），它们的贡献只有象征性的意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有效利用的资金少于这些无价值的贡献的总额，因为它们的本国货币并不象主要货币（美元和英镑）或其他硬货币（马克、日元、瑞士法郎等等，其中有些货币希望跻身于占统治地位的货币之列）那样是国际支付手段。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实际上是由更加排他性的“十国集团”所决定的，这个集团构成了真正的国际货币体系。

把不发达国家接纳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事实上完成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是它们构成一支可以调动的储备力量，供十国集团内不同政策的主张者召唤：在1967年的里约热内卢会议上，美

国使“特别提款权”得以通过，其手法是宣传这些提款权中一小部分可以提供给八十个“穷”国中遵行基金组织政策建议的那些会员国。

第二个作用是把外围国家的货币活动限制在国际货币体系所需要的限度以内。殖民国家在这一目的上过去握有（有时现在仍然握有）更加有效得多的手段——货币区（英镑区，法郎区，葡币埃斯库多区等）及其商业银行网。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非洲以及几乎整个亚洲仍然被英镑所统治，在较小程度上被法郎所统治。英镑具有超乎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的重要权威，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它奉为名列第二的主要货币之主要原因之一。然而，在那个时候，拉丁美洲总的说来仍然未受到外界的任何正式的货币控制。而且，美国的目的着眼于在政治上正趋独立的亚洲和中东地区建立立足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美国进行这种接管所需要的结构。这项政策证明是成功的：拉丁美洲逐渐被拉进美元区，而亚洲和中东则脱离了英镑区。当非洲在1960年大部分取得政治主权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能拒绝接纳它们，即使这种会员国资格对那些国家来说没有什么意义，那些国家象法郎区成员国一样，缺乏最低限度的货币独立而不能实行它们自己的任何货币政策。

为了了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有关外围国家方面如何为这个体系而发挥这一作用，有必要首先记住：不发达国家在对外支付方面几乎遭受永久性的困难，这反映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基本结构性不平衡以及价值由后者有系统地转移到前者。

我们对发达国家所持有的储备总额及净额的数量和演变，多少掌握了比较充分的材料，但是我们对大部分不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情况则仍然知之甚少。计算了货币体系的储备总额，但是不发达国家的负债程度不很清楚。短期外债（银行帐目上一定范围

地记录的唯一债款)和中、长期外债之间在这方面的区别是波动不定的,意义不大。事实上,长期债务中相当大的部分是用来支付当前消费的直接需要的(那主要是进口品)。因此,货币体系的债务以外,还有国家债务和公、私企业的债务。而且,很大数量是“居民们”(包括这些国家的国民)非法存在国外的资产,这不能成为本国储备的一部分,因为这些资产没法子弄回来。

因此,观察一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材料所反映的第三世界持有的储备总额的情况与发展,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不发达国家整个说来并不短缺国际清偿能力。

至于亚洲国家,非生产石油的十二个国家的国际储备总额(1948年以来有可比的统计数字)从1948年的54亿美元下降到1951年的37亿美元和1966年的36亿美元,而这些国家的进口在同期间却从44亿美元增加到51亿美元然后又增加到95亿美元。亚洲在战后拥有大量储备,特别是印度持有英镑盈余(印度和巴基斯坦共拥有12亿英镑以上),可是亚洲的储备在1948年至1951年之间很快消减(储备对进口的比率从122%降到73%),从那时以后消减得较慢,但却持续不断(1966年的比率为38%)。诸如印度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大国的储备不再能应付一个季度的进口。较小国家的储备情况较好,显著的是泰国的储备,它在1948年至1966年之间增加了7亿美元。中东产油国持有的储备显著地增加了:伊朗和伊拉克的储备从1951年的3亿美元增加到1966年的7亿美元,科威特的储备(货币局与政府的储备)增加到11亿美元,沙特阿拉伯的储备(沙特阿拉伯货币署)增加到8亿美元。

在拉丁美洲,对于我们有可比统计数字的十六国的计算表明:储备对进口的比率在1948年约为50%(当时储备总额为25亿美元,进口为50亿美元),这一比率直到1953年没有变化。当时进口为59亿美元,储备为28亿美元,几乎只有墨西哥单枪匹马地改

善了储备。可是,在1953年以后,情况不断恶化。1962年,储备不超过23亿美元,而进口保持在79亿美元(因此,储备对进口的比率低于30%)。确实,1962年至1967年之间,情况似乎有所改善,因为,虽然进口增加到95亿美元,储备也上升到31亿美元。这一改善几乎全部来自两个来源:委内瑞拉持有储备的增加,它是一个石油大生产国(五年内增加2.54亿美元);特别是阿根廷储备的增加(从1966年的1.32亿美元增加到1967年的6.25亿美元),这是由于该国的通货收缩政策。除了这两个国家以外,储备对进口的比率继续下降,从1962年的30%降到1967年的23%(储备16亿美元,进口51亿美元)。

在1964年至1970年之间,储备总额与进口之间比例的发展似乎对不发达国家有利。储备总额从1964年的99亿美元(其中22亿美元属于主要的石油出口国)上升到1970年的181亿美元(石油出口国为42亿美元),而它们的进口在同期间则从355亿美元上升到556亿美元。因此这些国家储备总额从1964年的占出口28%上升到1970年占32%。

然而,如果我们看它们的净储备(即:减去短期外债以后的储备),我们发现在1950年至1970年之间情况肯定恶化了。例如,二十八个有关非洲国家的对外储备净额对进口的比率从1960年的60%降到1965年的23%。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情况也是这样的,那些地区的储备净额为储备总额的三分之二,债务的增加快于储备总额的数量。

在这些情况下,不发达国家是否设法偿付它们的外债呢?它部分地靠动员它们的“有条件储备”来解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提款权构成了愿意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见(体现于“稳定化计划”)的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可以得到的第一类储备。第二类储备来自双边协议:这些信贷提供来采购信贷发放国制造的商品(往往体

现于有关的协议之中)。虽然有关这些协议的数字并不总是全文发表和对比地发表的,我们知道这些有条件资产的数量在过去十年中已经大大增加。最后,严格来说,在国际清偿能力方面,某些国家并无问题。例如,法郎区的非洲国家情况就是这样,因为它们在国际收支中可能发生的任何赤字是由宗主国自动地支付的。可是,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不掌握管理它们货币的国内外手段。

总之,一个外围国家认真进行的任何发展努力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外收支的困难。如果控制这些对外关系的有力手段以及指导过渡战略的有力手段并没有及时发挥,由此造成的危机对“大国”和依靠它们的国际机构提供了机会来进行干预并强制实行一种“稳定化”计划,这种计划总是蓄意为了短期偿款的要求而牺牲发展的目的——换言之,即为了维持现状。

各种国家形态之间进行结构调整的科学理论

由于在思想上关心于发现一些保证和谐平衡的机制,传统的理论从它的调查领域中排除了实际问题,那就是某些国家形态从属于其他国家形态(并按照后者的需要而成形)的结构调整问题。当我们观察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关系时,当我们研究不同中心形态之间关系发展的方式时,结构调整的问题被视为基本问题。

传统理论已证明破产,因为它无法证明它应证明的问题,即:(1)在国际收支趋于自发平衡的地方存在着一个机制;(2)这种平衡各有相应的汇率,而且只有一种;(3)这种平衡以及相应的汇率不以有关国家可能发生的结构变化为转移。如果不同的平衡确实是可能的(这决定于有关方面的结构条件),那么,“国际关系的纯理论”就不可能了。所以,以这种“理论”为基础的、建议的“经济政策”一定是无效的——或者,更确切些说,得到的结果将不受遵循的政策所左右,成功或失败的真正原因到处都存在。

那么，国际关系的传统经济理论还剩下些什么呢？实际上不剩下什么了。这种伪科学的意识形态性质是清楚可见的。它的机械形式主义使它不能抓住真正的问题；相反地，它的作用是回避这个真正问题，以便替建立于不平等基础上的国际体系提供正当的理由，并使它具有它所不掌握的和谐。弗朗索瓦·佩鲁和托马斯·巴洛夫毫不犹豫地严厉批评了以这种“不科学的偏见”作为基础的“国际货币政策”。

真正的问题到处存在——在社会形态演变的历史分析方面；在它们各自的动力和具体矛盾的分析方面；在不均衡发展的真正的具体历史条件方面。

第三章 从专业化到依附

第一节 国际专业化的基础

国际贸易的古典理论声称它符合交换双方专业化的利益，因为这会提高两国按使用价值计算的总收入的水平。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来说，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来源。因此李嘉图把两种商品的交换最终视为对交换双方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结晶于两种产品中的等量劳动的交换。然而，在国内交换领域中，价值法则意味着包含等量劳动的两种商品交换价值的相等；在对外交换领域中，交换的商品包含不平等的劳动量，反映不平衡的生产率水平。

以李嘉图使用的著名例子(但以“小麦”取代“酒”)，葡萄牙在小麦生产(在这方面，80小时的劳动足够生产一单位的这类商品；而在英国则需120小时)和棉布生产(在这方面，葡萄牙90小时所生产的等于英国100小时所生产的)方面，比英国有更大的好处。但比较而言，生产小麦比生产棉布有更大的好处。所以，在头两种生产中搞专业化而从英国进口棉布是符合葡萄牙的利益的，虽然葡萄牙在国内生产棉布的成本在绝对数上小于英国。就使用价值而言进口是有好处的，即使进口品在当地生产更为便宜——这是李嘉图与亚当·斯密相比所作的主要贡献。

这项理论能使我们说明：在一定时刻，根据当时生产率水平的分布而实行交换——即使是不平等的交换——是符合两国利益的。让我们再用李嘉图举的例子，只是把条件颠倒一下以接近现实：

我们假定葡萄牙同意专门生产小麦而从英国购买棉布。如果

每单位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

	在 英 国	在 葡 萄 牙	英国对葡萄牙的相对利益
一单位棉布	80 小时	120 小时	1.50
一单位小麦	90 小时	100 小时	1.11
国内交换比率			
一单位棉布 =	0.89单位小麦	1.20单位棉布	

葡萄牙现有劳动力总数为 1,000 小时，小麦消费保持固定为 5 单位，那么葡萄牙将用 500 小时的劳动来生产供本国消费的小麦。它将掌握 500 小时可以用来生产本国所需的棉布 ($500:120=4.2$ 单位) 或者再生产 5 单位的小麦来换取 5 单位的棉布，从交换中多得 0.8 单位的棉布。虽然它在使用价值上获利，但是它为了取得英国用 400 小时劳动可以生产的 5 单位棉布，却必须花费 500 小时的劳动。葡萄牙自身的 1 小时劳动交换英国的 0.8 小时劳动：一种不平等的交换。这种交换的不平等反映葡萄牙较低的劳动生产率。

因此，如果劳动生产率的不平等不是自然的而是历史的，当落后的经济社会取得进展时，比较利益就有变动了。如果葡萄牙通过本国的现代化而取得了与英国在各个领域内同样的生产率，换句话说，用 80 小时生产棉布和 90 小时生产小麦，那么它是值得现代化的。因为那时它将能以 450 小时生产 5 单位小麦并以 550 小时生产 6.9 单位的棉布 ($550:80$)。于是不发生交换了，因为两国的成本相等——但是葡萄牙同它以前进行交换的情况相比是得利了： $6.9-5=1.9$ 单位的棉布。

如果葡萄牙同意专业生产小麦并尽全力在这方面赶上英国的话，它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此后它就只得用 450 小时来生产 5 单位的小麦来供自己消费 (5×90)；它有 550 小时供自己支配来生产

6.1 单位的小麦(550:90),这能使它取得 6.1 单位的棉布。这种选择对葡萄牙不够好,因为棉布业的潜在进展(成本从 120 小时减至 80 小时)比小麦生产更大(成本从 100 小时减至 90 小时)。

所以,更符合一国利益的是发展那些有最大进展可能的生产部门,并使它有关外贸的选择从属于这类发展的优先要求。因此,决定的贸易选择必须在每一发展阶段加以修改。这肯定是国际关系的一项有进取心的思想,但是它符合于历史和当前的形势。

李嘉图的分析以实际生产率之间的比较作为基础,它提供了解国际专业化性质所需要的行动概念,就是评价这种专业化的原因并从中得出说明其动力的结论。如果英国确实只需花 80 小时劳动来生产一单位棉布,而葡萄牙则需要 120 小时,那么这是因为英国工业比葡萄牙的先进,因为这里涉及的是直接与间接的总劳动时间。在英国,纺织业已机械化了,所以,需要的 80 小时劳动是以某种方式分配的:例如,20 小时的直接劳动和结晶于机器之中用于这一生产的 60 小时。在葡萄牙,棉布是手工技术生产的,所以,需要的 120 小时是以不同比例分配的:较少的间接劳动和较多的直接劳动(例如,后者为 90 小时,前者为 30 小时)。

还要顺便提一下:在李嘉图的例子中,两国的每小时实际工资是相同的,降到生理上仅足糊口的水平。因此,生活必需品是受国际交换制约的商品,所以在两国中只能有一种同样的价格(按金价计算)。因此,按金价计算的生活必需品价格、名义工资以及实际工资在英国和葡萄牙都是一致的。有关国家得到大于它们在没有交换情况下的使用价值量时,专业化和交换就增加了两国得到的实际利润量。

李嘉图的整个论点等于断言:虽然葡萄牙在多方面更为落后,但搞专业化是符合该国利益的。李嘉图在论证中的这一点上停步了,不愿利用他已发明的分析手段。我使李嘉图的分析产生“活

力”，是要表明：从专业化得来的直接好处将决定两国间的发展方向，其情况是：长期来看，同意在较少活力的生产部门实行专业化的国家将受到损失。

不平等专业化的基础除了联系客观价值论以外是无法理解的。然而，在 1870 年以后，在经济学中取得胜利的是主观价值论。传统经济学拒绝按社会劳动这一共同标准来降低不同“生产要素”中的一切成本，就使它失去比较生产率的任何手段，并失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个重要概念的意思。因此相对利益就由不同价格间的比率来加以衡量，这种比率决定于不同生产要素的相对报酬以及它们在数量上的相对用途。由此，该理论以恶性循环为基础，并使比较成本的原则失去其实际的可行性。因为最有利可图的技术（最有效的生产要素组合）决定于这些生产要素所得到报酬的相对比率。现在，这些报酬本身根据生产要素的数量用途而变化，所以最终根据使用的生产方法而变化。从这一点出发，这种原则所具有的影响比在李嘉图的理论中更为局限。在古典理论中，确定了商品运动的顺序。在这里却相反，商品运动中的每一点变化改变了比较利益，因为它影响了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因此，我们就卷在一个恶性循环之中：每个国家应在它具有最大利益的领域里实行专业化，它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它在这个特定的生产部门投入了大量生产要素。

因此，放弃客观价值论就改变了比较利益理论的本质，给予它一种辩解性意识形态的性质。因为“利益”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它并不先验地包含在客观现实之中。于是经验实证主义被迫乞灵于虚枉的理论（金钱数量论）或似是而非的假定（没有“反常的价格作用”）、或者错误的概念（“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力——是给予的”，而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间的社会分工则是所谓“自然”赋予的内容）。以替代为条件的现代交换公式继续堕落进辩解性的意

识形态。这项理论通过哈伯勒、勒纳和里昂惕夫而最后采取其目前的形式：一件产品的成本相等于放弃另一件产品。巴斯塔布尔、马歇尔、埃奇沃思和陶西格所提出的折中办法被放弃了，这种折中办法认为每个国家中每件产品的成本是由工资、利润、利息和租金以稳定比例所组成的（这样就避免了把不同人的主观效用相加的困难）。我在这里无需提出“集体无差别曲线”的结构细节（这来自不定数量的两种不同商品在效用上的相等）。我也无需提出“生产可能性曲线”的细节（这来自靠生产要素经常储备而生产不定数量的两种不同产品的技术可能性）。国际交换比率现在处于两种“单独的”交换比率之间，决定于切线对无差别曲线在这些曲线与生产可能性曲线相切点上的倾斜度。在这些点上，产品的替代率对消费者和对生产者都是相同的。因此，国际交换的必要和充分的条件是：单独的交换比率在一国与另一国之间应当不同。我们被束缚在一切主观主义的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同义反复之中：交换给双方带来了“利益”，因为进行了交换。但是这种“理论”是完全无用的。它阻碍我们了解历史，因为它不谈生产力的初始水平和发展的力量。

第二节 不平等交换的理论

一种基本贡献

所以我们看到专业化可能是不平等的。在什么情况下国际交换也变得不平等呢？关于这个问题最早的总体系统阐述，我们应归功于《不平等的交换》的作者阿吉里·伊曼纽尔，我把阐述的内容在这里概要叙述，并加上我自己的某些看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假设认为劳动力的流动性（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部门与另一个部门之间的工资平等化，以及一个国家与

另一个国家之间的工资平等化)和资本的流动性(利润率的平等化)。这种抽象的假设是李嘉图和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从中推论的结构。马克思没有处理国际交换的问题,因为它在这个核心问题中没有特殊的意义。他满足于对劳动力或资本的不完全流动的可能结果作一些顺便的观察,而强调这个问题同国内的类似不完全问题之间的相似性。

李嘉图确实讨论国际贸易,虽然以一种含糊的方式。他作为一个经验主义者,注意到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不流动性。这个事实本身并不成问题,至少在李嘉图写作的时间——正如中心地区的任何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可以归结为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是不成问题的,中心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在不同国家内不平衡地推进也是不成问题的,最后,一国与另一国之间的劳动力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以及劳动力价值并不一致,这也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李嘉图没有权利在同一论点中援引这两个事实,它们属于具体社会形态的方面,并设想提供他的思想结构即纯粹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它设想各国的实际工资都是相等的,所导致的理论只能把国际交换建立在资本不流动的基础上。让我们看看阿吉里·伊曼纽尔在这一点上说些什么(第40—41页):“至于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李嘉图只对其结果感兴趣,即它们报酬的平等化。所以他只谈到利润的平等化,那是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不流动所能影响的唯一平等化,因为工资的平等化总是由下而上地保证的,通过人口调节的作用,不论劳动力是否有流动性。对李嘉图来说,利润的不平等化是比较成本法则发生作用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而这是一个重要之点,看来直到现在尚未注意到。”

如果资本是流动的,如果我们设想工资是相似的(就维持生计而言是相等的),那么只有在生产率不同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交换。这只有通过下列两个原因之一才会发生:(1)不同的“自然”潜力

(由于气候的不同,葡萄牙在同样数量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条件下可以比英国生产更多的小麦);(2)不同的有机构成,反映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可是,在后者例子中,工资是不平等的,因为“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加入了劳动力价值的决定。”(第150页)

如果劳动力与资本这两个生产要素都是完全流动的,那就不会有贸易(如赫克谢尔所表明的)。伊曼纽尔表明(第VIII页)专业化只代表一种相对的最佳条件:“绝对的最佳条件不是要葡萄牙专业生产酒而英国专业生产棉布,而是要英国人把他们的资本带到葡萄牙去既生产酒又生产棉布。”

于是,人们可以观察两种形式的国际交换,在这种交换中,产品并不是按它们的价值进行交换的。在第一种情况下,工资(以及剩余价值率)是相等的,但是因为有机构成不同,生产价格——由利润率平均化来表示——是这样的:较先进国家的直接与间接总劳动的时间(其特点是较高的有机构成)在国际市场上比欠发达国家总劳动的时间取得更多的产品。下列例子说明这种情况:

	c 不变资本	v 可变资本	s 剩余价值	V 价值	p 利润	P 生产价格
A	10	10	10	30	8	28
B	16	7	7	30	9	32

A=欠发达国家($c/v=1$)
 B=较先进国家($c/v=2.3$)
 剩余价值率=100%
 平均利润率: $17/43=40\%$

伊曼纽尔说(第164页),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交换并不保证一小时总劳动得到等量的产品,可是它不是不平等的,因为这种“不平等的”交换是国内内部关系的一种特点:“生产价格……是竞争性制度中固有的一种因素。”

可是交换还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反映生产率的不平等。因为,重要的是提出这里写下的两个等式(它描述了同一种产品使用不同技术——B是先进技术,A是落后技术——的生产条件)是按照价值的等式:按照A和B的劳动时间分别单独考虑的。按照使用价值,产品数量在A的情况下不可能和在B的情况下相同,因为B的生产力水平较高。例如,以30小时的总劳动(直接和间接)时间,按B的条件使用,我们能得到90个物质单位的产品,而按A的条件使用的同样数量的总劳动时间,我们只能得到少量的、例如60个单位的产品。如果A和B都结合进同一世界市场,产品就只能有一种价格,即较先进国家所定下的价格。换句话说,30小时的A劳动不值30小时的B劳动:它们只值 $30 \times 60 / 90 = 20$ 小时。另外,如果产品进入工人阶级的消费,而且只有一种价格(例如每单位10法郎),那么30小时的B劳动可赚到 $90 \times 10 = 900$ 法郎,即每小时30法郎,而在A的情况下,这30小时只得到每小时20法郎。如果实际工资在A和B都相同,虽然它们的生产率不同,那么在A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一定较低,以便补偿较低的生产率。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之间的比例不是相当于10/10,而是相当于 $15 (10 \times 90 / 60) / 5$ 。

正如查尔斯·贝特海姆所指出的,交换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是不平等的,主要因为生产率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和不同的有机构成有联系),其次因为不同的有机构成通过利润率平均化的作用而决定生产价格,这种生产价格的单独价值是不同的。必须补充,由于剩余价值率在A和B的情况下必定是不同的(以便保证A和B的实际劳动报酬相等),因此问题就更加复杂了。

可是在现实中,伊曼纽尔的论点则根据一种不同的情况,其中所交换的产品的有机构成是类似的。我们可以设想生产技术处于同样的发展水平上(同样的有机构成),而且我们的论点一开始就

设想工资是同样的(同样的剩余价值率)。那么, 交换是绝对平等的。如果现因某种原因, 生产技术并无改变, 而A 情况下的工资只抵B 情况下工资的五分之一, 那么我们会看到以下情况:

	C 配置资本	c 使用的 不变资本	v 可变资本	s 剩余价值	V 价值	p 利润	P 生产价格
A	70	10	2	18	30	14	26
B	70	10	10	10	30	14	34

A 和B 用同样的(最新) 技术生产同样的产品(例如石油), 并在国际市场上出售这种产品。可是, A 的实际工资低于B。产品必须有一个一致的价格, 即在世界市场上实行的价格。这种价格表明什么呢? 根据价值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 这种价格包括什么呢?

A 的较高剩余价值率提高了A 和B 的平均利润率, 两者合在一起, 从 14% 提高到 20%。低工资国(A) 以同样生产率的等量劳动(直接和间接) 在国际交换中所得低于其贸易国B (整整 76%)。伊曼纽尔描述这类交换是真正的不平等交换, 因为他表明一国与另一国之间利润率的差距必须很大才能补足工资方面的逆差距。在上述例子中, 为了交换平等, 在A 工资只为B 工资的五分之一的情况下, 当B 的利润率为 14% 时, A 的利润率必须达到 26%。

现在, 这第二个例子确实真正同现实存在的情况相一致。因为第三世界的出口主要不是由来自生产率低下的落后部门的农产品所构成的。在 350 亿美元(1966 年) 的不发达国家出口总额中, 最现代化的资本主义部门(石油、采矿和矿物初加工、现代化种植园——例如在中美洲的联合果品公司下属的机构或者在非洲和马来亚的尤尼莱佛公司下属的机构) 至少提供四分之三或 260 亿美元。如果这些产品由先进国家以同样的技术(也即同样的生产率)

来提供的话，平均利润率约为配置资本的15%，使用的资本是它的七分之一（5年至10年后更新，平均为7年），剩余价值率为100%（所以相当的资本—产出比为3.5）——它们的价值至少为340亿美元。仅仅在这方面从外围向中心的价值转移，按照中等估计，总计将为80亿美元。

至于生产率低下的落后部门所提供的第三世界其他出口品（传统农民所供应的农产品），情况是否较不清楚呢？这里，劳动报酬（“工资”的名称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合适的）的不同还伴以生产率的低下。低多少？这就更难说了，因为这类有关产品总是不可比的：茶叶、咖啡、可可只在外围地区生产。可是，可以肯定地提出，外围地区的劳动报酬要比生产率在比例上低得多。例如，一名非洲农民每年干100天的重劳动所得的进口制成品，其价值仅为一名欧洲熟练工人20天的简单劳动。如果这名农民用欧洲的先进技术来进行生产（我们很具体地知道，根据农学家提出的现代化计划，这意味着什么），他一年工作300天，所得的产品在数量上等于原来的6倍：他的每小时生产率至多高一倍。因此，在这个事例中，交换是很不平等的：如果劳动报酬在比例上相当于其生产率，这些产品的价值就不会是90亿美元（这是现在的情况）而是其2.5倍，即约为230亿美元左右。因此，从外围转移到中心的价值约为140亿美元。并不奇怪，这里的价值转移在比例上要比来自现代工业产品的价值转移大得多。在后者情况下，进口资本货的成分要大得多，而在传统农产品（这种产品的价值几乎全部是直接劳动）中这种成分就微不足道。

那么，如果从外围地区的出口总共约为350亿美元，如果劳动报酬相等于中心地区，在生产率相同的情况下，它们的价值将为570亿美元左右。由于不平等交换的机制，从外围地区向中心地区隐蔽的价值转移约为220亿美元，那就是说，两倍于外围地区得

到的“援助”和私人投资的总额。我们谈到对第三世界的掠夺，这肯定是有理的。

西方先进国家从第三世界所得到的进口品确实只代表它们国内总产值的2%或3%，在1966年约为12亿美元。但是从不发达国家的这些出口品却代表它们产值的20%，即大约1,500亿美元。因此，由于不平等交换的隐蔽价值转移约为这种产值的15%，它从相对条件看远不是微不足道的，仅仅由于它就足够成为对外围地区增长的障碍以及外围地区与中心地区之间日益增大的差距。从中心地区的观点来看，这种转移所作出的贡献也并非微不足道。中心地区从它得到好处，因为它大约相当于中心地区产值的1.5%。但是这种转移对大公司特别重要，大公司是直接的受惠者。

不平等的交换的理论招致了三种批评。贝特尔海姆虽然保持在伊曼纽尔的论证结构范围之内，却不愿扩大马克思(关于价值转变为生产价格)的模式到国际关系的领域而得出逻辑的结论，也不愿从他设想剩余价值率高于中心地区而得出逻辑的结论(他的确应当由此推断先进国家是不平等交换的受害者!)其他批评者声称中心地区的工资较高，是因为那里的劳动生产率较高，所以这种不平等是“有理的”。让我们记住(伊曼纽尔就是这样做的)，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价值是和它的生产率不相联系的。显然，第三种批评者的态度比较微妙，他们否认“不平等的交换”这个名词具有任何意义，声称伊曼纽尔没有权利使用价值转变模式。他们说，这些模式只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背景内才有意义，不能应用于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上。事实上，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否认存在着一个单一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换句话说，他们基本上否认帝国主义的存在!当然，转变的模式不能应用于任何各种情况:例如，它们不能用来分析古希腊和波斯之间的贸易关系。但是那不

是这里的情况：中心和外围确实是同一个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创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以抽象的方式规定了这种生产方式的三个条件：(1)产品的商品形式普遍化（普遍化的市场）；(2)劳动力的商品形式的普遍化（存在一个单一的劳动力市场）；(3)资本之间的竞争普遍化（存在一个单一的资本市场，表现为利润率平均化）。这三个条件抽象地反映了马克思所研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这是以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作为其具体模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另一级的现实，如果我们要从理论上研究它，它也得抽象地加以规定。在这一级上，世界体系表现为存在着一个商品的世界市场并且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由于存在一个世界商品市场，就有一个有关国际范围的价值难题。由于存在这个难题，我们就必须使用价值转变模式。

是否可能出现一个国际交换的经济理论？

一个经济理论必须有助于分析情况，就是说，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挥作用的机制。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而超越了经济主义的“科学”，对它进行基本的批判，并表明唯一可能的科学的基础——社会——是什么情况。

由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思想方法始终是经济主义的、异化的，他们设法制订一个国际交换的经济理论。为了这样做，他们就必须假设交换双方存在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斯密已经感觉到对外贸易的作用相当于资本主义的开始（“产生一种被国内农业市场狭窄所限制的剩余”），正如李嘉图感觉到外贸在他的时代的作用：“产生一种被农业报酬递减所阻碍的剩余”。正如克里斯琴·帕洛克斯所指出的，马克思则把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结合起来。如果他在这方面没有走得更远，这可能不是因为他感觉

不到这个问题,而是相反,因为他确实感觉到了这个问题。由于不同社会形态之间关系的理论不会是一种经济主义的理论,国际关系(它恰恰属于这个方面)不会产生一种“经济理论”。马克思有关这些关系的言论是符合他的时代所出现的问题的。当时,从外围地区向中心地区转移剩余确实不会很大:外围地区当时出口的绝对量很少,而且,中心地区所得的报酬很低——如果生产率相等,同外围地区的出口量就没有多大差别。可是,今天就不一样了,外围地区75%的出口品来自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而且中心与外围的劳动报酬差距很大。

新古典主义形式的经济主义交换理论以主观价值论为基础,它在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同李嘉图的经济主义相比后退了一步——因为它只不过是同义反复,它无视生产关系。真正的问题是发现国际贸易的实际作用究竟是什么,一向是什么,现在是什么,以及这些作用如何完成。

不能肯定马克思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向把这问题看成是什么。这里举布哈林的论点作为例子(第40页):

“与劳动力成为资本主义关系的一极相应的是资本作为它的另一极。前者例子中这一活动是由工资水平平均化的法则所调节的,后者例子中则出现国际利润率的平均化。”

布哈林并未看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是同质的;并未看到它不能被视为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罗莎·卢森堡的伟大功绩是认识到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关系决定于原始积累的机制,因为涉及的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活动所特有的经济机制,而是这种生产方式和与此不同的形态之间的关系。普雷奥布拉曾斯基以同样的精神写到这些交换说它们是“一个经济体系或一个国家较少量的劳动交换另一个经济体系或另一个国家提供的较大量的劳动”。(第91页)当那种情况发生时,

不平等交换是可能的。

受苏联影响的、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主义理论是一种后退。帕洛克斯认为，根哲尔、帕维尔和霍罗维支声称“不发达国家提供的产品的价值是由发达国家的产品通过生产而按部门地决定的；而这一价值实际上等于零，因为先进国家能毫不费力地生产不发达国家专业化生产的产品。”（第 257—258 页）这个论点不能成立，因为外围国家的 75% 出口品来自生产率极高的现代化企业，而其余的（主要是异域农产品）则是先进国家根本不能生产的。反对这种观点的是一位罗马尼亚经济学家拉赫穆斯，这是可以理解的；虽然，不幸的是他求助于另一种经济理论，即李嘉图的理论。他说，基于比较成本的国际交换加深了发展的不平衡，如果“先进国家在可以取得生产率最大增长的活动中实行专业化，而欠发达国家则限于在生产率增长极为有限的部门中实行专业化。”这只是部分事实，因为外围国家的专业化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现代化产品。关于比较利益的经济主义理论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发达国家限于实行这种或那种专业化——换句话说，国际交换的功能是什么？

关于比较利益的经济主义理论，即使是科学的李嘉图派，也只有有限的有效性；它描述一定时刻的交换情况，但并不根据在某一时刻所存在的比较生产率（换句话说，这些生产率的改善）而考虑在发展中对某种专业化给予优先。它不能说明世界贸易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背景下发展方式所特有的两个重要事实：（1）各先进国家的结构类似，因此比较生产率也类似，它们之间的贸易发展似乎快于先进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发展，虽然后者情况下比较生产率的分布有更大的差别；（2）外围国家的专业化采取不断变化的形式，包括它目前的形式，外围国家在这种种专业化形式下提供主要由生产率高的现代化资本主义企业所生产的原料。

为了说明这两个现象，必须首先注意资本主义扩大市场的传统倾向的理论，其次要注意外围地区被中心地区统治的理论。

分析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交换，使我们观察到：只要生产率相同的劳动在外围国家得到较低的报酬，那么交换就是不平等的。如果不考虑在外围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在组织劳动力供应方面所奉行的政策，就无法说明这个事实。资本如何在外围地区造成无产阶级化，资本所推行的生产专业化如何在需求上造成永久性的、不断增大的剩余劳动力——这些都是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

阿里基根据罗得西亚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史，批评了W.A.刘易斯关于不发达经济社会中劳动力供求动力的理论。刘易斯假设“传统”部门存在着潜在的剩余劳动力（“隐蔽的失业”），该部门的生产率是低的——随着生产率高的“现代化”部门的发展，这种剩余劳动力会减少。正是由于这种剩余，所以现代化部门才有可能支付低廉的劳动报酬，这些部门据说拥有供其支配的无限量的劳动力供应。事实上，阿里基表明罗得西亚的情况正相反：现代化部门极其丰富的劳动力供应在增加，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比殖民时代早期的1896至1919年间更多——因为这种极其丰富的劳动力供应是由国家和资本的经济政策所组织安排的（特别是通过“后备”政策）。因此，不是由“市场法则”来说明外围地区工资的发展方式（这是不平等交换的基础），而是由那里所实行的原始积累政策很简单地说明这一点。

不平等交换的其他阐述和方面

根据价值转变为生产价格的不平等交换的理论阐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使我们对这个概念赋与一种科学内容，从而规定支配它的条件，但是这是不“实际”的。确实，按照马克思的方法，价值

之转变为价格并不考虑下列事实：不变资本、投入等组成成分本身都是在生产过程中结合进来的商品，因此不计算它们的价值而计算它们的价格。生产者消费的商品也是这样，这些商品构成了工资的实际内容。为了考虑到这种普遍的相互依存，我们需要象斯拉发所做的那样保持在价格的直接外貌的水平上。他根据实证经验主义条件进行的分析，重新得出了马克思作的重要结论，即：相对价格体系和平均利润率是由实际工资水平所决定的。这种论证推倒了主观主义经济学的整座大厦，剥夺了以主观价值为基础的“经济合理性”所声称的绝对有效性，并使它沦为一定体系内主要由决定劳动力价值的社会关系所规定的合理选择。这里有意思的是斯拉发的体系可以用来衡量不平等交换的程度。正如奥斯卡·布朗所表明的。

布朗设想铁和小麦这两种商品是在具有以下技术的某一经济社会中生产的：

$$13 \text{ 吨铁} + 2 \text{ 吨小麦} + 10 \text{ 人年} = 27 \text{ 吨铁}$$

$$10 \text{ 吨铁} + 4 \text{ 吨小麦} + 10 \text{ 人年} = 12 \text{ 吨小麦}$$

如果利润率 r 是统一的，那么我们就得到：

$$(13p_1 + 2p_2)(1+r) + 10w = 27p_1 \text{ 以及}$$

$$(10p_1 + 4p_2)(1+r) + 10w = 12p_2$$

其中 p_1 代表一吨铁的价格， p_2 代表一吨小麦的价格， w 代表每一人年所支付的工资。

我们假设发达国家A国生产铁，那里的工资是 w_1 ，而被统治的国家B国生产小麦，那里的工资是 w_2 ，低于 w_1 。如果A和B的工资相同——例如等于 0.56——那么利润率将为 0.20，小麦的价格为 2.44，铁的价格为 1。可是，如果A的工资是 0.70 而在B是 0.12（或者少 5.8 倍），那么，在同样的平均利润率 0.20 的情况下，小麦的价格将下跌到 1.83。B国贸易比价（出口小麦和进口铁）恶化

25%，在平均利润率不变的情况下，意味着各自的工资水平发生剧烈转变：A的工资增加25%，而B的工资降至原有的17%。反过来，如果A和B的工资相同，在生产率相等的情况下（因为B根据A过去所用的技术生产小麦），小麦的国际价格将不同于B工资较低时的情况。国际价格和工资水平不平等，何者是因？何者是果？这个问题是不得要领的。因历史原因（各社会形态之间的不同）而造成的工资不平等构成了专业化的基础以及使这种不平等永久化的国际价格体系。

传统的经济理论基本上仍然是“微观经济的”。在国际关系中它除了个人间的关系（买方与卖方）以外都闭目不见。然而重商主义的经验同这种观点有矛盾：直到自由贸易为时颇晚的胜利，国际经济关系是严格地从属于政府政策的。在对外贸易垄断结构内活动的特许公司的历史表明了这一点。英国为了击败可能的竞争者，毫不犹豫地使用政治手段，正如印度工业中的事例。自由贸易的理论只是强国所宣传的，而且是在它们以其他手段确立了统治地位以后。研究一下关税政策，可以令人考虑国际关系的垄断性质。根据比较利益的理论，如果一个国家建立起保护性的关税，它的贸易伙伴采取同样手段以牙还牙是没有好处的。因为新确立的关税是个“事实”，它改变了确立这种关税的国家内部相对价格的分布。其他国家对该国实行自由贸易并将其国内价格体系——把关税额考虑在内——视为一种“基准”，那么它们还是能继续“最大限度地满足它们的需要”的。这种理论设想中事先就排除了以牙还牙的理由。那有双重理由：一方面，关税的目的是要造成一种垄断来改善贸易比价，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就有可能使某些工业在关税壁垒保护下建立起来。它用这种方式为自己创造了未来的优势。其他国家就应当步其后尘。自由贸易的鼓吹者们的答复是：声称一国因其贸易伙伴采取提高关税的行动而实

行以牙还牙，这是估计错误。一方面，该国的贸易比价肯定改善了；但是另一方面，却导致了资源的非最佳分配。陶西格和埃奇沃思肯定认为（虽然未能证明这一点）这样导致的不利大于所得的利益。实际上，这是一个虚假的问题，因为“资源最佳分配”的理论根据的是在动态观点中没有意义的“要素赋予”理论。

当代计量经济学一个流派已提出：把国家视为世界贸易的单位，从而“衡量”国际关系中垄断的不平衡性。这种流派衡量各国进出口的“比较集约度”、价格弹性和外贸收入以及替代弹性。可是，他们工作的贡献对于了解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只有次要的重要性。国家被视为不平等力量的垄断寡头势力。这对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虽然在理论上是对的，但是对于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却并不一样。因为国际关系中的垄断寡头概念的先决条件是买方与卖方的经济独立性。可是，在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有关经济社会的补充性质排除了互相独立的设想，因为在比较高度发达的经济社会统治背景下产生的专业化机制使附属国的结构适合于自身的需要。双头垄断或寡头的外部分析肯定有朝一日要被迫脱离“博弈论”的领域以便分析各社会形态以及这些社会形态中不同统治阶级之间的政治关系。

需要的不是限于描述不平等的现象（对这种现象的外在表现——弹性——进行计量经济学的衡量），而是分析垄断在世界贸易中所处的地位。今天，不发达国家出口的大部分原料是被垄断资本所控制的，或者在生产阶段将直接控制，或者在世界贸易阶段被控制。一个垄断资本所取得的利润额是和这个垄断资本与它所控制的生产者的力量对比成比例的，而这种力量在不发达国家中无疑更为强大。它有多大程度的可能性来实现价值转移？预先没有办法来决定答案，因为政治考虑在这件事情上对公司的态度可能不无影响。可是，广泛而言，有可能说：这种转移能够实现到这

样的程度：产品的价格不再能超过当地生产最低限度的劳务价格（工资与租用费），那就是，能保证工资收入者维持生计以及当地财产所有者阶级所需要的奢侈消费量（使之不致采取国有化而危及外国垄断资本）。而且，这些财产所有者阶级的思想方法是可以理解的。国有化确实不但对他们有危险：除了它可能产生的政治困难以外，它并不能使不发达国家无需使用外国技术人员和外国资本（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更高的报酬）。

相对价格和比较实际工资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不平等交换理论中的唯一组成成分，虽然它们是它重要的成分。在实际价格体系（经济决策是据此作出的）中，取得自然资源的成本构成一项特殊的成分。我们看到实际价格体系基础上的经济计算并无特别的合理性，因为这些自然资源中有些是由某一阶级的排他性调拨所左右的，这就导致一种不平等的因素，而其他自然资源则是人人可自由享用的。而且，这些资源是在不同国家中分配的，决定它们的调拨条件在各地并不相同。

总的说来，消费某种自然资源所必需的产品的“公平”国际价格，除了平等的工资和平均利润以外，还应当包括租用费的成分，以足够重建这种资源。如果涉及的是一种能自我更新的资源（如土地、空气或水），那么价格必须有可能令人满意地维护这种永久性的资源。如果涉及的是一种容易耗尽的资源（如碳氢化合物或矿物），那么价格必须有可能发展一种对国家具有同等价值的替代活动。

然而，情况却很少如此。资本主义制度利用流行于外国国家中的前资本主义调拨形式以便不支付土地保养费。有计划的破坏土壤是依附性经济社会长期贫困化的一个主要因素。这种破坏是有利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社会的，办法是通过低于可能代用产品价格的价格。

技术依附是不平等交换的又一个方面，其重要性无疑将会增

大。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试图用以下标题整理出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移总额：专利权使用费、为换取信誉和技能而对外资股份支付的利润、企业购买零件时支付的高价、售后服务费用等等。最低限度的估计（人们认为很可能是联合国贸发委员会低估的）在1968年为15亿美元。这些转移每年以20%的速度上升，所以到1980年将达到90亿美元或为七十年代末不发达世界可能出口量的20%。

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个垄断价格——垄断资本肯定最能绝对掌握的价格，即技术价格。只要生产技术比较简单，统治就必须直接控制生产资料，即实际上的外国资本所有制。一旦中心国家的资本能够统治第三世界的工业并从中取得大量利润而无需资助它们的设施时，这种调拨的直接形式就没有意义了。

第三节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主义

前资本主义的和重商主义的对外贸易

“国际”交换的定义是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产品交换。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内部交换的集约度低。在村社、贵族庄园或东方帝国内部，某些产品的流动是组织得很好的（支付赋税，在某些场合互赠礼品，馈赠嫁妆，等等）；可是，这不是商品交换而只是伴随某种超经济类型社会义务完成的活动。在村社之间或封建领地之间也没有许多交换：因为每个单位都类似其邻居，它们自给自足地生活。可是这些社会中任何一个都不熟悉远距离贸易。这种贸易能够取得生产成本无法计算的异国产品。

中非所发现的中国瓷器，流入欧洲的鸵鸟毛，著名的“香料”——这些都证明了远距离贸易的性质。整个社会（如腓尼基和古希腊）建立在与以往互不了解的世界取得接触的这种活动的基础

之上。在许多差别很小的社会中只拥有少量剩余，对这种贸易所提供的产品的控制在社会形态的组织中有极大的重要性。但是严格说来并不存在国际专业化，从这种意义上看，远距离贸易仍然是一种边际活动，因为它并不成为作为交换伙伴的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成分。

在重商主义时代形成过程中的中心地区(西欧)和自行形成的新外围地区之间的贸易关系在逐渐成形的资本主义体系中构成一个基本的成分。以西欧为一方和新世界及亚洲、非洲的贸易站为另一方之间的国际贸易在数量上构成了世界交换的大部分。而且，中心地区内部的交换中一大部分(可能是较大部分)是来自外围地区的产品再分配活动：这首先是意大利(特别是威尼斯)和汉萨同盟的城镇在中世纪末、然后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十六世纪、然后是荷兰和英国从十七世纪以后所起的作用。中心地区当时进口的奢侈消费品不是农产品(东方的香料、美洲的食糖)就是手工业产品(东方的丝绸和棉布)。中心地区取得这些产品，或者通过简单的交换，或者通过掠夺，或者通过为此目的而建立的生产组织。同东方的简单交换始终处于困难，因为欧洲除了从美洲搞来的贵金属以外拿不出什么东西。金银枯竭的经常性危险非常严重，以致当时所有的经济思想都是出于反对这种倾向的需要。美洲所确立的生产形式主要为完成对中心地区提供贵金属和某些奢侈品的职能。经过一段时期对美洲印第安人财富的赤裸裸掠夺以后，集约化的采矿企业成立起来了，并且对人力资源实行严重浪费，作为它们的活动有利可图的条件。与此同时，实行一种蓄奴制生产方式以便在美洲生产食糖、蓝靛等等。美洲的整个经济围绕着有利于中心地区的这些发展领域。例如，养殖牲口为的是给矿区和奴隶种植园地区提供食品。“三角贸易”以到非洲猎取奴隶开始，完成了这一重要作用：欧洲各港口由于把外围地区的产品

出售给统治阶级分子而积累了货币资本，这些统治阶级分子受到推动而使自己从封建分子转变成农业资本家。

因此，资本主义的史前史和商业资本的时代——这从地理大发现(十六世纪)到产业革命(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对外围地区(主要是美洲和非洲，后来加上英国统治下的印度)赋与了特殊的任务。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工业形式之所以兴盛，只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个成分不寻常地接触的结果：一个结果是动产的集中，另一个结果是无产阶级化。后者之出现是由于欧洲封建生产方式内部的分崩离析，前者之产生是由于形成过程中的资本主义中心地区为一方与开始和它接触的外围地区及独立社会形态为另一方之间的国际交换。拥有金、银财富的美洲首先受到野蛮的掠夺。然后，远距离贸易改变了它的性质。首先它使大西洋各港口——荷兰、英国和法国——的商人发财致富。然后，为了有利于这种贸易而在美洲组织起种植园，这就需要发展奴隶贸易，它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将起到重大的作用。

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资本国际流动

当资本主义成为一个世界体系时，国际贸易就改变了性质。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理直气壮地谈论国际专业化——换句话说，即：已知价值的产品的交换。

就世界贸易和国际资本运动而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已经成形，这个体系的结构特点是什么呢？从最为明显的方面出发，我们首先注意到有关各经济社会之间的比例失调(而且，这种情况还在加深)。先进世界(北美、西欧、苏联与东欧、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1938年约共有8亿人口，而“三大洲”(包括当时有4亿居民的中国)则有13亿人口。它拥有全世界收入的70%。人均收入的比例为1比4。30年以后，这一比例为1

比6(不包括中国,因为它不再是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全世界居住在不发达国家(仍不包括中国)中的人口比率已从53%增加到58%,而它们的生产比重却从20%下降到18%。

中心与外围之间的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下降了,而中心地区内部的交换则增加了。在十八世纪末,法国的外贸(仅次于英国和荷兰)约为出口5.5亿和进口6亿金法郎,其中2.2亿金法郎是和外围地区(美洲殖民地和勒旺岛)的直接交换,不包括奴隶出口;而法国从英国和荷兰进口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共约1.6亿金法郎)是那些国家再出口的异国产品。因此法国外贸中一半以上是它和外围地区的直接和间接贸易。在1850年左右,法国的外贸与1780年的水平相比增加了一倍(1825年恢复到1780年的水平):进口11亿金法郎,出口12亿金法郎。同欧洲以外的进出口贸易占45%,而且即使不包括与美国的贸易,也仍然占25%以上。此外,法国从英国进口的一大部分仍然是殖民地产品。最后,应当看到法国与其西欧工业邻国(英国、西德、比利时)的贸易并不比它同欧洲较不发达国家(俄国、奥地利帝国、西班牙、意大利)的贸易大许多。可以说,35%至40%的法国外贸仍然是和外围地区的贸易。这些比例在1870年战争以后并无多大不同,同非欧洲外围地区(不包括美国)的贸易当时约占法国外贸总额(进出口值共为45亿金法郎)的25%。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一比例甚至进一步增加对外围地区的贸易:在77亿美元的进口总额中,30%来自包括法国殖民地在内的“三大洲”,而出口(总额为58亿美元)的25%也输往这些国家。但是法国同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的贸易比它同落后的东欧和地中海地区的贸易要重要得多(前者为后者的6.5倍)。尽管石油进口有非比寻常的增加,在近年来法国贸易总额中,与外围地区的贸易已下降至25%以下,现在法国更大部分的交换是和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

欧洲共同市场国家)以及美国进行的。英国的贸易发展也表现同样的特点,但是更为突出。外围地区吸收英国制成品(特别是棉制品)的份额一直占优势,至少直到1850年。在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之间的内部交换比重在1928约占世界贸易的46%,在1965年增加到62%,与此相关的是,中心地区与外围地区之间的交换比重则从22%降至17%。换句话说,中心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增加了内部流动的相对集约度,但在外围地区,它只增加其外部流动。

另一个证据是不发达国家的出口专业化程度增加——在少数“基本产品”出口方面的专业化,一般伴随着供应商与消费者的相对集中。可是,必须避免某种过分简单化。

首先,不发达国家并未垄断“基本产品”的出口(即:初级产品,农产品与矿产品)。有出口基本产品的富国(斯堪的纳维亚的木材,澳大利亚的羊毛,等等),还有主要由发达国家进行的“初级”产品贸易(例如,小麦)。我们看到这些产品的价格运动不同于不发达国家的出口。把不发达国家和基本产品出口国等同起来,会导致理论上的错误。这涉及到所交换的产品的性质。在初始阶段,异国农产品用来交换日常消费需要的制成品(纺织品,五金器皿,等等);这是简单的贸易经济时代的情况。当农业商业化和矿业发展的结果扩大了国内市场而使取代进口品的产品生产工业兴起的时候,贸易就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其中交换的是基本产品换取消费品和取代以往进口品的轻工业所需要的产品(电力、原料、半成品、设备)。到了再进一步的阶段,不发达国家可能成为消费制成品的出口国,这些制成品或者由不发达国家中较先进的国家出口到较落后的国家(这已经是很常见的现象),或者出口到中心地区的发达国家去——这是某些国际机构所推荐的政策。

结合进世界市场的程度也可以加以衡量。粗略的观察(看一

下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难以看清这一点。因为在两类国家中这方面的情况相当“分散”。可是,如果我们考虑发达世界与不发达世界之间的全部交换,我们就注意到交换的产品对于不发达经济社会的相对重要性大于发达经济社会。这是因为发达国家贸易的主要部分是在这些国家之间进行的。发达国家大约80%的贸易在它们自身之间进行,只有20%的贸易是同不发达国家进行的;外围国家的比例正相反,它们大约80%的贸易是和发达国家进行的。当我们提出这一点时,显著的混乱消除了。对发达国家来说,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地位和它的出口占国民产值比率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反比关系。位于名单之首的是一批“小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荷兰、东欧国家,等等),中间是西欧“大国”,末了是美国和苏联。这个事实反映资本主义扩大市场的固有倾向,而这是比较利益理论所忽视的。对不发达国家来说,经济地位的因素主要被它们根据外部需求所发展的程度所掩盖。可是,总体而言,不发达国家可被视为已经高度结合进世界市场。

至于资本的国际流动,有六组重要事实需要包括在说明性的模式之中。

第一,从最老的资本主义中心的资本输出,直到大约1880年以后才真正扩大规模。英国的资本输出从1825—1830年的1亿英镑增加到1854年的2.1亿英镑和1880年的13亿英镑,然后增加到1913年的37.63亿英镑。以法国的例子,跃进是突然的:从1870年的120亿—140亿法郎增加到1914年的450亿法郎。德国的数字是:1883年的50亿马克增加到1914年的220亿—250亿马克。美国的情况:1896年为5亿美元;1914年为15亿美元;1922年为185.83亿美元;1933年为252.02亿美元。

第二,这种资本输出主要从老的资本主义中心流向形成中的新中心,只在较小程度上流向不发达国家。因此,俄国、美国和大

英帝国的“白人”自治领是主要的出口。在我们的时代，资本的主要运动是从美国流向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

第三，资本输出并未取代商品输出，而是相反地给了后者一个推动。世界贸易的平均增长率在1840—1880年为3.3%，1880—1913年为14%，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为0，1950年以来的时期为7%。1880—1913年的资本大输出时期也是世界贸易大增长的时期。

第四，外国投资的流入和汇回利润的回流，在老中心和形成中的新中心之间的关系则很不同于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关系。在后者情况中，外围地区从“新借户”的地位（输入资本的流入超过出口收入的流出）过渡到“老借户”的地位（利润流出超过新资本的流入），并在这个阶段稳定化起来。在老中心和形成中的新中心之间的关系，发展道路是不同的：新中心转而成为资本输出国（首先是“新放款人”，然后是“老放款人”）。

第五，在形成中的新中心，工资往往上升到资本来源老中心的普遍水平（甚至，有时从一开始，它们的工资水平真的比较高），中心和外围同样生产率的工资之间的差距往往更大。

第六，最后一点，外围的利润率比中心要高。可是，同劳动力报酬相对差距比起来，利润率的差异是不大的。例如，美国投资的总收益在拉丁美洲约为15%至22%，在美国国内则为11%至14%。

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仅仅象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颠倒了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它还确立起一种新的层次，从那以后，美国所起的作用大大超过其他西方大国所起作用的比重。这种变化反映在美国在资本输出方面的绝对优势：美国的份额从1914年的6.3%上升到1930年的35.3%，到1960年上升到59.1%，而英国的份额则从50.3%降至43.8%再降至24.5%，其他两个主要资本输

出国(德国和法国)的份额从 39.5% 降至 11% 再降至 5.8%。可是,发达国家已成为美国资本最为主要的市场:1966 年,欧洲吸收美国资本的 40.3%,加拿大吸收 34.8%,澳大利亚、日本和南非吸收 7.2%,而整个第三世界只得到 17.7%。美国投资在各经济部门的分布是很不同的,决定于资本接受国是先进的还是不发达的类型。在 1964 年美国直接投资总额中,矿业部门占 8%,石油生产占 32.4%,加工工业占 38%;公共服务、贸易和杂项服务占 21.6%。可是,如果我们分别考虑美国在不同地区的投资,我们发现加工工业所占的份额在欧洲上升到 54.3%,加拿大为 44.8%,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 54.1%;而在拉丁美洲则降为 24.3%,亚洲为 17.5%,非洲为 13.8%。另一方面,投入矿业和石油生产的投资份额在外围地区则升到约 60%,第三产业部门为 20%。如果我们还考虑到欧洲的大部分美资工业是为欧洲市场生产的(美国资本控制英国汽车工业的 50%、德国石油工业的 40%、法国电气和电子设备工业的 40% 以及加拿大大型工业的几乎全部),而在外围地区,大部分外资工业是为外部市场生产的(矿产品出口以前先行加工),那么我们就得出结论:中心国家投在外围地区的大部分资本是有关出口活动的(采矿、石油、矿产品初加工),其次是与出口有关的第三产业活动,而为当地市场生产的工业则只占小小的地位。

贸易比价的问题

1880 年以后,净易货贸易比价的运动有了变化。1800 年至 1880 年之间,英国的贸易比价不断恶化,从 1801—1803 年的指数 245 降至 1843—1848 年的 118,1848—1856 年的 110 以及 1880 年的 100。如果我们同意(广泛而言是正确的)英国在当时是制成品的的主要供应者,它的进口主要是来自世界欠发达地区的原料和

农产品,那么这意味着:在1880年,不发达地区以同样实物量的出口品(例如棉花)可以得到1800年两倍半的制成品(例如棉纺织品的码数),或该世纪中叶1.2倍的制成品。1880年以后,贸易比价的运动反过来了。原料和农产品供应者的贸易比价恶化了,从1876—1880年的指数163降至1926—1930年的120和1938年的100。这意味着:在1938年,不发达国家以同样数量的出口初级产品只能购买1880年60%数量的制成品。

当代的时期可以分为两个小段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以后,直到朝鲜战争末,大约1953—1955年,不发达国家的贸易比价大为改善。可是,此后当代世界进入的大繁荣时期却出现了贸易比价的严重恶化,不发达国家依靠一些特定出口产品的这种比价至少出现5%至15%的逆转,在某些情况下或许逆转多达8%至25%。

贸易比价的这些变化本身并不意味着什么。如果一个生产部门的生产率提高快于另一生产部门,前者相对价格与后者相比趋于下降,那是正常的。的确,比较成本理论的乐观正有赖于此。我们来看看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的关系实际情况如何。如果我们假定价格固定在生产成本的水平上,工业国出现了技术进步,那么,生产成本以及制成品价格同农产品价格相对比就下降了。农业国的贸易比价改善了。后者供应和以前等量的农产品而得到越来越多的制成品,从而因别国的进步而得利。

显然,在1800年至1880年之间,英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显然是这种情况。但是1880年以后的情况如何呢?如果不发达世界出口生产的生产率提高大于发达世界出口工业的生产率的提高,那么“初级”产品生产国贸易比价的恶化就是正常的。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由于国际专业化,将和初级产品生产国本身一起获得后者技术进步的好处。可是,如果发达国家出口生产部

门的技术进步更为迅速，那么就必须解释专业进行“初级”生产国家究竟由于什么机制的作用而被剥夺它们专业化的好处的。

我们从一个经济社会内工、农业之间的长期进步进行对比，可以了解到什么呢？

		人均收入 (按国际单位)		增加百分数	年增长率
美 国	(1850)	(1935)			
农 业	298	669	121	1.0	
工 业	737	1,683	127	1.0	
英 国	(1867)	(1930)			
农 业	581	827	42	0.6	
工 业	418	1,151	175	1.6	
法 国	(1860-1869)	(1930)			
农 业	435	500	15	0.2	
工 业	468	1,373	193	1.8	
澳大利亚	(1886-1887)	(1935-1936)			
农 业	678	1,408	107	1.5	
工 业	368	1,461	294	2.9	

所有这些国家的进步都是工业更为迅速——农业进步最快的是在澳大利亚，但也只是它的工业进步速度的一半；即使在美国，1935年以来工业进步的较快步伐一直是很突出的。

与农业相比，各国的工业进步速度较快，伴以工业中较高程度的资本积累。

从第一组到第四组，我们看到投入农业的资本从三倍增至五倍，而投入其他活动(主要是工业)的资本则从七倍增至十一倍。这表明资本密集性和生产率水平之间密切的相互关系。

至于目前时期，技术进步的图式似乎有了深刻的变化。

资本积累的演变

人均收入	农 业	其他活动
第一组: 大约 500 日本, 1913 斯堪的纳维亚, 1880	100	400
第二组: 1,000-2,000 英国, 1865 意大利, 1913	100-300	700-1,400
第三组: 3,000 英国, 1885 德国, 1913 法国, 1913	300-400	2,300-3,400
第四组: 4,000-5,000 美国, 1913	300-500	3,400-5,100

资本与生产之间比率的演变

美 国			英 国	
年份	加工工业	采掘工业	年份	国民经济
1880	0.54	1.16	1875	3.51
1890	0.73	1.36	1895	3.72
1900	0.80	—	1909	3.80
1909	0.97	1.80	1914	3.40
1919	1.02	2.30	1928	3.53
1929	0.89	2.14	1938	2.68
1937	0.74	1.57	1953	2.55
1948	0.61	1.34		
1953	0.59	1.26		

这一比率在一个世纪的时期中发展的逆转反映了当代科技革命的开始。这以自动化为基础, 现在正在使“余留因素”(科学)成为技术进步中的重要因素, 而传统生产活动中的外延因素(劳动力与资本)份额则日益缩小。这一革命只影响一些先进大国: 它在美

国开始于二十年代，在英国开始于三十年代。这说明为什么在不发达国家中虽然古典型的工业积累仍在进行，可是资本—产值比率却日益加重而在发达国家中则在日益减轻：这在一些不发达国家中常常比若干先进国家要重。

一般说来，如果在发达国家里，在古典的积累过程中，农业进步不如工业快——可是在那些国家里，机械化已经渗入到农村——显然，更不容置疑，发达国家出口工业的进步快于不发达国家中对机械化尚一无所知的传统出口农业。这方面的证明就是工、农业(工业总是现代化的)人均产值日益扩大的差距，这个差距在不发达国家中比发达国家中发展得快。然而，我们已经看到，不发达国家并不是传统型农业的农产品主要出口国。所以，我们必须比较下列各方面的进步：(1)先进国家向不发达国家出口的工业部门的进步；(2)不发达国家出口的采掘工业(石油和别的矿产)的进步；(3)这些国家中现代化的种植园农业的进步；(4)这些国家中传统出口农业的进步。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上述四组的资本—产值比率(因为我们没有它们资本有机构成提供的更好数据)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必须以同样方式小心估计投入的资本和产值(增加价值：劳动力与资本的报酬)。至于资本，可以用一致的当年价值作估计数，因为资本货几乎全是发达国家供应的。可是，至于产值，我们必须记住这些事实：在生产率相等的情况下，不发达国家的工资较低，可是这些国家实现的部分利润则通过全世界利润率均等化并由于那些产品的价格低廉而转移到中心国家去了。如一切情况相等，同样的比较应表明不发达国家的资本—产值比率的数字较低。低多少？如果，生产率相等，不发达国家的实际工资只是发达国家实际工资的三分之一，如果均等化以前的平均利润率在不发达国家为30%而发达国家为15%，如果工资等于增加价值的30%，那么，不发达国家中的资本—产值比率应当一分为二

来同发达国家的有关数字作比较。现在,在美国的加工工业(这是先进世界出口的实例),资本—产值比率约为2——而不发达国家的石油与采矿工业的这一比率当前估计是小于3,它们的现代化种植园农业为小于1.5,它们的传统农业是零:或者,平均而言(按照这几种产品在不发达世界出口中的相对重要性加权)按外围国家出口部门当前数值来看约为1.8,以比较数值来看则小于1。有鉴于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提出结论认为先进国家出口工业的进步快于不发达国家出口工业的进步。

对不发达国家贸易比价恶化意义的精确分析要求进行有系统的研究以便比较相对价格的发展(净易货贸易比价)与生产率的发展。关于双重要素贸易比价的思考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以比较生产率进展指数表现的净易货贸易比价的商数。不幸的是,很少的研究专注于双重要素比价的发展,而这种比价却是从不平等交换理论的观点所表示的唯一比价。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说:如果交换是平等的,那么双重要素比价就应当保持不变,而这种比价在不发达国家中从1880年以来却已经恶化了。根据比较成本的理论,易货贸易比价对进行出口的不发达国家来说应已改善,因此使这些国家能从提供它们制成品的发达工业国所取得的较快进步中得利。然而这种情况没有发生。传统理论对此如何说明呢?

从主观的角度来看价值,价格只是由需求决定的,而不问生产成本方面可能发生任何变化。今日的一些经济学家关心于在这种纯主观的基础上来说明不发达国家贸易比价恶化的机制。他们声称能确定“初级”产品的需求(因此也是它们的价格)已经发生有系统的下降(至少在相对的条件上)。供求规律的确表明:如收入保持不变,则需求减少时价格就下跌。但是那恰恰不是这里的情况,因为需求的增长是和收入的提高并驾齐驱的。

劳尔·普雷维什以不同的根据提出他的观点，他分析本世纪中技术进步和要素报酬的比较演变。他一开始设想发达国家工业中的技术进步快于不发达国家初级生产中的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好处以两种方式表现出来：或者是价格下跌而货币收入保持原样，或者货币收入上升而价格保持原样。如果在两类国家中，由于进步而价格下跌了，那么贸易比价的变化只反映这种进步的不平衡分布。如果两类国家中收入与生产率一起上升，情况也是这样。可是，如果一类国家中进步带来价格下跌而在另一类国家中进步带来收入增加而价格并不下跌，情况就不一样了。普雷维什说这正是国际贸易关系发生的情况。在工业化世界中，工资收入者由于生产率提高而获得工资增加。可是，在农业占主导的国家中，劳动力的经常过剩阻止了工资收入能分享普遍的繁荣。这一观察促使我们提出一个新的因素，这个因素是大约在1880年出现的，而普雷维什忽略了，那就是：中心国家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垄断资本的面貌，这一发展使经济体系抵制价格下跌。这正是为什么在整个十九世纪期间技术进步导致价格下跌，而在1880—1890年以后我们见到进步所反映的却是价格持续上升和收入（工资和利润）更快增加。由于垄断而使工资有可能增加，此后的竞争不是表现为通过降低价格。因此不发达国家的贸易比价恶化是从垄断资本、帝国主义和“劳工贵族”的兴起而开始的。

但是最终为什么不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供应总是过多呢？普雷维什说那是因为技术进步在这些国家里把劳动力从生产中解放出来的缘故。但是技术进步在制造业中也完全发生同样作用的。实际上，我们只需考虑一下外国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本质，就能了解到这种劳动力永久性过剩的原因是相当明显的。这些社会经济形态的特点是处在解体过程中的农村后备劳动力颇为重要，它构成了劳动力市场中的主要因素。在中心地区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

形态中，这种后备劳动力不再存在。

还必须说，在发达国家中，虽然劳动力供应与不发达国家中的情况相比不是那么过剩，可是直到1880年，进步才反映在物价稳定和工资增加上：在整个十九世纪，在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区，价格一直在下跌。在中心地区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中，收入的主要形式是资本家利润，而在外围资本主义，主要形式往往是地主收取的地租，那里的地主阶级是结合进国际市场的主要受惠者。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对事态变化反应最灵敏的弹性收入就是利润。在繁荣时期实现的额外利润进行了再投资。因技术进步而解放的劳动力被生产资本货的劳动力额外需求所部分地吸收。（只是局部地。因为企业家只有在节省劳动力大于额外资本开支时才有兴趣搞革新。）在结合进国际市场的一个农业经济社会中，情况就不同了。地主的地租在繁荣时期上升了，但没有进行再投资，而是花掉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花在购买进口品）。农业生产率的进步没有被制造资本货的劳动力需求增大所补偿，即使是局部地补偿。那些资本货是进口的，部分地由可能的额外出口所支付。所以，劳动力过剩比较大。除了这种相对就业不足的基本原因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同制度性质密切有关的其他原因，诸如：外国工业摧垮手工业者，这种灾难是建立一个本地工业所无法补偿的，所以这个制度必须把一大部分人口排挤出生产以便恢复其平衡。

资本主义扩大市场的固有倾向

国际贸易所占据的绝对和相对领域扩大的根本原因，必须从资本主义的内部动力、从它的基本推动力、从它对利润的追求以及从它所推动的机制中去寻找。在相对不同结构的两个前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并没有交换，因为这类社会的推动力是对需要的满足而不是对利润的追求。这种满足是由国内生产达到的，那就是说，在

村庄里或者在大庄园里达到的：从外部购进的唯一的本地缺乏的很可能生产的很少一些商品。使国内交换不经常的同样原因也使对外交换不经常：没有追逐利润，没有市场。在相对的“实际成本”方面很可能有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交换。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市场不断扩大，因为对利润的追求带来了竞争，这刺激每个公司进行积累，扩大规模，并到处搜求廉价原料和出售更多商品的机会。扩大当地市场和产生全国性市场的同一机制推动公司到国外推销。据认为，只要一个公司没有征服整个国内市场，到国外推销对它就没有吸引力，而且，为了征服国内市场，该公司的“最佳规模”必须是：一个企业就足以满足全国的需要。这种边际主义观点并不正确，其简单原因就是没有“最佳”规模：一个大公司总是强大的，总是更善于竞争。所谓的最佳规模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企业”的要素，其要素收益据说先是渐增然后渐减。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新古典派对一切“要素”建立一个对称理论的愿望。可是这是很人为的，因为这里的“企业”意味着“行政机构”。那个巨型企业很可以把这种行政机构分成许多必要的独立单位以便达到最佳管理：这个巨型企业所划分的许多单位仍然对“最佳规模”的小竞争者拥有决定性的优势，因为它们掌握着共同的财政资源。

因此，资本主义总是在寻找新的出路，不论结构异同都有活跃的外贸，因为即使结构类似，在任何一定时刻还是会有许多“特殊的”产品或者被认为是特殊的产品。可是，这些优势总是不断变化着的，而且国际交换领域始终在发展之中——不是因为每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搞专业化，而相反是因为生产越来越多样化了。

如果交换双方处于同样的一般发展水平，那么从理论上说就不应当有比较利益。可是，比较利益是存在的，只是它们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如果德国能向法国出口大众牌汽车而法国不能向德国

出口雷诺汽车，这不是因为双方的相对要素报酬及其相对利用不一样，而是因为大众汽车厂在工艺上超过其竞争者雷诺（部分地由于其规模较大），或者因为它掌握更多的财政资源。如果这种优势由于竞争的公司进行改组而丧失，那么潮流就会逆转。如果交换双方不处在同样的发展水平上，例如美国和欧洲之间的交换，那么比较利益的理论可能解释这些交换，因为美国生产率的优势在各生产部门之间并不是均衡地分布的。真正的“自然优势”的确存在，这也是事实，虽然存在的领域是有局限的（例如某些农产品的气候因素，或者矿产资源的地质因素），这就说明为何意大利向挪威出口柑桔类水果而不是挪威向意大利出口，以及为何德国鲁尔区的煤用来换取法国洛林的铁矿石。

我们至今所考虑的问题不同于罗莎·卢森堡所调查的。市场扩大到世界的范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本性。市场之所以扩大不一定是为了解决市场问题和实现剩余价值。马克思和列宁所确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告诉我们：剩余价值之实现不一定需要通过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解体来扩大市场。在实现剩余价值方面存在的唯一问题是货币问题——即充足的信贷扩大的问题。卢森堡提出了一个不同类的问题。她不局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背景（那正是《资本论》的背景）而研究了另一个问题，即：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张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心地区的社会形态和外围地区的社会形态）与这些形态的转变（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解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卢森堡表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市场的深化而进行扩大再生产的进程相一致，同时发生着原始积累的过程。因此，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之间的经常矛盾（它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矛盾）由国内（纯资本主义的）市场的深化和外部市场的扩大所不断克服。

但是，这种矛盾一面在不断克服，同时又在不断增大。因此它

表现为资本过剩不断增加，而与此同时对这种资本的控制则变得更为高度集中，资本主义市场变为世界范围的了。所以，在这方面的发展达到某一点以后，大规模的资本输出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如果比较利益的理论安置于适当的地位，即一个次要的地位，并按其实际情况来加以认识——国际贸易明显机制的理论——而不是按照并非其实际的情况——说明资本主义国际扩张的基本力量的理论——那么，国际贸易理论和资本运动理论之间的不相一致就会消失。

扩大市场和组成一个国际市场的传统倾向并不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阶段含义所特有的一个新现象。奥利弗·C·考克斯已经表明：国际贸易如何从重商主义时期开始起就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强有力的、向前的、代表性的公司企业如何从十六世纪以来总是深深地结合进世界贸易的基本结构网之中；今天的世界贸易又如何不顾自给自足的神话而仍然对美国大公司极为重要。考克斯推断说，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是不能根据封闭体系的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加以分析的；这样，考克斯就和卢森堡站在一起反对马克思和列宁。在这一点上，我并不同意他，因为他关于没有非资本主义的外部出路，剩余价值就无法实现的论点是错误的：没有非资本主义的环境扩大再生产是可能的——这种必要的出路一开始并不存在，是投资本身所产生的。这一点对于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国际市场为基础时就有独占倾向这一点，是重要的。

当集中(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固有倾向)使中心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时，资本主义扩大市场的这种永久倾向就在表现形式上有了质变，情况仍然是这样。当列宁把垄断作为他对资本主义新分析的主轴时，他正是这样评价的。因为十九世纪典型的小企业没有能力输出资本，所以当时扩大市场的倾向必然表现在贸

易上(商品出口)或者在国家干预上,通过这样的行动使外国地区服从于中心地区的客观需要。1880年以后,垄断资本自行直接活动,扩大市场的倾向就找到一个新的表现形式:资本输出。

因此,世界贸易扩大的重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扩大市场的固有倾向,而不是出于吸收剩余的任何需要,不论在竞争时期还是在垄断时期。这就是列宁所说的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国外市场的问题:“完全不是因为一般产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实现。这是胡说。其所以需要国外市场,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向。”^①

资本的国际流动

当前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断以矛盾的措辞谈到商品贸易和国际资金运动。关于国际资金运动,据说那是由于生产要素的不平衡分配,这造成资本的不平等报酬,而以前那些同样的教科书却说商品贸易也是由于同样的生产要素分配的不平衡,甚至说交换的结果是要把不平衡分配的生产要素的报酬拉平。

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国际交换并不影响实际工资,但增加了有关两国中实现的利润量而并不使它们的利润率平等化。因此,这个理论为资本流向利润率较高的国家的一项可能的附加理论留下了余地。

采取主观价值论就要抛弃李嘉图的理论。首先,陶西格认为国际贸易作为生产要素不平等的相对报酬的结果,一定会导致这些报酬在绝对量上的差异。李嘉图认为仅适用于利润的情况,陶西格则扩大沿用于工资和地租:交换增加了一切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也即增加了它们的实际报酬,虽然并不使这些报酬率平均化。萨缪尔森把这种论点推进一步,设法表明:商品交换造成生产要素

^① 《列宁全集》第2卷,第130页。

报酬的绝对平均化。但是这种理论公然违背了最明显的事实。除此以外,如果贸易和资本输出都是国际不平等赖以补偿的手段,那么这两种手段之一怎么没有取代另一种呢?资本输出怎么只在达到某一阶段以后才较快地发展呢?怎么资本输出的发展从来不会减少(即使是局部地减少)商品输出而相反却总是刺激了后者呢?

对古典派经济学家来说,按定义而言,储蓄“超额充裕”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储蓄是自动投资的。凯恩斯区分储蓄动机和投资动机,提出了可能存在全面不平衡的问题。后凯恩斯主义者在这个基础上努力把“成熟”的定义解释为长期的储蓄过剩。哈罗德认为,如果技术进步使资本—产出比率(一国的资本及其收入之间的比率)稳定而利息率不变的话,那么这种进步是“中立性”的。在这种情况下,进步并不改变分配。哈罗德的这一理论包括双重假设,即:稳定的有机构成以及同样稳定的剩余价值率。如果进步继续不断而仍然处于中立性,它就会不断增加国民收入。因为要使增长发展均衡的话,储蓄的增加就不能快于收入的增加,或者换句话说,边际储蓄倾向必须稳定。但是这种倾向要随收入增加而增加。所以,要使增长保持均衡,利息率必须不断下降,这由于“流动性偏好”而不可能发生。因此,哈罗德使自己限于(按照边际主义的观点)设想“中立性”的技术进步来研究和谐增长的情况。琼·罗宾逊设法完成这一分析。她受到马克思观点的启发,把技术进步的中立性规定为意味着资本有机构成的稳定性。然后她以某些设想为条件来研究稳步积累的情况,这些条件是:不变的利息率,技术进步的中立性,工资与利润之间净收入划分的稳定性。把最后两项设想加在一起,正相当于马克思的两项设想(资本有机构成的稳定性,以及剩余价值率的稳定性),也相当于哈罗德关于技术进步中立性的定义。按照这种设想,只有在净收入中固定数量的部分能不断储蓄的情况下,积累才能稳步发展。因此,也是由于同样的

基本原因，哈罗德提出了稳定储蓄量(而不是日益增加的储蓄量)的必要性——利息率也稳定(发达国家中的储蓄往往过多)。

因此，后凯恩斯派就声称重新发现了“成熟”经济社会的“总危机”理论。在达到某一发展水平以后，储蓄的可能性就大于投资需要(决定于消费量)。这里我们有一个消费不足的理论。储蓄可能性的增加是因为平均收入较高而且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在增加，而新投资的需要却保持稳定，因为，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里，科技革命反映在资本—产出比率的下降。因此，当代(三十年代)的这一革命开始时的标志就是空前未有的最强烈的经济危机。确实如此，一个世纪来，技术进步并未“中立”而是花费资金的。所以，消费的稳步增加就要求投资率的不断增加以补偿储蓄相对量的不断增加。如果从那时以来资本出现超额充裕的倾向，那么这是否并非由于利润率的下降呢？凯恩斯难道没有探讨资本边际效用下降的倾向吗？

对马克思来说，技术进步是花费资金的，换言之，它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率)。在观察过的事实方面看，这无疑是正确的，至少就整个积累的时期到当代的科技革命而言。在这种情况下，技术进步必然导致利润率下降。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法则受到了批评，因为反映生产率进步的有机构成提高促成了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它对利润率的影响是和上述法则相对立的。有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可以说明上述趋势强于这一反趋势——这或者是因为：生产率的提高在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工业中较大，虽然剩余价值率在增加，但这一增加小于有机构成的增加；或者是因为：与此相反，生产率在其他工业中提高较大，在这种情况下，有关的这两项比率在这方面均不受影响。说明一种趋势的法则中带有两种相反的运动。这里的例子是：有机构成的增加和剩余价值率的增加总是伴随出现的，因为造成有机构成(技术进

步)增加的力量也有利于剩余价值率的增加。在实际情况中,技术进步不断地引起劳动力剩余,那是技术进步所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市场上感觉到了这种劳动力剩余,导致剩余价值率的增加。然而,自主中心积累的重要要求往往在发达国家中使剩余价值率稳定化。此后,在充分发达的经济社会中,利润率不得不下降。这就必须寻求新的出路,可以取得更佳利润率的出路:大规模的资本输出就出现了。这种出路自然会在形成过程中的新的中心国家找到,在那里,可以广泛应用最新式的技术。在这些地方,尽管工资很高——有时(甚至常常)从一开始就高于老的中心国家——生产率还要高得多,因此利润率也改善了。但是这个体系的外围地区国家中的利润率也改善了,正由于相反的原因,即:由于那里的剩余价值率更高,所以在同样的生产率下工资却较低。随着商品和资金更加彻底地结合进世界市场,利润率平均化往往在全世界范围相应地生效。因此,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利润率之间所发现和测定的差距虽然很明显,却不足以补偿外围地区向中心地区的大规模价值转移,这种转移是由于剩余价值率的差距而通过贸易比价恶化的机制而造成的。

今天的时代有了许多新趋势。垄断并不仅仅意味着有利于垄断势力的利润再分配。分析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情况——这始终反映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目前阶段的“巨型企业”经济中的表现,只是在最近才进行的。垄断资本潜在超额利润的实现导致了“剩余”的增加——剩余这个概念比剩余价值的概念更为广泛,包括了非生产性的收入和国家岁入。巴伦和斯威齐调查了这种日益增长的剩余被吸收的方式。“拼命销售”——垄断资本之间的竞争不再为价格所影响——构成了这个制度的内在法则:随垄断而来的大肆支出“销售成本费”使垄断利润得以实现,而与此同时降低了这种利润率。例如在美国,增加的民用和军用

公共支出已经从本世纪初占国内生产总值7%上升到今天占30%，这构成了实现利润的体制中所固有的其他倾向。因此，所实现的剩余——所有可估量的剩余价值、浪费以及国家所吸收的剩余——从1929年占总产值的47%提高到1963年的56%。但是不能实现的潜在剩余总额：生产能力的利用不足是永久性的，失业者总数加上在发展中的军事工业部门中受雇的工人构成了劳动力中很高的、肯定在不断增加的部分。长期的就业不足减少了垄断资本的实际利润率，决定了技术进步的形式和特殊条件，并最终推动了对于可以提供较高利润率的外部市场的征服。巴伦和斯威齐所举的例子表明了输出的垄断资本的超额利润量：“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三分之二的资产设在北美洲，可是从那个地区得来的利润只占三分之一。”（第194页）确实，从利润率之间的这种差距所导致的是：正如巴伦和斯威齐所指出的，资本主义中心地区最终成为大的资本输入者，因为利润的回流大大高于资本输出，所以，资本输出并不是解决如何吸收剩余问题的办法，而相反却使这方面的条件恶化。可是，这个事实对大公司在宏观经济方面看来似乎资本输出是解决安排剩余利润问题的办法。

当代的科技革命使得这个制度的基本矛盾进一步恶化，因为它的主要表现是使得投资更有效率，换言之，降低资本—产出比率，从而使未消耗的那部分利润更多地剩余下来。因此它加强了输出资本的固有倾向，而且肯定是最近美国资本流向欧洲的背景。

后凯恩斯主义的“成熟”理论设法说明一个真正的现象：在垄断时代实现剩余价值的困难。然而，它设法在无法找到的地方寻找原因——在货币机制方面。巴伦表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法则在垄断时代被吸收剩余（浪费和公共开支）的新形式所克服。为了做到这一点，巴伦不得不发明一个新的科学概念——剩余——而且和斯威齐一起确定当代的潜在剩余往往大于实际剩余。

和这两位经济学家一样，我认为对外贸易和资本出口都没有真正提供克服实现剩余价值的困难，因为资本主义中心地区的贸易总的说来是同样平衡的，资本输出造成了在数量上往往超过它的一种回流。而且，“过度剩余”以其他方式被吸收的原因即在于此：通过经济浪费和公共开支，特别是国际关系的某些当代形式——对外军事开支和国家“援助”——这造成了国际收支的赤字。

因此，对外贸易符合于该体系同以前一样的要求，但是力量上则十倍于以往。它使得劳动力成本有可能降低，特别是通过在不平等交换的条件下购买的、从外围地区进口的农产品。这种不平等交换之所以可能，是由于使垄断资本主义能在中心地区保证工资稳步增加的机制（与垄断资本之间的竞争形式有联系的机制），而外围形态的性质则使那里的劳动力报酬可以保持在低水平上。对外贸易还能使原料成本降低，那是由于对外交换的同样机制。

这样，竞争性资本主义不得不求助的超经济方法已经被严格的经济方法所替代：这是“经济主义”的来源之一。与此同时，由于垄断资本，输出资本的可能性把中心地区所需要的那种生产强加于外围地区的现有办法大为增多。资本输出不让剩余被吸收，就有助于提高利润率，因为外围地区的剩余价值率高于资本输出国的国内利润率，这就使资本得到好处。但是这种转移主要被世界范围的利润率平均化（那是不平等交换的实质）所掩盖了。

我们不应该把资本主义中心国家（诸如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机制和资本输出机制的作用与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的这些关系的作用等同起来，因为不论是交换产品的性质或外国投资的方向或利润回流的动力，在这两种例子中都不是同样的。美国和其他中心国家（欧洲与日本）之间的不平衡发展（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剧了）已经使中心地区内部的关系在1945年以来特别

重要。它是这时期繁荣的基础，并把同外围地区的关系降到了次要地位。因此，世界体系已经转变：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已经建立起一个基本的等级制，而在以前，这个体系的特点是大国之间处于相对平衡。现在，美国资本在其他中心国家的投资并不起到这种资本在外围地区投资的同样作用。其中，寻求原料只起次要的作用——重要的因素是得到对许可证的保护和优惠的市场，而且首要的是得到技术优势而不是低廉的工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对不发达国家的国家援助起了各式各样的作用。除政治意义以外，这类援助使私人投资流入和利润流出之间的矛盾得以克服——换句话说，它服务于保持现状的重大作用，这把一种不平等的国际专业化形式强加于外围地区。垄断资本出现以后的转变并不产生剩余吸收的新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了这一点：“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末，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够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①

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法则仍然是这个制度基本矛盾的重要表现，所以也是永久性表现；贸易在力求扭转这种下降趋势中的作用并不限于资本主义的竞争时期。相反，它发挥这种作用的效果被垄断资本所加强了，因为垄断资本有可能输出资本。中心国家内垄断资本的兴起也导致了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因为由于它而出现了中心与外围之间在生产率相等情况下的工资差异，并在外围国家中组织起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

外围地区的职能

产业革命以后，中心与外围之间的贸易改变了职能。这种贸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85页。

易在数量上继续很重要并占据世界贸易的主要份额，虽然从1830—1850年以后开始下降了。对英国来说，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同美国和东方（印度、奥斯曼帝国以及后来的中国）的贸易占了压倒优势，因此这个时期的著作每当谈到海外贸易的机制并提出海外贸易的理论时只考虑这类贸易。英国在长时间里一直作为欧洲转口销售异国产品的中心。中心国家（先是英国，然后是欧洲大陆和北美，其后是日本）向外围国家输出供日常消费的制成品（例如，纺织品）。它主要输入的农产品，或者是东方传统农业的产品（例如，茶叶），或者（尤其是）新世界产量很高的资本主义农业的产品（小麦，肉类，棉花）。正是这个时期确定了工业国和农业国之间的国际专业分工。当时，中心国家还没有从外围国家进口矿产品（矿产品生产要求大量投资和便宜的运输工具），传统的贵金属是例外。随着新国家进入工业化阶段的程度增加，它们同英国的贸易就改变了性质。起先，它们象外围国家一样地供应农产品而换取“英国制”的制成品或者由英国转口的异国产品。可是，虽然它们都是工业国，它们的工业化水平是不平衡的——而且它们有已探明和可开采的自然矿产资源（例如，煤和铁）——中心国家（例如，法国和德国）之间就出现了和发展起用制成品和矿产品交换其他制成品和矿产品的关系。落后国家（例如俄国）仍然是农产品出口国。世界贸易逐渐分为具有不同职能的两类交换：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交换，以及中心地区内部的交换。

在竞争性资本主义时代，市场的扩大发生在宗主国企业之间竞争背景下的外部世界的市场之中。可是中心国家的资本主义有一些客观的需要，它来自（1）市场不宽绰，在初期阶段主要是农业的，被农业生产率进展的步子和范围所限制；（2）最大限度利润率的要求，这意味着到国外去寻找供大众消费的较便宜的商品（特别是谷类），以便使劳动力成本降低，使原料成本降低，从而减少使用

不变资本的价值。克里斯琴·帕洛克斯对于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在这些客观需要和国际贸易理论形成中的不同阶段之间的联系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对于来自资本主义早期的斯密：“（一）国外市场是剩余商品的出路，它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国内市场狭窄，在工业化阶段中国内市场的劳动分工是受到局限的；（二）国外市场本身就有可能扩大国内的劳动分工，如果只有国内市场这种分工是受到限制的。”李嘉图也关心对外贸易和产生剩余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在李嘉图的时代，“同斯密的估计相反，工业部门拥有巨大的基础，足以扩大各个市场来吸收工业剩余；李嘉图所支持的J. B. 萨伊的市场法则对这方面作出了定义；所以国内农业市场在消费工业产品方面只起次要的作用。……虽然农业部门不再被认为是吸收剩余的市场，只要……它通过收益递减律和工资不断增加的原因而堵塞利润扩大的道路，从而威胁到这种剩余增长的潜力，那么它就起到限制剩余产生的作用。……对外贸易的作用……是取代国内农业市场在提供劳动力所需的口粮方面的地位。”后来，“马克思提出把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所作的理论贡献结合起来，协调了‘吸收’观点（强调制成品出口）和‘产生剩余’观点（强调初级产品进口）。”在这个意义上说，对外贸易是制止利润率下降的一种方法：“对外贸易一方面使不变资本的要素变得便宜，一方面使可变资本转化成的必要生活资料变得便宜，它具有提高利率的作用，因为它使剩余价值率提高，使不变资本价值降低。”^①

竞争时代里中心国家资本主义的这些客观需要就是那个时期有关国家所遵循的经济政策的出发点：殖民征服以及为宗主国利益而打开受保护的市場，摧毁殖民地的手工业，为此目的而求助于政治手段（在这方面，印度的例子是能说明问题的），鼓励移民以及在北美洲西部和南美洲开发土地来生产小麦和肉类，等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64页。

在这个时期中，资本输出尚未被人知道是扩大市场的方法。因此，当资本输出在很少情况下出现时，它采取的主要形式仍然是投资于公债，而由中心国家最强大的金融机构来收取，例如借给埃及总督的贷款就是这样。

在垄断时代，这种扩大市场的固有倾向所表现的形式是相当不同的。从那时起，商品输出就伴之以资本输出。就中心国家的资本而言，国际经济关系（贸易和资本输出）继续服务于同样的职能，那就是：抵消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一）通过扩大市场和开发剩余价值率高于中心国家的新地区；（二）通过减少劳动力成本和不变资本。

在那儿以前，很少有任何资本输出。垄断资本的形成使大规模的资本输出从1870—1890年起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必须区分在外围地区的外国投资以及流向正在形成过程中的中心类型的年轻国家（美国和加拿大、俄国和奥匈、日本、澳大利亚、南非）的外国投资。这两种投资不论在职能或动力上都不一样。资本输出并不取代商品输出；相反，它给后者一个促进。它要使外围国家专业化的方式发生可能的改变。外围国家不是只出口农产品，而成为具有很高生产率的现代资本主义企业所生产的商品的出口国。今天，石油和粗矿物占外围国家出口的40%以上，而这些原料的初加工产品（加上主要对处在不同工业化水平的外围国家之间的贸易具有重要性的少数制成品）占15%以上。农产品——其中三分之二是粮食，但也包括工业原料如棉花、橡胶等等占余下的三分之一——今天在第三世界出口中最多占40%；而且它们不再由传统农业来供应了。这些农产品中至少有一半来自现代化资本主义种植园，诸如尤尼莱佛公司或者联合果品公司的种植园。因此，外围国家出口的四分之三来自现代化的高生产率部门，那是外围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心国家投资

的结果。外围地区的这种新的专业化是不对称的；所以外围国家几乎 80% 的贸易是和中心国家进行的，而中心地区内部的变化则和这一进程并驾齐驱，发展得更为迅速，其结果，中心国家 80% 的对外贸易是在它们自身之间进行的。中心地区内部的这些变化是不同类型的——主要是工业产品交换其他工业产品。

在产业革命和完全征服世界（1880—1900 年）之间有一个世纪之久，可是性质上只是一次小小的停顿：旧的形式（奴隶贸易、掠夺新世界）逐渐消失；新的形式（贸易经济和开发矿产资源）缓慢地形成。我们的印象是欧洲和美国在这个时期退守本土以完成从资本主义史前形式到工业形式的过渡。在这个时期中，产品按它们的价值（更确切地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意思，是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交换；中心国家的劳动力报酬极低，倾向于压低到维持生计的水平；（与英国制成品相交换的海外产品的）贸易比价朝着符合平等交换规则的方向发展。正是这种暂时局势决定了马克思设想印度会成为一个象英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马克思忽视了殖民地问题。

列宁所指的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在旧基础上发展的可能性已经枯竭的时候、通过欧洲与北美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完成而出现的。于是资本主义地盘在地理上进行新的扩张就有必要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外围地区是通过殖民征服而产生的。这种征服使不同的社会形态再次相互接触，但那是新形式的社会形态：中心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建立中的外围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有利于中心国家的原始积累机制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了。与正常的扩大再生产相对照的原始积累的特点就是不平等交换，那就是：交换的产品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生产价格是不平等的。从那时以后，接着劳动力报酬也变得不平等了。这种新的国际专业化就是要为商品交换（用一种肤浅的形容，就是“基本产品换制成品”）和资本运动

提供基础，因为第一次产业革命可能性之枯竭正好符合于垄断资本的形成(这使得资本输出成为可能)。

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商业与金融关系因此服务于同样的双重职能：一方面，通过牺牲前资本主义体系来扩大资本主义市场，为吸收剩余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是增加平均利润率。在竞争时代，重要的是这两种职能中的第一种，因为把中心国家的工资保持在相对低下和停滞的水平上(无论如何压低在大约1860年的水平上)，是和自主中心积累模式的客观要求——即：劳动力报酬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平行增长——相矛盾的。所以，资本主义市场的向外扩张作为实现剩余价值的一种手段，是极其重要的。1880年以后，垄断资本创造了所需要的条件，首先，随着公司之间不再靠削价竞争，就使中心国家的工资随生产率提高而提高，这是自主中心积累所要求的；第二，使得对外围国家大规模输出资本成为可能。这些变化的第一点使外围国家在吸收机制中的地位下降。可是，与此同时，它加强了第二种职能，即：提高利润率的水平(利润率水平在中心国家倾向于较快下降)。这通过资本输出就有了可能，资本输出能使各种形式的生产在外围地区建立起来，那些生产虽然是现代化的，但却享有低工资成本的好处。就在那时，不平等交换出现了。

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能力增长快于消费能力的倾向，这种倾向要不断靠降低利润率的办法来加以克服——从中心地区转移到外围地区，并从中心地区的国家形态转换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范围。

帝国主义时代本身可分为两个时期：1880年至1945年，以及自1945年以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殖民制度把古典形式强加于国际分工。殖民地提供贸易经济的产品(“热带”农产品)；欧洲的资本投在采矿业以及同这种殖民剥削有联系的第三产业部门

(银行业和贸易、铁路和港口、公债,等等);发达的中心国家供应消费制成品。这种制度对外围地区具有特别的贫困化影响而且一定会导致一种初级型式的“受阻塞的发展”,那是明显的。而且,在1880—1914年这一段欢快而短暂的初始时期以后,资本主义就经历了最为停滞不前的时期之一,那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备战和战争很快成为这一困难的唯一解决办法。

在1939—1945年大战之后,中心国家的资本主义开始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期,那是以西欧的彻底现代化为基础的,西欧在大战期间更加落后于美国了。与此同时,殖民征服被动摇了。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大批轻工业在欧洲以外建立起来,这表明一种由本地生产原先靠进口的商品的政策。但是一切仍继续在世界市场的结构内活动,只是国际专业化的形式改变了。在这种情况下,增长受到阻塞是不可避免的。当前时期是以资本主义体系发生三大重要的结构变化为标志的,那就是:(1)在世界范围活动的巨型跨国公司的组成,它们的活动是通过大量分散的机构进行的;(2)一场技术革命的影响把未来工业的重心转向新的部门(原子能,空间研究,电子),使得以增加资本有机构成为特点的古典积累方式过时;“后效因素”——“智力”——成为增长中的主要因素,超现代化的工业以“劳动力有机构成”著称,这种有机构成给予高技术劳动力以大得多的地位;(3)技术知识集中于这些巨型跨国公司内。

这种新形式的垄断资本给外围地区带来重要的后果。从此以后,有形资本的投资作为取得额外剩余价值以增加垄断资本利润率的一种手段,失去了它的重要意义。技术统治越来越适合于完成这一任务。因此,利润从外围地区向中心地区的回流将要增加,不发达国家将要成为中心地区的资金来源。与此同时,技术革命将有可能造成一种新型的不平等的国际专业化。

在过去二十五年中,资本主义体系的动力背后就隐藏着这些

变化。然而，这种动力不是和谐的同义语。它的表现是中心与外围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以及中心地区各个国家形态之间的对抗重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次日所组织起来的、以美国位于最高点的阶层结构，随着欧洲与日本在长时期繁荣后成功地赶上而受到挑战。世界货币危机反映了这种新的发展。

大繁荣时期将会告终吗？看来是这样。在外围国家中，“进口替代”的可能性正在枯竭，这表现在工业化和增长显著地放慢。在中心地区的西方国家中，半永久性的收缩紧张正在重现，加上“国际清偿能力危机”，这似乎表明会发生停顿。但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无疑能够克服这种局面：它正在从两个方向寻找解决办法，这可能会决定国际专业化的未来形式。

这些方向中的第一个是把东欧结合进中心地区的内部交换网，以及东欧的现代化不论是在苏联控制之下，或是通过“独立的”国家政策（例如，按照南斯拉夫的模式）。第二个可能的方向是第三世界在古典型工业生产（包括资本货生产）方面实行专业化，而中心地区则保留超现代化部门的活动（自动化，电子，征服空间，原子能）。换句话说，外围地区将接受一种新形式的不平等专业化，从而使世界体系的不平衡发展延续生存。

这些就是不同形式的（过去的，现在的，或许还有未来的）不平等国际专业化，它总是构成有利于中心国家的原始积累机制。正是这种机制（表现为劳动力报酬日益增大的差距）使外围地区的不发达永久化并且加剧。与此同时，这种“不发达的发展”表现为外围形态所特有的国内矛盾的加剧：外围国家经济中部门生产率之间日益拉大的差距，在分析不发达的社会形态的时候这是必须考虑的。在每一个这样的阶段中，资本主义表露出它扩张主义的倾向：第一阶段是商业扩张主义，然后是帝国主义（按照列宁对这个词的含义），现在是后帝国主义。

第四节 外向积累和依附性

在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在自主中心积累过程中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品生产之间相互补充的关系占据中心地位。从这种关系中看到了另一种关系，把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劳动生产率)同剩余价值率(所以也是实际工资水平)联系起来。后者关系是基本的：只靠它就可以使我们掌握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性质以及自主中心积累概念的性质。

自主中心积累并不意味着闭关自守。相反，我们已经看到外贸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不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方面，在重商主义时代，而且在产业革命以后。可是，外贸在这里从属于自主中心积累的要求，并成为达到这一点的一种手段。换句话说，自主中心经济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强加一种不平等的国际专业化。

如果我们从外围的角度来察看这种不对称的关系(这种关系服从于这种不平等的专业化)，我们将发现一种根本上不同的积累模式。

在外围地区，我们从一开始就发现出口部门注定要在产生和形成市场方面起决定性作用。中心国家形态的资本并不是因为在中心国家缺乏出路而被迫转移的：它只是在发现外围地区有较高报酬的情况下才转移到外围来的。利润率的平均化将重新分配这种较高报酬的好处，并且显示资本输出是抗击利润率下降趋势的一种方式。在外围国家建立这种出口部门的原因，就是要用低于中心国家生产类似产品或代用产品(有关咖啡或茶叶等特殊产品)的价格来获得构成不变资本(原料)或可变资本(粮食)成分的产品。

外围地区出口的产品使中心地区资本主义感到兴趣，那是由于——在一切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即在生产率相同的情况

下——那里的劳动力报酬低于中心地区。而且，只要外围社会在一切现有条件(经济的和超经济的)上都从属于为出口部门提供廉价劳动力的这个新职能，那么它的劳动力报酬还会更低。

当一定的社会从属于这种新的职能，它就失去了它的“传统”性质：的确，那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提供廉价劳动力的职能。……中心国家积累过程所特有的那种主要关联——劳动力报酬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间存在一种客观的关联——已完全不见。在这里，出口部门的劳动力报酬是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所容许的最低水平。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那是不均匀的，而在自主中心模式中则是均匀的：出口部门是先进的(有时极为先进)而其他经济部门则是落后的——由制度所保持的这种落后是出口部门可以从廉价劳动力得利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出口部门发展所产生的国内市场将是有限的和畸形的，到头来，外围地区从中心地区只吸引到数量有限的资金，虽然它提供较好的收益。通过中心地区市场扩大和外围地区只发挥边际的、从属的和有限的职能，总的世界体系范围内的消费能力和生产能力之间的矛盾被克服了。

然而，在出口部门已经达到某种增长水平以后，的确出现了一个国内市场。和中心国家所产生的市场相比，这种市场欢迎奢侈品需求而不是大众消费品的需求。如果投入出口部门的所有资本都是外国的，如果这种资本的所有利润都汇回中心国家，那么国内市场就完全由大众消费品的需求所组成，它和低廉的劳动力报酬一样是很受局限的。但是这种资本中有些是当地资本。而且，保证劳动力报酬低下所使用的方法依靠的是加强那些象传送带那样活动的寄生性社会集团：大庄园主、富农、买办贸易资产阶级、国家官僚，等等。国内市场就这样主要依靠这些社会集团对奢侈品的需求。

一种特殊的关联——表现为出口部门同奢侈消费之间的联系——因此成了这种依附性外围积累模式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特点。因此，生产商品以取代进口品的工业化开始于末尾而不是初起；换言之，开始于中心国家最先进发展阶段的产品，即耐用消费品。现在，这些商品需要大量资金和稀缺的资源。其结果将使资源分配的过程出现显著的畸形，有利于这类商品而有损于大众消费品的生产。后者的产品找不到多少需求，因此吸引不到财力或人力而使它有可能实现现代化。这就是自给性农业停滞的原因。只要选择以“有利可图”为基础的发展战略，在收入分配结构、相对价格结构以及需求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必然导致这样一种畸形。在这种背景下建立的少数工业不会成为发展的中心，而相反会加剧体系内部的不平衡，使人民大众贫困化（他们作为生产者，属于生产大众消费品的部门），与此同时，使少数人更加紧密地结合进世界体系。

从社会观点来看，这种模式导致一种特殊的现象，即：群众的“贫穷化”——换句话说，导致若干贫困化的机制：农业小生产者和手工业小生产者的无产阶级化，农村的半无产阶级化，以及组织在村社里的农民趋于贫困化而没有无产阶级化，城市化，城镇地区公开失业与就业不足的大规模增加，等等。总的说来，就业不足趋于增加，而不是保持有限和稳定的状态，除了由于危机时期的波动以外。因此，这里失业的机能不同于中心国家模式中的情况：在这里，失业的压力保证劳动力报酬趋于最低限度并比较僵化，而且防止其增加，这在出口部门和奢侈品供应部门都是这样。这里的工资并不表现为既是一种成本又是能产生对模式运转很重要的需求的一种收入，而仅仅表现为一种成本，需求则来自其他方面——或者来自国外，或者来自社会特权阶层的收入。

尽管经济实行越来越多的多样化或工业化，发展的“外向”性

质却永久存在着，这种外向性并不来自依附性外围积累模式的外部。相反，这种模式在运行中能再生产它的社会与经济条件。群众的贫穷化保证少数人收入日益增加而使他们能采取欧洲式的消费模式。这种消费模式之扩大带来了奢侈品生产部门的利润并加强了特权阶级在社会上、文化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结合。

在这个多样化和不发达深化的阶段，就出现了新的统治和依附的机制。那是文化上，政治上，也是经济上的：技术依附以及受跨国公司的统治。出口部门和奢侈产品供应部门需要花费资本的投资——那只有寡头大跨国公司能够承担，这就造成了技术依附的物质基础。

可是，更加复杂形式的财产结构和经济管理也出现了。历史的经验表明本国私人资本往往参加(即使只是次要的力量)旨在以本国生产替代进口的工业化进程。它还表明，无论如何在大国中，出口部门和奢侈产品供应部门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市场，因此使它有可能建立一个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这往往是由国家创始的。可是，基本工业和公共部门的发展并不意味着该制度正在向充分发达的自主中心的形态发展。因为，这个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在这里不是为发展大众消费品生产服务的，而是为发展出口部门和奢侈品生产部门服务的。这种分析不能不使我们提出这个基本问题：为谁的利益而发展？为群众利益的发展政策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资源分配的优先项目作为基础，就是要反对一味追求利润的规则。过渡战略的意义即在于此。

从另一个观点出发，我们看到，在外围地区的外向资本主义经济中，可以不用阻碍那里的外向发展而使工资处于很低的水平。自主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往往变得排他性的，而外向限制了它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自主中心经济和外向经济所构成的“一对”，其意义何在呢？这意味着：在自主中心经济中，社会矛盾的两

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有一种有机的关系，双方都结合在同一个现实(即国家)之中。相反，在一个外向经济中，这意味着：这种对立统一不能在一国的结构范围内理解，而只能在世界范围理解。

对世界体系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根本法则进行有区别的分析，必然导致一些结论，对资本主义未来的整个中心问题提出疑问。不可能把这些法则的影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不谈它们的政治意义，那样就会否定生产关系在根本上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直接有关经济方面的，那就是存在着不平等交换，这意味着价值转移。如果认为这涉及到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而没有意义，那就表明把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的分析也认为是荒谬的了，因为马克思谈的也有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如果认为不平等交换的理论意味着“中心地区的工人剥削外围地区的工人”，那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只有占有资本才有可能剥削。(这也意味着在生活水平和政治态度之间的关系上接受一种机械的看法，从而把基础结构和上层建筑的辩证法降低为直接的经济决定论。)从不同的观点来看，如果认为这意味着外围国家的资产阶级象那里的无产阶级一样，也关心于摆脱中心国家的统治，这表明他已经干脆忘记这个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是尾随着中心国家的资产阶级而形成的。

应该说，不平等交换意味着阶级斗争的问题必须从世界范围来观察，意味着民族问题不能认为只是伴随着主要的“纯”阶级斗争问题的附带现象。它意味着，中心国家的资产阶级(唯一存在于世界体系范围的资产阶级)剥削世界各地的无产阶级——中心国家的和外围国家的——而剥削外围国家的无产阶级尤为残酷，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自主中心经济中资产阶级与本国无产阶级联系的统一性所根据的客观机制(这限制了资产阶级在中

心国家进行剥削的程度)在外向性的外围国家并不起作用。

世界体系的组成及其所具有的特点，不但使社会主义趋势有可能在外围地区发展，而且还把社会主义力量的主要核心从中心地区移向外围地区。事实是：社会主义方向的转变只在世界体系的外围地区突破。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在世界体系中已经发生的变化，最终会否认世界体系的存在并忘记结合进世界体系的外围地区已经很大程度地无产阶级化了。查尔斯·贝特尔海姆在他的《致罗莎娜·罗珊达》信中写道：“我认为非常重要是要……在毛泽东的思想和‘第三世界’倾向之间划出一条极其明确的界线，后者把所谓的不发达国家看成是被发展‘束之高阁’的国家或者仅仅是落后国家，而事实上它们是帝国主义统治的产物，帝国主义改变了它们并把它们结合进帝国主义体系，它们在其中起的肯定作用是作为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的后备军。正是这种作用使这些国家的群众准备革命，不论那些群众是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还是已经无产阶级化而能作为无产阶级政策的执行者。”

第四章 不发达的起源与发展

第一节 向外围资本主义过渡的理论

马克思关于非欧洲社会的著作并不多：400页稍多一点，大部分是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内容集中于一些专题事件——印度的兵变*，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鸦片贸易，等等——而且时常只从英国国内政治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马克思只以次要方式讨论了亚细亚社会的问题以及这种社会因殖民奴役的结果而发生的变化。实际上他接触了三类问题。

马克思不时讨论到殖民统治前“亚细亚”社会的性质，很明显的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书中的一段文章里，他系统阐述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他强调村社——换句话说，没有土地私有制——在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造成的障碍。当我们回顾当时关于非欧洲社会的情况时，可以看到他对此表现的真知灼见。

马克思在谈到殖民统治使这些社会，尤其是印度，发生的变革时，认为这会导致东方的资本主义全面发展。他指出，殖民主义政策确实是反对这一点的，它使手工业遭到破坏之后阻止现代化工业在殖民地建立起来。但是，他认为，任何力量也不能长期阻挡当地按欧洲模式发展资本主义。专门论述“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的文章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印度被英国贵族和商业资本掠夺以后接踵而来的是宗主国资产阶级进行的工业化；铁路将使得自主中心的工业兴起。马克思对此非常肯定，他担心一个发达的资

* 1857—1859年由于东印度公司的管理权移转给英王而引起英印军队中印度士兵的兵变。——译注

产阶级的东方可能最终会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在欧洲的胜利。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写道：“大陆上革命已经迫于眉睫，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由于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革命在这个小小角落里不会必然被镇压吗？”^①

事实上，垄断资本（它的出现是马克思不能想像到的）就是要阻止可能从竞争中产生当地的资本主义。外围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是外向的，它建立在国外市场的基础上，因此不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外围地区充分发展。马克思是在殖民主义早期写的，所以他只看到有利于中心地区进行原始积累的机制，中心地区当时处在重商主义阶段并正在趋于结尾，所以他认为属于资本的史前阶段。

可是，马克思确实隐约看到了另一个可能的结果——有利于中心国家的东方社会的无产阶级化，而中心国家包括无产阶级在内却“资产阶级化”了，外围国家则成为主要的革命力量。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写到“……为了使同行的150万英国工人在十年中得到三年繁荣而不得不卖命于东印度群岛的几百万工人……”^②。

关于向外围资本主义经济过渡的理论，我提出下列九个论题：

一、经济理论本身偶尔涉及“从自给自足经济向货币经济过渡”的一些问题。可是，实际上向外围资本主义过渡的方式根本不同于向中心资本主义过渡的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贸易手段从外部对前资本主义形态发动的进攻造成了某些严重的倒退，例如手工业遭到破产而没有被当地工业生产所代替。今天第三世界的农业危机主要是这些挫折的结果。由于外国资本在外围国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4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36页。

建立的工业的外向性，后来外国资本的投资并没有产生纠正这些倒退变化的效果。

二、不平等的国际专业化以三种畸形的形式表现在外围国家的发展方向上。向出口活动的畸形发展(外向)是决定性的，这并不是“国内市场不充足”所造成的，而是由于中心国家在各个领域里具有高生产率所造成的，这种情况迫使外围国家成为产品的补充供应地的作用，因为它们拥有生产这类产品的有利的自然条件：中心国家所没有的农产品和矿物。由于这种畸形的发展，在生产率相同的情况下，外围国家的工资水平却低于中心国家，因此外围国家有可能集中在国内市场上有限地发展工业，而与此同时，交换将会是不平等的。后来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加上跨国公司内部新的国际分工的(初始)影响，即使改变了外向的形式，却未能改变外向的基本条件。

三、这种最初的畸形接着带来另一种畸形：外围地区第三产业部门的过度膨胀，这种情况既不能用需求结构的发展也不能用生产率的发展来加以解释。在中心地区，第三产业部门的过度膨胀反映出垄断高级阶段所固有的实现剩余价值的困难，可是在外围地区这种情况从一开始就是由于外围发展所特有的局限性和矛盾所造成的：不充分的工业化和日益增长的失业，地租地位的加强，等等。尤其在行政开支过速增长中表现出来的非生产性活动的这种过度膨胀是对积累的障碍，今天通过政府财政的准长期危机而在第三世界显示出来。

四、不平等的国际专业化还成为外围地区向轻工业活动部门畸形发展的基础。并成为这些部门使用现代生产技术的基础。这种畸形是支配外围地区发展政策的特殊问题的根源，外围地区的发展政策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政策。

五、投资乘数效应理论不能机械地沿用于外围地区。凯恩斯

主义的乘数的意义确实符合处在垄断高级阶段的中心地区的情况，其特点是难以实现剩余。在外围地区，囤积或进口都不是减少乘数效应的“漏洞”。抵消这种效应的是外资利润的外流。而且，不平等专业化以及由此而来的显著的进口倾向产生了使乘数机制与称为“加速器”的现象相联系的效应从外围向中心转移的效果。

六、对外国垄断资本在不发达国家的战略所进行的分析表明，只要外围结合进世界市场的教条不受到批驳，外围就没有对付垄断势力的经济手段。

七、不发达并不是表现在人均生产水平上，而表现在某些特有的结构性特征上，这责成我们不要把不发达国家同现在发达国家当初的早期发展阶段相混淆。这些特征是：(1)外围地区的生产率分布以及从中心地区转来的价格制度的极其不平衡是外围地区的典型特征，这是因外围形态的不同性质所造成的，而且这主要决定了外围形态中收入分配的结构；(2)按照中心国家的需要调整外围国家的生产方向所造成的脱节阻碍经济进步的好处从发展的两极传向整个经济；(3)中心国家的经济统治表现为国际专业化的形式(在世界贸易的这些结构中，中心国家根据自身的需要来塑造外围国家)，并表现为外围国家的经济增长依靠这种结构取得资助的依附性(外资积累的动力)。

八、按照外围地区经济增长所进行的程度来加强不发达的特征，必然导致阻碍增长，换句话说，不论人均生产达到何种水平，都不可能转变为自主中心和自我推动的增长。

九、在中心地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往往是排他的，而外围地区的情况则不是这样。因此，外围形态根本不同于中心形态。这些外围形态所采取的形式一方面决定于那里以前存在的前资本主义形态的性质，另一方面取决于它们被结合进世界体系的形式和

时代。这种分析使我们能掌握外围形态与“早期中心形态”的根本不同——后者的基础是简单商品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因此它具有独立演变成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能力。不论外围形态的起源多么不同，它们往往都集中在一个典型模式上，其特点是农业资本和附属的(买办的)商业资本占统治地位。中心国家资本对整个体系的控制以及这种控制所表现的为自身利益而进行原始积累的重要机制，使外围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严格的限制，这最终取决于政治关系。外围地区的民族社会不健全使当地的官僚机构具有比较明显的势力和特殊的作用，这不同于中心地区的官僚社会集团和科技治国社会集团的势力和作用。不发达发展的典型矛盾以及反映这些矛盾的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兴起，说明当前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倾向。外围地区的这种新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而是表明中心与外围之间组成新关系的未来形式。

第二节 不发达经济社会的外向性

外向性不能归结为不发达经济社会出口活动数量上的重要性：随着“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外向性有了新的形式。可是，到目前为止，出口活动在数量上的优势仍然是不发达世界在当前事实中的典型情况。我们已经看到，如果我们把发达国家看作一个整体，把不发达国家看作一个整体，在它们之间进行的商业交换中后者得到较大部分的收入而前者得到较小部分收入。但是这种经验主义的看法是不合适的。在财政资源(直接投资、为出口地区和部门服务的基础结构，等等)和人力资源(根据结合进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需要来安排培训和教育，等等)的分配方面偏向出口活动，使外向性具有质的一面并使出口部门凌驾于整个经济结构之

上,这是由国外市场的需要所决定的。

外向性的历史根源

殖民地贸易。 在欧洲,农业革命是产业革命的先导,它解放了部分的农村劳动力,产生了无产阶级,同时为支持城市提供剩余而为自主中心的工业化创造了条件。新工业摧毁了旧的手工业,但同时从后者吸收了劳动力。虽然这种双重过程伴随着贫困和失业,但是它代表生产力发展的一种进步,向中心资本主义过渡的这种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经济平衡,同以前存在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平衡相比,是一种更高的平衡。

向外围资本主义的过渡遵循一种不同的模式。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绝不是引进新制成品并使农民为满足新需求而生产出口农产品的自发结果。正如雷伊和梅拉苏的著作已经表明的,这是由于严格的经济机制不足,因为传统的社会结构阻碍商品交换的扩展:例如,村社的活力(坚持全体村民有权使用土地)使得简单的竞争机制不起作用,而这种竞争机制在欧洲从封建主义过渡到中心资本主义经济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政治当局——这里是殖民当局——关心的是刺激一般所谓的“原始经济的货币化”。这里意味着使用纯粹的、简单的暴力手段,所以也是原始积累的手段。以货币形式纳税的义务是最广泛使用的方法。可是,同样在这方面,我们不应忘记“强制作物”:例如在赤道非洲的“司令官田地”里要强追栽种出口作物。在最极端性的事例中,种植农被干脆剥夺土地:建立狭小的“土著保留地”就属于这一内容,其目的是使非洲农民不得不向欧洲人拥有的矿山、工厂或种植园去出卖劳动力。这在南非、罗得西亚和肯尼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雷伊把这个过渡阶段的整个经济与政治关系称之为“殖民地生产方式”。

特殊的畸形出现了，它改变了原来的社会，消灭了它的传统特性。总的说来，传统方式中体现剩余的“门第声望”从此可以买卖了。例如，社会集团之间妇女嫁娶伴随着全部财产的转移，即为一例。前资本主义关系的这种商业化是资本主义关系渗透的一个强大因素。它迫使人们去追求金钱，因此，要不成为商品生产者，要不就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土地也往往成为私人转让的财物，成为一种商品，地租就出现了。

在欧洲，向商品经济过渡的同时，随之出现生产力的进步，因为这一过渡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可是，现在正在考虑的这些事例中，情况却往往是：人均产量的增加伴随着劳动投入量的增加。赤道非洲的农业就是这样，在那里，出口作物的发展总是附加于传统自给作物的发展而并不取代后者。因此，以某种年度劳动力贡献为基础的文明被一种以更大贡献为基础的文明所替代。这种过渡是痛苦的，有时被有关力量所抵制：因此就要使用诸如强制种植某些作物这样的超经济手段。大规模土地所有者赞成从自给自足农业向商品生产农业过渡，在很大程度上吞没了上升的利润而在农业生产率上没有多大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得到的最初货币收入只创造了对本国产品不大的需求，主要只涉及对进口品的需求。同本国产品有关的商品交换领域的扩大因此发展很慢。

传统方式的这种畸形把一部分人口逐出土地，使他们无产阶级化，但是并没有创造一种需求来为这部分过剩人口提供就业——他们是由于前资本主义结构屈从于外国资本的需要而造成的。缺乏一种通过自主中心工业化的出路，是增加“对土地压力”的原因，这在第三世界是很常见的。农村人口密度的增加导致农业技术的倒退，因为农业的进步通常是以每公顷土地使用较多资金和较少人力来表现的。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和地租的提高反映了

这种农业危机，并使这种危机长期存在和不断加深。因此，经济的外向性注定使农业陷于停滞，有时甚至陷于倒退。

在手工业工人兴旺发达的地方，由于进口制成品的竞争而挤垮手工业工人的情况就带来又一次倒退，这和欧洲的情况适成对照，在欧洲，手工业被当地工业所挤垮后出现了进步。印度和埃及手工业破产的历史已经由杜德、克莱尔蒙特和伊萨维撰写了。在欧洲社会里存在着保证劳动力就业的新的平衡，而在第三世界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则是一种倒退的平衡，把一部分劳动力排挤出生产体系。

外国投资。不平等交换的条件——即不发达的再生产——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前资本主义农业关系的畸形以及手工业的破产造成了没有工业化的城市化。一端是劳动力报酬的低下，另一端是资本的集中，促使外国资本在外围国家建立用于出口的现代生产部门。

肯定地说，美国私人投资中有 50% 以上在最近二十年中投入了油田和采矿业，而英国的海外资本中只有三分之一投入直接的出口活动：公共服务、铁路、贸易和金融共占英国海外资本中的很大一部分。至于法国，投入第三产业的资本比例就更大了：在十九世纪，它的海外投资大部分流向政府贷款、公共服务、贸易、铁路和银行业。可是，很快就看清，接受来自中心国家大部分资本的部门（主要是第三产业）以及种植园和矿山主要都是同出口经济有联系的，它们是后者的必要辅助部门。大部分交通工具（铁路、码头等等）、商业和银行也是这样。肯定的一点是，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外资根本不会吸引到为国内市场生产的工业上去：外国投资中流入这些部门的部分约为不发达世界外国投资总额的 15%。

在外围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石油生产国、经营采矿业的国家和一些种植园经济的国家），大量外国投资直接流向出口部

门。在另外一些以本地农业为主要出口活动的国家，这种投资集中在“辅助性的”第三产业部门。结果，外资渗透的程度很不平衡。例如，采取国有化措施之前的古巴（典型的种植园经济）和扎伊尔、赞比亚、智利（典型的矿业经济）接受的外资按人均计算比巴西、印度尼西亚、塞内加尔、印度或埃及高 5 倍至 30 倍；石油生产国接受的外资就更多了。

在外围地区的第二类国家中，本国资本中一大部分投在出口活动，这些投资以改良土地的分散投资形式出现时，其数量往往被低估。因此，在埃及，出口的主要来源农业，自 1882 年至 1914 年吸收了全国总投资的 30%，自 1914 年至 1937 年吸收了 12%，自 1937 年至 1947 年吸收了 14%，自 1947 年至 1960 年吸收了 4%，自那时以来建造了阿斯旺水坝就吸收了更高的比例。这些投资对增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无论如何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从那时以后，生产过去靠进口的商品的轻工业发展起来接替了经济动力的作用：1882 年，农业吸收全国资本的 58%，1914 年吸收了 48%，1960 年吸收了 21%。法属北非的垦殖者农业是另一种出口农业，吸收了一大部分（虽然在不断减少）投资：阿尔及利亚自 1880 年至 1955 年为 50% 至 20%，突尼斯自 1910 年至 1955 年为 45% 至 22%，摩洛哥自 1920 年至 1955 年为 26% 至 13%。甚至在赤道非洲，对农业开发的投资同对基础结构的投资相比仍然较少，本国资本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在象牙海岸，自 1950 年至 1965 年，出口农业吸收现金投资的 17%，未考虑开垦工程方面的传统投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老的欧洲中心国家的资本输出中有相当大部分用于购买其他国家的公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和北美的大金融中心所持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公共债务约占这类债务总数的 40—100%，占外国投资的 15—70%。

这类投资大体相当于花在基础结构方面的公共开支，这是由于外国国家结合进世界市场而造成的，其中一例就是埃及总督伊斯迈尔所从事的巨大灌溉工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后来所谓的“援助”的使用方向虽然各国不一样，却往往更多地注意资助工业，包括为国内市场生产的工业。苏联的政策在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使得西方改变了它自身的态度。可是，情况仍然如此，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制订的主张规定投资应有利于改善国际收支以保证贷款及利息偿付。现在苏联自己几年来也已经采取这种态度了。这对于转向外部市场的畸形发展赋予了一个新的方面，其背景是容许外围国家取得某些过去得不到的工业活动的国际专业化。

当中心与外围之间最初开始接触时，如果实际工资(或劳动力实际报酬)相等，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中心国家可以出口，而在各方面都没有竞争力的外围国家则除了出口(中心国家所缺少的)异域农产品或矿物原料以外，不能出口其他东西。国际交换就是以这种形式开始的——首先是异域的农产品，后来随着洲际运输费用大大减少而以矿物原料，这需要外国资本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投资。

随殖民地贸易而来的是出现了外国资本的飞地，尤其在采矿部门，这和以前的殖民地交换相比，对当地产品并未产生更多的货币需求，因为这类企业分配的基本收入大部分消失在外部“泄漏”中了。外国企业支出中的很大部分直接进入了国外市场——购买工厂以及汇出利润。而且，当新工人需要的制成品依靠进口时，当地支付的部分工资就流向国外。这些工资中只有一部分进入当地的需求(主要是购买食品)；这对商品关系的扩大有重要贡献。

例如，关于在几内亚开采铝土矿的情况，总投资费用中只有12%以及出口铝的总值中不到25%留在该国。关于在阿尔及利

亚撒哈拉开发油田的情况，由投资所产生的当地支出不超过总额的 44%，而且这些当地支出中的一半最后又转变成进口。当地费用占当时石油出口值的部分就更少了——不到 22%。

至于大规模采矿或油田开发的情况，留在国内的“最初货币开支”中的主要部分最终就是国家得到的收入，或者是以矿区租用费的形式，或者是作为税收（直接税和间接税）。

进口替代的工业化。第三世界的工业化遵照的是进口替代的模式，它的发展进程是从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上升”到生产半成品的工业，然后再到生产设备的工业，而在中心地区，工业化的进程则同时包罗一切形式的工业，它并不从生产重型设备的工业“下降”到生产消费品的工业。

外围地区的工业化发生较晚——拉丁美洲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洲和非洲是在 1945 年以后。延迟的原因不能归于市场薄弱，劳动力报酬低下而造成的，因为这本身并不构成工业化的障碍。市场并非只由消费品所组成，在那里，生产资料也起重要作用。低工资意味着高利润，因此这有可能使企业主进行储蓄和投资，也就是说，可以开辟市场。在欧洲，工业化是在一开始工资极低的基础上发生的，日本的情况也是这样。当建立在外围地区的企业生产率类似于中心国家的企业的生产率时，低工资就可能带来高利润率。但是，劳动力报酬之间的差别只在中心国家工业集中化进展顺利的时期才足够紧要。在这些情况下，向海外各国输出商品的垄断集团同时也就是在那些国家输出资本的集团。它们力求使它们的全部活动（在中心以及在外围）都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这促使它们愿意在外围国家的出口生产部门进行投资。至于本地资本，它们集中程度不足，并且没有达到使之能与外国垄断资本竞争的规模，因此它们在可能情况下就选择那些非竞争性的补充部门，例如买办贸易或服务部门。

只要存在一个以当地市场为中心的工业，面临的是一个性质畸形的市场，这个市场工资水平低下，它是根据特权阶层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根本无视于广大群众的需求。而且，进口替代工业使用的是现代技术，这种技术使用资本过多而未能吸收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侵入而产生的失业，从而再度产生劳动力大量供应而使工资低下的市场条件。

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普遍化为外国资本提供了新的机会，但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外围经济的外向性。外围国家开始生产以前需要进口的消费品，它就愿意以资本货和中间产品的进口来取代消费品进口。一个自主中心的战略必须建立在同时生产消费品和资本货的基础之上。对外贸易(出口和进口都一样)应当包括消费品和生产设备，以此建立平等交换的条件。

跨国公司内部的国际分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跨国公司的特点是生产活动分散在世界各地。它的机构遍布五大洲，因此往往在整体上实行一种垂直结合的模式。这些机构提供各类产品，对这些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是“消费时代”的典型特征。这些都是耐用商品(家用电器、电气和电子设备、车辆，等等)，总是可以醒目地看清特定的商标，并且具备需要的售后服务组织。这些商品的不同生产阶段在国际上广为分布，表明真正出现了一种世界性的生产过程：体现在生产交换中的旧国际分工正在被一种公司内部的分工所取代。

对公司一整套活动的地点选择是根据在生产率相同的情况下对工资进行的比较。在东亚，纺织工业每小时的工资为10美分至30美分，而美国同样生产率的每小时工资为2.40美元(或者等于前者的8倍至24倍)；在电子工业方面，比例为1:7。因此，在劳动力低廉的国家里建立那些需要比较最大数量劳动力的生产“环节”，是符合这些公司的利益的。

从国际分工的观点来看，这种分散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的一种新形式的不平等。在中心国家集中的是战略性活动，就是术语所谓的“软件”（技术研究和革新、管理）、这种和那种形式的智能以及最复杂类型的重要设备的生产、那些需要高度技术工人的东西。外围国家就搞“硬件”——就是在进口设备的帮助下只需普通工人的产品的生产。因为，虽然名称叫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在发源地和最高层管理方面仍然是有国别的。通常是美国的公司，较少的是日本的、英国的、或者德国的。在旧的分工中，不发达国家供应原料，发达国家提供制成品；这正在被一种不同的分工所取代，即：不发达国家供应初级产品和制成品，而发达国家提供设备和“软件”。这种分工加强了决策当局和技术革新集中化的作用。从而它再生产自身的条件，把世界劳动力市场分裂为严密的、劳动力报酬差别很大的各国市场。把这种情况转移到公司内部，就加深了不平等交换。

这种新的不平等的后果有几方面。首先，这种国际分工使外围国家丧失了自身发展的任何主动性，从而不仅使消费方面“赶上”的机会，而且使获得某种独立性（即便只是某种文化和政治秩序）的机会都化为乌有。然后，它增加了从外围向中心的价值转移。仅仅有形的转移就为数巨大，它采取了资本报酬和“软件”开支的形式，它来自对一些具体设备的垄断。联合国贸发会议把这些转移同技术控制联系起来，估计它们的年增加率为20%。这种分工使外围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分裂。通过和中心的直接联系更为集中以及许多不同地区之间的从属性联系更为分散，外围之间失去联系的情况增多了，这导致“小国”之间的竞争并削弱它们的谈判力量。跨国公司加深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它们重新产生类似的结构而不可能在比较广阔结构的经济领域内发展起相互结合和补充，这却是这些国家独立发展所必要的条件。在地区、部

门、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不平衡方面，向少数存在最大数量“外来储蓄”的城市的集中化加重了现有的畸形，特别是城乡之间的畸形。在经济不发达国家雇用一点儿劳动力，不让农业和落后部门实行变革，这些做法无助于解决失业问题；相反，它们加速了所在社会的脱节而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

国际分工的这些新趋势在整个第三世界尚不很明显。只是在东亚(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和墨西哥，才已有可能对其后果进行研究。发源于美国、日本和英国的向这些地区的“外迁工业”，在六十年代期间足够系统地保证制造业以非凡的速度增长——年增长率在 16% 至 35% 之间——并保证以这种类型的工业化为基础而使生产全面增长，年增长率从 7% 至 10%。这五个国家和地区本身代表第三世界制成品全部出口的几乎四分之三，总额约为 44 亿美元。它们的工业品出口到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市场。它们主要是轻工业(纺织、服装、皮革制品 16 亿美元；食品和饮料 8 亿美元；木制品和家具 4 亿美元；等等)。但是这种发展集中在少数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事实，排除了扩大到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可能性。

上述五个国家和地区已经被西方列为第三世界的模范，以对付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但是，这些希望已经破灭。尽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大量增加，它们的国际收支仍然极为软弱。首先，因为对这类工业投资的专门分配是牺牲了农业和以国内市场为对象的工业的，因此那些部门的进口迅速增长。第二，因为设备和半成品进口的增加与工业化的发展速度相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因为有形和无形利润的转移基本上抵消了出口收益。当新资本流入放慢时，对外收支便恶化，重新产生堵塞独立增长的常见特点。虽然这些国家和地区取得了高增长率，但是它们没有一个接近于“起飞”理论的独立和自主增长的阶段。相反，

它们比二十年前处于更加依附的处境。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工业产生少数“半工人贵族”,按西方标准,在同样生产率情况下收入很低,但是与备受失业与临时工之苦的无产阶级化群众相比,他们则享有就业保障的特权。这种特权情况保证了无产阶级的驯顺,使得这个制度得以延续存在。而且,这些工业的模式排除任何技术进步,因为中心国家把需要熟练工人的环节保留在自己国内。最后,中心地区的资本加强统治阻止了民族企业资产阶级的形成。可是,这些工业确实产生了一个薪给专业工作者的中产阶级——经理人员、工程师、办公室职员——他们坚持自己所隶属的世界体系的消费模式和意识形态。移植在这类依附性之上的“精萃人士”意识形态以及民族文化的堕落使他们同意缩小由国家起决策作用的领域。

虽然在西方也能看到这些倾向,但它们不象在第三世界具有那种同样的决定性含义,因为它们移植在不同的历史阶层上。美国(还有英国)工业流向欧洲大陆,特别是意大利,并不改变那里已经建立的基本社会结构,并常常与当地资产阶级结合起来。而且,这种外流已经有效地放慢了美国和英国的增长率并产生了萧条区和失业。因此它包含了自身的局限性。它保证了美国在一定时期内对欧洲的统治,但与此同时,它为自身制造了挑战的条件。的确,欧洲和日本近年来的迅速增长部分地是由于工业的这种重新分布。因为这些历史条件不是第三世界的条件,这种复兴已经推动了一个进步和技术革新的浪潮,特别在日本和德国,这最后使美国统治地位告一结束。不可能把中心和外围之间关系所特有的统治和依附的不对称进程同中心内部的不平衡发展进程等同起来。

生产率的部门不平衡以及价格结构从中心传到外围

如果我们按部门一方面划分生产(增加价值),另一方面划分

就业的劳动力，并且比较一下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中的部门人均产值，看到中心国家人均产值全国平均数的相对集中以及这种数字在外围国家中的显著分散，我们会感到震惊。见下列由阿尼巴尔·平托制订的表格：

就业者人均总产值 (1960)						
	拉丁美洲				美国	英国
	现代部门	中间部门	原始	总计		
农业	260	60	18	77	47	93
采掘业	1,060	90	16	521	133	90
制造业	480	172	16	271	125	97
建筑业	208	68	22	87	120	99
主要服务	352	140	30	165	147	128
其他服务	428	80	31	96	90	98
总计	388	98	18	100	100	100

在拉丁美洲，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之间生产率总水平的比例达到极为悬殊的程度，1:11，而英国仅为1:1.4，美国为1:1.3。

实际上，这种现象就是由于我所谓的“生产率的部门不平衡”。当然，不可能比较严格意义上的生产率，而只能在生产同一产品的两家企业之间进行比较：如果一家企业生产一单位同样产品所需的必要劳动（直接与间接）总量少于另一家企业，那么可以说前者的生产率高于后者。伊曼纽尔提醒我们，在不同部门之间，我们只能谈不同的利润率。同样地，如果在同样的价格结构情况下，一个部门的劳动力或资本或两者不能获得象另一个部门同样的效率的报酬，我就要说前者的生产率比后者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要素的流动是显著的，那就是说，存在一个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其实际倾向就是各部门的劳动力和资本的报酬率趋于相同。可是，在中心国家使劳动力和资本得到相应的类似报酬的价

格结构如果转移到外围国家,其结果将是:如果技术条件(因此也是生产率)的分布不同于中心国家,那么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就不能得到同样数率的报酬。如果产品并不绝对同一,但至少在使用价值和采取的生产技术上可比,那么生产率的直接比较有时也是可能的。例如,在中心国家生产一公担小麦需要一定总额的劳动力(直接与间接),如果一公担小米——外围国家的产品,在使用价值(营养价值相同的谷类作物)和采取的生产技术上都可以与小麦相比——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那么这是因为外围国家的生产技术落后。我们谈到生产率的不同,那是有道理的。与此相对照,中心和外围的纺织业由于技术类似,所以生产率也会相同。当然,其他一些产品的生产率不可能作直接比较,例如只在外围国家生产的咖啡就不能同中心国家的任何产品相比。

现在,中心国家的价格结构事实上转移到了外围国家。因为存在着一个世界市场,中心国家相对价格的主要结构就不可避免地通过这个市场转移到了外围国家。

中心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同部门中,人均产值并无理由必须划一。因为这种产值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劳动力报酬和资本报酬,而人均产值如要一致,就得达到五个条件:(1)每个就业者提供的劳动量(例如,每年)应当相同;(2)劳动的有机构成(伊曼纽尔用语),即具有不同技术水平的各种劳动力的比例应当相同;(3)劳动力(同样技术的)的报酬率应当相同;(4)人均使用的资本额(资本的有机构成)应当相同;(5)资本的报酬率应当相同。

可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有一个精确地完成这些条件的倾向。资本主义确实在实际上要使劳动时间划一,把它降为最简单的、最不熟练的类别,然后给以划一的报酬,如同它趋向于利润率的相等。而且,经济各部门都有密集使用资本的倾向;这构成了生产率提高的方式。确实这个部门和那个部门之间的资本有机构

成是不同的，分析时分散程度愈高，范围就越广，新的强有力的工业的有机构成增加得最快。正是有机构成的这种“分散”说明了中心国家部门生产率分布不平衡的事实。但是这种“分散”在外围国家更为突出。如果我们把国民经济分为大约十个部门，我们发现中心国家的有机构成为1至4，平均利润率为15%至20%，生产率变化在1与2之间，而在外围国家进行同样划分的话，有机构成的幅度为1至35，而生产率的幅度则为1至10。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象在中心国家里那样掌握所有的生产部门，那么外围国家资本有机构成的这种大差距是可能的。正是这种环境是报酬发生部门差距的原因，并且是第三世界收入分配不平衡问题的主要方面。

关于收入分配不平衡的这个主要原因，还应加上一些其他同样重要的原因，它们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完全程度有联系的：一种低水平的劳动时间划一化（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组织形式不普遍的农业以及城市部门之间），外国垄断资本和依附性本国资本的不同利润率，等等。还有一些次要的因素，诸如：（1）农村和城市地区各自的就业水平，这对企业工资与收入同所有权工资和收入之间的收入划分有决定性影响；（2）资本所有权和企业所有权的分布结构，这主要决定城市地区企业收入分配的方式；（3）土地所有权结构和土地开发方式的结构，这主要决定农村地区的非工资收入；（4）劳动力供应根据技术水平和工会组织程度以及不同集团的政治组织而分布的情况，这主要决定工资分布的结构。

不发达国家中有时可以看到的平均工资和最无权阶层（特别是农民）平均收入之间的很大差距，是把属于两个不同时代的、生产率水平不能相比的两个经济制度并列起来的必然结果。认为经济政策的目的之一一定是降低工资水平，匆忙地作出这种结论是错误的。事实上，一个较高水平的生产率不但有可能提高工资，而且

在很大程度上要求这样做。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力价值的概念提出了这层关系。因此，当收入类别太不同的情况下把两种生活水平作比较，那是很难正确的——更不用说在满足水平、福利水平或幸福水平之间进行比较了，这些往往使经济学家超出了科学的范围。这种比较忽视价格水平，不发达国家中城乡地区的价格水平是显著不同的；由食品采集的经济社会所提供的食品在赤道非洲的某些地方很容易采集，但是这种食品在城市里可以高价出售；城市中心（甚至在贫民窟）住房的高昂费用；食品采集经济社会和捕猎经济社会的产品在国情统计中不加计算；城镇的不同生活方式带来了新的要求——车费，必须支付的娱乐，等等。劳动的强度也必须加以考虑。往往会忘记传统农民的收入相当于每年 100 个工作日，而城镇工人的收入相当于 300 个工作日。如果我们考虑到问题中的所有这些因素，有记录收入之间的差别——有时在 1:10 之谱——往往失去了它的突出性。

“享有特权的工资收入者”的问题存在于其他地方。工资水平的等级制度在不发达国家比在中心国家更为突出。在经济的现代部门，不论是种植园和城镇，数量相对较多的非熟练工人群众组成国内最无权的集团。正是与这些群众相比（特别是城镇失业和无地农民就业不足占很大比重的地方），与这些主要是不熟练的就业不足者群众相比，熟练工人（体力工人和办公室工人）的工资就带有特权感。同样情况适用于受雇于公共服务的集团，特别在广泛感到他们数量太大以及受到急于求职的“市内小社会”的压力而雇用的地方。除此以外，如果本国资本主义企业的收入不存在，那么这批工人的特权情况就具有政治意义。

一般认为，在不发达国家的工人群众平均收入之间必然会有越来越大的差距，这种平均收入的增加只能随国民产值的缓慢增长而发展，具有比较高度熟练技术的工人收入则将随发达国家中

同样工人的收入而发展。实际上，这些模仿效果限于最高度熟练技术的工人，他们能从自己的国家移居出去：这就是所谓的“智力流失”。现有的估计长期流动的少量数据令人想到从一开始差距就很大，或许就象今天一样大，特别是两个世界——传统世界和殖民主义所安置的现代世界——的不均质造成新部门劳动力供应不足。随着乡村向城镇移居的发展，现代部门中不熟练工人群众的差距逐渐缩小，而比较高度熟练技术的工人的差距则扩大了。

在发达国家中，劳动人民中的大多数（职业人口中的60%至90%）是工资收入者。结果，长期来看，平均工资和人均国民产值发展很不同。同时，在工业国中，广泛说来，工人阶级通过它的工会组织相当坚强地进行团结斗争——除了由于种族分歧（例如美国的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或民族分歧（例如某些欧洲国家中的本地工人和移民工人）而使这种团结发生破裂或至少受到损害。所以，所有经济部门的工人工资的增长都围绕生产率平均增长率而不是各个部门不同的生产率增长率趋于固定在一致的水平上。由于这个情况，工资政策是国家收入分配政策中的一项基本成分。

不发达国家的情况与此不同，那里的工资收入者只是职业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在1%与至多30%之间——而且由于工会组织落后以及城乡人民之间的差距而团结不强。所以，在工资长期发展和国民产值发展之间并无明显的关系。我们发现在某些国家中，在最近一些时期中，极低或中等的国民产值增长（在0.2%和3%之间）伴随着实际工资的显著增长（牙买加和哥伦比亚为每年6%以上；锡兰为4.5%；赞比亚、罗得西亚、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为8%以上），或者反过来，实际工资极低增长，甚至负增长，而人均生产增长却比较好（台湾、缅甸、南朝鲜、印度、菲律宾，等）这样的现象并不能简单解释，因为在工资运动和工业化步伐或者甚至是利润运动之间并无最小的共同关系。在有些例子中（比属刚

果,波多黎各),工资的稳步增加刺激了企业选择更加有效率的生产方法。至于对付长期性通货膨胀,我们发现各种可能的情况:延迟调整工资,稳步提高实际工资,或者相反地,不断降低实际工资。工资的弹性活动(实际额的上升或下降)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工资问题并不构成有关国家中收入分配的主要轴心。

不发达国家中不同类别劳动人民的报酬水平(不论绝对的和相对的)之巨大差距——在城乡之间、熟练与不熟练工人之间、受雇于某些大企业与受雇于其他部门的人们之间——即使在严格的经济意义上可以加以说明,总是构成建设一个团结国家的障碍。可以想像,一项经济发展政策可能着眼于有计划地反对经济的“自然法则”,设法减少这些差距以便保证国家团结。但是,只有当它要达到的减少特权工人报酬的措施不是为了其他收入者的好处,例如私人企业(不论本国或外国的)的收入,而是为了全社会的好处,而且这种政策所影响的类别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这项政策才是正确的。

这种平均主义政策在政治上是合理的,因为国家团结的目标对发展来说是重要的。可是,它意味着必须采取一项不同于市场价格制度的价格制度。不发达国家中的实际价格制度(它主要由流行于发达国家中的实际价格制度所决定,这是由于国际竞争以及某些产品替代另一些产品)符合于相对划一的生产率分布。鉴于不发达国家中的生产率“分散”得广泛得多,当你挑选一些部门来促进其发展时,根据划一的基础来决定劳动力报酬和资本报酬就会导致一种从经济流通的观点看来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所以,就要采取不同合理性水平的两种价格体系:一种是实际价格体系,其作用是“拉平”报酬的不平等,保证国家团结;另一种是参考价格体系,其作用是为经济计算的需要服务。只有在发展的过程中,生产率之间的不平衡才会降低而两种体系才会接近。

外国资本、本国企业资产阶级、享有特权的工资收入者阶层以及政府官僚之间的政治关系的性质，是最终决定这种社会收入分配演变的重要方面的因素。在没有企业资产阶级的地方（黑非洲的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享有特权的工资收入者阶层可以同政府官僚一起成为外部统治的主要传送带。但是这种情况并非始终如此。例如在扎伊尔，1960到1968年期间，官僚势力攫取了大份额，而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境况则恶化了。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保证供给适应于需求的平衡价格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生产价格。这些价格预计各部门劳动力的报酬相等（一个单一的劳动力市场），资本的利润率相等（利润率均等化）。结果，如果为了保证各部门的扩大再生产而必须储蓄同样份额的利润的话（为简化起见，我们可以说：如果取消资本家消费而把全部利润进行再投资），增长结构——不同部门之间的投资划分——就由价格来决定了。如果没有资本市场来保证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的资本流通，那么增长结构和需求结构（其比重由这种增长所影响）之间的密切结合就没有保证。所以，资本流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方式的一项必要的法则。但是这种流通遇到一个永久性的障碍：资本的所有权。由于需求发展的结果，要求加快增长的企业和部门担心：如果它们为了取得投资资金而吸收外资太多的话，它们可能失去对自身事务的控制。所以，它们就设法把价格提高幅度，使之有可能产生足够数量的自筹资金。竞争的环境使得这样的活动或多或少成为可能。从增长观点看来是合理的价格体系将意味着（不考虑资本家的任何消费）各部门能按照需求来提供自身增长资金的价格结构而不必求助于外部资金，因此就有不同的利润率，否则相反来说，就有相等的利润率和资本的完全流通。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实际价格体系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而是介乎两者之间；自我筹资的幅度有很大不同，决定于许多

因素——例如，包括有关部门被垄断的程度。此外，还必须加上不平衡间接税收对价格体系所造成的畸形。

我们说一个企业或一个部门生产率比别处高，是说它在劳动力报酬相等的情况下保证了更高的利润率；如果该部门必须提高增长率以满足需求量的变化，这肯定是发展趋向。

现在，中心国家的价格结构已大部分传到外围国家，其原因和占统治地位的货币价值传递机制的原因是一样的：同消费模式有关系的心理机制，进口货对当地产品的竞争（后者是或多或少地从属于替代的）等等。

中心国家的价格结构的这种传递决定了外围国家各部门之间生产率的不平衡，表达现代化的不平衡程度——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渗透的程度。生产率的这些不平衡时常反映在不平等的利润率上，但是也反映在不平等的劳动力报酬上，特别在不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部门，这往往是农村生产的情况。所以，从消除外围地区所特有的历史性落后（各部门之间的不平衡）的需要而促进增长来看，这种价格结构是毫不合理的。

如果我们根据中心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垄断情况而考虑到利润率平等化的倾向不断受到挑战，那么就会看到这种转移过来的价格体系是更加不合理的。边际主义的一般平衡理论是在假设完全竞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琼·罗宾逊假设一种经济在竞争性平衡的状态内突然组成卡特尔，得出了双重结论认为：国民收入将会重新分配以有利于企业主，并改变生产方向。如果我们确实认为产品的总需求弹性在各部门都不一样，正如生产要素的供给弹性不一样，那么，需求弹性较小的产品会比需求弹性较大的产品生产得更多；同样地，劳动力供应弹性很大的那些部门将会发展起来，而劳动力供应弹性较小的部门将会下降。

必须补充说明，增加经济的垄断程度并不增加琼·罗宾逊的

分析所得出的显著比重的储蓄量，根据那种分析，生产要素所损失的将由企业家所获得。确实，当分配变得有利于利润时，使用的生产技术会变得更为原始，这是斯拉法所表明的情況。因此，国民产值的水平就下降，而企业主无法回收生产要素的损失。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就受到阻碍。而且，这种更不平衡的收入分配加深了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成为就业不足的平衡的一项附加原因。巴伦和斯威齐表明：在垄断资本主义下，实际剩余少于潜在剩余。

根据产品的需求弹性对垄断化现象的分析当然是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关于经济中垄断程度的全面概念考虑到每个制度都潜在地包含某种程度的垄断这一事实。每个商品总有一条总需求曲线，不论这种商品是由单个企业生产的或者被大量企业生产的。这种完全卡特尔化的设想只表明经济中内部垄断的程度并使之有效。这种方法在理论上能使我们衡量一种经济中垄断的程度，在那种经济中，生产完全掌握在垄断资本手中。它不能使我们了解集中过程的真正发展。现在，对这种发展的分析，以及对垄断超额利润——在不同部门间并不平衡——分布的分析对于价格理论是有决定性意义的。而对需求弹性的分析使我们了解利润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的程度，我们需要根据有关公司的全面战略来分析同一部门中垄断资本之间所进行的斗争——通过价格以及其他手段（投资，购买大额股票，垄断商标，等等）。

从另一种方式来看，相对价格的世界体系部分地就是不平等交换的结果。这种交换——以及它所根据的不平等专业化——是为一种职能服务的，那就是说，增加整个体系范围的利润率。我们正需要根据这些来解释卡莱基对垄断影响分析的结果。他相信他能说明发达国家在历史过程中劳工所得的国民收入份额保持稳定的原因：垄断程度的不断增加已经被不利于原料的贸易比价的发

展所平衡。

需要补充的是：如果一种原料的加工由提供这种原料的公司所结合的公司来承担，那么这种原料的价格就变得纯属常规。例如，这种情况是：牙买加和几内亚等地生产铝土的集团就是在喀麦隆加工氧化铝以及在加拿大或加纳制成铝的同样集团。根据该集团的利益在于把利润集中于外围地区还是中心地区，它将对铝土或氧化铝制订高价或低价。

由账面价格构成一种客观标准，由此可以判断经济选择的合理性；这种看法是没有任何科学道理的。根据这种价格体系作为利润率计算基础的项目估计技术，是世界银行所主张的，它属于纯意识形态领域。

外围地区对生产技术的选择：体系的不合理

边际主义理论声称：技术的选择取决于拥有的生产要素，声称：经济体系是合理的，那就是说，它应导致轻型技术被不发达国家所选用。可是，观察之下，情况并非如此。为什么不呢？

在不发达经济社会国际一体化的特殊条件下，投资是否采取最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加快积累速度的方向呢？这个问题有三方面：（一）总投资率的问题：决定国民经济中划分消费和投资的机制是什么？在不发达的情况下，这种机制是否会决定特别有利于投资的划分方式呢？是否有可能预先决定合理地用于投资的那部分国民收入呢？换言之，把消费限制到什么程度才有利于要求加速资本形成率的社会呢？（二）对投资的选择问题：把投资引向这一个产业而不是另一个产业（资本集约程度不同）、引向使用这一种技术而不是另一种技术的机制是什么？当这种机制在不发达经济社会的背景下活动的时候，它们发展速度的影响是什么？是否可能预先确定有用投资中的优先次序呢？（三）根据资本集约度不同的各种工

业的观点来进行国际专业化的问题：当一国被结合进世界市场时，引导该国生产主要发展轻工业或者主要发展重工业的机制是什么？在不发达国家中，国际专业化的这些机制是否有利于最大速度的发展呢？有组织的投资活动应在多大程度上以国内经济为基础，应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于国际交换呢？

边际主义认为：决定投资方向的只有利息率——那是它的理论主张。而且，它认为：只有在货币市场上自由得出的利息率才能够合理地引导投资并作出符合于个人偏好的增长率的决定——那是它的学说主张。按照边际主义者的看法，利息率是用以调整资本供应来适应资本需求的。现在，资本比较密集的生产方法使生产过程延长而要求消费者作出牺牲（消费者总是偏好目前的消费而不喜欢未来的等量消费）。因此，货币市场通过利息率，根据“主观低估未来”的程度，在收入中划分消费与投资时进行可能的调整。它决定符合个人偏好的发展总速度。而且，它认为，利息率除了储蓄形成的总速度外，还决定各生产部门间的最优投资分配和最优生产技术选择。利息率决定着资本不会投入这样的部门：如果那些部门增加投资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低于其他部门的生产率提高的话。（边际主义者说）利息事实上不仅仅是当前偏好的尺度，而且也是资本要素价值的边际生产率尺度。

利息率真的在决定投资总额和投资方向上起决定性作用吗？不，并不是这样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背景下，划分消费与投资是由实际工资水平（剩余价值率）而不是由个人的当前偏好所决定的。

庞巴维克是怎样着手证明这种划分符合于“个人时间偏好”呢？他出发的原则是：更加密集地使用资本货总是有可能增加生产，但也需要延长生产时间。这种“生产过程的长度”只是衡量生产的“资本集约度”的粗略方式，而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有机构成

的概念则表达得更加清楚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庞巴维克的说法和马克思的说法并无不同，即：资本最为密集的技术也是生产性最强的技术。可是，庞巴维克论点的结果似乎不太贴切。因为生产过程越长，生产性越强，中间产品的生产就应无限发展。可是这显然并非如此。为什么不呢？因为，庞巴维克告诉我们，由于对未来的主观低估，虽然，如果我们延长生产时间，具体产量能无限增加，这种产值也不断增大，但是，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产值先是增加然后就减少，所以存在一个最优生产时间长度。可是，如果这样，我们必须预先假定对未来的主观低估率高于生产过程延长时的具体生产率增长率。为了摆脱这种困难，庞巴维克就提出了另一个主张：由于制造生产资料的工人所需求的生活资料必须生产，生产时间就不能无限延长。这个新主张意思是什么呢？它的意思是：劳动力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劳动力从事生产消费品，另一类劳动力从事生产生产资料。庞巴维克的新主张意思是说：不可能把从事最终生产的那部分劳动力减少到生产等于于发放工资的消费品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以下。于是，发展速度看来基本不是决定于对未来的主观低估率，而是决定于剩余价值率。

所以，我们在这里再次遇到马克思的基本主张。斯拉法证明：决定实际工资水平（劳动力价值）的社会关系如何同时决定平均利润率和比较价格体系。这一“发现”最后暴露了边际主义分析的意识形态性质并使资本主义中经济选择的做法丧失一切合理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把这种合理性归结为它的真正内容：资本主义自身再生产社会条件的再生产手段。

现有收入在当前消费与投资（或换言之，未来消费的增长）之间的划分，是一种社会选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是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在一个理性社会内，这只能由集体选择所决定，这种选择是在有关社会目标（超越资本

主义经济测算的时间展望)的长期考虑基础上作出的。这是对第一个问题的答复。

就生产技术的选择而言,目前的理论仍然采取一种边际主义分析。某种生产可以在生产要素的各种组合下同样良好地进行。如果生产要素的报酬是已知的,就有可能从不同的技术中选择一种具有生产要素已知量的、根据它们的相对报酬而加权的技术,它有可能使当前的生产达到最大限度。

使用一种以资本比较密集为特点的更先进技术,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然后就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比例上低于资本密集度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生产率下降了。这里我们有一个可靠的假设:如果可以使用较少劳动力生产一单位的产品,那么我们就必须使用更多资本。在第二种情况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比例上高于资本密集度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显然,资本生产率也提高了。第一种情况使人们在不同的“有效率的”技术间进行选择,而第二种情况使人们消灭“无效率的”技术,即:不论生产要素的相对报酬多少总是处于低下水平的技术。

在一个蒙受很大程度的结构性失业的不发达国家中——换句话说,在那里,资本短缺是限制增长的因素,而劳动力则无限量地供应——应当提出什么政策呢?根据上述定义属于无效率的(即使是最轻型的)技术当然必须排除。在有效率的技术中,要选择那些对稀缺的生产要素最为经济、从而使资本生产率达到最大限度的技术。这等于指一切可能的有效率技术中最轻型的技术。选择一种对工资没有参考价格的技术经常会得到赞成。

这种说理的思路是很成问题的,即使我们同意那种假设,认为劳动力要素的确是无限地得到供应的。因为,在各种各样的有效率技术中,按照现有的生产要素报酬率,一种较不轻型的技术能

够产生一定的剩余,这种剩余分配给投资以后,就会在将来提供增长的条件。根据对工资不采取参考价格的测算,就排除了这种选择,因为它结果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工资的实际分配用于消费,从而减少了一国取得剩余以用于投资的能力。因此,规律就是:最重型的技术仍然受到欢迎,因为这类技术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提供一定的剩余,这项剩余用于投资以后,就能取得社会所希望的增长率。竞争驱使企业家们选择那些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剩余的技术。因此,毫无疑问,在经济生活中,今天不发达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企业界所进行的选择并无多大不同。在进行不同的选择时,其原因往往有关市场规模问题而不是有关工资水平问题。在任何情况下,这种选择几乎总是(而且幸亏如此)并非决定于对工资不采取参考价格的测算。这说明技术选择的问题是一个虚假的问题,边际主义往往有这种情况。真正的问题是部门选择的问题。

剩余可以全部用于投资,或者可以全部或部分地用于消费。如果人们认为提高工资是发展的最终目标,他们就会力求保证剩余和工资平行地提高。如果用于投资的剩余在比例上增加得较慢而工资率规定增加得较快,而就业的增长又取决于剩余再投资的增长,那么将有可能制定一项社会最优函数,使得选择的剩余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组合能在整个时期中(例如十年或十五年)而不是在该时期末最大限度地提高工资。

这些论点并非仅仅在理论上有意义。开始进行工业化晚于他国的那些国家,一旦使用最先进的技术,优先发展最先进的工业,的确就会在生产率和就业方面得到迅速的提高。作为一个总的规律,在一个不发达经济社会中,进行不同于已经取得良好工业化的国家的抉择,是没有根据的:必须按照实际存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率,选择最有效率的技术,取得最大限度剩余的技术。事实上,现代化部门的加速积累将伴随着工资的提高,可是在生产率相对停

滞的传统部门，劳动力报酬即使能增加也是比较缓慢的。所以，如果这两个部门的平均收入互相很不一致，而且，如果随着发展的推进，这种不平衡越来越明显，那也不必奇怪。

虽然这种自发运动沿着劳动力报酬差距日益增大的道路前进，据考虑，在这漫长的过渡时期，一项真正的发展政策将不能忍受这种日益增大的不平等，因为这破坏全国团结的发展前提。因此，国家必须计划价格与工资以保证全国团结。为了做到这一点，当地的价格体系必须与世界价格体系相隔绝。但是与此同时必须意识到计划（挑选哪些部门加以发展）可以不根据选择的价格体系，其合理性（为了生产率不同的各部门工人之间团结的政治需要）则在其他方面。必须有一个参考价格的体系，这是为了经济测算的目的，从而使得作出的选择导致现代部门的发展。随着传统部门受到相应的侵蚀和衰落，从政治团结的观点来看属于合理的价格体系就会更加接近从经济选择来看属于合理的价格体系。

我们还必须回答第三个问题，有关不平等的国际专业化形成的方式。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某种水平的国民收入，伴之以这种收入的某种分配，会带来特定的需求方向，其结果，就需要符合于这种需求的特定生产方向。欧洲所建立的第一批工业依靠的是相对轻型的技术，因为那是比较有利可图的。但是，一种工业（例如纺织业）的发展需要其他部门（例如机器制造业）生产的提高。这些部门中最有利可图的技术可能是最重型的。马克思在研究利润均等化的机制时探讨了这个问题。一方面，当生产方向符合于社会需求时就取得了平衡，另一方面保证了所有资本的均等报酬。因此，资本喜好投入轻工业的倾向就被补充工业的必要发展所限制。

应当注意到，这一定义相当不同于那种把轻工业等同于消费品生产，把重工业等同于资本货生产。例如，煤炭生产的每单位资本所使用的劳动力多于塑料制品生产或啤酒生产的劳动力。但

是,这两种现象之间有一种联系:如果,在任何部门或工业中使用一种比较现代化的技术,那么全国的生产平均而言就会“更加重型”。但是那时资本货的生产已经比消费品生产增加得更多。技术之日益加深是和生产力由最终生产转变为中间性生产平行发展的。但在国际一体化的情况下,当资本主义在一个由外部交换所统治的结构内发展,补充商品是可以进口的。

正是追逐利润(而且只有追逐利润)引导中心国家的资本在外围地区建立轻工业而不是重工业。在生产率相同的情况下,外围地区的工资低于中心地区。在一个已知生产部门,使用同样的技术,资本从中心流向外围所带来的利润增加多少将和该部门的“轻型程度”成正比。正是这种力量造成了不平等的专业化。

不平等的国际专业化,外国资本的统治, 乘数机制的转移,脱节

为了区分一项经济流量的初始独立变化所产生的初级影响及其所引起的二级与三级影响的浪潮,在理论上提出了大部分经济进程的积累性质。一方面在初始情况下所考虑的不同流量的价值与另一方面由初始变化所引起的一系列日益减弱的浪潮的末尾之间,简单的数学程序使我们能揭示集中体现引起的变化量的乘数,因此揭示了初始变化的影响力。

我们已经看到在经济周期起源中乘数机制中的两项所起的作用:衡量有影响力的投资同引起的收入增长之间关系的乘数,以及衡量有影响力的收入增长同引起的投资之间关系的加速原理。

凯恩斯对乘数的分析假定这样一个背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因需求不足而陷于瘫痪,并且拥有的生产能力不得不如数开工。在这种背景下,凯恩斯设想供给会立即响应需求的诱惑——那就是说,可以不需任何新的投资而增加生产。任何初始的独立

需求(不但是一项独立的投资,而且是国家产生的初始需求,或者是贸易收支的盈余,等等)都有可能使生产体系复苏起来。

在满足需求压力的生产扩张需要投资的情况下,我们则摆脱凯恩斯分析的严格框框。如果,为了进行生产扩张,第一时期中节省的全部收入必须进行投资,我们就回到“典型的”例子上来了——换言之,乘数不再具有意义了,它的“价值”变得不限定了。但是如果只有部分的储蓄必须进行投资以实现经济扩张,乘数就恢复了限定的价值。凯恩斯的“储蓄倾向”被贮藏倾向所取代,或者消费倾向被消费和投资倾向所取代。如果我们同意工资必定要满足对消费品的需求,利润必定要提供储蓄(以投资为目的),那么我们在积累机制方面就存在固有的不平衡,因为利润对工资的比率增加快于满足消费增加所需的设备量与这种消费增加量之间的比率。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储蓄被贮藏起来,并非如凯恩斯的理论所说的是由于所谓“灵活偏好”,而是由于不可能把来自收入的全部储蓄有利可图地进行投资——这一差距表现了社会上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贮藏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新的需求为了产生其供应,只要求把部分储蓄进行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把全部储蓄用于投资并非有利可图。贮藏理论与生产要求的分析之间的联系,不需要加入资本的边际效率这个心理因素(它是凯恩斯理论中最虚弱之点)即可建立起来,不需要加入利息率和“灵活偏好”率(它迫使凯恩斯接受货币数量论)即可建立起来。

不发达经济中的贮藏和这种强制性贮藏是完全不同的现象,后者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之间的固有矛盾。在前资本主义经济中,贮藏是出于这样的社会事实:统治阶级占有剩余的背景是他们根本无需为保证未来的收入而把储蓄用于投资。当这些经济社会结合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时,它们保留了前资本主义占有剩余的形式,例如地租。贮藏在过去往往采取

积累“实际价值”(黄金,土地)的形式,现在则采取积累当地货币的形式。贮藏贵金属必须和奢侈性消费等同起来,因为黄金必须生产出来,或者以实际的出口来支付。如果贮藏者购买土地,以这种方式花费的数额流入了他人之手:需求转移了,但并未消失。可是,向往土地确实增加了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如果在最后,贮藏采取货币积累的形式,货币的数量自动地进行调整以适应经济需要,从而使这种贮藏在影响经济活动的水平方面不起作用,同时保留了它对贮藏者本人的功能,即:潜在购买力的积累,社会效果的加强。

由于不发达世界条件下的生产扩张显然需要投资,而前资本主义贮藏的具体形式并不构成凯恩斯意义上的流失,一笔独立投资的乘数效应应当是最大的。但是这种效应并非最大,这有两个原因。

主要的原因是:投资资本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被输出了,因为这种资本是外国所拥有的。现在,利润构成了主要用于资助投资的收入。因此,利润的输出把初期投资的推动力转移到了中心国家。

产生积累过程的能力薄弱的第二个原因反映外围资本主义的具体矛盾。如果,在外围地区,工资低而使用的技术先进(与发达国家使用的技术类似),那么,社会的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之间的全面平衡就不能达到:这些国家中很高的利润由于缺乏出路而不会进行再投资。

现在来谈谈加速原理,我们记得它的作用是增加投资——对资本货需求的增加在比例上大于对消费品需求的增加——因为现代生产技术要求安装折旧时间达许多年的耐久工厂设备。我们已经看到,在周期开始时,加速原理有助于放慢乘数的影响,但是也加剧了总需求的波动。

一旦加速原理转移到生产设备的地方,那么,如果不平等的国际分工把这个生产部门分配到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地区,加快积累速度的强化影响将会在中心地区感受到。

投资积累影响的这种转移结果使不发达经济成为一种支离破碎的经济,这已经在最近二十年的产业表格上表现出来。只有在这些表格进行比较时都是在同样的合计水平上制订出来的,那么发达经济社会与不发达经济社会之间的结构比较才有意义。于是考虑一种结构上的质的不同,可以总起来说,不发达国家的产业表格是“空”的,或者说“技术系数”微不足道。就包括十五个部门的合计水平而言,投入总额(不包括交叉重复项目)在西方发达经济社会为增加价值的两倍以上,而在平均的不发达国家(人均产值在100至200美元之间的国家)则不到其增加价值的一半。这就是说:如果双方的进口(或出口)均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20%,即在这样的合计水平上,那么在发达国家中,对外交换约占对内、对外交换总额的6%,而在不发达国家中则占12%。如果我们不包括对内、对外的最终交换——即花费在本国与外国最终货品(供消费和投资)上的收入——如果我们认为最终货品约占进口品的一半,那么对外中间交换占发达国家中间交换总额(对内和对外)的5%,而占不发达国家的16%。非合计的水平越高,幅度就越大。在六十个部门的水平上,幅度在3%至15%之间。虽然在总水平上比较适度,而加工工业主要部门的百分比则高得多(幅度在10%至60%之间),在某些特别重要的公司中可能百分比更高。

这就是说:发达经济社会是一个结合的整体,其特点之一是对内交换的流动极为繁忙,而组成这个整体的各部分对外交换的流动,与对内交换相比,总的说来是为数很小的。与此相对比,不发达经济社会是由相对并列而并不结合的各部分所组成的,这些部分对外交换的流动密度要大得多,而对内交换的流动密度则小

得多。

这种脱节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在一个结构性自主中心的经济社会中，任何一点所开始的任何进展都由许多聚合机制扩散到整个机体中去。当代的分析强调初始需求的增加所产生的“先导性”影响。原先，分析强调其他的扩散渠道：因进展而导致的价格下跌，与此同时，还有需求和实际收入的相对价格结构的变化，利润的可能增加，以及投资分布的变化。如果经济是外向的，所有这些影响就有限，因为主要都转移到国外去了。例如，在石油工业方面取得的任何进展将对科威特的经济毫无影响，因为游牧育种业对石油工业部门毫无交易。这种进展将扩散到西方以及所有的石油消费国。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当谈论不发达的民族经济社会，“民族”这个形容词还是留给自主中心的发达经济社会，它们每一个都构成一个真正的、结构性的经济地域，那里可称为发展中心的工业使进步扩散开来。不发达经济社会是由各部门、各公司组成的，它们互相并列而并不高度结合，它们各自结成一些实体，其重心处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国家。我们在这里看不到经济意义上的具有完整国内市场的国家。根据其地域大小和出口品种，不发达经济社会可能看起来是由这种类型的、相互独立的若干“部分”所组成（例如巴西或印度）或者由一个单一“部分”所组成（例如塞内加尔，它的经济完全以花生等食用块茎植物为中心所组成）。

其结果是：不发达世界虚假的、不成结构的经济地域可以加以割裂并划分成一些小地域而并无严重危险；这在发达国家的整体地域里这样做的话就会引起无法忍受的后退。第三世界民族团结的软弱常常是这方面的一种反映，这也是小型民族主义的根源：对出口经济感兴趣的地区并不需要该国的其余地区，而后者反而成了它的负担。

这种脱节的影响可以在第三世界的历史地理上清楚地看到。对一种在中心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中比较重要的出口产品感兴趣的地区会经历极为迅速增长的光辉时期。但是因为没有形成自主中心的结合实体，一旦这种产品不再被中心国家感兴趣时，那个地区就衰落了：它的经济停滞了，甚至倒退了。因此，巴西的东北部在十七世纪时“经济奇迹”的局面进了死胡同——当时甘蔗种植的经济失去了它的重要性，该地区就陷入了毫无生气的局面，后来成为现在这样的饥荒区。甚至在小小的塞内加尔，在树胶贸易时期，河流地区是很繁荣的。当树胶被合成产品取代后，该地区成为一个廉价劳动力的出口区，因为那是该地区居民唯一的生计。当洛林的铁矿石最终判明时，这可能对该地区产生一个困难的再转变问题，因为整体工业的基础结构已经在这种金属的基础上形成了，它可以从小处进口。但是当毛利塔尼亚的铁矿石判明时，那个国家将回复到沙漠。

第三节 贫穷化

第三产业部门的过度膨胀

第三产业部门(商业，服务业，行政，等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提供国民产值的40%至50%，而在不发达国家中为30%至60%：在最少结合进世界市场的国家(非洲内地的国家，阿富汗，等等)为30%左右，在结合程度高的国家中为50%以上(常常要大得多)。而且，在发达国家中，第二产业部门的份额接近于第三产业部门的份额，而在所有的不发达国家还要小得多。我们发现就业人口也以同样的畸形方式在各部门之间分布。在发达国家中，第二与第三产业部门之间分布得比较平均，随着人均产值增加，在第三产业部门就业的人口趋于增加；而在所有的不发达国家

中，在第三产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比例要比在第二产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比例大得多。因此，矛盾的是，就第三产业部门在经济中所占据的位置而言，不发达国家的情况似乎更接近于美国而不是西欧，如果只看一种发展模式，甚至比美国更先进。

可是，如果我们观察中心国家形态和外围国家形态中这些比例的历史比较演变，我们发现两者具有很不相同的动力。在发达国家，就业人口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的运动不是直线的：在1820年和1880—1890年之间，人口从农业部门多少按照平等和不变的比例转移到另外两个部门。在二十世纪，农业人口的下降更快，但是现在（特别在1920年以后）则是第三产业部门越来越从这种人口转移中得益。各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的演变大体是平行的，除了在二十世纪里第三产业部门的份额与第二产业部门的份额相比增加得比这两个部门雇用的劳动力速度更快。

相反，在第三世界，非农业人口中的就业人口进入第三产业部门而不是第二产业部门，而这种情况从现代城市与结合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相联系的发展进程一开始就发生了。参加第二产业部门的人口比例下降了，即使在这所谓的工业化开始阶段。在埃及，1918年与1958年之间，在工业、营造、建筑部门就业的人口占非农业就业人口的百分比从34%下降到25%。在马格里布，在1955年前后，工业、手工业和营造业雇用全部城市劳动力的45%，而商业、运输、服务和行政则雇用55%。在象牙海岸，在1965年前后，第二产业部门只雇用非农业劳动力的33%。

换句话说，在中心国家，工业在发展中为工人提供的就业多于它所摧毁的手工业者人数。工业从衰落中的农业以及从人口的自然增长中招收工人。在外围国家，工业雇用的工人人数少于它摧毁的手工业者以及从农业中“解放”的农民的人数。来自外国工业

的竞争的影响是明显的。因此,在第三世界中,城市发展伴随着失业的绝对或相对增加,这种情况在西方除了很短暂的时期以外没有发生过,那些时期主要分布在1820年至1870年之间(除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时期)。例如,在埃及,城镇就业人口的百分比从1914年的32%降到1960年的22%。在马格里布和西非,1965年和前后时期的失业占城市劳动力的15—20%。

不发达国家中行政部门臃肿现在是“不发达”中的司空见惯的现象。设法对这个问题不仅作描述而作些分析,就必须在这方面回答一系列问题。首先,在总的方面,中心与外围经济中公共开支与物质基础的比较增长率情况如何?趋向行政活动的畸形发展,是外国国家的一个根深蒂固和长期存在的趋势(例如,在殖民地时期很明显)还是一个最近的趋势(与非殖民化所产生的政治结构有联系)?这种畸形在目前时期是在外围国家更显著呢还是在中心国家更显著?再提些总的方面的问题,这种公共开支是怎样筹资的:它的财源力量(本地税、本地贷款和国外贷款、通货膨胀)与中心国家的力量相比有何特殊之处?在部门方面,我们需要分析外围国家和中心国家公共开支(生产性开支和非生产性开支)的比较结构,以及这种开支筹资的比较结构(哪些门类的收入最终支付这种开支)?

在埃及,行政服务的增长率(1914年至1960年之间每年为4.7%)比经济的生产基础增长率(1.8%)要高得多。这笔开支还要加上灌溉基础结构中可观的投资(特别在1882年与1914年之间)。广义而言,这种演变的主要原因是世界市场的需求(在灌溉地上发展棉花种植)和教育的发展。所有这些形式的公共开支都严格地进行筹资而不采取任何通货膨胀或外援(那只是最近出现的情况,即1957年以后),财政结构是落后的和僵硬的,以关税和间接税为基础。纳税负担不断增加,从很低水平(1914年约

7%)上升到很高水平(1960年约30%)。在马格里布,已看到公共开支在逐渐增加,这影响到有关国家当前的行政费和设备,这种增加按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在阿尔及利亚从1880年的分别为12%和4%,上升到1955年的18%和9%;在突尼斯,从1910年的11%和3%上升到1955年的17%与8%;在摩洛哥,从1920年的10%和3%上升到1955年的12%和5%。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这些费用完全靠当地资金提供,现在则靠国外资金,三国国外资金的数额分别相当于它们在1955年前后本国资金的40%、35%和40%。就整个西非国家而言,目前的行政开支从1950年的占国内生产总额的12%增加到1970年的18%。就整个中非国家而言,公共开支总额(文职活动和设备)在1960年至1968年间从占国内生产总额的15%增加到20%,它们的财政赤字则从总开支的5%增加到6%。

发展,不发达,以及非生产性活动

科林·克拉克和富拉斯蒂埃根据传统方法把经济活动划分为三大部门——第一(农、矿),第二(工业、建筑)和第三(运输、商业、服务、行政)——制订了发展阶段的一个总理论,可以总结如下:在第一阶段,第二产业部门以牺牲第一产业部门而取得发展;在第二阶段,第三产业部门取代了第二产业部门的位置,它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份额增加得越来越快,使第一产业部门、甚至第二产业部门的相对比重减少。

实际上,这种分类法是一种很不好的分析手段,因为它基于一种狭隘的“实证经验主义的”观点。以严格的经济主义的理论来看,这不能说明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和外围地区第三产业部门的特殊功能。

第一产业部门和第二产业部门之间的分别最初是由重农主义

者提出来的。第一产业的活动与所谓“加工”活动相比从大自然“提取”更多的资源吗？虽然李嘉图对亚当·斯密作了回答，有可能认为这种区分是有点道理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前，占有土地是欧洲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封建方式的基础。这种占有是由资本主义所尊重的，它阻碍了资本主义向农业的渗透：地租的位置反映了这种历史特殊性。然而，随着资本主义方式渗入到农业，资本开始在这种活动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在矿业活动中一开始就很显著，因此，似乎把矿业包括在第二产业部门，与加工工业和建筑业放在一起，是并不牵强的。

但是看一下第三产业部门的内容，这种三种分类的牵强附会性质就特别明显了。这里我们看到，同那些劳务生产（例如理发）的手艺活动一起，那些多少已成为“公共服务”的自由职业活动（教师、国立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律师、法官等，他们都在经济上起同样的作用），以及商业和银行服务的资本主义生产，或者同那些手艺和自由职业所提供的劳务相类似的资本主义劳务生产（例如，一所美容院或者一家律师事务所）。在所有这些活动中，不论从社会观点（主要是收入）或者从技术观点（工资在成品价值中的份额）来看，主导的作用通常不是由工人所作出的。在银行业和商业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资本，即使这个生产要素并不主要采取机器的形式而是采取货币储备或商品库存的形式。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象马克思的深入分析那样回复到古典的传统，并不象边际主义所设想的那么无益。这种传统对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作出基本的区分。生产性活动的领域向社会提供物质产品，供各处消费。它可以再细分为两个部门：初级生产，其中，土地资产（农业）起主导作用（至少在历史上是这样的）；以及次级生产，其中，资本起这种历史作用（严格意义上的工业，以及

矿业和运输)。与此相对照,非生产性活动并不从大自然提取任何东西——这并不是说它是无益的。这种观点是带有深刻的社会学意义的;这符合于这样的事实:为了从大自然提取某一数量的财富,人们就在社会上组织起来,他们必须把一部分时间不是用在直接生产方面而是用在社会工作方面。

对一个具体的生产方式而言——这里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的概念是相对的。这里,生产性意味着能产生利润,利润的作用在于积累,即在于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活动领域加以扩大和深入。正如亚当·斯密观察到的,雇用仆人使人花钱,雇用工人使人赚钱。设法把这个问题和任何活动的效用“本身”等同起来而不顾这种活动所处的生产方式,那是一种非历史的观点。提出下列问题完全是毫无意义的:建造金字塔或者中世纪的大教堂对人类是否有益?或者,在未来的理想社会里,劳动时间是否将不断减少而赞成那些不构成“劳动”的活动,因为它们没有劳动的强制性;闲暇、教育、文体、等等。

第三产业部门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最近迅速发展的解释,必须考虑到资本主义的内部动力,即实现剩余价值的条件:如果剩余价值不能全部花掉,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运转。为了克服利润率的下落,可以设法增加剩余价值率。但是这样的增加——不论在中心或在外围——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并且使投资没有出路:社会上储蓄能力和有利可图地进行新投资的可能性之间的矛盾加剧了。其结果就是“挥霍浪费”剩余价值。

竞争条件的变化,加上垄断的出现,这就导致了这种挥霍浪费。销售成本(钱伯林在三十年代第一次对此加以注意)一方面反映垄断资本之间的竞争加剧,另一方面也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解决办法。而且,各国间的竞争变得更加尖锐了,由此出现的军国主义化自1914年以后却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凯恩斯所要求的国

家干预构成了第三个浪费的根源，虽然有些国家活动可能导致有益的民用开支(教育，社会服务)。巴伦和斯威齐已经表明：这种被浪费的剩余的数额(绝对数和相对数)只会越来越增多。

可是，就不发达国家而言，科林·克拉克的辩护理论以及巴伦和斯威齐的马克思主义分析都不能使我们对第三产业部门臃肿膨胀所带来的问题找到答案。这个答案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结合进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的那些决定性条件，这种结合带来了三大主要后果。

第一，占统治地位的中心国家工业的竞争阻碍了当地资本积累起来对工业进行投资而使这些资本流入与出口经济、尤其与商业有联系的补充活动中去。

第二，生产率低下的某些第三产业活动——小规模零售贸易，包括行商，各种服务，等等——的膨胀是隐蔽失业的表现，这是外围资本主义发展所特有的贫穷化进程的结果。

第三，地租地位的加强，这是外围形态国际性结合的一个有特点的结果，并导致收入花费的特定方向，以有利于某些第三产业活动(例如，个人服务)的畸形为标志。在中心资本主义的形态中，土地资产已经在经济中和社会上失去其统治地位而使形势有利于资本。可是在外围国家，对外交换的加紧——一开始即以农产品出口作为基础的一种专业化的结构——加强了地租的主导地位，而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分布(不论是早先存在的，还是作为生产商业化的结果而出现的)使这种情况成为可能。现在，地租并不一定要储蓄起来，而资本的利润则必须储蓄起来投资于现代化，这是竞争所必需的，因为那是垄断得来的收入，因此可以全部花掉。这种花费是一种奢侈性开支，就物质商品而言它集中于进口品，就当地产品而言它集中于劳务(仆役，闲暇服务，等等)。

所以，第三产业部门的膨胀只是外围国家人口过剩特殊规律

的表现,这是外围经济外向性的结果,也是这些国家中把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排除在外的机制的结果。

第四节 依附

商业依附,金融依附和技术依附

就商业交换而言,中心国家的统治地位并不是由于外围国家的出口都是基础产品而造成的,而是由于外围经济只是基础产品的生产者——换言之,这种生产并没有结合进一种自主中心的工业结构。其结果,总的来说,外围国家的大部分贸易是和中心国家进行的,而中心国家则在它们自身间进行大部分贸易活动。

统治地位也表现在经济取得资金来源的结构。在中心国家,资本主义是本国的,所以资金来源来自国内;但在外围国家,资金大部分来自外国资本,至少就生产性投资而言。现在,如果生产性投资由外资提供资金,这不可避免地或迟或早会导致利润外流,因此增长就会受阻。国外援助(公共援助和无偿援助,或者局部无偿的援助)就成为“国际专业化”体系运转的一种必要条件。其后果是:对发展方向负责任的是那些提供资金的人们。这除了加强直接的政治统治以外,还加强了经济统治的机制。

关于输出利润的流动情况,没有很多资料。很多不发达国家的国际收支没有完整的材料,某些例子中(包括若干非洲国家)的情况完全是想象的。利润输出的官方数字表明不发达国家中这种情况的“分布幅度”很大:输出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5%,占出口值的8%至70%。属于百分比大的那些国家,这是很高的比重,例如某些石油生产国或矿业国。在殖民地发展过程中这种负担的演变方式如何,从来没有作为问题提出来,有关这一主题的科学的研究很少。如果我们开始观察一下发达国家的国际收支,就

可以比较容易地了解这种流动。就英国而言，来自国外的收入从1880—1884年的占国民收入的4%增加到1910—1913年的10%；在法国，从2.5%增加到5%；在美国，外部来源的收入在1915年至1934年之间的增加约为国民收入增加速度的两倍半。在1950至1965年之间，美国国外投资的收入增加等于国内投资收入增加速度的2.3倍，前者的比重从美国公司利润总额的8.8%上升到17.8%。

所有这些数字都有可能估计过低，它们只能局部说明外资在外国国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在最好的例子中，国际收支的统计数字只包括了实际输出的利润。例如，在埃及，在1945年到1952年之间，外资利润为资本报酬总额的20%至30%，而输出的利润为15%。外资利润的输出使埃及在1882年至1914年间的增长率从每年3.7%（如果那些利润进行再投资以后所得的潜在增长率）减少到1.7%（实际增长率）；同样地，在1914年至1950年之间，增长率从每年3%或4%减少到1.4%。在象牙海岸，私人金融转移从1950年的73亿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增加到1965年的252亿，数额比同样年份的公共援助和私人资本流入（从46亿增加到154亿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大得多。就中非五个法郎区国家而言，1960年至1968年间的利润流出每年平均达442亿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而流入这些国家的公共援助和外国投资则不超过344亿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象牙海岸可输出的利润总额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3%，对中非关税与经济同盟所有国家也是13%。对西非九国，在1960—1970年的十年间，利润流出（920亿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或国内生产总值的10%）大于私人资本加公共援助的流入。

哈里·麦格道夫表明：我们得到的情况压低了这一现象的意义。美国企业在海外积累的利润为数非常之大，已使它们在二十

年时间内成为世界上第三股经济力量。需要补充，现有的情况只表明这些流入的市场价格，而市场价格则早已包含大量的价值转移了。

历史表明外国投资的动力导致了资金流动的逆转，使利润回流最终超过资本流入。它也表明，外国投资的动力在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即发展过程中的新中心形态：十九世纪时的美国、日本、德国、俄国以及后来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同外围形态中的现有情况很不相同。

走向独立发展道路的年轻资本主义国家——换言之，走向自主中心的、以及很大程度上自主动力的发展——能够得到大量外资。可是这种资金在它们的例子中只起一个辅助作用，数量上也是次要的，而且重要性也日益缩小。因此，在美国，外资占国民财富的比例从1790年的10%不断下降到1850—1870年的5%，到1920年下降到1%，此后就完全消失；瑞典、加拿大、德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经验也是类似的。在这些国家中，国内外所有的投资推动了经济增长，因为这种增长是自主中心的，所以是迅速的。在这些情况下，利润流出的问题变得次要了。这些国家开始时是债务国，后来自己成了债权国，也象老牌宗主中心（英国、法国以及后来的德国）那样转而输出资本。

但是外围国家的形势不是这样，它们从来没有达到输出资本的阶段，而只是从“新借户”（资本流入超过利润流出）变为“老借户”（利润流出超过资本流入）。达到这一转折点的日子，当然各国是不一样的。就老外围国家而言，如阿根廷，这一转折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发生了。广义而言，拉丁美洲以及很久以前沦为殖民地地位的亚洲国家（印度与印尼）在几十年以前、有时在五十年以前即已成为“老借户”；而赤道非洲只是在现在才达到这个状况。新财富的发展，外资兴趣的发展，诸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中东石

油，可能暂时会推动投资的新浪潮从而恢复有关国家的“新借户”局面。但尽管这一切情况，也不可能逃脱这种进程。

私人资本收支的情况也是公共资金收支的情况。虽然在这个领域里，情况被认为是特别有利的（很大比重的赠款，有利的贷款利率，等等），公共债款的价值跌落已经在 1965 至 1967 年吸收了新流入非洲的公共款项的 73%；东亚 52%；南亚和中东 40%；拉丁美洲 87%。根据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的计算，如果新贷款数额在目前水平上再保持十年，到 1977 年，上述这些地区的这些比例数将分别为 121%，134%，97% 和 130%。

从外国国家的这些历史性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当发展——即不发达的发展——进行时，外围国家的国际收支往往恶化，这是因为外围国家从“新借户”阶段发展到“老借户”阶段，也是因为经济在不平等国际专业化的背景下日益商业化助长了日益高涨的进口浪潮（诱发的，间接的和次要的进口）。

只要外资的利润可以有计划地进行再投资（这是殖民地发展的繁荣时期发生的情况），金融收支的倒流就会延缓。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国民财富就越来越转移到外资控制之下，而发展的利润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被外国人所吞并。除了这个基本机制以外，还要加上外国资本主义部门越来越大的竞争力，它们在某些情况下排斥了在结合国际市场的最初阶段所构成的当地资本。塞内加尔的情况就是这样，曾经在十九世纪的贸易经济中起过作用的该国资产阶级在 1900 年至 1940 年之间垮台了。国民财富逐渐转移到外国人手里，可以达到很高的程度，例如在黑非洲：黑非洲国家国内生产总值（按货币计算）的 15% 至 80% 来自外资部门。1965 年，象牙海岸的国外收入占该国非农业产值的 47% 和国内生产总值的 32%。在马格里布（当时尚是一个垦殖的殖民地），1955 年的上述两个比例数分别为 70% 和 57%。

当然，存在着一些力量来阻碍按几何级数上升的外国利润达到计算表明的天文般的水平。这些力量阻止资本总收入成为经济中越来越大的收入份额。所有这些力量——除了货币事故(通货膨胀)或政治事故(国有化)——都是由于利润率下降而出现的。因为，如果资本报酬稳定，它的积累就会导致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增加。事情仍然是这样的，在繁荣的不发达国家的模式中(诸如罗得西亚或南非)，少数人手中控制国民财富的两极化现象越来越趋于极端。

中心国家资本占有外围国家产生的剩余，是这种资本占有主要生产资料的直接结果。这种直接占有是剩余转移的一个必要条件吗？当然不是。有理由认为技术依附将逐渐趋向通过直接占有来取代统治。对特殊类型设备供应、售后服务、零件供应、专利以及各种形式的“善意活动”进行垄断，越来越有可能取得一个企业(即使不是其法定所有者)所产生的很大部分的剩余价值份额。今天，有可能设想在一个完全依附性经济中，工业仍然是本国的，甚至是公众拥有的。

外围国家国际收支的逆差倾向

外围国家的历史表明有两个阶段是迅速相连的：第一阶段的标志是国际收支盈余，这相当于一国开放为殖民地、建立不发达经济、不发达的发展；接着是一个长时期的国际收支逆差，这相当于这种体系的危机，以外部需求为基础的增长受到阻塞。外汇本位制暂时掩盖了这种对外逆差的倾向；但是这迟早会使不发达国家不得不着手争取货币独立——这种独立不是对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办法，而只能引起更多的货币混乱。

由于不发达经济是外向性的，所以它们所有的问题都来自国际收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每一项重大的经济变革都对国际收

支的各个成分有影响。能不能说发达国家也是这样呢？在那些国家里，也难以想像任何巨大的变革会对决定本国经济同外国之间关系的情况没有影响。但是这两个问题是不同类的。确立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可行模式而使国际关系不涉及这种发展纲要，是有可能的，即：资本主义经济形成一个内聚的实体。可是这样的实体在不发达国家是无法设想的，因为这类国家从定义上讲就是无法脱离国际市场的。

所以，这个问题并不在于发现是否存在一个能保证总的对外收支自动平衡以及特别是统治的发达中心与被统治的不发达外围之间的关系自动平衡的机制：这种机制显然并不存在，至少不是能保证自动平衡的形式。问题在于要发现：为什么尽管没有这样的机制，这个体系的确还是能运转。现在，它确实在运转，并保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处于相对平衡，正如这些国家和这个体系的外围之间的关系那样。如果，在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上，这个体系在起作用，那是通过不断的危机而起作用的，这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头三分之一的古典周期性危机，特定国家的对外货币和政治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元短缺”危机，然后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危机。永远的结构调整形成了这一历史的背景——这种调整的特点总是不平衡、不对称和统治(昨日被英国统治，今日被美国统治)。

至于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关系，通过不发达国家对外逆差的永久性倾向而发生着性质上根本不平等的调整，这种倾向由于这种结构性调整而正在不断被克服。外围形成的形式符合于中心的积累需要，价格结构和相对利润率分布的建立方式说明外围的资本主义发展仍然是外围性质的，即：主要建立在国外市场的基础上。所以，这种调整伴随着外围的对外收支长期保持逆差的倾向。企图说明国际收支的不对称现象而不提结构性调整(即，国际专业化

的机制),只能是局部的和描述性的。描述“弹性”和“倾向”状态和运动的现状的说明正是这样的,这是因为它们表达了结构调整最深的机制。

这种现象是怎样表现的。如果我们假定有稳定的汇率(金本位或外汇本位),那么逆差的倾向就不断被潜在增长的放慢而得到克服。要把这种现象以统计方式记下来是很难的,因为它作为一种潜在倾向而活动,它并不以明显的外在现象表现出来。可是,当汇率被允许自由波动时,不平衡的倾向就经常反映为货币的贬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比较便于记下这种现象,即使贬值可能是由国内通货膨胀所引起的而不是由对外收支不平衡所引起的。只有了解真正的货币发行史,才能使人把责任归于其应负的地方。人们也可能通过观察不发达国家持有的国际储备(黄金与外币)的运动而设法揭露这个现象。

大体从什么时候开始,外围的国际收支变得长期处于逆差呢?这很难说,因为形势的逆转似乎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发生过。似乎看来,例如古巴和法属及英属非洲殖民地的实际国际收支是长时间地享有盈余的,这种情况使有些人错误地说货币清偿能力的输入肯定已经由实物出口所支付了。可是,早在十九世纪,几乎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汇率都在定期降低。以巴西而言,对外收支逆差在这方面的责任并不亚于膨胀性地发行纸币。阿根廷在1880和1900年之间发生了同样的情况。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对外收支——它们是基础产品的大供应国,因此比非洲和亚洲最近沦为殖民地的国家更加充分地结合进国际市场——已处在十九世纪的长期性逆差状况之下了。

二十世纪的情况是没有什么疑问的。1929年至1937年之间,各种货币的黄金价值到处都下跌了;但是不发达国家的情况比发达国家显然下跌更大。如果有些不发达国家同宗主国(法属、

比属、葡属、西属、英属殖民地同英镑区的殖民成员国)保持汇率不变,这不是因为它们在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方面没有困难。而是尽管有困难,宗主国还是这么办了,以便使收入机制的作用自行逐渐消失。我们已经看到不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它们取代黄金而成为国际货币)在1937年少于1929年,这表明逆差的倾向是长期性的。拉丁美洲的形势也反映这样一种逆差。因为即使这些国家采取压低的汇率,逆差仍然保持,这表现在它们在1927年至1937年之间(整个周期)中央黄金储备的下降,以及它们总的货币储备的下降。相反,就发达国家来说,同期间所有这些储备都增加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个比较刻板的汇率取代了以前时期的波动汇兑。可是,在不发达国家,贬值很频繁地发生,这是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准、甚至得到它的提议的。贬值有时是由于以前的国内通货膨胀而必须实行的,但时常也是由于长期性的对外逆差而引起的(逆差被通货膨胀所加剧)。与此同时,外国国家的国际储备已经减少。确实,紧接战后的时期,在若干发达国家里也出现对外逆差:在战后重建时期,这个体系几乎完全有利于美国。中心地区(美国、欧洲、日本)就整体而言,在这第一阶段结束以前没有恢复它的传统地位,在各个发达国家自身之间也不乏严重的调整问题。但是,在1948年至1967年之间,欧洲的货币同美元的相对价值只损失了5.2%——而中东的货币价值损失了38.4%;除日本以外的亚洲的货币价值损失了46.1%;非洲的货币价值损失了47.6%;拉丁美洲的货币价值损失了62.2%。

国际关系的不对称:目前的解释。金德尔伯格好像是作者中第一位设法系统地说明贸易各方对外收支状况的不对称。这肯定不是关于他所分析的不发达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而是有关欧洲和美国之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期中的关系问题。哈罗德为英国的利益辩护,责备造成“美元荒”的是美国的政

策,特别是美元对黄金的升值,加上他认为太高的美国关税。金德尔伯格根据一项总理论来回答哈罗德。他的出发点基于这样的观察:使得不发达国家成为危机形势各个阶段的牺牲品的机制类似于欧洲与美国之间关系现在所进行的机制。在1949年,即使美国的一次较小的衰退也会使欧洲对美国的出口下降约50%。金德尔伯格认为要使美国的和欧洲的国民收入的变化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得以对称,就需要完成五个条件:(一)一个地区对另一个地区的依赖程度(根据两国各自的出口对国民收入的比率来衡量)必须与数量相应;(二)通货膨胀和通货收缩的压力必须在两国采取同样的方向;(三)两国出口的价格弹性必须相同;(四)革新不应始终发源于同一国家;(五)在两国中,供给对需求的响应必须相同。

现在,在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方面,正如一般的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这五个条件。所以在国际收支方面不对称。可是,列出的这五个条件只是对现象的描述而不是解释。

同样情况也适用于劳尔·普雷维什关于中心与外围之间不对称的命题。根据这一点,收入的波动在十九世纪的发达国家(主要是英国)设想大于不发达国家。在萧条时期,国民收入的下降——在英国比在外围国家更为严重——带来当时统治中心进口的下降大于外围国家进口的下降。于是英国把这些国家的黄金吸引到自己那里,因为国际收支(设想在整个周期期间处于平衡)在萧条期间不利于不发达国家。可是,相反地,在繁荣时期,这个现象的对称使黄金流回到不发达国家:英国国民收入的较大扩张带来了英国进口水平的增加,这大于不发达国家进口的增加。普雷维什认为,在二十世纪,这个现象已经失去其对称性,因为美国的进口倾向一直在不断下降,而英国的进口倾向则保持稳定。

普雷维什的主张，认为不发达国家的国际收支在十九世纪长期处于平衡而今天则长期处于逆差，并非基于中心和外围的波动的相对大小，也并非基于进口倾向的绝对大小，而是完全基于中心的进口倾向的运动。那么，他的命题表明什么呢？相当简单：中心国家的发展基于内部市场（指所有发达国家构成的市场），而外围国家的发展则基于外部市场（发达国家）。正是这种根本的结构不对称说明了进口倾向比率的演变。但是这种运动并非二十世纪所特有。它始自外围国家结合进世界市场的时候。那么，我们如何解释为什么外围国家对外收支表现逆差的长期性倾向只在晚期才显示出来呢？提出普雷维什在他的分析中所忽视的因素，即：资本运动，普雷维什只考虑了贸易收支而忽视了国际收支中的其他项目。不发达国家贸易收支逆差的长期性倾向可以被外资流入所抵消。只在经济周期某些时期（繁荣时期）出现的这种流入，确实可以使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波动增大，但它却有助于平衡整个经济周期的盈余与赤字。的确，这种流入带有利润回流的含意，回流最终一定会在数量上超过这种流入。正是这种越来越大的利润回流，最终和已经分析过的贸易收支运动一起，造成了当代不发达国家国际收支的长期性赤字。在十九世纪期间，外资越来越多的流入超过利润回流，弥补了贸易收支的不断恶化。在二十世纪，越来越多的利润回流超过新资本的流入，增加了贸易收支的不断恶化，从而使总的国际收支更为不利。

金德尔伯格的分析依然限于贸易收支的领域，所以需要象普雷维什的分析那样同样加以完整化。而且，这种分析也纯属描述性的。为什么发达国家的进口倾向是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不发达国家的进口倾向是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价格弹性和供给对需求压力的反应是现在这个样子？

答案是强加给我们的：正是外围资本主义发展的外部市场的

地位说明了这些倾向活动的方式。因此，对于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是一种历史变化的产物，这种历史变化的阶段我们已经找出；所谓的“通货收缩”压力的原因是成熟的状态，价格弹性的原因是经济垄断化的程度——垄断化的工业生产比农业生产更坚定地抵制价格下跌，它仍然有竞争力。至于革新，显然它们一定来自发达国家，而不是来自不发达国家。这些革新以及它们在不发达国家中产生的“示范影响”，把需求从本国产品转向进口品而加强了进口倾向。最后，在资本主义结构中供给是明显地有弹性的，在资本主义结构中，有活力的企业家走在需求前头，但是在一个企业追随需求（外部需求）的结构内供给并不是很有弹性的。这种情况加剧了生产垄断化程度的差异对价格相对弹性的影响。

国际关系不对称的原因：依附性。在贸易关系中采取主动的是中心国家——中心国家把专业化的特定形式强加给外围国家。这种不对称反映外围的商业依附，这表现在中心国家的出口与它的进口相比处于前列（外围的出口服从于中心所要求的专业化形式）。

外围的商业依附被它的金融依附所加强。其基本原因是外资在不发达国家的投资自动地产生利润转移的回流。按照资本的平均收益率（在 15% 至 20% 之间），不需很长时间，利润回流就会大于资本投资的流入，而且在达到某一水平以后，对外国际收支的平衡就会倾斜。这种回流反映出新近得到资本的领域正在“打开”的阶段过渡到它正在“以巡行速度”进行开发的阶段。外国投资在不发达国家没有刺激性的副作用，意味着这种投资并不起到积累过程的催化剂的作用——那种作用可以由具有资本主义结构的国家中的外资来发挥。

在不发达国家中外国投资的条件下，国际收支的平衡需要迅速的出口增长——不但快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且快于进口

的增长。现在,有许多力量会促进不发达国家的进口增长,一些主要的力量是:(一)城市发展,加上农业粮食生产的增加不足,必须增加基本粮食产品进口(小麦、大米,等);(二)行政开支增加,超过当地经济可能性的比例;(三)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加上特权阶层的“欧洲化”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示范影响);(四)工业发展不足,工业结构不平衡(消费品工业占过大的主导地位),这就必须进口生产品和中间产品。这些力量联合起来使不发达国家依赖外援,这往往成为永久性现象。

外围国家对外逆差的倾向和外围国家通过就中心国家的积累需要来进行结构调整以再吸收这种逆差之间的特殊矛盾的辩证关系,说明外围国家的历史上为什么有一系列“经济奇迹”——当体系正在建立时出现非常迅速增长的短暂时期,继之以发展受阻、停滞,甚至退步的时期:没有任何前途的奇迹和已经失败的起飞。

外汇本位制,外围结合进中心宗主国所主宰的货币体系,消除了国际收支不平衡产生的暂时困难;即使这种不平衡是持久的,它最终也必定被收入机制的作用所再吸收。采用外汇本位制使得这个体系恢复平衡,因为它通过接受“统治性”汇率(这促进结构调整)而放慢不发达国家的增长。

如果这种货币结合被放弃而在外围国家建立独立的货币体系,这会影晌结构调整的机制吗?不会自动这样的。如果我们继续仅按不断增加的国际专业化——即首先发展向世界市场出口的生产——来考虑发展,那么只有以抑制发展(甚至是外围的发展)作为代价才能达到对外平衡。平衡的基础倾向继续在发挥作用,控制迟早会证明无效而必需使货币贬值。

在依附形成中的外围国家货币体系的作用

货币发行的所谓“反常机制”。现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都有

一个独立的货币体系，即：中央银行受权协助财政部，管理该国的国外产权，根据类似于发达国家的一些原则。实行了外汇管制和兑换，通常希望自由化有可能实现：外汇管制被认为是因为国际收支困难而遗憾地必须采取的，而不是视为经济政策的一项正规手段。

第三世界国家的货币都不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起到主要货币的作用(即使有些国家的货币是坚挺的)，因为这些国家对外收支逆差。因此，第三世界国家的外部产权主要是外汇，这是指主要货币(首先是美元，其次是英镑)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货币，特别是老宗主中心的货币。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这些国家生活在外汇本汇制政权之下。在谈到一个机体同意把它的本国货币按固定比率和无限制的数量(不加任何管制)来兑换主要的货币或兑回，这个名词是在比较狭义的意义使用的。

以这种原则作为基础的体系直到最近时期仍然几乎是所有外围国家的特点。最直言不讳的肯定是货币委员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发行本国货币的储备只是同等数值的英镑存款。实际上，这种本国货币自身并不存在——流通的只是特殊票面的英镑罢了。在法属殖民地的货币制度中，它的机制仍然支配着法郎区的非洲国家，同样的情况存在着，尽管外表上是相反的：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事实上只是法兰西银行的分理所，法兰西银行才是法郎区唯一真正的中央银行。只有它授权给公众以支持——而且只对法国财政部——只有它管理整个法郎区的外部产权。可以按固定比率自由兑换和无限制兑换，商业银行网包括宗主国银行的许多支行，各种货币群实际上是一种货币群。“法郎区”满可以称为“法国法郎区”。这里可以不谈货币区，除了有关各方在货币政策上持有某种程度的独立(那就是说，当它们的中央银行都均等地得到这类机构所特有的一般权力)，并相互以固定比率提供各自的货币。在

这种情况下，该地区中心国家的货币机构同意对外围国家的货币机构必要时提供贷款。这就是马里的例子，是真正属于“法郎区”的唯一国家。

这种自由的幅度可以扩大到几乎具有独立的本国货币体系的程度。可是，即使到那时，可以看到：在货币发行的三大可能的支持形式中（国外产权、对经济的支援、对公共金库的支援），第一种，国外因素，在发达国家中起较大的作用。这个事实反映经济活动的外源性。

可是，它使古典派经济学家提出一个新理论：即货币发行的“反常机制”，根据这种理论，货币发行在这些国家里并不与需要相一致，即定量方程式中的第二因素（ PT ：价格水平乘以交易量），而是由对外收支自动地决定的。（这一理论是夏贝尔所主张的，被纽林和罗旺所批驳，也被艾达·格里夫斯所批驳。）其结果据说是：在繁荣时期，当时对外收支顺差，货币发行过多，这引起本国通货膨胀；而在萧条时期，国际收支逆差，货币发行不足，这延迟了复苏。

我们假定国际收支顺差。进口商得到外币，他以此兑换本国货币，存入一家（外资）商业银行。这家银行掌握的现金增多，它可以对本国经济提供更多的信用贷款。如果实际上要求贷款，如果该银行同意提供，从而使清偿能力系数回复到先前的水平，那么货币形式的流动资产量就会按国际收支差额的倍数增加，如果信用货币的使用和代表性货币的使用之间具有固定的比率而决定了刻板的清偿能力系数的话。反而言之，这个理论认为，如果对外收支逆差，各银行就不得限制信用贷款量。如果本国生产厂商要求银行提供它们更多贷款，银行就不可能这样做。这正是这种论点的错误所在。

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在南罗得西亚，在1946年至1951年之间，对外收支为逆差。所以，一方面，本国货币就拿到货币委员

会去兑换成英镑以支付赤字。但另一方面，各银行则把（它们自己的）英镑兑换成罗得西亚币以资助本国贷款的大量增加。有人就会说国际收支的逆差是由国外短期贷款的流入所弥补的。这种阐述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说得很含糊其辞：它意思说这种贷款流入是由国际收支不平衡所诱发的，而且它对后者必定是同等的。

重要的是要分清我所谓的实际国际收支——它的组成是：出口和旨在长期投资的资本流入，这构成贷方；进口和外国投资的利润回流，这构成借方——和银行资本运动的收支（银行自身而不是作客户代理人的资金的流入与流出）。

实际国际收支是不论何种情况的。我说过这种收支通过收入影响具有趋于长期平衡的倾向（构成购买力转移的一种赤字），但那种赤字并没有自动地被再吸收——特别在汇率死板和转移很有限的情况下。在独立货币的事例中，除了这种收入影响以外，还有一种外汇影响（不平衡导致贬值，它以顺差或反常的方向影响收支，这决定于弹性），这有时有助于导致短期的再平衡。

至于银行资本运动的收支，这是独立的，不受实际国际收支的诱发。所以，虽然实际国际收支自动地影响流通，这种影响并无重要性，因为它可以被银行资本的运动所抵消或不抵消，银行资本总是完全由经济对货币的需要来决定的，而且它不受任何约束。

因此，虽然国际收支有赤字，流动资产的货币量、甚至流通量还有可能增加。并无证据说明货币的流入与流出是由对外收支所诱发的；这是对于以外币本位制为基础的货币体系的作用进行最佳的实际研究的结果。

这一分析把我们带到了真正的问题所在，即：商业银行网是怎样构成的？它服务于什么经济活动（外向的还是自主中心的）？如果这银行网是由宗主国银行的分行所构成的，那么反常机制的理论就失去一切有效性。但是这也适用于更大的范围，如果银行网

是国别性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感到了对货币的需要——对国内信用贷款的需求——对外赤字只导致外汇储备的减少，这反映经济外向性的缩小。

对外收支、货币量和价格运动的同时存在，并不使数量论的解释具有更大的科学可行性。在萧条时期，不发达国家的价格下跌（特别是原料价格）、货币量减少，对外收支恶化，这是正常的。但是，正是价格下跌造成了对外赤字，而不是对外赤字造成价格下跌。

外汇本位制是不发达国家的典型现象，它是经过长期的初步临时性措施以后才采取的：因此，在很长时期里，西印度群岛流通的现金凭证不能兑换成黄金但能兑换成宗主国的钞票。汇率随对外收支状况波动，因为没有有一个机构来保证固定汇率和无限量的汇兑。

总之，在整个十九世纪，各殖民地、东方各国以及拉丁美洲各国通用黄金，或者更常用白银、硬币（中国，印度，荷属东印度群岛，波斯以及除巴西以外的拉丁美洲）。外汇本位制是后来逐渐采用的，1898年开始于印度，然后到二十世纪初就到处推广了，特别是在各殖民地。1899年阿根廷采用了一种直接的金汇兑本位制，当时汇兑局承担以黄金与当地货币互相兑换。不久以后，巴西采取了同样的制度。只有中国继续使用其银元和银元宝。至于拉丁美洲，整个十九世纪它是使用纸币的出色地区，纸币在那里和银元共同流通，银元的币值略高，这决定于发行量。墨西哥后来从这种形势（汇率随银价而波动）转为外汇本位制。其他国家对于采取这一决定踌躇不前，直到二十世纪时它们最后才建立现代形式的中央制度（信用货币不可兑换）来稳定它们的货币。

拉丁美洲的经验——国库发行纸币进行流通——值得给以一定的注意。在这里，货币不是通过商业银行的信用而是通过预算

引进经济的，这就有可能数量过大。在预算发生赤字时，货币收入可以不经任何实物对等保证而增加。我们假定预算平衡的。只是由于对外收支不平衡而导致汇率下跌。这通过进口品价格上涨而带来了一系列物价膨胀。如果对外收支的不平衡是一种永久性倾向的一部分，正如不发达国家的情况（除非实行外汇管制），那么就会发生无休止的一连串贬值、价格上涨以及新的贬值。现在我们假定实际对外收支如预算一样也是平衡的。流通的货币可能证明为数不足。货币只通过国家开支注入经济，一名商人发现自己暂时头寸短缺时就去向外资商业银行求援。为了满足他的求援，外资商业银行需要更多的当地纸币即该国的法币。它们输入属于自己的资金，在外汇市场上购买当地货币。这种交易会提高汇率，这又使价格下跌。在这种情况下，货币量的确使自身调整到适应于需求，但只是在造成汇率水平和价格水平不断受到挫伤的代价之后。

拉丁美洲在以前所实行的纸币制度基础上确立了独立的货币制度，亚洲、中东、非洲的英语国家则是在以前的外汇本位制基础上确立独立的货币制度的。只有非洲的法语国家尚保持于这一运动之外。

自由决定汇率，并不意味着汇率不再由保证金决定，不再由对外收支状况决定。如果发行的货币的保证金仍然包括外汇，那么外币价值的波动将继续传导过来。至于对外收支，这通过汇率而发生作用，影响市场——不论是自由市场，官方市场还是黑市。只有外汇管制，对该国收支强制实行平衡，才能使它的货币保持良好状况。

在外汇本位制之下，当地的货币发行受到宗主国中央银行的控制，正如在宗主国的货币发行一样。这意味着信贷管制，经济学家往往过于夸大其重要性。一般说来，看到货币流通已适应于需

要的人们都反对对货币发行实行真正管理的可能性。据说，取消自由兑换成黄金和垄断的发展都是如此，（在中央银行同意下）货币发行膨胀已成为实际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信贷管理（约束或同意发放）更为重要，即使由于经济上并不需要、不可能发行货币而使信贷受到限制。

在一个依附性的外围经济中建立独立的货币制度，能使中央银行具有同样的权力来管制信贷吗？如果我们假定自由兑换得以保持，中央银行就没有权力，因为（外资）商业银行可以拒绝服从限制信贷的纪律约束而向它们的总部发出呼吁。如果在总政策上发生不一致，中央当局就有与外资商业银行发生冲突的危险。在这一斗争中，当然政府握有强制的有效手段，即：可能采取控制兑换。外国银行可能设法回避中央银行的信贷管理的一切办法，都会由于控制兑换而失效。但是对一个不发达国家来说，这必然意味着使自身排除于国际资本市场之外。的确，怎么可能区分流入的资金是来进行投资的还是银行为了给经济体系提供发展所需要的头寸呢？中央银行现在可以向迁移国外的银行发号施令了。可是这个优势是以极高的代价换来的，因为，从今以后，（一）国际收支的波动直接影响货币发行；（二）货币的外汇后盾是以实物出口来支付的；（三）外资商业银行使该国经济为它们不能再提供的一项服务支付代价——提供由稳定而广泛接受的一种货币的保证作后盾的贷款。

构成当地货币发行保证金的储备量的波动，迫使银行根据国际收支的变迁而调节信贷数量。国际收支的逆差就使它们限制发放的信贷量。限制活动量会冒加剧对外逆差的风险。反过来，对外收支的盈余对当地的经济并不带来好处。不但银行可能发现自己处在这样的境地：当地生产厂商不要求更多的信贷（因为出口量已经很大，不能增加了），提供的外汇盈余没有效果，而且，假如真的

有信贷流入，那么它带来的价格上升的倾向（加上其他影响，如：由于该国成功的出口活动所带来的繁荣而出现对当地市场的过度需求）可能阻止出口量的增长，或者甚至降低出口量，其结果，该国将很快丧失它对外部世界的有利处境。

必须补充说明，货币独立意味着不发达国家要真正付出代价。作为当地货币保证金的外汇从此以后要靠出口超过进口的真正盈余来取得，这在外汇本位制情况下并非如此：在那时，保证金可通过外资商业银行输入资本来提供，必要时可以免费。只是因为传统经济学家们不区分实际国际收支与银行资金流动的收支，所以他们能声称外汇本位制等于百分之百的黄金流通制。

确立了对兑换的管制以及最终结束了银行资金流动，外资银行体系对当地经济活动所提供的服务能说明它付出的代价是合理的吗？这个问题的确提出了一个严重困难：即银行体系对经济的真正代价。经济体系的其余部分为旨在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转而取得短期贷款所支付的利息，构成了一种收入转移，对这种转移的说明是要从历史上去寻找的。如果十九世纪所有的企业家们拥有的最初黄金库存相等于必要的清偿能力数额，如果新生产的黄金跟上了经济增长的步伐，那么短期信贷或许不会象它已有的方式那样发展。但是，事实上，黄金的流通量越来越不足，虽然它是当时社会上唯一能被接受的货币。银行善于利用这一形势以发行信用货币：可兑换的票据或者代表性货币，以换取支付利息。然后，它们肯定要冒风险，这包含在兑换性的问题上，因为企业家在任何时刻都可能要硬币。可能声称：既然兑换性已经废弃，这种风险就不再起作用了。实际上商业银行确实仍然冒一定风险，因为取得信贷的人可能总是要现钞。但是，如果这些银行接受中央银行的纪律，它们实际上是没有危险的。利息不再表现为同风险相应有关。中央银行已成为一项公共服务，为经济提供支付手段。利息不再是

这种服务的报酬，而是限制对货币需求的一种方便的办法（这可以说明凯恩斯设法以此为根据而从理论上说明利息的作用）。还有其他一些限制货币供应量的方法：对信贷从数量和质量上加以控制就增强了这些技术。无论如何，银行信贷的借户支付利息丝毫不使经济趋于贫困，因为利息款从可能成为其额外利润的人们（企业家）手中转到将成为其同类收入的人们手中（银行家的利润），即使这并不对发展速度和发展方向起到影响。

但是在不发达国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那里，利息款就是经济的真正损失。只要银行网是外资拥有的并能把它总部进出的资金自由兑换转移，这一代价可以视为合理，理由可提到为借户创造一种可靠货币的好处。可是，一俟确立对兑换的管制以后，从经济外部就没有特殊的保证提供出来了。

因此不发达国家被引导走得更远。只要外向经济结构被接受，那就没有理由拒绝外汇本位制。这的确使任何信贷管制都不可能——但是，除了在自主中心的经济社会，这种管制是无意义的。它的真正作用是中央银行有可能拒绝接受垄断资本所想望的涨价（作为有利于它们的收入再分配），可是国家认为不能接受（不论是为了经济平衡，或者甚至是政治原因）。但是一个依附性的外国经济社会则并不存在这种计划问题。

如果货币独立是必要的（这意味着把外资银行收归国有），那是因为必须把银行信贷用来服务于不同的政策——旨在加强经济的自主中心性质的一种结构性变化的政策。

依附性外围经济中银行信贷的功能和方向。针对不发达国家货币体系的批评，认为这种货币体系对经济的货币供应不是太多，就是不足，因此认为它是没有基础的。货币体系和银行体系即使是外国控制的，也对经济供应它所需数量的货币。但是那些迁居国外的商业银行的活动适应谁的要求呢？那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感到不满的经济学家，特别是货币学派经济学家装作不看到企业世界和金融世界之间存在的结构性关系。银行决不会为“总的”经济服务，而是为一个特殊的经济活动集团服务。

在不发达国家中，银行的历史同这些国家中外围资本主义建立的历史紧密相连。当国际贸易发展得规模巨大时，欧洲银行在那里建立分行以便利这种贸易。逐渐地，从这种外向部门开始，在近几十年来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背景下，银行活动扩展到面向国内市场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可是，重要的是，这些活动的一大部分（往往是主要部分）是被跨国公司所控制的。这些公司掌握大量金融资源，分布于全世界。它们根据这里或那里利率的不同，将会提取一个活动中心的银行信贷以资助另一个中心的活动。它们通过内部账目——它们的不同机构相互出售产品的常规价格——就能转移它们的金融资源而不用管可能存在对转移的任何控制。因此，当地的信贷管制政策对它们日益不起作用：事实上，要使得对这些公司的管制有效，管制就必须具有国际规模。

从另一个角度，当本国资本主义的一个部门已经出现，它就必定要建立其自身的金融机构，因为外国银行限于支持同它们有关系的外国资本。埃及的米斯尔银行的例子是典型的。在赤道非洲，当地的私人资本抱怨说外国银行经常拒绝给以支持。

如果情况是这样，那是因为货币体系的功能不能降低为提供短期资金供经济活动使用。除了这个消极的功能以外，它还有一个积极的功能，它对于积累机制的运行是重要的。没有信贷的介入，就不可能实现剩余价值。短期储蓄转化为长期投资的方式，以金融术语来说，确实多种多样。但是这种必不可少的转化总是在自主中心的经济社会里进行的，或者通过银行，或者通过专业机构，或者通过公共财政部门。在自主中心的经济社会里，金融机构便于储备储蓄转化为长期投资；可是在不发达国家中，事事都在

促进使用储蓄(包括储蓄者愿意进行长期投资的那些数额)来对经济提供短期资助(只要这种存在银行里的储蓄用来资助外贸活动)或者资助国家开支(大部分对经济没有生产性,只对公债持有人的利益具有生产性)。这里,转化机制起相反作用。

最近时期许多国家努力建立货币和金融市场,国家推动建立公共或半公共性质的金融机构——股票市场、储蓄银行、工商信贷和抵押信贷——结果却不如人意。这些挫折的原因在于不发达经济的实际情况。金融机构的建立可以很有利于动员和集中资金:如果由于外国竞争的结果而本地工业不能诞生,这些资金就会不加动用。

世界体系中外围地区的货币混乱和通货膨胀。外汇本位制的批评者不但责备这个体系不容许符合于本地需要的管理,而且宣称它赞成把那些波动自动转为主导货币的价值。

的确,正如布洛赫-莱内写道:“当产品可以自由交换,不同的货币实际上是一种货币时,各处的价格水平必定趋于相同;如果不是这样,差距就归咎于不受货币影响的结构原因(例如运输费用、劳工费用、动力费用)。”可是,在取消按固定汇率进行无限制兑换的地方,在使用以外汇为后盾的有管理的货币的地方,这种单方向的影响却基本上仍然依旧:如果所有外汇的价值降低而使当地货币拥有的保证金价值跌落的话,这种货币本身就很快失去其初始的价值,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公众的信心。

当地货币之降低价值,不仅是因为进口货更贵了。人们很可以设想内部价格的上涨仅限于国际部门,而国内部门不受影响。当汇率调整时,这在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往往会发生的。这里显然有个自相矛盾的情况:在发达国家中,在那里,所有的活动部门“紧密结合在一起”,一次价格上涨可以局限于一个部门,而在不发达国家里,两个部门共处一起而相互并无渗透,经济并不构成一

个完整的统一体，同国际市场有联系的资本主义部门的价格上涨却会全部影响到看来似乎独立的本地部门。

要说明这种现象，或许应当通过分析人们的行为来找出答案。有一些人只是力求把自己的名义收入适应于价格水平。他们追随经济运动。他们的行为是中性的。相反地，另一些人——他们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类别的人——则不断设法找出货币价值的未来动向。因为他们掌握着货币储备，当一个巨大的信用因素插进来决定货币价值时，他们就对其活动方式施加重大的影响。在不发达国家中，拥有大额收入的人往往是地主。他想的是怎么花钱，他知道他要的奢侈品必须从国外购买。货币价值对他来说意味着有关的外汇价值。相反，在发达国家里，拥有高收入的人经常是企业主。他想的是把他的金钱用来投资，他知道他的大部分生产开支——购买机器，支付工资——将在他所在国里得到补偿。他的想法是，国外的货币贬值并不使本国的货币贬值，只要外贸供应他本国的国内市场。康迪拉克在他的《论商业的性质》一书中专门用一章来研究统治阶级决定一切产品的价格和产量的机制。

资本主义制度在垄断时期的活动中特有的那种持续不断的爬行式通货膨胀(这导致了取消货币对黄金的自由兑换，并提供了货币政策的框架)，从而把价格长期上涨的环境从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传到外围。

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在货币稳定和价格下降的环境下进行的(价格的下跌是由发展所带来的，这反映在实际成本的稳步下降)。可是，在不发达国家，外围资本主义的当前发展却是在外界传来的价格上涨的环境中进行的。

常常有这样的看法：通货膨胀损害自由储蓄而有利于强制储蓄。这只有当国家——通货膨胀的推动者——利用它创造的购买力来进行生产性投资时，情况才是这样。更一般地说，通货膨胀是

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方式。在不发达国家里，从外部传入的价格上涨使外国垄断资本的利润侵占较薄弱的本国部门的份额。这种转移根本不是仅仅一种理论机制。大多数黑非洲国家过去二十年中在某些活动部门(公路运输、林业、建筑、等等)实行的非洲化，伴随着这些活动利润的显著下降，而有利于外资所控制的活动(不论处于逆流或顺流)。这种利润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价格上涨所造成的，这在各部门之间是不平衡。不发达经济中的其他强有力成分常常包括地主。由于通货膨胀，他们把额外收入花在进口的奢侈品上。而且，在总的价格上涨中，工资与利润比率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中情况很不相同。在发达国家，广义而言，工资随物价而上升，因此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提高经常在这两类收入中不断分享。在长时期中，经验表明，工资所分享的部分大体相同。在不发达国家中，工资随物价而上升的情况要差得多，由于深刻的结构性原因，而且首先由于前资本主义农村环境的解体所导致的劳动力供应过剩的压力。尽管生产率在提高，实际工资至多能设法保持稳定。适用于工资的情况，也适用于从事商品生产、尤其是出口商品生产的农民的收入。爬行式通货膨胀是双重贸易要素条件恶化的一个主要因素，会加重不平等交换。

发达中心国家中的爬行式通货膨胀传递到整个世界体系，显然并不是外围国家中通货膨胀和货币混乱的唯一原因。伊莱·洛贝尔认为，必须分清三类混乱。头两种混乱(公私消费超比例的增加，以及工业化带来的紧张)来源于经济内部并可能对于对外收支有影响，而第三种混乱则来源于对外收支。

公私消费的增加速度大于生产性经济的增长率，其表现为预算赤字，或者超比例的消费信贷，或者以信贷来弥补企业的结构性赤字，这是内部根源不平衡的最常见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有必要使货币贬值：其效果相当于税收增加和需求的随后减少，虽然

这些效果是较少选择性的。

有些紧张状况可以触发价格的盘旋上升而供求总量则并不失去平衡。这设想为平衡的预算、不左不右的信贷政策(产生的清偿能力不超过希望增加的现有现金数)、同样不左不右的工资政策(工资随生产率步伐上升),而且国际收支方面没有困难。然而加速工业化的政策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的紧张局面,如果消费品特别是食品的生产比工业就业发展得慢,这存在着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危险,那样就会使工资增加和所有价格的上涨,报酬增加而收入延缓的结果会造成公共财政的赤字和对外收支的紧张,因为价格上涨限制了出口可能性,最终影响货币领域。实际上并没有办法来避免这类紧张,这必然伴随着加速发展:这种紧张只能靠不断的调整来加以约束(例如,国家财政结构的调整)。显然,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使形势更加恶化。

以“进口替代”为基础的工业化政策,即使我们认为农产品现有产量与工业就业并驾齐驱,如果幼小的工业生产成本高于它们所替代的进口品价格,那么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可能不得不贬值,这将产生对幼小的工业起保护性关税的同样作用。可是,如果要避免国内价格普遍上升的话,(多种汇率)必须有选择性。

对发源于对外国际收支的不平衡的分析,是从最简单也是最基本的事情上开始的:由一种主导货币所引起的外部通货膨胀的大规模影响,这种情况发生在结合进一个货币区的国家,或者一个虽未结合进货币区,但却具有重要的双边外贸结构的国家。这里,制度的僵硬性不容许采取许多调整。在世界范围,当通货膨胀从那些本国货币用作世界上其他国家储备货币的国家扩散开来时,这类情况也会发生。

出口价格的下跌——如果这造成对外收支的失调而可能采取

任何行动来改变汇率,那又当别论——必定使进口减少(那并不总是和出口国的收入下降相一致的),最后使不同产品的供求之间发生部门的不平衡以及和以前情况相同的价格盘旋上升。这里重要的是设法把主要的供应保持在满意的水平上以打击可能的投机活动;但是这并不总是能做到的。

但是,出口价格的上升并不总是产生不对称的不良影响。相反,我们在这里看到国内价格同外部价格联结起来的倾向,如果收入过多而供应弹性很弱,价格的不断盘旋上涨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它在理论上为加速积累提供可能性)就这样常常阻碍这种潜在的额外积累得以实现。

不发达的这种结构性情况大大减少了掌握对外关系并使之为发展政策服务的可能性。所以,重要的是,不要把“发展性通货膨胀”(一些国家在某些时期曾经有效地实行)和“不发展的通货膨胀”(那是不发达国家所经历的)混淆起来。

第三世界的通货膨胀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实际上只局限于拉丁美洲)在最近二十年中已成为一个常见的因素。扎伊尔由于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国家官僚——突然当权而引起通货膨胀,这个阶级设法吞并一部分国民收入,但是他们无法严重侵犯外资占有的部分(因为这种资本的一些活动的外向性,或者就金萨沙的自主中心工业集团而言,因为这些外资企业强大得足以使自己适应于通货膨胀),也无法直接从农民群众那里直接征收贡赋(农民以公开叛乱进行抵抗,或者通过停止出口生产以进行消极抵制)。在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在为期八年的通货膨胀以后恢复了某种平衡,其标志是:扎伊尔的相对价格和实际收入与1960年的情况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反映农民和低工资收入者的收入转移到新的统治阶级手中(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削减一半)。这种平衡是一种后退性的平衡,其内容更多地偏向于新特

权阶层的消费，所以公共财政的平衡和国际收支的平衡(前者有赖于此)都是极为脆弱的。

今天第三世界的大部分通货膨胀是这一类型的——例如，苏加诺的印度尼西亚的通货膨胀，马里的通货膨胀，或者在若干拉丁美洲国家的通货膨胀。在某些情况中，与这类通货膨胀并列的是一种与工业化失调进程有关的信用膨胀进程，同样由于这种新官僚占统治地位的原因，这种信用膨胀作用平平。

这些特殊的调整过程是有关通货膨胀的结构主义论点的背景。但是没有通货膨胀也能取得同样的结果。因此，在黑非洲的前法国殖民地，那里的货币制度禁止任何预算性通货膨胀，赋税负担的累进增加采取了间接税的形式，这减少了农业生产者和城市工资收入者的实际收入而有利于上述情况中的同样社会阶层。

在有系统的自主中心发展的国家政策的背景下，例如在 1877 年至 1914 年之间发生在日本的情况，通货膨胀用作一种强制储蓄的方法，则很不相同。在这里，国家对老的商人家族(他们在 1870 年前后转变成工业家)的援助是通过无抵押贷款来进行的。这些贷款对市场有重大影响，使价格上涨，从而有可能使购买力从农民群众手中转移到新资产阶级手中，新资产阶级利用这些购买力来支付他们从国外进口的机器。在通过生产取得实际储蓄以前，这种蓄意考虑的信用膨胀使投资有可能进行。货币发行总是赶在需要以前，肯定带来价格上涨，但它基本上使经济活动水平有可能增加。国家产生的、有利于企业主的部分购买力流向了国外市场，因为有必要进口大量机器。这些进口是通过出售本国的金银库存来支付的。在日本，进口超过出口是由于投资货物进口突然增加，而不是象在不发达国家那样由于收入转移到寄生性的富人阶级手中而使奢侈品进口增加的结果。那不是总的对外需求上升，而只是对投资货物的需求水平上升。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外收支的困难

是通过国内通货膨胀的增长加速的结果，而不是价格上涨的原因。

对比这种类型的发展性通货膨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不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和价格上涨的类型，是很有意思的。这里，价格上涨虽然来源于内部，但却和国际收支有密切联系。可是，它发生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中，所以它对积累的一些消极作用就不能具有具体的形式。

的确，由于英国和美国的需求正如在繁荣时期那样，在战时也增加了，并且由于这些国家在战争期间出口制成品的需要和可能性都减少了，这些情况导致海外各国贸易比价的改善，这有利于当地的积累。通过国际收支的改善而实现的这些额外收入中的一大部分在平时就会花在奢侈品进口上。于是，这些额外收入部分地成为一种强制储蓄而很快在当地进行投资，这种情况更是由于没有外国竞争和进口大大减少而有利于本地工业的发展。的确，有些相反的力量与这种发展背道而驰，例如由于不可能进口化肥而使农业生产率下降以及从欧美进口机器的困难。因此，这种额外收入的一部分流入当地市场去购买奢侈品（建造豪华别墅，等等），这就引起价格上涨。而且，这种无约束的奢侈品消费导致对快餐业进行投资，这成为当地奢侈品开支的发展中心之一。同盟国国际收支的部分赤字靠出售黄金储备来支付，而且特别靠外国投资转为当地所有（从这些投资中赢利最少的项目开始）。就这种方式而言，战争有助于当地的资本形成，仅由于所有权的转移，其结果是：后来实现的利润就不再外流了。以后，欧洲国际收支的赤字是以跌价的货币或“战时外债”（例如英镑信贷）来支付的，由于欧洲货币的通货膨胀，战时外债也跌价了。这样，欧洲的通货膨胀传到了海外各国，由于国外军队的开支而使通货膨胀更趋严重。

尽管对当地发展具有特别有利的条件，最后的结果却很微弱。通货膨胀反映为总投资增加，但与此同时，战争造成了资金的滥用

(破旧磨损的设备不加更换,例如铁路、公路、码头,等等),结果,很难决定净投资是否起积极作用。总之,这种类型的通货膨胀似乎在作用上是消极的。确实起了积极作用的不是通货膨胀,而是外国竞争的暂时消失。

因此,货币结构在不发达中不是主要之点。不论是什么货币结构,资本主义体系中外围地区的货币价值是不能和占统治地位的中心地区的货币价值不一致的。

外围在世界危机形势运动中的作用

当前的经济理论把不发达国家同早期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等同起来,不考虑外围所特有的危机形势的现象。它回避这个现象而采取由发达国家传递到不发达国家(或者通过货币机制,或者通过外贸乘数的机制)的有关危机形势的机械理论。实际上,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经济社会并无自身的危机形势现象,即使是从外界传递来的,因为它们没有自身的内部动力。

可是,外围确实在全世界周期发展或危机形势波动中具有重要地位。它牺牲了前资本主义环境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可能扩张的场所。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扩张对积累机制的运行并不重要,它的确在中心国家起到增长的催化剂和加速器的作用。从这个观点说,它在殖民化的初期肯定起了重要作用。它在当前时期似乎已经失去了这种重要性,但是在国际专业化的新结构背景下可能恢复。

对经济传递论的批判。 同哈伯勒和克拉克提出的图式相反,不发达国家所经历的经济摆动与周期并不相似。当发达国家中形势有利时,不发达国家的出口水平上升。

在这些国家中首先得益的收入主要是地租收入。资本主义类型的企业的大部分利润都外流了,工资可以认为是相对稳定的。

可是，地主收取地租的弹性使这种收入吸收农产品出口的价格上升和数量增加所带来的补充收益。小农也从这种繁荣中有所得益（虽然不如地主，因为他们必须对付中间人，那些商人可以吸收一部分额外的收入）。这种地租的繁荣反映在奢侈品进口的显著增加以及小农所购买的廉价制成品进口水平的较少增加。相反地，如果发达国家中的形势不利，初级产品售出量减少、售价下跌。不发达国家的整个经济因此而受害，但是比较刻板的工资受到的影响比地租少。利润量也缩小了，从定义上说它们仍然被输出，所以并不影响不发达国家的形势。可是，如果出口下降，而且地租随之下降，那么奢侈品和农民消费品的进口很快将蒙受同样的命运。

所以，周期根本不是通过国际收支传递的。国际收支在繁荣时期和萧条时期都继续保持平衡，因为出口、地租和进口都以同样的方向变化。哈伯勒的分析在具有中心资本主义结构的国家间的关系上可能有一定的可行性，但是在中心和外围那样结构如此深刻地不同的国家间的关系上则是毫不适用的。

我们能不能说周期是由交换量的波动所直接传递的呢？不能，因为外贸乘数分析的特殊作用是表明对外交换量的初级波动（由于国外危机状态所引起的波动，这构成一个独立的数据）引起次级的国内波动。这儿我们没有这类情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发达经济社会中没有真正的周期。由于地租在这些经济社会中构成弹性的收入，这意味着乘数在那里并不起作用。由于出口值增加而导致的现有购买力的增加并不是把主要的钱花掉而部分地储蓄起来——它是全部花掉的。需求的增加在这里并不带来诱发的投资。由于加速作用已转移到国外，所以就没有真正的周期，甚至没有传递来的周期，而只有总收入的正弦曲线摆动。

对世界危机形势的历史进行研究，得出了以下的看法：

（一）实际总收入的波动，在不发达国家总的说来似乎不如发

达国家那么显著，至少在二十世纪——这并不意味着在某些不发达国家可能并非更加显著。而且，虽然危机性波动的严重程度在不同发达国家之间可以相比，这方面对不发达国家的“波及”却很大。根据一国结合进国际市场的程度，波动相应地更为剧烈。在充分结合的国家里这种波动的剧烈程度可能不亚于最发达的国家。

(二) 在 1900 年至 1970 年之间，初级产品出口价格单位价值的波动，根据特定的产品，其幅度在 5% 至 21% 之间。在三个和平时期中，这些波动的程度在相继阶段中有增加：1901—1914 年，每年为 11%；1920—1939 年，每年为 13—15%；1946—1965 年，每年为 18%。出口量的年度波动平均为 19%。1945 年以后，它们增至 24%。出口量的周期性波动平均与价格波动的程度相同。最后，出口收入的波动(出口价格与出口量波动的积累影响)的年度值与周期值都达到 22%。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强烈程度日增：1901—1913 年为 19%；1920—1939 年为 21%；1946—1965 年为 30%。实际价值的变化(由名义价值的变化除以英国制成品出口价格指数而得出)表明：实际价值的变化(1902—1960 年期间为 13.5%)与名义价值的变化(13.7%)是相同的。

(三) 不论在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贸易收支的行为方式并无确切的规则，因为出口与进口都以同样方向和类似比例变化。即便如此，不发达国家的进口与它们的出口相比具有收缩较小的某种倾向。

(四) 发达国家贸易的收缩，主要是由于它们的进出口量都有收缩。可是，不发达国家的贸易的收缩，则主要是由于它们的出口价格的下跌，由于这表现出来的它们贸易比价的恶化，以及由于这导致的它们实际进口能力的削弱。

(五) 国际收支的周期性运动是由于资本的运动，远不是由于

贸易收支的运动。出口值的被动并没有因资本运动的同等反波动而被抵消。相反，这些摆动加强了资本运动的波动。正是在萧条时期，外资流入外国国家最少。所以，当出口总值的波动被进口的同等波动（与地租运动有关）所抵消时，资本运动的摆动（这加强了贸易收支的条件）具有周期性地从这个或那个方向破坏对外收支的作用。确实，外资输出利润的外向运动有助于缩小这种动荡。事实上，在繁荣时期，当外资在流入时，利润外流的量也是最大的。然而，资本运动波动的程度往往证明是大于利润运动的波动的。

（六）1914年以后，国民收入的波动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都大大加剧了，正如进出口和价格的波动也是这样。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波动已失去其正规的周期性性质，而让位于以有限程度运动的变化不定的危机形势。

（七）不发达国家中工业生产的波动取决于其产品的去向以及有关国家对外贸的依赖程度。不发达国家中农业收入的波动取决于同样的因素，即：经济活动的外向性还是自主中心的性质。

（八）不发达国家实际总收入的波动往往小于发达国家的情况。可是，按当前价格的收入波动显然更大，这是因为这些国家中价格的极大易变性。

从这些观察中，我得出以下四点看法：

（一）周期并不是通过货币量的波动而传送的。不发达国家的国际收支在繁荣时期是顺差、在萧条时期是逆差，这是事实，但这些国家看到它们的国际清偿能力时增时减而国内流通则保持不偏不倚，即相应于货币收入的比例（实际收入乘以价格水平）。

（二）周期也不是由贸易收支通过乘数作用而传送的。贸易收支的情况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里事实上是极为变化多端的。必须补充：即使当不发达国家的贸易收支是顺差时，我们也看不到这种净盈余所产生的次级诱发投资的浪潮。

(三) 因此，很简单，周期就是以出口为生的那些农业经营者收入运动的周期性，其形式是出口贸易比价的周期性恶化。这种摆动对于面向当地市场的工业生产具有次级影响，也对整个服务业有影响；但是只要这种摆动与进口运动相一致，这些影响就比较轻微。不发达国家的周期只是它们进口能力的周期。

(四) 在国际性周期中，不发达国家在复苏时刻起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们通过前资本主义环境的可能解体而为发达国家的出口品提供了补充性出路。在衰退时期，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往往比发达国家本身之间的贸易下降得少些，而且发达国家的进口在萧条时期增加了(特别是十九世纪的情况)。

外围在世界危机形势中的作用。 在国际性复苏的机制中，外围起的作用远不是微不足道的。问题在于，不论萧条可能有多严重，它在不发达国家结束得早于中心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因为它在不发达国家里程度较浅。在发达国家的一次萧条中，大量工人群众陷于失业。所有的收入都收缩了——首先是利润，但工资也收缩。在先前的繁荣时期中，新企业建立起来，而现在开工率降低了。闲置的生产能力的负担沉重，使复苏更为困难。另一方面，在不发达国家，虽然主要的收入形式地租的摆动很大，但大部分人口的混合收入则并非如此，特别是自给经济的收入。从某一时刻开始，比较死板的不发达市场可能成为一个复苏的因素。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与中心之间存在的交换关系使中心国家有可能通过当地前资本主义经济的解体而找到新的外部市场。

在萧条时期末了，原始的本地生产的进一步解体反映在发达国家出口的新浪潮。可是，这引起的货币收入的分配意味着未来的进口增加。因此，打开新的对外出路并不是对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从理论上讲，为了复苏并无必要对资本扩张打开新地盘。这种复苏主要是由于资本更为密集的新技术的普遍采用而引起国

内市场的深化。可是，我们观察到，在中心地区的每次萧条以后，在外围地区的新出路打开了，因此它在国际性复苏机制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在繁荣时期所特有的积累过程中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因为以总收入增长作为标志的繁荣的发展，反映在利润所占的份额增加，最后反映在积累起来的相对储蓄量的增加。工资所占的相对份额降低。因此，消费能力日益落到生产能力之后。额外储蓄的投资所生产的新设备，用不了很久就把大量消费品投入市场而无法被吸收。加速的作用在一定时期维持了新设备有利可图的幻想，由于绝对消费量的增加而有此必要。因此，消费品生产过剩，因为分配并用于购买消费品的购买力（主要指工资）小于消费品的总产值。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也继续掩盖这种不平衡，因此有助于延长繁荣期。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交换，当然并不构成对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总生产过剩的解决办法。即使并无前资本主义环境解体的情况，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也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在交换上总走在落后伙伴前头的发达国家却采取进攻姿态，向它们的落后伙伴出口。只是到后来，不发达国家的结构才有变化，使自己适应于发达国家的生产演变，以便有可能向它们出口初级产品。所以，不平衡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与外围间贸易关系的一个永久性特点。然而，这种永久的不平衡却总是被纠正。所以，在最发达国家的发展中，不平衡只起类似于信用那样的催化剂作用。正是那些有可能在繁荣时期中会生产过剩的产品——即消费制成品——才是首先在外围经济社会中寻找出路。相反地，发达国家在繁荣时期对产量相对最少的产品日益增加的需求，使不发达国家进行结构调整以适应最发达的经济社会的需要。不发达经济社会专门生产的商品的供应量在繁荣时期往往少于发达国家对它们的需求：有助于发达国家设备的初级产品——主要是原

料。消费品与中间产品的交换——前者供过于求，后者求过于供——因此在发达国家造成上升的趋势。现在我们可以更好地评价外围在世界危机形势中所占的实际地位。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扩展到外围国家，对于积累机制的运行并不重要，这种扩展却对中心国家的增长起到催化剂和加速器的作用。

例如，当前时期的情况就是这样。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以来，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出色增长的时期，第三世界在其中只起很次要的作用。正是西欧的现代化才是这一“奇迹”中的重要因素。现代化意味着资本主义市场的深化(而不是扩展)，这种解决办法通过不同方面因素(诸如政治方面的因素，例如对共产主义的惧怕)的结合而成为现实——马克思和列宁表明这是可能的——从而排除任何机械的“经济主义的”解释。欧洲共同市场和美国资本的流入欧洲是这一现象最明显的表现。

可是，虽然这个时期中资本主义向外围的扩展并未起重要作用，这并不意味着它总是如此，也不说明它将来也总是如此。在过去，十九世纪期间资本主义市场向各个殖民地扩展的非凡浪潮对中心国家积累所采取的比较和平的道路肯定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最初浪潮决定了中心与外围之间国际专业化的一系列初期形式，当然外围使自己适应于中心的要求。这些适应的形式在达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就意味着对资本主义扩展机制的障碍——由此而出现了三十年代的危机。

1945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增长方式转而趋于耗尽它的种种可能性。世界货币危机或许是这方面的一个征象。由什么来接替确保资本主义增长的作用呢？我看有三个可能性。第一，把东欧国家不断结合进世界市场并促使它们现代化。第二，当代的科技革命，自动化、征服原子、征服空间等等，可以对市场的深化打开巨大的可能性。第三，也是最后一点，资本主义向第三世界扩展的

新浪潮，其基础就是当代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新型国际专业化。在这方面，中心国家将专门从事最现代化的活动，而至今尚为它们所保留的传统工业的形式则转移到外围国家去。外围国家使自己适应于中心国家的要求，将再次在世界范围的积累机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第五节 对过渡的障碍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拥有三种手段来制止利润率下降的倾向——这些手段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积累动力的三个深刻倾向。第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作了详尽的研究，即：增加剩余价值率；换言之，在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国家中加剧资本主义的剥削条件，这意味着相对贫困化。第二种手段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到剩余价值率较高的新地区从而有可能通过不平等交换而取得超额利润。第三种手段包括制造各种形式的浪费：销售费，军事开支或者奢侈消费，使得那些因利润率不足而无法进行再投资的利润仍然花费掉。马克思对这第三种手段只是稍稍涉及，它是在当代大规模发展起来的一个特征。

这里我们要讨论的只是资本主义所包罗的扩张领域。需要掌握的是：这种扩展是中心资本主义的活动，它在力求从这方面找出解决其自身困难的办法。正是因为中心资本主义在这种扩展中掌握着主动权，因此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关系继续处于不对称——确实，正是由于这一点，所以外围存在着，而且还在不断更新。

向外围资本主义的过渡已经显示了这种不对称，反映出主动权操于中心之手。外围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是在来自中心的竞争结构（就这个词的最广义而言）以内进行的，中心决定着外围所采取的不同结构，外围处于补充性的、被统治的地位。正是由于这种

竞争，就决定了外围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中心资本主义相比的三种畸形：（一）趋向出口活动的一种严重畸形，它吸收了来自中心的大部分资金；（二）趋向第三产业活动的畸形，它来自外围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和外围形态原来的结构；（三）选择工业部门方面的畸形，趋向轻工业部门，并在这些部门中使用现代化技术。这三重畸形反映外围结合进世界市场的不对称方式。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意味着乘数机制从外围转移到中心而使中心的积累能不断积聚地进行。由于这种转移，导致了不发达经济的突出脱节、二元结构、乃至经济增长受阻。

正是由于趋向出口活动的畸形，构成了出现一种依附性的、受局限的发展形式这样的障碍的主要原因。事实在于：中心对外围的初级产品（农产品和矿产品）的需要，广义而言，是以中心的平均增长率为转移的。外围国家必须以出口来支付日益增加的进口，出口必须增加更快以便保证能补足被外资所输出的利润。因此，中心的增长率决定了外围的增长率。当然，这种障碍只是相对的。从理论上说，这并不是无法克服的。并不存在贫困的恶性循环使得真正的自主中心发展不可能出现，使得倾向于出口活动的方向不可能打破。大规模有组织的投资可以通过扩大本国市场来产生自身的市场。但是这意味着突破利润的规律。

经济学家们希望保持对利润规律的尊重，因此他们不愿拒绝对外国资本投资的需要。对外资而言，面向国内市场的本地投资如果不能使出口按需要量增加（或者使进口按需要量减少）以便让外资赚得的利润输出，那么就会加剧对外不平衡。由于以大规模引进外资为基础的经济的改造会带来直接或间接诱发进口的巨大浪潮，对外平衡的要求严重地限制了由外部资助的自主中心发展的可能性。

经验表明：不发达的发展与中心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相比，是

既不规则的,也不是积累性的。相反,它是不平稳的,有些阶段增长得特别快,接下去却又突然受到阻塞。这表现在一种双重危机上:对外收支加上公共财政的危机。

我们假定一个外围经济社会的年增长率为7%。要得到大约3%(一种温和的估计)的资本—产出比,投资就应达到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我们假定这些投资的一半由外资提供资金,利息率为15%(也是一种温和的估计)。如果进口增加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同,那么只有在出口年增长率大大高于12%的情况下对外国际收支才有可能保持水平。下表说明这种增长动力中的各个要素。

	0 年	10 年	20 年
总的经济平衡			
国内生产总值	100	200	400
+ 进口	25	50	100
- 出口	15	53	135
= 流动资产	110	197	365
公、私消费	90	157	285
+ 每年投资	20	40	80
(其中,外部资金)	(10)	(20)	(40)
(累计外资)	(0)	(150)	(550)
国际收支			
出口	15	53	135
+ 外资流入	10	20	40
= 总计	25	73	175
进口	25	50	100
+ 利润回流	0	23	75

而且,如果赋税负担达最大限度而且保持不变(例如,分配收入中的22%假定全部用于消费品),考虑到资助公共投资的需

(另一半投资)，公共财政的平衡就要求当前公共消费的预支增加较慢(只能在4%或5%)，那就是说，当前的公共开支应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越来越小的比例，如下表所示：

	0 年	10 年	20 年
国内生产总值	100	200	400
国民消费	90	157	285
公共收入	20	35	64
公共开支：			
当前开支	10	15	24
投 资	10	20	40

很清楚，事情不能象这样进行下去。虽然某一特定产品或某一特定国家的出口可以在某一时期以很高的速度增加，可是就整个外围地区而言，对中心国家的出口不可能增长得快于中心国家的需求——那就是说，大体按中心国家的增长率：一个国家坚持其国际专业化的基础而能克服其历史形成的不利地位，那是不可能的。但是，首先，在这个基础上，向外围的进口增加必须快于国内生产总值。从历史角度来观察，这个倾向可以由两个基本原因来容易地作解释。第一，国际专业化意味着外围国家生产活动范围的相对缩小，而反映增长的收入增加则意味着需求范围的扩大。第二，国际专业化所特有的脱节情况意味着中间产品进口的更快增长。此外，资本形成和公共开支的直接与间接进口比重极高。

从另一方面看，当前的公共开支必须增长得快于收入。这种要求也有几个原因。对国际专业化所要求的基础结构的公共投资，包括了经常性的活动开支，这会象累计投资那样增加，即大大快于国内生产总值。保证对增长有重要作用的社会服务(教育，保健，不必说传统的行政需要了)相对而言不能剧烈减少，相反地，这里的自发倾向却是使这类开支的份额增加。而赋税负担是有限度

的。

因此，公共财政和对外财政的双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其后的增长将会受到阻塞。如果低水平的国际一体化不开始，如果不能突然开发使中心感兴趣的一种资源（从而有可能使出口大增），如果由此产生的繁荣不能吸引外资的大量流入；如果赋税负担不能保持较低而且不断减轻，那么这种动力的机制就不可能发生作用。增长必须是很强有力的：将会出现“奇迹”。但是这最后会告终的：不论达到什么样的人均收入水平，并不出现“起飞”。因此，至今为止并没有一个不发达国家已经起飞，不论是那些人均收入在二百美元左右的国家，或者是那些人均收入高于一千美元或两千美元的国家。在那里，自主中心和自主动力的发展是决不可能的；而在中心国家则一开始就有可能，甚至是在收入水平很低的情况下。

因此，说明外围结构的那些特点，并没有随经济增长的推进而削弱：相反地，这些特点却加强了。在中心国家，增长意味着发展，使经济更加完整一体，可是在外围国家，增长并不意味着发展，因为增长使经济脱节——增长只是“不发达的发展”。

我们看到，把不发达等同于低水平的人均产值，那是很错误的。科威特在1960年的人均产值（3,290美元）毕竟大于美国（3,020美元），委内瑞拉的人均产值（780美元）高于罗马尼亚（710美元）或日本（660美元），而葡萄牙的人均产值（349美元）比一些非洲国家也大不了多少（加纳为230美元）。加蓬今天的人均产值大体和法国在1900年的人均产值相等。

第五章 外围地区的当代社会形态

第一节 当代外围地区的历史形态

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国内市场的扩大与深化为基础时就具有排他的倾向，与此同时，中心的社会结构具有接近《资本论》的纯粹模型的倾向，其特点是社会阶级两极分化为两大基本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以前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的社会阶级（地主，手工业者，商人，等等）或者消失或者转变（例如成为农业资产阶级）。的确，这种社会制度导致新的阶层划分，与此同时情况较为简单：“白领”和“蓝领”，干部与不熟练工人，本国工人与外国工人，等等。但是这些新的阶层都位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重要分野的结构以内，因为所有新发展的社会阶层都是由资本主义企业中工资收入的职员组成的。所以新阶层的划分不是经济关系——因为从这个观点看，新阶层的地位都是相同的，都是出售自身劳动力的人——而是政治关系或意识形态的关系。而且，由于垄断资本的形成而使企业集中的情况改变了资产阶级的表现形式。但是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而造成的所谓二分法（以 J. K. 加尔布雷斯所杜撰的话来说，据说控制权转到了“技术阶层结构”之手）则只是幻想而已。因为“科技治国论者”所作的决策是符合资本的逻辑和利益的，而资本则进行越来越集中的控制。社会结构被经济运动所直接塑造的事实导致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化，即导致经济主义。造成的一个幻想是认为经济是超越社会的一种力量，它是社会无法控制的。这就是现代异化的根源，也是经济学声称包罗整个社会科学的原因。

可是，如果从外部引进的——就是以国外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倾向于排他，而只是占主导地位的话，那么外围的形态就不会趋向这种重大的两极分化。与中心国家社会形态日益类似相对照，外围国家的社会形态则始终是不一样的，这并不是意味着仅仅相互并列。因为，正如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里结合进一个屈从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的不同目的的体系（农民继续在他以前的生产方式的背景内从事生产，但从此却生产出口到中心国家去的商品），所以新的社会结构形成一个结构性的分层的整体，它是由殖民社会“不在当地的巨头”所统治的：占统治地位的宗主国资产阶级。外围地区的经济制度不能就其本身加以了解，因为它和中心国家的关系是重要的；同样地，外围国家的社会结构是一种掐头去尾的结构，只能当它作为世界社会结构的一个成分时才能了解。

外围形态采取的形式最终将一方面取决于受到进攻的前资本主义形态的性质，另一方面取决于这种外部进攻所采取的形式。

受到进攻的前资本主义形态有两种主要类型：一方面是东方的和非洲的形态，另一方面有美洲形态。前者是一些综合体，一方面由不同的生产方式构成，主导的方式是纳贡制方式——或者是初期形式（即以现有村社为基础）或者是发达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就逐渐转变为封建生产方式），简单商品方式和奴隶制方式是服务于这种主导方式的——另一方面通过与其他社会形态进行远距离贸易的生产方式构成。简单的早期形式是非洲类型，发达的形式是亚洲与阿拉伯类型。美洲形态则不同。当欧洲人发现新世界时，那里并非无人居住的，但移民很快进入，他们大部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心国家取得最后胜利以前（即在产业革命以前）到来的。土著居民或者被驱赶或者被杀灭（北美洲、西印度群岛、阿根廷、巴西），否则就完全屈从于欧洲商业资本的要求（南美洲的

安第斯地区)。这种进攻也采取各种形式。美洲、亚洲和阿拉伯世界及黑非洲并不是以同样方式转变的，因为它们没有结合进中心地区资本主义发展的同一阶段，所以并未完成这种发展中的同样功能。

关于美洲已有不少系统的研究，所以不必多谈这个大陆。更多的篇幅将集中于阿拉伯世界和黑非洲。

美洲的外围形态

美洲在当代世界体系形成中的重商主义时期起了重要的作用。一开始，哥伦布到达前的社会形态不是被摧毁就是屈从于欣欣向上的欧洲中心国家的商业资本。商业资本是充分发展的资本的前身，它在美洲建立了许多附属体，其形式是剥削贵金属（主要是白银）并生产某些异域产品（食糖，后来是棉花，等等）的企业。垄断着这种剥削的欧洲商业资本家这样就积累起货币资本以供其后资本全面发展的需要。剥削采取各种形式：“拟封建制”（拉丁美洲的监护征赋制）或者“拟奴隶制”（矿山）或者奴隶制（巴西、西印度群岛以及北美南部的英国殖民地）。它们都仍然服务于初生的欧洲资本主义：它们为市场而生产，所以不能与真正的封建制或奴隶制生产方式相混淆。而且，这些附属体发展了自身的附属体：为它们的人力供应食品、为它们的剥削用途提供原料的企业。这些下属企业有时具有一种“封建的”外貌，特别是在拉丁美洲，那里有大规模的畜牧业；但是它们根本没有变成真正的封建，它们在功能上还是为资本主义市场而生产。在多数情况下它们属于简单小商品的生产方式，是由欧洲移民（特别是北美的英国移民）在自由土地和自由城镇组成的，那里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也为隶属于商业资本的种植园地区构成的市场而生产。

正是在这一重商主义时期，拉丁美洲取得了至今成为其特点

的主要结构。这些结构的基础是大庄园类型的农业资本主义，它的劳动力来自地位下降的农民（债役雇工和过去的奴隶）。此外当母国的垄断资本过分扩展时再加上买办型的本地商业资产阶级。与此同时，还出现一个以当时欧洲类似阶层为形象的手工艺人、小商人、官员、家庭仆役等等的小城市居民。

在十九世纪初，独立意味着权力转移到地主和土生白人买办资产阶级手中。上述结构在整个世纪持续下去并得到加强，因为同英国这个新宗主国的贸易增加了，英国在拉丁美洲到处建立进出口公司和银行的网络，并通过给新国家提供公共债务的资助而得到额外的利润。二十世纪中石油和采矿资本的设施（大部分来自美国），然后是进口替代工业的建立，产生了一个为数有限的无产阶级，比较来说，其中的上层显得较有特权，因为农业危机导致贫苦农民不断贫困化并使城、乡失业增加。有时，地主和买办商人从他们和外资发生关系一开始，寡头势力就在农业与贸易中投下资本来发展新的轻工业或者在有关扩大城市地区的极为有利可图的活动中的投下资本（投资于房产，在“第三”产业部门，等等）。

研究拉丁美洲的历史学家们——其中有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塞尔索·富尔塔多，费尔南多·卡尔多索，恩佐·法莱托，达西·里贝罗——已经表明：拥有大庄园的和土生白人的买办资产阶级如何成为日益占统治地位的欧洲资本主义的传送带。在欧洲，自由派思想是工业资产阶级的旗帜，而在拉丁美洲，那是地主和商人的旗帜。十九世纪期间（从1810年至1860—1880年）出现了支持自由贸易的“欧洲帮”同代表国家发展的利益并主张保护主义的“美洲帮”之间的一系列内战。前者在十九世纪末最终获胜（当时中心国家的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断送了工业发展的一切希望并肯定了拉丁美洲的依附性。墨西哥的波菲里奥·迪亚斯是这种民族投降的象征。接着，一些在此以前属于拉美人的工

业企业和采矿企业被外资所接管(特别在 1880 年以后的智利),为帝国主义资本铺平了道路。

然而,尾随在统治地位的外资之后,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构成了一个新的工业资产阶级。由于拉丁美洲服从于自由贸易的要求而使其发展受到限制,这个新的工业资产阶级企图(至少局部地)向地主和商人的权力进行挑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设法争取群众的支持,这就使巴西的瓦加斯政权、阿根廷的庇隆政权、墨西哥的卡德纳斯政权具有民粹主义的性质。但是这个资产阶级也要设法保证这种民众支持不能转而反对它;因此,它禁止民众阶级在它控制之外自由地进行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种非民粹主义的、科技治国论的思想发展主义接了过去,这标志着后退一步,趋向妥协,其特点是要求外援并与外资(现在是美国资本)联系。新资产阶级往往来自过去占统治地位的、与外资有联系的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同样家族。占统治地位的外国资本的不断进展及其不断增大的技术垄断说明了这些本国资产阶级的屈从地位。这种发展模式的失败表现于通过进口替代实现工业化的可能性趋于枯竭以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经济停滞,导致这个制度在社会主义方向上出现了突破:古巴和智利。

阿拉伯和亚洲的外围形态

在亚洲与阿拉伯世界,这开始得晚得多。一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前封建阶级才转变为为世界市场生产的资本主义大地主。而且,这种类型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只影响广袤大陆的一个边缘,有时是很狭小的地区。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埃及,它的几千名大地主把埃及完全变成了兰开夏纺织厂的棉花地。在长时期里,村社的生存权在若干地区就是要抵制发展农业资本主义——在印度,

程度稍轻一些,英国统治者在印度给与柴明达地主以土地所有权,强制地拆散了村社;在中国以及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许多地区,情况尤其如此,它们逃脱了直接的殖民奴役。只是到近期,往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才出现了小规模农业资本主义(富农类型的),特别是在土改消灭了或者限制了大地产的地方。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迟缓和有限的性质,城市居民结构所特有的现象,旧阶级转化而出现的新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文化特有的现象,或者殖民奴役的形式所特有的现象,或多或少地限制了买办贸易部门的扩张,这有利于欧洲的公司企业,或者有利于大城市背景的局部欧洲化的资产阶级(例如地中海东部诸国)。后来,例如在拉丁美洲,外资所建立的零星分散的工业使本地寡头势力有可能同这些新活动发生联系。这些新形态的结构往往类似于拉丁美洲的结构,落后的情况很快赶上,因为现代形式的外资渗透是更加强有力的。

英属印度的情况已由 R. C. 杜德、帕姆·杜德和弗雷德里克·克莱尔蒙特进行了研究。从十九世纪初开始,英国人有计划地用经济手段(禁止向英国进口)和超经济手段(破坏苏拉特、达卡、穆尔希达巴德等工业城镇)来摧毁印度的纺织工业。他们通过从头制造一种大土地所有制(以免征棉花地的土地税来大力支持)的办法来强行实施农业专业化。独立后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继承了这种结构。独立以来,局部的土地改革为更加彻底的富农型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打开了道路。与此同时,随着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进展,城市资本主义的重心出现了从买办商业资本向国家资本转移的倾向。

荷兰殖民主义在印度尼西亚为自身的直接利益而建立为出口生产的工业作物种植园。这种政策所造成的当地大土地所有制的相对薄弱,说明小资产阶级具有较大的具体比重,也说明后来苏加诺政权的特殊性质。在某种程度上,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马来亚、

印度支那和菲律宾。特殊的环境，明显的是不同帝国主义利益之间的矛盾，使泰国得以逃脱殖民奴役。

由于这些原因，当代泰国社会形态的历史是特别有意思的。依附性在其他地方导致的混乱和异化的表现，在泰国则较不显著。由于泰国逃脱了直接的殖民主义控制，它在一个长时间里是一个落后的、但并非不发达的国家，它有能力恢复，并通过“开明专制主义”而达成比其他地方更为紧密和坚实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现代化。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它结合进世界体系，泰国的不发达进程才加快了。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阿富汗。伊朗抵制的时间较短，1907年的英俄协定和阿巴丹石油的开发导致它作为一个半殖民地而被结合进世界体系。

当代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形态的历史，可以明确地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的标志是警觉到欧洲的危险，有时则试图模仿欧洲以更好地抵制欧洲。这种企图失败的结果是殖民奴役阶段，在这个时期中，阿拉伯的社会形态具备了最终的依附性外围的性质。第三个阶段是这种依附性受到挑战的时期，开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期间。

阿拉伯的社会形态是以远距离贸易为基础的。世界贸易的重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加上欧洲重商主义资本主义的兴起，带来了阿拉伯世界的衰落。结果，在十九世纪帝国主义侵略初起时，阿拉伯世界已经失去了真正的团结，从此以后只是一个不均质的综合体，从属于一个外国：奥斯曼帝国。帝国主义既加剧了世界的分裂又恢复了它的团结。

阿拉伯文明的限度恰恰就是和游牧相结合的重商主义形态的限度。当这种形态渗透进农民国家时，阿拉伯人未能对有关民族留下自己的印记，除了在埃及。这说明他们在西班牙的失败：在西班牙，阿拉伯商人阶级留在城市，周围则全是基督教农村。当阿拉

伯人被逐出西班牙时，他们留下的只是些纪念碑而已。同样地，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失败了。阿拉伯化在伊朗、安纳托利亚等地的失败，以及伊斯兰化在阿比西尼亚的失败，反映同样的局限性。

阿拉伯世界很早就感到来自欧洲帝国主义危险的现实。早在十六世纪，在重商主义时代，欧洲商人从奥斯曼国家得到了因“投降条约的规定”而取得的贸易特权。因此阿拉伯商人阶级已经被击败；欧洲已经打赢。其后三个世纪是长期的休眠时期，在此期间，东方不注意西方在发生什么情况。对重商主义欧洲的商业发展来说，其必然结果是阿拉伯重商主义世界的衰落。阿拉伯城市凋谢了，而乡村区占了统治地位，它们都是不均质的；而可能反映东方世界衰败原因的那些中心却不复存在了。十九世纪初，随着波拿巴的埃及战役，出现了一次初步的觉醒。

阿拉伯世界所作的长期抵抗努力都归于失败，可以把这一失败的日期列举如下：1882年在埃及，1830—1911年时期在马格里布，1919年在阿拉伯东方。然后出现了阿拉伯复兴的时期，反帝斗争的时期。历史的整个这一世纪中，出现两大特点，并在阿拉伯世界到处发展，在不同地方以或多或少的明确程度或延缓程度出现。首先，这种复兴的标志是一个新阶级、城镇现代小资产阶级的出现，这是由阿拉伯世界结合进帝国主义领域的进程而造成的。这个小资产阶级接替了正在迅速崩溃的老统治阶级，甚至接替了由于结合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产生的新资产阶级。第二，这种复兴表现为阿拉伯团结感的增强。因为除了埃及以外阿拉伯世界从来不是一个农民世界，所以这种复兴不能以真正的本国农民文化作基础；所以在语言和文化方面恢复过去阿拉伯人的团结，就落到了城镇资产阶级身上。在这种复兴可以以本国农民团结为基础的地方（例如在埃及），阿拉伯团结感的出现就延迟些，而代之以一种（埃及）民族感情的复兴。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中头一个反对外来威胁的地方。可是，正是来自以色列的危险使埃及认识到它的命运是和整个阿拉伯世界联系在一起。在帝国主义制造以色列国家而在阿拉伯地区的心脏扎下地盘以前，阿拉伯东方并未真正觉醒。所以，从一开始，这里的反帝斗争是和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相一致的。马格里布在地理上更为遥远，而且被另一个大国法国所殖民化，它在1967年以前并未醒悟到阿拉伯团结的问题。巴勒斯坦问题逐渐成为“阿拉伯问题”的中心，成为想领导反帝民族运动的各社会阶级的能力的考验。正是在这一考验中，买办和大庄园主资产阶级这一代以及小资产阶级都失败了。

十九世纪的阿拉伯“复兴”主要以埃及和叙利亚为中心。在埃及，早在十八世纪，阿里·贝就首先试图把埃及国家现代化，那就要求其摆脱奥斯曼的束缚。在波拿马军队冒险以后的形势导致穆罕默德·阿里·帕夏进行第二次尝试。埃及的统治阶级——都是外国血统(土耳其、阿尔巴尼亚、切尔克斯人)——是帕夏的军事官僚机构向农民征收贡赋，他们是由小业主家庭组成的。他们的盈余被埃及国家用来资助现代化(其形式为灌溉工程)和建立国家军队和工业。1840年的英土联盟打击了这种现代化的尝试。欧洲匆忙援救奥斯曼的苏丹(他们的军队被埃及帕夏部队所击败)，迫使穆罕默德·阿里屈从于投降条约的规定，从而结束了发展工业的努力。帕夏的继承者们从1848年至1882年放弃了这一独立政策，指望靠欧洲资本的援助来使埃及欧洲化和现代化(如伊斯梅尔君主)，把国家结合进世界市场(通过发展棉花种植)并要求欧洲的金融机构为这种外向发展寻找资本。埃及的统治阶级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结构的变革，在国家帮助下取得土地，使自己从达官贵人型的官僚集团变成大庄园主阶级。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常说的“封建分子”，而是农业资本家，他们的繁荣取决于世界市场。这

样,埃及就变成了兰开夏的棉花种植园,当英国对埃及独立的威胁出现时,埃及统治阶级很快地同意在保证维持其特权的情况下屈服了。它得到英国人的丰裕报酬,成为开发尼罗河流域的最大受益者。

城市的第三等级是由职员和手工业者(即早先重商主义世界的残余)及其在农村的相应人士:乡间名流所组成的,他们的反应则不一样。作为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他们感到殖民主义的危险在于破坏阿拉伯价值标准和埃及文明。他们也很快经受到进口商品竞争的有害影响。他们由此而反对欧洲的控制,并对赫迪夫和土耳其一切尔克斯贵族感到失望,因此开始认真地重新思考民族生存的问题。正是这一第三等级开始了1860年以后埃及的“复兴运动”。然而,这一尝试虽然取得某些成功,如:语言的复兴,把语言出色地适应文化和技术更新的需要,批判精神的觉醒,但还是以失败告终。哈桑·里亚德指出:“在面对(帝国主义的)危险时,……贵族们出于自私的利益并由于其土耳其血统而抛弃了本国的所有传统,可是却并未真正吸收欧洲的文化。第三等级拚命抓住传统以维护自身的特性。外国人的力量既威胁他们又强烈吸引他们,并使他们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本国的传统。在那段短暂的历史间隙中——当他们察觉外来危险的时刻(1840年)到这种外来危险成为占领埃及的现实时(1882年);第三等级的思想家们未能克服这一矛盾:既想维护自身的特性,又想从自身的落后中迎头赶上。……最后,他们发现自己进入了死胡同,空洞地主张自身的特性,逐渐导致神经质地忠于传统的态度,这就使运动陷于瘫痪。”

叙利亚是这种十九世纪阿拉伯复兴运动的另外一极。叙利亚在传统上趋向地中海,说明该国很早就觉察到帝国主义的危险。可是,阿拉伯东部(马什拉克)各国的经济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紧紧掌

握之中，在当时是停滞的：叙利亚的城市脱离过去时期的贸易道路，也脱离埃及进行的新殖民地发展，它们并没有早期的出色精英人士。所以，在埃及，“复兴运动”是由第三等级（手工业者、职员、宗教领袖）的半民众人士培育的。

因此，埃及—叙利亚的复兴运动未能制订一个为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所需要的社会变革的紧密而有效的纲领。可是它是形成现代阿拉伯感情的决定性时刻，因为它使阿拉伯世界各“省”之间的思想沟通再次进行，并在统一的基础上改造了语言，同时使之适应于现代化的共同要求——因此，简言之，对阿拉伯团结的主要手段给与了新的生命。

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的尝试，同日本的做法一起，是十九世纪期间在欧洲世界以外所进行的唯一的现代化尝试。帕夏的失败由于两组原因：靠近欧洲，这使他没有时间改革国家并使之现代化，加上本地的社会条件不够成熟。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形态并没有从内部准备资本主义的诞生。因此，帕夏试图实行国家重商主义以弥补本地资产阶级之不存在，这样做的社会基础是脆弱的。另一方面，日本并没有埃及战略地理位置的不利之处，它不是欧洲早期妄想占有的目标。而且，日本的封建社会形态使它先倾向于产生一个本地的资本主义。

在复兴运动失败以后，开始了一个黑暗时期，其标志是每个省各自自行吸收，广而言之，这个时期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就是胜利的帝国主义的美妙时代。那也是已经退却到阿拉伯世界各个省份里去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失败。最后，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立足的时期。哈桑·里亚德的《纳塞尔的埃及》一书中首次分析了埃及在这个时期中的政治史。这里我继续他著作中的重要主线。

阿拉比在 1882 年遭受的军事失败标志着曾经对复兴运动寄

托的希望终成泡影。第三等级被扫除了，先在政治上，然后在经济上。“作为他们的继承者的见识狭窄、唯命是从的小官吏的一代很快就接受了外国统治并以拒绝现代世界的价值标准来进行回避，以不担风险的反动的反对态度来进行回避。”与此同时，在殖民地发展的背景下，出现了一个埃及资产阶级，开始只在农业方面，后来是半农半商、甚至是工业的。高度集中的大规模资本主义地主的贵族统治在1919年以后冒险而成为商业和工业企业，组成了与外资相联系的米斯尔集团，那就是埃及的地中海东部诸国资产阶级（希腊人、欧洲化犹太人、欧洲化东部基督徒）和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的大资本。这个阶级成了埃及的统治阶级：直到1952年一直是帝国主义统治的传送带。正如里亚德写道：“在十九世纪的文化复兴流产之后，埃及社会停止了思考。从中出现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在那时以后就满足于欧洲的装饰，小资产阶级则满足于咖啡馆谈天。实际上不存在无产阶级，而数量越来越多的无权的人民群众则被剥夺人的地位，沦于每日为皮阿斯特（埃及货币名——译注）而奋斗，以维持生计。……因此，殖民地埃及对他们作出反应，形成一个知识分子阶层的一切条件均已具备，这批人要在崎岖的社会的界线之外去寻求真理，他们无法使自己结合进这个社会，即使只是在物质上，由于它不充分的发展。……我们正是在这个背景内来看埃及的第一个民族主义政党，那就是穆斯塔法·卡米尔和穆罕默德·法里德的政党，它的历史从1900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它是由属于知识分子第一代的人们所建立的，……不能认为是埃及资产阶级的政党：当时的埃及大资产阶级是向外国控制进行妥协的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它也不是农村资产阶级的政党……农村资产阶级有自身的组织乌玛党，这个党在意识形态和社会问题上持猜疑的保守态度并忠顺地支持效率高的英国行政——这表明：早在那时，农村的中产阶级就感到在面对无地

农民群众数量日增这个危险时要和贵族相团结。……然而，在相当准确的意义上，它还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它的现代意识形态来自欧洲的资产阶级传统。……尽管埃及社会的悲惨状态、穷苦群众的冷漠思想、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农村中产阶级的反动态度以及由此出现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公开背叛，民族主义政党的号召得到了许多响应。在紧急关头，这个党代表了民族，它体现了这个民族的潜力。……但是民族主义政党的历史是短暂的。……当1919年全民族奋起的时候，它在舞台上消失了，让位于一个更能确切地代表当时的埃及社会的党：华夫脱党。”

这个华夫脱党的历史就是埃及在1919年至1952年间的历史，它也不是埃及资产阶级的党。那个资产阶级继续基本上亲国王和亲英国。华夫脱党的不坚定正是小资产阶级的范畴：“因此华夫脱党最后表明它在主要问题上是和保皇党一样保守的，因此它从不认真考虑土地改革。这也说明为何英国人从来没有被它的民族主义宣传所蒙骗。……华夫脱党从来没有片刻设想埃及不成为英国的保护国。……无疑，在谈判中，英国方面表现很精明，它利用埃及君主准备老老实实接受外国势力存在的现实而不必向华夫脱党作出多于最低限度的让步，即使是表面文章。可是，当英国权力的整个大厦面临严重危险的威胁时，英国就很快找到一个妥协的根据。这是在面临法西斯主义威胁时在1936年和1942年发生的（1936年的英埃条约要把英国在埃及保留的利益掌握二十年。这一条约的谈判从1924年以来就拖下来了，但由于意大利对埃及的威胁而突然加快，意大利在上一年已经在埃塞俄比亚确立了地盘。）……英国所作的一连串让步，加上1920至1945年间轻工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妥协。由于种这聚合力，这个体系虽然遇到危机而继续在运行：在二十五年中，华夫脱党的议会和君主专制之间的交替适合于保证外国利益和贵族利益的生存。……快得

喘不过气的经济发展——那就是说，最后，无权群众的数量激增，终于在城市人口中占 40% 并在农村人口中占 80%——加上一方面中等阶层的贫困化，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以及亚洲的殖民制度危机，就是第二次大战以后时期中冲突的原因。”

在埃及偏狭内向的这个长时期中，在这时期中帝国主义统治没有从根本上受到挑战而只在其采取的形式上受到批评，并寻求一些可使这种统治“得以忍受”的安排，民族感情是严格地埃及式的。并没有企图把埃及的反帝斗争放在阿拉伯世界的更广泛背景之内。的确，1936 年的巴勒斯坦造反在埃及引起一些反响，特别在人民群众之中，埃及有一种感情，认为该地区整个说来是被同一帝国主义所压迫的，而犹太复国主义则被视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可是，这种感情一直在群众中间传开，群众中没有自身的党派或组织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能表达自己的运动是那些善于勾结的资产阶级运动和不稳定的小资产阶级运动。而且，这些不再植根于埃及的历史，因为它们都是殖民主义的产物。这种无根性被塔哈·胡赛因清楚地表达出来，他宣布埃及作为希腊和欧洲的产儿，对东方一无所求。哈桑·里亚德谈到“一种肤浅的西方主义，其根基却是真正的文化真空。这是一种使自己得到廉价的自我满足的方便立场：因为我们从来不是‘东方人’，我们向来就是和‘西方人’相等的，而我们却向西方人什么也没有学到。”

同样的狭隘地方主义也是这个时期中阿拉伯东部(马什拉克)的政治生活特点。可是，在这里，因为帝国主义者把这个地区在英国托管地和法国托管地之间人为地划分，而由于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安置形成对这个地区生活的直接威胁，民族反应则更为一致和带有阿拉伯性质的。

奥斯曼对肥沃的新月地带的统治，在 1919 年以前保护了这个地区的统一。确实，这个统治并没有对帝国主义渗透形成有效的

防御,因为,自从投降条约的规定给予欧洲资本和欧洲货物以不平等的特权以来,整个奥斯曼帝国处在不发达和间接殖民奴役的境况之下。海运业的叙利亚被摧毁(这发生于早在十字军时期),使欧洲人(特别是意大利城市)在地中海地区的海运贸易方面崭露头角。跨越大西洋和绕过好望角航路的打开,使肥沃的新月地带失去了它的大部分商业作用。从十九世纪起,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了阿拉伯东方衰败的进程。叙利亚手工业的破坏早在十九世纪前半叶即已发生,导致了英国棉织品的大量涌入。其后,欧洲金融资本的渗透是通过奥斯曼国债而出现的。在1874年,这种债务消耗了奥斯曼政府岁入的五分之四。为了应付这种勒索,伊斯坦布尔就加紧对它的属地勒索贡赋:在十九世纪末,奥斯曼政府从叙利亚省和美索不达米亚省征课的税收中有80%以上作为贡赋支付给中央政府,不到20%用于地方行政的开支。此外,还要加上欧洲资本的渗透。可是,在1919年以前,这方面为数尚不多:在叙利亚几家工业企业,经营铁路和港口,以及建立一些公共服务(电力、供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一些大工程尚在计划阶段(柏林—巴格达铁路,摩苏尔地区的石油开发)。

因此,肥沃的新月地带被结合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托管时期以前并未大规模地开始。在叙利亚,在第二次大战以后的时期以前,这种结合始终很少,因为发展商业性农业的可能性是受到这个地区贫瘠的农业资源所局限的。可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杰齐拉(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半干旱草原,在那时以前只有游牧的牧人)开始被开发。这块地区的垦殖开发是由叙利亚的城镇资产阶级进行的,使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方法:拖拉机,少量工资收入的劳动力,从国家或者从游牧酋长租借大块土地。这就使大量增加农产品出口成为可能:棉花、小麦、大麦。在传统的西部农村,农民的社会组织阻碍了进步。因为叙利亚在失去

以往的贸易地位以后，实际上发生了社会退步的进程。该国的人口从过去极盛时期（古代和阿拔斯哈里发）的大约 500 万人降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不足 150 万人。但这些人口仍然高度集中于城市：1913 年，城镇居民占全国居民的三分之一，游牧民占四分之一，农业地区不到 40% 的人口。叙利亚城镇的贸易地位从此衰微，因为它们只为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内地服务。手工业被欧洲进口品的竞争所挤垮又加深了这一危机。在那时，为了生存，叙利亚的城市统治阶级就使自身“封建化”，那就是说，力求从西叙利亚农民手中取得他们无法再从贸易中得到的剩余。大庄园的组成是早在十九世纪的事，当时，已经失去作用的商业资产阶级开始转向农村地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这一托管地结构以内，这种封建化进程加速了，这是由于“法国式和平”有可能制服在此以前进行反抗压迫的农民。因为法国资本的统治实际上关闭了工业化的道路，城市资产阶级就没有其他出路了。在叙利亚取得独立以后，它通过建立轻工业（纺织、食品加工）以及在农业上征服杰齐拉地区而恢复正常。正如里兹喀尔·阿·希兰说：“农业的增长是城里人的胜利。”只是在 1955 年以后，这一进程才告一结束，失去了势头，并迫使叙利亚走上一条新的道路，即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叙利亚的事例上，我们看得很清楚，在 1920 年至 1955 年之间，结合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如何使本地的资产阶级发展起来，以及这种结合如何形成一种庇护—依附型的本国资产阶级。因此就比较容易了解：当本国资产阶级这样得到满足时，为什么在 1919 年时曾经是阿拉伯主义快活中心的叙利亚会在呆滞的地方主义条件中昏睡三十五年。

伊拉克的情况也是这样。英国人于 1920 年在那里立了足，那是一个半沙漠区，没有任何称得上真正城镇的地方。可是，该国的

自然潜力很大。英国人着手恢复很多世纪以前即已消失的农业生活：在托管地时期建造的灌溉工程在形成新的农业资产阶级、大庄园主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英国人把 90% 的土地分给半游牧部落的一千名酋长和头人。伊拉克石油公司开发的油田就从事其余的活动。这种发展进程从 1920 年时曾经主张民族主义、泛阿拉伯主义和局势激荡的叙利亚，产生了一个在 1958 年以前一直是英国忠顺保护国的叙利亚。

肥沃的新月地带的城市地区，不论在奥斯曼时期末了时多么悲惨，却是坚定地主张民族主义的，并赞成阿拉伯团结。在帝国主义威胁面前，它长期以来一直是亲奥斯曼的，它的“民族主义”摇摆于“奥斯曼”形式或者“阿拉伯”形式的“穆斯林民族主义”之间。这个地区的阿拉伯城镇居民对奥斯曼改革的不充分（特别是 1839 年的坦兹马改革）感到失望，而且对“青年土耳其人”改革运动在 1908 年以后坚决走土耳其民族主义的道路（甚至还有反宗教的方面）更感失望，他们就转向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并在周围寻找能使他们从奥斯曼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外部联盟。英国的外交活动善于利用阿拉伯民族主义并加以哄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城市资产阶级认为在“沙漠大公”中加以挑选而自封为“王”是精明的办法，这样就恢复了贸易城镇和游牧人民之间的传统联盟。事实上，那些“沙漠大公”（哈希米家族）接受了把该地分割为英、法两区，得到的报酬是被封为英国托管的小王：费赛尔一世得了伊拉克，他的兄弟阿卜杜拉得了外约旦。

伊拉克之转向地方主义是由该国的潜在财富及其发展所促成的，也是由英国人执行的精明的政策所造成的。伊拉克从 1920 年至 1958 年的政治历史确实非常不稳定，但是这只是在政府集团之间的联盟变化方面，因为直到 1958 年，双重现状——社会（新的大庄园主阶级的统治）和外部（伊拉克作为保护国的地位）——没有

对任何政权提出疑问。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新的结合的拥有大庄园的资产阶级出现，奥斯曼时期的旧阿拉伯民族主义消失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期间开始兴起的新的反对派并不比阿哈里俱乐部的知识分子集团走得更远。同埃及的华夫脱党相比，这个俱乐部不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因为伊拉克象埃及一样，资产阶级是投敌派。因此，那个俱乐部只是一个相当孤立的“知识分子”型的团体。但是从这个团体出现了未来的主要政治力量，它在1958年接过复兴社会党的前身小资产阶级民众主义而过渡为更加激进的伊拉克共产主义分子。

法帝国主义在叙利亚的任务比英国人在伊拉克面临的情况要困难得多。在叙利亚，既无石油，又无农业发展的潜力，因此有可能把资产阶级集合在托管政权的周围。而且，叙利亚资产阶级在奥斯曼时期末了时比伊拉克的资产阶级要活跃得多，它甚至能为这个地区定调子，使叙利亚具有“地中海东部国家”的性质，向地中海、从而向西方敞开大门。在这些情况下，法帝国主义在它的叙利亚城市里没有更多的东西提供给资产阶级，除了对叙利亚西部农民的加紧剥削而提供的无关紧要的“出路”。而且它设法利用人民中间的宗教分歧。但是叙利亚比伊拉克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立足，感觉更为敏锐，因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总是组成阿拉伯东部的同一个地区。耶路撒冷、大马士革、海法和贝鲁特的资产阶级是属于同一批家族的。这个地区在1919年被人为地分割成法国区和英国区，而它的南区巴勒斯坦则根据1917年的巴尔弗宣言而交给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叙利亚人民对阿拉伯领土的这种离散几乎是和巴勒斯坦感到同样痛心的。1940年法国的陷落产生了把法帝国主义从这个地区消灭的条件。首先是英国从1941年到1949年，然后是美国通过1949年的一连三次政变接过了控制权，而新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基本社会联盟则没有改变。

然后，从1920年直到1948年，帝国主义是这个整个地区的主子。在埃及，如同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一样，本国资产阶级（主要是农业资产阶级和拥有大庄园的资产阶级）由于追随帝国主义者而得到富裕和加强，同意偏处于地方一隅而为其外国主子效劳。帝国主义通过这个阶级的统治似乎并不受到严重的威胁，因为“反对派”仍然非常弱小，缺乏任何真正的阶级后盾——这个知识分子型的反对派一方面特别出于民族立场而对亲帝国主义的本国资产阶级感到不满，一方面又感到它的吸引力，因而处在矛盾状态之中。

阿拉伯拥有大庄园的资产阶级发生背叛的必然结果是把巴勒斯坦人们抛弃给犹太复国主义殖民化的支配之下。因此，随着以色列国的成立，1948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以及这个地区对帝国主义体系进行挑战的开始。

从1947年至1967年的二十年间有三个基本特点作为标志。第一，阿拉伯本国资产阶级的破产和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兴起。第二，英国从这个地区消灭而有利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两国之间制订出划分这个地区的暂时解决办法。第三，事实上认可了犹太复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扩张主义性质。

1920—1947年期间沉闷的地方主义的基础是社会均衡，它是由该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即英国（法国起帮凶作用）和各“国”拥有大庄园的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联盟造成的。只要殖民地发展能为小资产阶级保证一些“面包屑”，这种制度就能运转。可是，帝国主义统治的政权的内部矛盾对这种制度定下了限度。哈桑·里亚德分析过：就埃及而言，经济与社会矛盾的日益增大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人数大增，这些群众的苦难日益深重，失业上升，有不满情绪的小资产阶级人数增加，以及政治领域中新力量的出现：主要是共产主义运动和穆斯林兄弟会。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同样的现象表现了同样

的基本矛盾，虽然殖民地发展的晚近性质推迟垮台的时间长于埃及。

所以，正是埃及以1952年的军事政变打开了新时期。哈桑·里亚德和马哈茂德·胡赛因分析了从旧的社会关系（以英帝国主义同拥有大庄园的和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盟为基础）转变到苏联同埃及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新联盟。这种转变是以1952年的土地改革开始的，它取消了大庄园主的权力，把农村地区的领导地位给了富农，在1957年和1961年继续进行国有化，把属于西方资本及其伙伴埃及资产阶级的产业所有权转给国家。其必然结果是逐渐肯定一种新意识形态，即纳赛尔主义。新的埃及统治阶级正在形成，开始时怯懦，继续奉行旧资产阶级向地方主义退缩的政策。1956年的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迫使它作出反应并宣布一项泛阿拉伯政策。新政权以同样怯懦的方式长时期地寻求与本国资产阶级达成国内妥协，正如它设法保留传统的对外联盟一样。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拒绝资助阿斯旺大坝，埃及在1956年7月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作为回击，10月间英—法—以三方的侵略，以及美国和俄国制止侵略者，这些保证该政权在1957年走向国家资本主义。

埃及的榜样对阿拉伯东部的各个地方都发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在叙利亚，1954年施舍克里独裁政权的垮台使一个不同势力组成的联盟当了权，这个联盟是由复兴社会党的新小资产阶级社会力量和民族集团的传统资产阶级力量组成的。1963年的政变使叙利亚的复兴社会党当了权，这次是独自掌权，同时，走向新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运动又恢复了。在1960—1965年的第一个计划（仍然基于叙利亚和西方私人资本积极参加的幻想）和1965—1970年的计划（其中把国有化措施和苏联援助列为头等重要地位）之间，我们注意到象埃及的1957年时期以前和1960—1965年计划

的时期之间同样的发展情况。

在伊拉克，事物的结果也是同样的。1957年组成的阵线结束了哈希米王朝的统治，1958年7月的政变结束了拥有大庄园的资产阶级的统治。1958年至1963年之间，新政权摇摆于纳赛尔类型的路线和“左翼”路线之间。这是因为伊拉克的事态并不象埃及或叙利亚那样发展。英国和哈希米的统治已告完成并持续了很长时间：群众也以严重的暴乱进行干预；民众抵抗的力量（民兵）找他们的敌人算账，清算了拥有大庄园的资产阶级。卡塞姆政府的不断犹豫不决导致它于1963年倒台，让位于一个右翼的复兴社会党政权。

因此，1948年和1956年，都是以色列扩张主义揭露了阿拉伯各国拥有大庄园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本质，暴露了它屈从于帝国主义以及它断断续续的、纯属口头的“泛阿拉伯主义”蛊惑人心的本质。它也迫使每个阿拉伯国家从独立中走出来。因为以色列的本质威胁这些国家的存在，以色列必须吞并这些国家的一些地区以便达到它建立一个包括世界上大多数犹太人的国家的目标。所以，在1948年和1956年，以色列侵略两度造成阿拉伯群众对本国政府的造反以及当地政权从拥有大庄园的买办资产阶级之手转入小资产阶级之手。以色列在1967年发动的第三次巴勒斯坦战争导致了阿拉伯世界的一场新的、深刻的危机，说明了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失败，后者并不设法做得比它所取代的拥有大庄园的买办资产阶级更好些。

在长时期中，影响阿拉伯东方的潮流没有触及马格里布，这是因为法国的殖民统治，它的特殊的压迫形式，以及它引起的当地问题，同时也是因为其在地理位置上遥远及其特点——特别是它的北非柏柏尔人特性。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化，或许因为它早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前就开始，并因为法帝国主义的发展较迟，所以

局部地采取了“贫苦白人”垦殖地的形式。这种农业殖民化的目的也应用于突尼斯和摩洛哥。只是在后来，比较先进的殖民化形式才在马格里布、特别是在摩洛哥发展起来，其特点是法国金融资本投资于采矿业甚至工业企业。我在《现代世界中的马格里布》一书中分析了殖民主义在这三个国家带来社会结构的不同，我写道（第104页）“阿尔及利亚的土地贵族早已绝迹——实际上这是阿卜德·卡德尔（1830—1848年）自己搞垮它的，而不是殖民主义——而殖民主义却在摩洛哥加强了这个阶级。突尼斯的情况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即使这些结构在小资产阶级迅速上升的情况下——这是三国的共同现象——今天逐渐失去了它们的重要性，它们的确在长时期里决定了民族运动的性质。”直到1848年，征服阿尔及利亚期间所实行的灭绝战争，使阿尔及利亚的抵抗带有普遍的农民性质，它使城市上层分子毁灭或大规模迁移。殖民主义所产生的新城市阶层同乡村或者同以前的城市统治阶级都没有联系。因此，他们的“民族主义”在很长时间里是表面的，而且他们的要求带有“同化主义”的性质，这是费尔哈特·阿巴斯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还是这样说明的。可是，由于法国移民的反对，这种前景不可能实现。抵抗运动的基础逐渐转移到城镇人民和旅法的阿尔及利亚工人。这一运动导致了1954年的武装起义。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1962年）期间真正重新诞生的。从1850年到1945年的漫长时间，即从阿尔及利亚的早期民族主义到当代的新生，在突尼斯和摩洛哥则是没有的，这两国受殖民统治较晚些。所以，那里的现代民族运动不象在阿尔及利亚那样具有民众运动的先例。在突尼斯，三十年代开始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界的民族运动从来不带“同化主义”的幻想。它始终是“资产阶级的”和“温和的”，正如该运动从一开始就联系着的布尔吉巴其人象征的。当1954年该运动被农民群众的造反所

淹没时，由于法国的让步政策而使局势得到控制，突尼斯在 1956 年取得独立。摩洛哥受殖民控制为时更晚，其连续性更为明显。所以现代的城市民族主义运动必须与该国的传统上层分子站在一起，直到取得独立，后者始终居于无可争辩的控制地位。

马格里布从法国殖民主义的漫漫长夜中苏醒过来时，在重新发现其民族性方面遇到了困难，它是孤立于阿拉伯东部之外的。它的民族主义纯粹是本地的，虽然，归属于阿拉伯世界的感情则并非没有。我在写到它独立以后的时期时说(第 188 页)：“马格里布各国在上一个十年(1960—1970 年)中的政治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基本的社会现实最终必将突破表面政治现实的虚饰，这种政治现实本身就是殖民主义任意造成的结果。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运动在战争的头几年中达到激进主义的高峰之后，最后被小资产阶级社会成分所掌握，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代表……国家独立的主要受益者阶级。在突尼斯，在日益增大的小资产阶级影响下(小资产阶级的上升类似于阿尔及利亚的情况)，新宪政党逐渐从自由企业的资本主义转向了‘民族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的发展是从左向右，而突尼斯的发展则相反。摩洛哥的政权还不得其所；小资产阶级的压力曾在 1960 年的某个时期几乎取胜，但最终失败了，它的失败标志着保守的传统统治阶级的复辟。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它们目前的发展周期：从突尼斯的‘温和的’民族主义，以及从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农民激进主义，发展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摩洛哥尚未完成其历史上的这一章，但是作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的政治和社会成分已经在积聚力量。”

当代帝国主义统治所依靠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使不发达现象永久存在，这在各地都是一样的，不论其对外政策的方向如何。与此同时，由于巴勒斯坦战场远离马格里布，那里感觉不到以

色列的威胁，反帝斗争必要团结的觉悟不象在阿拉伯东部而局限于缺乏群众影响的人们。

非洲的外围形态

不谈“种族”的问题——非洲人民从史前时代以来，与其他“种族”相比，既不是更为相似，也并非较少混合——各地区之间仍然表现许多相似点的那种共同的或者血缘的文化背景使黑非洲成为一个单一的实体。这个活生生的实体广漠而富庶，它没有等到殖民征服就已经同旧世界的其他大地区进行了相互交往。但是，这些交往并没有打破非洲民族性的一致；相反地，它们有助于肯定和丰富这种一致。而殖民征服则进一步加强了这一点。

可是，从内部看，黑非洲似乎是极其多种多样的。现在的国家（它们都是人为划分的结果）中确实没有一国具有这种多样性的全部或主要的基础。可是，认为这种新近的特点没有在非洲留下印记而且不大会在近期的将来得以巩固，那是错误的。意义更加重大的是疆界往往和目前各国重叠交叉的一两百个大小不等的地区。它们的定义并非仅仅来自其地理位置，而首先来自其社会、文化、经济、甚至政治状况的相似性。

除了这种一致性和多样性，这个大陆可以分成以最近期非洲史即殖民主义时期的影响为基础的三个大区。

传统的西非（加纳、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冈比亚、利比里亚、几内亚比绍、多哥、前法属西非），喀麦隆、乍得以及苏丹一起构成“老殖民地经济的非洲，贸易经济”。这部分可分成三个小区：（一）沿海区，那是外部世界容易到达的，它是富庶地区；（二）内地，主要作为沿海区的劳动力来源和工业品市场；（三）苏丹。传统的刚果河流域（扎伊尔、布拉柴维尔刚果、加蓬以及中非共和国）形成第二个大区：“拥有租借地的公司的非洲”。非洲的东部和南部（肯尼亚，

乌干达，坦桑尼亚，卢旺达，布隆迪，赞比亚，马拉维，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和南非)构成第三个大区，“劳动力后备军的非洲”。

埃塞俄比亚、索马里、马达加斯加、留尼旺和毛里求斯象非洲大陆另一侧的佛得角群岛一样，都不是这三大区的一部分，虽然它们一些地方可以找到各大区特征的某些方面——但和影响它们发展的其他制度的特征相结合：佛得角群岛、留尼旺和毛里求斯的奴隶重商主义制以及埃塞俄比亚和马达加斯加的拟封建制。

重商主义时期从十七世纪延伸到十九世纪早期，其特点是奴隶贸易。不仅是沿海区受到这种贸易的影响：由于这种影响，整个大陆的生产力下降了。有两大奴隶贸易区：依靠大西洋贸易的地区（由于数量巨大，所以是最有害的），它从塞内加尔的圣路易沿大陆的海岸延伸到莫桑比克的克里马内；以及依靠东部贸易的地区，它从埃及、红海和桑给巴尔经营到苏丹和东非。这类重商主义活动是在1800年以后在东部地区进行的，因为震撼欧洲和北美社会基础的产业革命并不到达土耳其—阿拉伯东部。

从1800年至1880—1890年期间的特点是企图在这些地区——至少是受大西洋重商主义影响的某些地区——和资本主义已出现充分发达的工业形式的世界之间建立一种新形式的依附。东方重商主义的势力范围并不受这一进程的影响。

下一个时期，即殖民化时期，完成了西非前一时期的任务，在东非接过了东方重商主义，并以十倍的劲头发展目前形式的依附。

前重商主义的非洲形态是唯一真正能称为传统的形态，是独立的社会形态，但并不同世界上其余地区相隔绝；相反，它们同北非的阿拉伯形态保持了远距离贸易关系，这使双方的社会形态都完成了重要职能。

重商主义时期见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两极的出现：无产阶级的诞生以及货币形式的财富积累。在产业革命期间，两者会合了：货币财富成为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达到其完成期。在这为期三个世纪的酝酿发展期间，西欧重商主义中心的美洲外围在大西洋国家商业资产阶级积累货币财富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黑非洲作为“外围的外围”起了并非不重要的作用。非洲不得不向美洲种植园提供奴隶劳动力，因此丧失了独立性。它开始根据外界要求、即重商主义要求而被塑造定型。

重商主义的奴隶贸易对非洲的破坏性影响，由于博巴卡·巴利关于瓦洛人(沃洛夫人)的著作等材料，现在已被世人知道得更多了。这些著作中提出了下列各主要之点：

虽然瓦洛人参加的前重商主义跨撒哈拉贸易在那个独立的塞内加尔王国中加强了国家的中央集权并刺激了进步，可是取代它的大西洋贸易(当法国人在1659年在圣路易殖民定居以后)却并不促进生产力，而是相反地造成生产力的退步和瓦洛-瓦洛社会和国家的解体。因此法国人不得不使用武力来切断以前的跨撒哈拉联系，来征服非洲的这个地区并改变其对外关系的方向，以便适应圣路易的法国贸易站的要求。非洲社会曾设法反对这一点，而伊斯兰提供了这种抵抗的结构。圣路易的商人们用武器来支付他们购买的奴隶。这打乱了下列各部分之间的力量对比：(一)国王，保持着一支由王国控制的、由俘虏组成的常备军；(二)贵族院，提名国王并保有封地制度，这和村社的集体部族土地所有制(拉马纳)相并列并驾凌其上；(三)村社，以部族土地所有制为基础。圣路易的商人们支付给国王的关税刺激了一场有主要贵族们参加的长期内战，他们袭击村社以便虏掠奴隶。穆斯林的祭司(回教圣者)设法组织村社的抵抗运动；他们的目的是制止奴隶贸易，即输出劳动力(但不是要结束国内的奴隶制)。从此以后，伊斯兰改变了它的

性质：从商人的少数派阶级的一种宗教变成了一场民众抵抗运动。穆斯林祭司领导的第一次战争（1673—1677年）未能设法改变河流地区人民的宗教信仰和制止奴隶贸易。一个世纪以后，在1776年，图库洛尔国家的吐罗多革命推翻了军事贵族并结束了奴隶贸易。但是在瓦洛王国，由于太靠近圣路易，迪里先知在1830年进行的尝试在支持国王的法国军事干预面前失败了。

第二，对瓦洛事例的研究特别令人感兴趣，因为奴隶贸易是在树胶贸易同时发生的。可是，后者对非洲社会并没有同样的冲击。输出商品（而不是劳动力）不一定有消极影响，而相反可能导致进步。这类输出并不是整个非洲重商主义时期的特点，那时非洲几乎专门供应奴隶。但是例外的是，它在这里却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奴隶象加兰的黄金一样，主要走冈比亚的路线。现在，树胶由瓦洛供应，但也特别由特拉扎的摩尔人供应。后者可以通过圣路易输出树胶，只给法国人，或者通过波坦迪克，那会遭到英国和荷兰的竞争。法国人为了切断波坦迪克的路线，就帮助特拉扎人定居河边，并在十八世纪头二十五年中的“树胶战争”期间越过该河。因此，这些情况在该地区带来了瓦洛人和特拉扎人之间的一种特殊的次要矛盾。正是这种矛盾说明了十七世纪期间“回教圣者战争”的失败，这场战争是由敌视奴隶贸易的回教圣者以及摩尔人同时领导的，摩尔人为了垄断树胶贸易而对瓦洛人增加压力。

在沿海，从圣路易到克利马内，奴隶贸易影响了几乎整个大陆，除了东北地区（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东非）。到处有战争和无政府状态，各族人民纷纷逃向难以到达的避难地区，而且因此往往很穷——例如旧非洲黑人各民族居住在人口过多的西非山区。这一切导致人口严重下降。随着前重商主义时期已经开始建成的大型实体，各民族的结合过程停止了。代之而起的是各民族的分裂、隔绝和争吵，这是当代非洲最严重障碍之一的根源。

结束本章以前不谈一下东方重商主义时期，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说明埃及和阿拉伯同尼罗河以及沿红海和印度洋东岸的非洲(远至莫桑比克)的关系。奥斯曼帝国、穆罕默德·阿里统治下的埃及都不是类似文艺复兴至产业革命期间的欧洲重商主义社会，南部的各阿拉伯苏丹国就更不是了。前资本主义解体的情况——无产阶级形成的必要条件——几乎不存在。我要在这里提出的是苏丹发展中的主要趋势，苏丹是穆罕默德·阿里要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征服的。两个苏丹国是在前重商主义时期建立在那里的，其基础是和埃及和东方进行远距离贸易，这两个国家是：在埃及征服时仍然强大的达尔富尔苏丹国以及两条尼罗河之间的芬格苏丹国，它由于埃塞俄比亚对它发动的战争而受到削弱。穆罕默德·阿里的目的很简单：从苏丹掠夺黄金、奴隶和象牙以供出口来加强埃及的工业化。这是类似于欧洲重商主义时期的一种原始积累过程，这可以证明我们谈论东方重商主义是有道理的。可是，产业革命已经发生，帕夏已知道这一点；结果，前重商主义时期和发达资本主义制度的时期在这里混合起来，企图通过国家对农民征税、垄断对外贸易以及尽可能掠夺殖民地来汇集资金，实现埃及工业化。

直到1850年，埃及军队虏掠奴隶，抢劫苏丹的本地产品。从那时以后，那些士兵把任务交给了苏丹的游牧者，特别是巴加拉人，他们把抓获的奴隶卖给了在赫迪夫庇护下立足的土耳其、科普特、叙利亚和欧洲商人。这些活动很快导致有关游牧民族社会制度的改变；他们的氏族组织被“游牧封建主义”所取代，那是一种建立在领土基础之上并由武士贵族所统治的准国家组织。在被征服的次级农业的区域里，埃及军队破坏了老的酋长地位，使村民们承受一种实物税(牲口和粮食)以养活征服者的官员和军队。埃及人指派了酋长，让他们负责征收赋税；他们靠这种方法迅速发了财。而

且，夺走了居民的最好土地，给了埃及的别伊和一些苏丹酋长。农民们被逐出本村而拴在土地上，半是奴隶，半是农奴；（大规模商业性）耕作这些土地的收入扩大了埃及的国库。其他的农民被游牧者所捕猎，被酋长所榨穷，他们纷纷来到军队在交通枢纽和猎奴区边境建立的集镇。有别于农业的手工业兴起了，而在归属于别伊和酋长的土地上则引进了埃及的耕作方法，生产率较高。到1870年，因为有更多供销售的剩余，所以可以用货币税来替代实物税了。苏丹统一了，伊斯兰化了，阿拉伯化了。

1881—1898年的马赫迪起义是受到这个制度压迫的人们的一次造反，他们是：村社的村民，庄园的隶农以及集镇的手工业者、奴隶和乞丐。成功的起义赶走了埃及军队、别伊和酋长。但是在马赫迪去世以后，以阿卜杜拉哈里发为中心组织的国家改变了内容。起义运动的来自人民的军事领导人同参加起义的巴加拉人武士首领们一起，为自身的利益而组织一个类似于埃及的国家；他们夺取了庄园，为自己的利益而征税。输出奴隶已被马赫迪国家禁止，这是事实，但是这种交易已大部失去其原有的重要性，因为劳动力不是就地使用了。新国家想继续为其自身的好处而剥削群众，为此而破坏了马赫迪家族周围的民众力量。他们被捕下狱，人民军事领导人中最重要的人被处决。而且，马赫迪国家逐渐恢复了奴隶输出，但这一回是为了它自身的好处：哈里发在他自己的领土外面，在达尔富尔和埃塞俄比亚，在上尼罗河邻近各国人民中组织掠奴袭击；他保留了大量奴隶来加强他的军队和经济，但授权苏丹商人输出一部分。哈里发的军队已经失去它在起义时构成它力量的人民性，在该世纪末就无法抵御英国的殖民征伐。

十九世纪时，在桑给巴尔组织的奴隶贸易确实属于一种重商主义结构。多少世纪以来，前重商主义类型的阿拉伯沿海贸易使黑非洲的这些地区同印度、印度尼西亚、甚至中国进行接触。在这

里，产品比奴隶重要，正如阿拉伯南部和印度洋邻近国家黑人人口很少这一点可以说明。但有一个例外，当阿巴西德哈里发在下伊拉克组织甘蔗种植园的时候，为此输入了黑奴。这种试验因这些奴隶的反叛（卡尔马特教派暴动）而很快结束。在十九世纪，奴隶贸易突然变得重要得多了。实际上有两个新的市场：留尼汪岛，供应的方式是把奴隶作为“契约工”运去，因为英国已废除奴隶贸易；以及桑给巴尔岛。1840年，苏丹把他的首都从阿曼迁到那里并逐渐建立一种奴隶种植园经济来生产丁香，欧洲贸易现在对这种产品提供了市场。桑给巴尔在此以前是一个贸易中心，现在则变成了一个种植园，类似西印度群岛、留尼汪或毛里塔尼亚（一个阿拉伯的西印度群岛）。因此，我们再次见到结合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要对于破坏性的奴隶贸易负责，这种贸易同前资本主义时期的远距离贸易毫无共同之处。

奴隶贸易随着重商主义的结束而消失。然后，中心地区的资本主义显示了它完整的形态；重商主义的功能——财富的原始积累——失去了它的重要性，而且资本的重心从商业部门转移到工业。美洲种植园的老外围——以及外围的外围，奴隶贸易的非洲——现在必须让位于一个新外围，它的功能是提供产品以帮助降低中心地区所使用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原料和农产品。保证这些产品以有利于中心地区的条件来供应，这种情况已被不平等交换的理论所表明。

然而，在十九世纪末以前，中心地区的资本只有有限的手段来做到这一点。只是当中心地区出现垄断资本的时候，才可能大规模输出资本，中心地区的资本才有办法用有利于它的条件以现代手段在外围地区直接组织适合于它的生产。在那时以前，中心地区只能依靠当地社会形态的能力来加以调整以适应资本主义制度的新要求。

在瓦洛的农业殖民化计划：把它变成一个棉花、甘蔗、烟草等种植园的国土，最初是英国的圣路易总督奥哈拉在十八世纪后期制订的，在法国革命和第一帝国期间由于圣多明各奴隶起义的结果而又被提上日程。当瓦洛在1819年被施马尔茨总督“购买”的时候，这项试验就开始了。巴里分析了失败的原因：主要原因是村社反对剥夺它们的利益而使欧洲合伙人得利，那种做法是贵族所同意以取得更多“关税”的。另一个原因是缺乏人力，因为没有理由要农民离开他们的村社到种植园去当无产者。国王提供了一些实质上是奴隶的武士——长期服役者。但是该计划只能采用一些权宜的办法。直到殖民征服以后，才可能产生无产阶级：通过征税，通过干脆的剥夺，通过强迫劳动。事实仍然是：瓦洛的农业殖民化计划在1831年以失败告终。但是这一尝试加剧了人民对他们的贵族的憎恨，并为他们皈依伊斯兰教作了准备：那是穆斯林居民在官方当局范围以外自行组织的。费德尔布在1855年至1859年间征服瓦洛，旨在再次开始农业殖民化计划而最后为法国工业取得了它所需要的棉花，其时，战败的贵族信奉了伊斯兰教，因此，伊斯兰教再次改变了内容：不再是一种从事反抗的思想，而现在成为结合这个新外围的一种手段了。

其他的非洲社会即使在被征服以前即努力自发地调整自己来适应这一进程。沃尔特·罗德尼指出：沿贝宁海岸，仍然到处在掳掠奴隶，但是不能再输出了，因此就留在当地社会内部进行劳动，生产欧洲需要的出口品等东西。凯瑟琳·考克利据此分析了达荷美棕榈林的巨大发展。昂吴卡·戴克说明另一种社会即伊博人的社会虽然无法使用奴隶，但使自己适应于出口棕榈油的生产。

收集出口产品以及输送交换来的进口品加强了迪尤拉穆斯林——从遥远的前重商主义时期承继下来的一个少数民族——的地位。“迪尤拉革命”使他们建立了一个自己控制的国家。但这个姗

姗姗来迟的事件是在殖民地时期已经开始以后才发生的。萨莫利刚把国家建立,就面临摧毁它的征服者;征服者们重新开辟了贸易渠道,使之适应于自己并使迪尤拉人沦为殖民地贸易的附属物。

非洲大陆的分割完成于十九世纪末,使殖民主义者增加许多方法来达到中心地区的资本的目的,那就是:取得便宜的出口品。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中心地区的资本——现在已经达到垄断阶段——能够直接就地组织生产,可以在那里剥削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为后者支付的价格无法使它们在枯竭时得到取代的办法)。而且,通过直接的、野蛮的政治统治,可以把当地的社会阶级作为传送带并使用直接的政治强制力而使杂费压得低低的。因此,在非洲,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外围模式出现很晚。直到独立时,对殖民地政府进行接管的当地阶层才构成国内奢侈品市场的一个因素。

然而,虽然各地的目标是一样的,殖民剥削制度却发展起不同的变形。这并不(或只是稍稍)取决于殖民者的国籍。法国的直接统治和英国的间接统治之间的典型区别,在非洲并不很显著。确实,有些不同是由于主子的国籍。英国资本更富有、更发达,而且掌握了“最好的地盘”,它比法国资本就进行更早、更彻底的发展。因此,黄金海岸在1890年以后建立的结构,以及加纳仍然具有特点的结构,在象牙海岸则直到强迫劳动废除以后才出现。比利时是一个小国,不得不对“大国”妥协,它并不取得法国向来从中得利的直接殖民垄断。葡萄牙也同意和英、美大资本分享殖民地。

在我称之为“劳动力储备的非洲”地区,中心地区的资本立即需要一支巨大的无产阶级队伍。这是因为那里有可供开采的大量矿产财富(南非的黄金和钻石,北罗得西亚的铜),以及在热带非洲极为优越的垦殖农业(南非的布尔老殖民地,以及南罗得西亚的英国新殖民地,还有该地区最北端肯尼亚的英国新殖民地——1919年以后被德属坦噶尼喀从劳动力储备的非洲南部分离出来的)。为

了很快得到这一无产阶级，殖民主义者以武力剥夺非洲农业社会的财富，特意把他们赶回到禁闭的贫瘠地区，那里没有现代化的手段，并且使他们从事密集农作。这样，殖民主义者就迫使传统社会成为临时移民或永久移民的供应地，为欧洲人的矿山和农场以及尔后为南非、罗得西亚和肯尼亚的制造业提供廉价的无产阶级。从此，我们不再能谈论非洲大陆这部分的传统社会，因为劳动力储备的社会已经具有一种全新的职能。这一地区的非洲社会形态是畸形的、贫困化的，甚至失去了独立的外貌：产生了种族隔离的不幸的非洲和班图斯坦，为中心地区的资本提供大量的利润。

直到最近，西非并没有已知的大规模矿藏财富可能吸引外国资本，那里也没有任何垦殖殖民化。另一方面，奴隶贸易在这一海岸十分活跃，因此产生了复杂的社会结构而有可能发展供出口的大规模热带农产品生产。

这些方法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构的最后结果，构成了“贸易经济”。主要的方法是这一些：（一）组织起占统治地位的贸易垄断，组织起殖民地的进出口商行以及由它们统治的金字塔式的贸易网结构，其中，黎巴嫩人占据中间地位而以前的非洲商人则被压垮而屈居从属地位；（二）对农民征收货币税，这就迫使他们生产垄断资本家要购买的东西；（三）对于获准实际占有某些部落土地的社会阶层和阶级给以政治支持，组织从那些特意沦于贫困以用作种植园地区的劳动力储备的地区进行内部移民；（四）同那些穆斯林团体的神权结构中愿意把征收的农民贡赋用于商业销售的社会集团结成政治联盟；（五）如上述办法证明无效，则干脆赤裸裸地诉诸行政强制手段：强迫劳动。

传统社会被扭曲到无法辨认的程度；它失去了独立性，现在它的主要职能是为世界市场而生产，这种社会由于沦于贫困化而没有根本现代化的任何前景。所以，这种传统社会并不是在过渡到

现代化；它是完完全全的一种依附性的、外围的社会，因此处于绝路；它的前进路子都被堵塞了。它最终保有某些传统的外貌，这构成它唯一的生存条件。贸易经济是指这种结合进世界体系的假传统社会同塑造和统治这种社会的中心地区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从属—统治关系。贸易经济的概念往往仅用于描述以农产品交换进口制成品；实际上，就分析来看，它描述的是：以这种方式形成的一个外围社会所提供的农产品交换一个中心地区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品（不论是进口的，还是由欧洲企业就地生产的）。

这种经济的结果，在不同地区是不一样的。在殖民化开始时，利弗兄弟公司要求黄金海岸的总督给与租让权以使他们发展现代化的种植园，他拒绝了，因为“这并无必要”。那位总督解释说，只需帮助“传统的”酋长们占有最好的土地，那么不同额外的投资费用就能得到这些出口产品。到十九世纪末，黄金海岸和德属多哥有了完全的贸易经济模式，后来很晚在法属西非、其后在法属赤道非洲也出现这种模式。为时很晚，反映了法国资本主义的情况，这说明他们在不很有利的条件下（在象牙海岸和赤道非洲的法国种植园主）企图形成准垦殖殖民地，并相应地把强迫劳动一直保持到当代，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贸易经济有两种主要形式。富农化，那就是：构成一个来自农村的当地种植者阶级；这些种植者几乎独占地占用土地，并雇用雇佣劳工，那是几内亚湾地区的主导形式，在那里的条件有可能发展贸易经济。但是在热带草原地区，从塞内加尔到苏丹直至北部尼日利亚，穆斯林团体产生一种不同类型的经济：组织出口生产（花生和棉花）的背景是受制于一个神权政治当局的广漠地区——即塞内加尔的穆利德团体、尼日利亚的苏丹国、苏丹的安萨尔和阿希卡——它保持了纳贡制社会形态的形式，但是它结合进了国际体系，因为从村社征收的、以贡赋形式占用的剩余本身是上市销售

的。正是埃及对苏丹的殖民化，产生了发展这类组织的最先进条件，在该国中这类组织往往成为纯粹的大庄园。英国人只是坐收这一发展的果实。1898年以后集结于殖民地政府的这些新大庄园主为了英国工业的利益而种植棉花，他们得到了强大的现代化技术设施。

但是，在殖民征服后西非的第二次伊斯兰变异打开了同类的演变道路，虽然比较缓慢和较不公开。伊斯兰教被贵族和殖民者“接过去”，它成为那些为了组织殖民者所想望的出口生产而控制农民的人们的意识形态。塞内加尔的穆利德现象是这种第二次变异的最突出例子。穆斯林团体的发起者和某些心胸狭窄的殖民地行政官员们认为自己是相互敌视的，其实无关紧要。事实上，那些穆斯林团体是扩大花生经济最重要的方向，他们要农民服从于那种经济的目的：大量进行生产，接受极低的、不景气的劳动报酬，尽管生产率有进步。

为了组织贸易经济，就必须破坏前殖民地贸易并根据外向经济要求的方向来重新形成周转线路。因为，在征服以前，在西非的不同社会之间存在着地区的互补性，它有重要的自然基础（森林与大草原），并得到这些社会间关系史所加强。可乐果与盐的内部贸易，牧民与农民之间的交换，出口商品的处置和进口商品的传播，构成了一个被非洲商人所主宰的严密网络。殖民地的商行必须控制这一切流动，把它们引向沿海，因此，殖民主义破坏了非洲的内部贸易并使非洲商人沦为从属的初级收款员的地位（要是没有干脆全部消除的话）。萨莫利贸易的毁灭，正如圣路易、戈里和弗里敦的混血种人贸易的毁灭，萨拉加的豪萨人和阿散蒂人贸易的毁灭以及尼日利亚三角洲上伊博人的贸易的毁灭，证明了贸易经济所具有的破坏性的社会经济影响。

然后，在地区一级，殖民地经济必然会产生一种依附性外围发

展的两极分化。沿海的富裕必然伴随着内地的贫困。非洲的地理和历史说明这个大陆是在内地大河主流沿线组织起来的，以此提供运输、灌溉和电力供应，必定只有其狭窄的沿海地区得到发展。它的资源全部集中分布于沿海地区（这是贸易经济的有计划政策），加剧了地区的不平衡。从内地向沿海的大量移民就是这种制度的一部分逻辑：它使得需要廉价劳动力的资本能得到这种劳动力，而且只有“世界大同”的思想才从这种移民中看到使移民迁出区贫困化的情况。而且，贸易经济最终达到巴尔干化，因为“得利的”小地区并不愿意同它们在內地的保留地分享它们获得的殖民地面包屑。

把这种制度建立在这个大陆上的第三大区：中非，是不可能的。在这里，生态条件保护了各民族，他们避居在沿海难以渗透的、奴隶贸易的蹂躏难以到达的地区。那里的人口密度低，而且没有充分的阶层结构，因而不可能推行贸易经济模式。殖民者对此感到失望，因此把这些土地交给冒险家去处置，后者愿意设法不花大钱而“得点利”，那里是难以吸引资本的。取得特许权的公司从1890年到1930年大肆掠夺赤道非洲，但是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利润之外，一无所获。利奥波德国王在刚果的政策也受到应有的谴责。在比属刚果，采取了由大资本直接建立的经济作物种植园（如：利弗兄弟公司得不到在黄金海岸建业的允许，却得到比利时人的欢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外资控制的这些种植园地区的延伸，出现了一种小规模的贸易经济。至于法属的赤道非洲，直到1950年以后才出现贸易经济的最早征象。但是特许权公司时期留下的印记仍然无所不在，我们称这个地区为“特许权公司的非洲”是有道理的。

在所有这三个例子中，殖民地制度组织的社会是为了在根据宗主国的最佳条件下来进行生产，生产的出口商品只提供极低、极

差的劳动报酬。一旦这一目的达到以后，当代非洲就不再存在任何传统社会，而只有依附性外围社会了。

埃塞俄比亚原先的历史应被视为同殖民主义在非洲建立的苦难的依附性社会适成对照。目前的偏见是把殖民主义视为现代化的一个阶段。事实上，埃塞俄比亚幸好没有被殖民化。古代的阿克苏姆邦属于那类古代贸易中心，在那里，宫廷的灿烂文明是通过对远距离贸易征税而取得资源的。被沿海的穆斯林机构所孤立的阿比西尼亚从九世纪以后变得封建化了；分散的统治阶级设法靠向农民征税以保持生存。在九世纪，麦纳里克皇帝意识到帝国主义的危险，采取主动在欧洲人到来以前征服了今日埃塞俄比亚的南半部（包括加拉和锡达莫诸国）。他后来把他的国家以“开明的专制主义”加以现代化，而并未使它发生异化。他剥削本国的阿比西尼亚农民，剥削被征服的地区，这使他能为国家搞到大笔盈余，以此加强行政机构。王国保留了对这个制度的控制，从国外得到可以达成其目标的手段，特别是武器。判断这项努力的历史性意义，可以回顾一下这个事实：加拉和锡达莫的农民当时并不懂得使用耕犁，而是象黑非洲其他地区一样是靠锄头来耕作的。埃塞俄比亚政府和封建领主在 1880 年至 1935 年之间引进了耕犁的使用。英国、法国和比利时殖民政府曾经瞩目于同样的目的而未能成功。无可怀疑，在 1880 年至 1935 年之间，埃塞俄比亚的农业现代化以及农业生产率的增长率比非洲其他地方要显著得多。正是因为这项进展才使人口增长也高于殖民地非洲的情况。与世界市场隔绝的埃塞俄比亚不受到进口品的竞争。剩余（粮食为主）供应国内市场；因此这个时期的发展是自主中心的。其结果是民族国家更为紧密，上层分子较少疏远，虽然地方主义的问题仍然存在表明“开明的专制主义”方法具有局限性，它无法把形形色色的农民群众吸收到单一的国家生活中来。直到 1935 年意大利征服以后，而且特

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埃塞俄比亚才真正进入了世界体系。也是从那时以来，不发达的现象才开始出现。

第二节 外围形态的一般特点

尽管其来源不同，外围形态却往往集中到实质上同样的模式上来。这种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反映出资本主义日益增大的统一力。所有的外围形态有四大共同的主要特点：（一）在国营部门中，农业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二）产生一个追随占统治地位的外国资本的当地资产阶级（主要是商业资产阶级）；（三）具有当代外围地区所特有的特殊官僚主义发展的趋势；（四）无产阶级化的现象具有不完全的特点。

农业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

农业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是不发达社会中最突出、最明显的传统特点。不发达世界中统治阶级的传统形象是大地主——不是封建主，而是为出口市场搞生产的种植园主。它最具形式的形式就是拉丁美洲的大庄园主。古巴是最完整的例子，因为那个制度在那里建立起来时一开始就是为这种职能服务的，对于前资本主义形态不加任何内部的变革。这种大庄园形式长期使用奴隶劳动（奴隶和雇农），后来才发展有计划地使用雇佣劳工，这个事实表明：当资本发现劳动力短缺时，它毫不犹豫地使用政治手段来达到它的目的。

当资本主义大庄园形态通过改变前资本主义形态而发展时，它遇到了内部社会势力的抵抗；由于村社是这些前资本主义形态的基础，因此这些社会势力特别活跃。在某些情况下，当这些势力被完全制服时，最终的模式就实现了，例如在埃及。可是，情况发

展往往证明达不到这一点。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结果就构成一些由于其初级生产的职能而结合进世界市场的农业资本主义形态，可是却仍然是封建型形式的外貌。塞内加尔穆利德地区和北尼日利亚各苏丹国的花生种植制以及苏丹的经济制度是这种不完全转变过程的例证。新的统治阶级为自己直接取得的只是一部分（往往是一小部分）土地。他们继续从自身地位原来依靠的纳贡制来获取。在上述的非洲国家中，这种贡赋是以新的宗教职能的名义征收的，因为农民社会被结合进一个宗教社团的体系。当地的统治阶级同世界市场相隔绝，只能以生存必需品的形式征收贡赋，供自身的消费以及供其食客和政府机器的消费。一旦结合进市场体系，它就能把贡品出售而采取欧洲的消费模式。但是只有当农民由于一种新力量的结果而同意这样做，它才能取得越来越多的贡赋；在这种情况下，新力量就是宗教。

矛盾的是，由于原来的前资本主义形态不够发达而此路不通的地方，最有力和现代形式的农业资本主义为自己扫清了道路。这是黑非洲的本地种植园地区的形态的情况，在那里，富裕农民立即成为新形态的中心人物，而其他地方，在结合进世界市场的大庄园制的内部矛盾发展以前，农业改革未能促进富农化（例如，在埃及、印度、墨西哥）。甚至在把结合进世界市场的前资本主义形态转变为富农型农业资本主义的条件不利的地方，发展的趋势也是这种方向。于是我们就看到分散的小型农业资本主义的虚弱形式，例如在尼日尔的热带草原区。通过合作社把现代化生产资料（畜力工具）集中起来以及出租这些生产资料，这种现象在非洲是常见的，反映了趋向资本主义的这种趋势的力量。

在东方，以及在拉丁美洲，新的依附性的本国资产阶级一般是从大地主阶级和高级文官中产生的，在某些情况下也从商人阶级中产生。大地主往往以适应出口农业的要求而与政治统治集团合

为一体，它们日益强大，变成了资产阶级型的地主。这种大土地阶级在黑非洲是没有的。出口农业往往在大型的欧洲人种植园里进行，例如在比属刚果和法属赤道非洲。在其他地区，贸易经济产生于聚集在村社中的千百万小农的劳动。这种村社关系的存在延缓了伴随农业商品化而来的分化过程。然而，在某些条件下，一个农业资产阶级可以很容易地在这类小农经济内部形成。

发生这种情况，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似乎是存在一个等级森严的传统社会，可以使传统酋长制的某些阶层有足够的社会权威来为自己占有大片部落土地。加纳、南尼日利亚，象牙海岸、乌干达以及乞力马扎罗地区的传统酋长制就是这样为自身的利益而建立起种植园经济的；班图各民族中是不存在这种情况的，他们没有这样的等级制度。可是，应当注意到，那些（半封建的）等级制度如果过于突出和发达的话（例如在伊斯兰的热带大草原地区）就不能促进农业资产阶级的发展。

第二个条件是存在每平方公里二十至三十人的平均人口密度。如果人口密度较低，单纯占有土地就没有效，而且雇佣劳动力的潜在供应不足。如果能从当地民族集团以外吸收劳动力，那么无产阶级的化就要容易得多，那就是象牙海岸的沃尔塔人的情况。在第二阶段，原来种植园主家族中的低级成员和家属可能转而加入无产阶级的行列。如果人口密度过高，例如在卢旺达以及在喀麦隆的巴米累克高原，部落酋长难以占有足够的土地。

第三个条件是存在丰富的作物，这样，在发展的最早期人均单位面积产量可以有充分的剩余，当机械化程度很低，农业生产仍然很粗放，所以农业生产率就很一般。因此，别地方的咖啡与可能做到的，却不能在乌干达的棉花，塞勒区的花生以及其他贫瘠的粮食作物中做到。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条件是政治当局不反对这种自发的发

展。有利于私人占有土地、自由劳工、个人取得农业信贷的方便条件，对于这种农村资产阶级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法属殖民地在1950年废除强迫劳动一事所起的作用就具有这方面的特点。资产阶级对于劳动力自由的典型要求，使得象牙海岸的种植园主有可能为自身的利益而使用大批移民，他们的数量同强迫劳动所提供的劳力相比，大得无法比拟——而且，这只是法国种植园主使用的部分。而且，还可能在农村组织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斗争，使种植园主得到过去受强迫劳动之苦的农民的支持。另一方面，比利时农民的家长式统治无疑起了消极的作用，而且阻碍了如下刚果这样的地区朝资产阶级发展的趋势。只有当这一政策被放弃而独立来临之后，这种资产阶级发展才可能在那里推进，由于从安哥拉来的难民，使那里有可能利用外来劳动力而加速了这种发展。南非和罗德西亚实行的种族隔离和“保卫非洲传统”的政策也阻碍了农村资产阶级的发展。

这种情况是否适用于“农村指导”、“农村行动”和“合作社”发展的政策呢？实施这些政策，根据的是一般同样幼稚的、家长式统治的公式，反映一种希望看到农村到处以同样的步伐持续前进的乌托邦想法。他们没有阻碍在可能的地方发展种植园制度，他们也没有在其他地方带来可观的质变。

还有大批地区由于当前情况不容许变革而没有受到这一运动的影响；正如艾伯特·迈斯特所说的，“没有起飞的”那部分非洲和“起飞不了的”那部分非洲。只要非洲仅仅靠扩大传统的自给农业而不需改变结构就能吸收其人口增长的话，那么这也是“没有困难问题的”农业非洲。把这样的非洲结合进殖民世界只能促进出口作物的极有限发展，而且这种出口作物往往是政府为了保证税款而强令种植的。在某些情况下，当这些出口产品同可以交换的工业制成品之间的贸易比价恶化时，或者干脆当政府强令种植的权

力削弱时，这些出口作物就被自给作物所取代了。一种寄生性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往往是贸易比价恶化的基础：例如，扎伊尔的棉花经济的衰落，是这一进程最突出的例子。马里、几内亚、乍得、中非共和国、塞内加尔等国也可以找到同样的现象。

农业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带来了农业危机，这也是第三世界的一个普遍现象。因为人口的自然增长无法从工业化找到正常的出路，对土地的压力就增加了。而且，农业资本主义的形态导致过多的农业劳动力被排挤出生产循环。在前资本主义体系中，不论在理论上过剩劳动力有多少，所有的人都有权得到土地。随着资本主义形态的发展，这种权利失去了。这种进程的结果是无地农民比例的增加以及这些农民中越来越大的部分被排除出生产循环。与此同时，不平等交换的机制使得农村人口日益贫困，尽管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有改善。这些都是人口流出农业区的深刻原因，而且，尽管城镇里缺乏足够的就业机会，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速度却在增加。

外国资本所强加的限度

伴随出口农业的商业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是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出现的买办贸易主要有两个形式。这种功能可以由发源于土地寡头的新城市资产阶级来进行，总的说来这是拉丁美洲和许多东方国家的情况。但是这也可以直接由殖民资本来进行，正如黑非洲的情况。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形成一个当地商业资产阶级的余地就极为有限了。

在东方世界里，城市资产阶级一般比农村资产阶级出现得早得多，后者的发展被农村地区所存在的半封建关系所阻挠。在另一方面，由于城市文明久远，所以老式商人容易变成现代型的资产

阶级，即中国马列主义者所谓的“买办”——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世界同农村内地之间的中间人。这个商人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及政府上层一起，常常同外国资本合作建立工业。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核心来自这些社会的上等阶层而不是来自农村资产阶级或第三等级。至于第三等级的各个阶层，特别是手工业者，对外国和本国工业的竞争不是使他们无产阶级化，就是使他们沦于无可挽回的倒退。东方主要城市中的大规模就业不足主要是由于这一现象。

构成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模式，既和欧洲模式不同，又和当代黑非洲的模式不同。在欧洲，古代政权的资产阶级在形成新工业资产阶级时并不常常起主要作用。他们时常通过购买土地而变得封建化，而新的农村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提供了十九世纪的大部分企业界精英上层。在东方，农村资产阶级的软弱和手工业者由于国际竞争而无法进步，使得民族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是高度集中的。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印度和埃及是最好的例子）以及城市财富不断向农村转移以购买土地，加强了财富的集中以及大地主和新城市资产阶级的融合。

在黑非洲，那里的城市化只是在殖民地时期发展的，大土地所有权几乎不存在，城市资产阶级的形成就长期推迟。传统的商人由于缺乏财政资源，没有能力使他们的方法现代化并进入现代商业周转。他们的发展仍然是有限的，他们的活动领域时常限于传统贸易（例如：可乐果和干鱼）。他们的有些活动（例如盐和金属的贸易）甚至完全不见了。可是，随着贸易量的增加，某些部门变得相当赚钱。尼日利亚的尼日尔河套和苏丹的牲口贸易就是这个情况，马里、乍得和贝宁海湾的鱼干贸易也是这样。有些商人从事一些现代商品如布匹和五金的贸易，但一般都进展不大。可是，他们却不乏事业心，萨拉科尔人和豪萨人被钻石买卖所吸引而迁移到

遥远的刚果去，就是证明。但是人数不多，财力薄弱，技术知识缺乏。

在殖民征服以前若干世纪，贸易是由沿海企业进行的，在那里，西海岸的是欧洲裔商业资产阶级，东海岸的是阿拉伯裔商业资产阶级，很快形成一个各种血统都有的商业界。这可能是一个民族商人资产阶级的开始。实际上，虽然这些商人随殖民征服而发展，他们并不到该地区内地（那里的农业已成为商业性农业）去经营。他们的发展开始太晚，在二十世纪初因殖民贸易大垄断资本的成功竞争而突然停步。这就是十九世纪末圣路易和戈里的商人破产的原因，他们是被来自波尔多和马赛的公司竞争所挤垮的。他们的儿孙都当了政府公务员。

农村地区商业关系的发展也必然形成一个小商人的资产阶级。可是，在这儿，大商业垄断资本的势力又阻止他们超越零售商业、小量批发商业的水平而发展到大规模批发业和进出口贸易的水平。留给当地商业资产阶级的一个领域是当地的食物业，直到今天这个行业仍然很分散，而且往往是妇女干的。但在某些地方似乎有走向集中的某些趋势。

可能成为资产阶级的所有这些阶层都苦于没有一个富有的地主贵族，有了后者的合作，他们就有可能加速积累率。非洲市场狭小，这也起了消极作用。商业的需求由大公司设在停靠港的很少量代理行来满足，由移民小商人（希腊、黎巴嫩和印度）来满足。只有在现在的例外情况下——当独立以后，或者当国家代表本国商人积极干预以后，欧洲商业撤离了——后者才能够进入大规模批发和进出口贸易的行业。

总的说来，外国资本对本国企业控制的有效与否，取决于这些本国企业是否成为包括对外交换在内的贸易循环的一部分而最终被外国资本所统治。例如，在塞内加尔，本国资产阶级可以用作积

累的利润是完全由中心地区资产阶级和外围地区资产阶级之间的等级关系所决定的。如果让自发的经济法则自行发挥作用，这种利润总是会降到零，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化使利润从民族资产阶级向中心地区的资产阶级转移。这种机制说明了1900年至1930年之间塞内加尔资产阶级的衰落，以及从世界市场引进的现代部门（如卡车）的境况不佳。

阿里基把追随外国资本而形成的这种微型资产阶级称之为“游民资产阶级”，它只能在占统治地位的外国资本的政策所规定的严格范围内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这种可悲形式常可以在非洲见到，在那里，资产阶级主要是由传统上从事贸易的民族集团的人们所形成的（迪乌拉、豪萨、巴米累克、巴卢巴、巴刚果，等），或者，在某些国家里是由“市井妇女”构成的。这个资产阶级虽然受到统治资本所表现的容忍程度的严格限制，他们却在普遍贫困之中构成了一支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当地社会力量，例如南部尼日利亚的情况，在那里，这种“非洲企业”常被称为推动本地私营企业的政策的成功例子。

在殖民地经济依附的主要方面存在于贸易关系的地方，在外国资本的主要形式是老式殖民商业资本的地方，即使这种有限类型的民族资本主义也是没有发展的可能性的。特别是在法国殖民地，宗主国资本主义的动力不大，这使得波尔多和马赛的老式商业资本（昔日垄断公司和奴隶贸易所遗留的）具有超乎比例的特殊影响。可是，在当代，由于占统治地位的外资重心已经从商行转到大跨国矿业和工业公司，这个部门已经失去它的重要性而让给了当地资本。

由于政治独立的结果而在关系上的变化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民族资产阶级更加突出地兴旺发展，因为它同国家机器有许多联系——家族关系、贪污，等等——国家机器有利于它的形成。

在当地权力集中的最极端例子中，是官僚集团的上层——在土地寡头存在的地方，两者就融合起来——这公开地或间接地形成了买办新资产阶级。这样，他们不但能把殖民地贸易的职能接过来，而且还设法同采矿、工业和银行等现代部门中的外国资本取得联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拉丁美洲和东方，大庄园主和买办寡头通过进口替代而开始从事零星的工业化。而且，它总是同统治着这种新的轻工业的外国资本合作。

今天黑非洲的工业化运动同东方和拉丁美洲采取的工业化模式有很大不同。首先，黑非洲的工业化运动发动得晚得多。殖民条约和市场的狭小肯定是这一落后的原因。但是即使在独立以后在进行工业化的地方，那也是几乎完全由外国资本来从事的。现代工业，即使是轻工业，需要的资本太多，当地的民族资本无力参与，它也不象东方那样有大地主来构成积累的来源。其结果是，实际上没有小规模的非洲工业。在统计数字中列为这类工业的往往事实上是城市手工业企业（例如，面包房，木工作坊），积累资本的机会很少。欧洲企业对于企业活动范围的渗透是非常深的。

非洲农村资产阶级自身不能产生一个现代工业，因为它没有财源。参加政府工作的农村资产阶级的成员把他们留在种植园的亲戚的钱用来投资，投在需要资本额不太大的部门，例如公路运输、出租汽车、服务业、营造业。反过来，政府公务员购买种植园或土地用作市场园地；但是私人城市财富薄弱，限制了这种转移的规模。

可是在东方，资本主义从城市开始，然后有所困难地扩展到农村，在黑非洲通常却是相反的过程，在那里，一开始，农村资本主义活动分散在千千万万种植园主之中。另一方面，城镇中高度集中的大资产阶级时常同大地主阶级结盟，这在东方以及在拉丁美洲

是常事，可是在黑非洲却没有。

向本国官僚机构发展的当代趋势

在当代世界里，可以看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国家行政和企业行政，工会和政治生活，等等）里都在发展着官僚主义机器，它的规模和效能处于同过去完全不同的水平，至少在中心地区的资本主义形态中。有人说它之所以必要是由于“技术”的发展，有时还说（伯纳姆和加尔布雷思）这种现象代表着政治权力从议会民主向科技治国的方向转移。关于现代技术需要这种体制的证明据说可以从俄国和东欧的发展中看到。虽然世界上部分地区的生产资料是公有制，而另一部分地区的生产资料是私有制，却都在趋向这种体制。第三世界对加速发展的要求，据说加强了这种总趋势。

这一理论是经不住分析的。中心地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意味着社会两极分化为两大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虽然后者中越来越大的部分——各类干部——是工资收入者但却否认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一分子）。当资产阶级行使政权并管理经济，它不能由自己从事所有的管理和经营职能。随着社会进步，这些机制变得越来越复杂，而这种现象也日益显著。因此就成立了负责这些事务的社会机构：高级行政管理、警察、军队、大公司的技术结构、职业政客的团体，等等。有些机构已经失去了它们的职能——例如，当资本仍然分散和竞争时，职业政客在议会民主的背景下是作为代表不同利益的谈判人的。随着垄断资本的兴起，这些人物的职能已经由大公司的技术官员或国家来取代了，这导致了西方国家里代议制政府的没落。只是在严重危机时期，例如使纳粹主义抬头的危机，资产阶级失去了对这些机构的控制，这些机构才似乎构成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在苏联集团的国家里，科技治国机器的加强及其对民主的要求（限于科技治国论者）反映向一种新形式的

普遍化国家资本主义的演变，其主要特点是重新建立市场结构以及与之俱来的意识形态：经济主义。

但是把这种分析转用到外围地区，那是不正确的。在东方以及在拉丁美洲，我们已经看到，中心国家的资本的统治地位产生了由本地统治阶级（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当地的政权是移交给他们的）所构成的社会形态。这些阶级是在世界体系的结构内行使其权力的，那就是说，是有利于中心国家和他们自己的。在外围的某些其他地区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例如，在马格里布，因为直接的殖民化以及“贫苦白人”的定居，形成类似于东方的社会阶级的可能性就极为有限。在黑非洲，特别残酷和野蛮的长期普遍直接殖民化使广大地区的当地人民沦为一批无差别群众的境地，因为传统的等级结构已大部失去其意义而所有新的经济职能都已由外国人接过去了。

随着政治独立的来临和民族国家的形成，新官僚机构同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出现了很不同的形式。在外围形态很先进的地方，本国官僚机构发现自己同社会结构的关系上处于同中心地区的本国官僚机构明显类似的地位。可是，这只是外观上的。因为外围经济只作为中心经济的附庸而存在，所以外围社会是不完全的；它所缺少的是宗主国的资产阶级，后者的资本是作为重要的统治力量而活动的。由于本地资产阶级的发展比较薄弱和不平衡，官僚机构显得就更有份量。在外围形态并不高度发达的地方，本地的官僚机构甚至是舞台上的唯一角色。然而，在其他地方会发展一种特殊的矛盾。国家或者在该制度内完成其职能——那就是说，至多帮助促进本地的外围资产阶级——或者它设法通过促进民族工业而把全国从中心国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那么，民族工业必须公共所有，这样就可能同发展这种工业的社会集团发生冲突。

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在所有的第三世界都能看到，这导

致了外国资本的统治地位和本国的城市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特别在非洲，这种民族运动往往是由城市小资产阶级（政府公务员和办公室职员）所领导的，如果有小企业主和种植园主的资产阶级的话，那就一起领导。农村中的传统上层分子一般支持殖民地秩序，他们感到那可以保护传统，而城市中的文化现代化是在危及传统。城市资产阶级被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所压倒。

独立突然增加了新的国家官僚机构在民族社会中的特殊份量——由于农村资产阶级（在它存在的地方）仍然是分散而有限的，情况就尤其如此。官僚机构继承了政权的威信，这在非欧洲社会中是传统的并且被殖民地政权（似乎是绝对权力）的经验所加强，还由于作为这种官僚机构来源的小资产阶级垄断着现代教育和技术而得到加强。

这种新的官僚机构成了主要的社会驱动力。民族资本主义最可能的形式将是什么呢？私人资本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呢？实际上，这两种形式以不同方式结合起来，这取决于殖民化末了时达到的发展阶段。

殖民统治下的资本主义发展首先靠的是自给农业转变为出口农业，靠的是矿业。殖民地资本主义的增长率因此取决于发达国家对殖民地基础产品需求的增长率。在后期阶段，农业商业化以及有关的城市发展所产生的当地市场使得一些轻工业单位——几乎全由殖民资本所资助——有可能建立起来。在某些情况下，当独立来临时，外国资本的这种潜在发展力尚未穷尽，所以新的当地政府必须不触动从殖民地时期继承下来的经济结构。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新政府被要求把外资部门接收过来，因为那是它取得经济基础来迅速发展的唯一手段。于是它就会从一个传统的行政官僚机构变成国家资产阶级。

在第一种情况下，随着外国部门的发展，可能通过国家的力量

为民族资本找到某种地位来推进这类发展。但是这种地位必然是很有限的。在另一种情况下，本国资本主义牺牲外国部门取得的发展是有更大可能的，而且采取各种形式，有利于私营或国营的民族资本。外资种植园转移到城市社会的小康阶级手中，以及购买新的外资工业的股票，是这类进程的例子。可是，在所有情况中，国家的作用是重要的，因为只通过经济力量的活动，这一进程是不可能的。种植园主和商人的当地资产阶级并不掌握财源来买下所有外国资本的投资。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得到公共资金。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构成了所谓“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质。

有些情况有利于使向前发展的演变更为激进而把它扭到所谓社会主义型的组织(指的是受到苏联国家模式的影响)；另一些情况则有利于所谓的自由派形式(指的是它们受到西方经济组织模式的影响)。当发达的殖民地式发展长期受到阻塞，以致问题日益严重，来自城乡群众的压力在独立以后就导致对私人资产阶级采取更为严峻的态度。同样地，而且自相矛盾的是，如果由于殖民地发展所造成的落后而没有私人资产阶级时，政府对国家生活的影响就能加强走向国家控制的趋势。另一方面，一个不断发展的殖民地式的发展(例如在象牙海岸)能够加强自由派的倾向并改变私人资产阶级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可是，总的说来，国家资产阶级从来没有消灭私人资产阶级，而是满足于吸收它们或者融合它们。特别是农村的种植园主资产阶级始终保持着一个有力的经济地位和重要的政治地位。

要了解诸如第三世界的特权阶层和特权阶级的地位等现象，必须先对整个结构进行分析。殖民主义，特别在黑非洲，在独立以前的时期，总是赞成在劳动力报酬方面有某些差异。直接的殖民统治越来越不能忍受了。城市发展和工业的创立，使得同欧洲消费方式有接触的城市工资收入者获得较高收入，颇为重要。而且，

农村中传统社会关系的强固性(它的解体很慢)限制了劳动力流入城镇。外资的重心从老式的商业资本转移到具有高度生产率的大公司,这就有可能修改工资水平。在比属刚果这个最高度工业化的非洲国家,从1950年至1958年,工业部门的实际工资翻了一番,这一增加并未阻碍新工业的发展;相反,它刺激了现代化和工业扩张。殖民主义不依靠依附性的、外围的当地资产阶级,而是设法以这种方式只向技术水平低的社会阶层作出让步,避免形成要价更高的上层分子。

这些小特权的范围与分布在独立以后有了变化。前比属刚果在1960年至1968年间的通货膨胀,结果使本地的收入分配有相当大的变化,但是外资所占有的份额则保持不变。一个当地官僚机器的建立(同时产生了一个官僚机构,其上层分子今天构成了刚果社会上取得最大特权的阶层),其资金来源是:一方面由于为出口而生产的农民的实际收入大量减少(他们的对内贸易比价恶化大大严重于对外贸易比价的恶化)、另一方面由于支付给工、商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不是那么严重(回复到1950年的水平)。拉兰德特表明了这些变化的退步性质:新的收入分配中进口成分增多,这包括更多的消费;随之而来的公共财政和国际收支的双重结构性危机(潜在是永久性的);以及包含着对外部世界的更大依附。除了没有通货膨胀,法郎区国家的发展特点也有类似现象,其他国家如加纳也是这样,加纳只有温和的通货膨胀。这种机制是按以下方式运行的:冻结支付给农产品生产者的工资和价格;增加间接税以平衡公共财政;导致国内价格上涨和自耕农及工资收入者收入的下降。各处的农民阶级对这种恶化情况的反应是退出市场并回复到自给经济,这样就缩小了国家用以增加岁入的征税基础。

尽管如此,整个第三世界今天存在同一方向的争取政治和社

会变革的根深蒂固的倾向，即：推翻任何地方存在的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当地政权，由文职或军人官僚机构直接行使权威（军人往往看来是新政权的途径，因为它组织得最为良好，有时候是唯一有组织的集团），并且建立和最终发展一个公共经济部门。即使没有旧权威需要推翻，也要通过不断的内部运动来进行类似的发展。这种现象可以由外围形态所特有的矛盾来加以解释。由于工业化不足以及没有外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型的阶层（公务人员、办公室职员，有时还有手工业者、小商人、中农等人中的幸存者）就具有巨大的重要性。教育体系的扩大以及失业的增多造成了这个制度的危机。为了克服危机而加速工业化的要求本身会导致公共部门的发展，因为利润规定（它决定外资的流入）和本国私人资本的不足拖了必要的工业化速度的后腿。国家官僚机构的最终加强可以导致国家资本主义的普遍实施。这种发展之或紧或松取决于它是否把外国资本收归国有以及取决于国家资本主义是否或多或少地容忍一个本国的私人部门并与之发生联系。可是，即使在极端的情况下，国家资本主义容忍、甚至鼓励在农村地区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富农化最后走向土地改革，即为一例）——即使它设法例如通过合作社体系组织这种发展以便控制它。如果它对于本国结合进国际市场并不提出问题，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一定在基本上保持外围性，正如它的前驱私人资本主义，并仅仅反映外围地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路线——从老形式过渡到国际专业化的未来形式。

民族资产阶级继续进行外资所开始的工作，即发展种植园经济和轻工业，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在某段时间内，它甚至能够通过逐渐接管外国企业而壮大。为了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克服粮食作物种植方面的严重挫折并建立那些巨大的经济地区，那是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

与此同时，外国资本主义正在产生一种特殊的结构，主要基于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其中，富农成为主要的形式。这种结构是被中心国家的工业和金融资本所统治的，而起主要传送带作用的往往是官僚机构或当地的国家资产阶级。

这两种模式的头一个无疑是最可怜的。这相当于第三世界国家中进口替代工业仍然直接受外资控制、因而本国企业资产阶级无法形成的情况。这在整个非洲是典型的。非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政策之基本失败，即在于此。例如，在象牙海岸，经过十五年非凡的经济增长以后，却没有民族资产阶级，除了在国家 and 外资之间成立起几个人为的企业，有时靠官僚勾结收取一些佣金而已。

在这些形态下，基本的民族问题并未解决。任命职务的非洲化符合于小资产阶级的愿望，他们不想改变殖民地制度而只想接过前任的位置。在这里，行政官僚机构成为他们的模式。

第二个模式是在官僚机构设法在生产过程中起作用的时候出现的。它成了一个国家资产阶级：那就是说，它通过控制经济而接管了国内产生的部分剩余。只要经济是依附性的，只要中心国家的控制使中心国家能为自身而占有剩余的主要部分，那么这个官僚机构始终是依附性的。

无产阶级化和贫穷化：阶级斗争的世界性质

目前，有关第三世界国家中就业、失业和社会收入分配的著作最近揭示了若干事实，已经使传统的不发达问题的理论家们感到担心。

首先，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这不但很突出，而且在不断增加。在各个第三世界国家之间进行一下比较，表明：人均收入越高，收入分配不平等越突出。因此，整个拉丁美洲，最富有的20%的人口得到国民收入的65%（在美国为45%），5%的人口得到国民收

人的 33%，1%的人口得到国民收入的 17%；而在社会的另一端，占人口一半的穷人只得到国民收入的 13%。

在黑非洲，被认为比较发达的沿海国家的人均收入约为 200 美元，它们人口的 93%——由城市（20%）和农村（73%）的群众组成——只得到国民收入的 55%。虽然城市人民群众的平均货币收入约为农村群众的一倍（就生活水平而言，并考虑到城乡生活方式和生活费用的差别），这些平均数事实上说明贫困的可比程度。所以，特权阶层是很小的（占人口的 7%）。在内地欠发达的热带草原国家里，特权阶层为数更小，在那些国家平均收入约为 100 美元，而特权阶层只占不到人口的 2%（虽然它占总收入的比重也较小——不足 10%）。换言之，当我们从目前尚开发不足的一些国家的现阶段转到已经比较充分开发的那些国家，我们发现大部分人口的境况根本没有改变，他们的人均年收入仍旧是 70 至 80 美元；另一方面，为数极少的一部分人却在增大其收入而逐渐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收入（人均 1,500 美元）。

这种社会收入分配方面日益增大的不平等是令人关注的，原因至少有二。第一点，这种制度的发展根本不能说明这种特权阶层会逐渐扩大而包罗全体人口。即使当整个收入的增长率很高的时候（例如，年平均在 7% 至 10% 之间），特权阶层的数量增长仍然是很小的（最多每年增长 3—4%）。换言之，特权阶层达到的上限是约占人口的 20—25%，不论时间多长（即使是一个世纪）。第二点是：这种发展是和中心国家的发展特点大不相同的。在这方面的所有研究表明：在中心地区，收入分配的格局——特别在工资与利润之间——是相对僵硬的，不论我们推回到十九世纪很久，情况也是这样。以最初的估计，从 1850 年以来，剩余价值率只围绕其 100% 的平均数稍有起伏（虽然有一些波动延续达几十年之久，而且在不同时期，随这些波动而出现或多或少的严重的危机性起

伏)。这种情况的不同,意味着:认为第三世界要取得增长就必须以不平等为代价的论点是错误的。

实际上,日益增大社会不平等是外向发展条件下再生产的方式。它打开了一个比收入分配较为平衡的情况下大得多的奢侈消费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的市场。当特权阶层达到占人口的20—25%时,这意味着:耐用奢侈品大体也占到总需求的同样比例。发展到这种水平,并考虑到生产与消费这些奢侈品所需要的资本、技术人员、辅助的基础结构,等等,资源分配的进程就会扭曲到影响生产大众消费品部门取得决定性进展的程度。

由于失业和就业不足的情况不断扩展,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就增大了。今天,第三世界的城市增长率为每年4—10%(视国别和时期而异),有工资收入的就业增长率却比它低30—50%,即每年为2—7%。在这种比率下,第三世界所有城镇的人口将从1970年的3亿上升到2000年的20亿,而失业人口中则会增加2亿成年人。

到处都可看到,工资收入者占全部城市人口的比率在下降;如果我们只考虑现代生产部门特别是工业中的工资收入者,那么这个总趋势就更加显著了。另一方面,当外围地区出现资本主义发展时,其他种类的就业也出现并高速增长。其中有些是与收入分配日益不平等相对应的(家庭仆役、服务行业的雇员,等等)。还有一些只是试图掩盖变相失业(小贩等)。在这些情况下,失业与就业之间的边界范围就扩大到使得官方的失业统计失去一切意义的程度——这是诸如国际劳工组织等官方组织现在已经发现的。为了把变化归因于和制度无关的自然现象而不研究社会经济制度的职能的意识形态人士又在求助于马尔萨斯的理论,这是很有意思的。这种脱离常规的最突出例子是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把第三世界养活一个孩子的“成本”(600美元左右)同少生一个孩子的

措施的成本（6美元）作比较。这种比较显然没有任何科学价值，因为这种“成本”必须同这个孩子长大成人后一生中提供劳动价值的“效益”作比较。在现实中，马尔萨斯宣传的最终动机比比皆是，而麦克纳马拉的公式提出来只会使人引入迷津。

占统治地位的“新马尔萨斯”潮流事实上可以总结为以下两个论点。第一，我们的星球正在经历一场空前的人口猛增。根据今天的人口增长率，预测在三、五十年多以后人口会达到令人头晕眼花的天文数字，与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相比会出现人口绝对过剩的危险。据说，这些自然资源将会在报酬递减的条件下开发，因此，为了取得一定的增长率就需要超乎比例的高额投资。第二，人口高增长率增加了人口中非工龄部分（青年人）的比例，他们必须由负责生产的那部分人们所照顾。这种扭曲降低了社会进行储蓄的能力而最终放慢其潜在的经济增长。它使不发达国家更坚实地陷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

事实乍看起来似乎肯定这两个论点。第三世界许多地区农业的停滞，或者至少人均农业产量的停滞，限制了为加速工业化提供资金的可能性。它使我们看到这样的怪事：第三世界国家是农业国，可是它们越来越难于养活自己，为了养活城市人口而越来越多地进口粮食，减少了它们进口设备的能力。现在，这种停滞往往是由于缺乏可耕地，或者是由于增加这类土地（灌溉等）面积所花的高昂成本。由于某些地区人口过剩所造成的农村人口外流引起城市增长速度大增。甚至迅速的工业化也无法应付这样的增长；所以产生了失业并且比重惊人。在人口高度增长的情况下，安装社会基础结构的成本（投资成本及经营费用，特别有关教育）就非常之高，这减弱了一个社会赶上其人口增长的能力。

这种说理导致一个明显的结论：在已知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下，人口增长的降低不但有可能增加人均收入，而且会保证更高的全

面经济增长率，因为有可能出现比较有利于积累的资源分配。因此就有节制生育的世界运动。

在各种情况下，这种很广泛的理由并不适用于整个第三世界，它在人口与自然资源的比率方面是极为不一样的。例如，非洲大陆的许多地区过去的人口密度大于今天。十六世纪，当葡萄牙人访问繁荣的刚果王国时，该国有二百万居民。在殖民征服时，经过三个世纪的奴隶贸易以后，该地区人口甚至不足原来的三分之一。甚至在现在，刚果也难以恢复到十六世纪的人口数字。奴隶贸易所导致的人口下降往往引起农业技术和生产率的退步。但是，非洲所遭受的蹂躏并不随奴隶贸易的结束而终止：殖民统治继续这种活动。强迫劳动（中非的搬运业，以及公路与铁路建筑等等）、强制性服兵役、把居民驱入拥挤的“保留地”以取得廉价的移民工人，这一切都造成农村地区人口下降，夺走它们劳动力的一大部分。这些现象引起人口的食品与健康条件恶化，有时引起饥荒；这些现象造成严重传染病的流行（如非洲昏睡病）。美洲印第安人地区的情况也是这样。

今天，在赤道非洲的各处，有着大量潜在的可耕地尚待开垦。但是农村地区低下的人口密度是对农业生产率上升的严重障碍。这些土地开发所需要的资本开支非常巨大，通过增加人口密度所能减少的这种人均成本将超过为增加人口密度而高额人口增长所需要的额外成本（特别在教育方面）。作为例子，我们可以考虑两个农业地区甲和乙，面积各为 100 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不同：甲地每平方公里为 10 人（共有 1,000 人），乙地每平方公里为 30 人（共有 3,000 人）。在一年中该地区建立运输网的成本是和人口密度无关的：200 公里公路花 10 亿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所以，乙地对甲地的相对利益可以估计为 6.66 亿，这是对乙地居民的边际福利，而乙地人口三倍于甲地。如果在 35 年间人口从 1,000 上升到

3,000 (假定人口高增长率为每年 3%), 经过贴现的教育成本将为多少呢? 有 1,000 名固定人口的居民区需要 8 个班, 每年成本(投资与经营成本) 大约为 2,000 万。乙地将要求 24 个班(每年成本为 6,000 万)。因此, 在 35 年间从形势甲过渡为形势乙包含贴现的额外(边际)成本(按贴现率计算)。如果贴现率为 5%, 教育成本只相当于人口密度增至三倍所得好处的一半; 如贴现率为 10%, 则相当于三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 人口增长的成本要比人口密度提高后所得的好处少得多。

但是成本—效益的论点不是主要的。埃斯特·博塞拉普已经表明: 在历史过程中, 人口压力对于农业的加强是有利的决定性因素, 是提高生产率的先决条件。热带非洲的一些现代化计划之所以失败, 其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们忽视了这一事实: 在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不大的情况下, 低生产率的粗放耕作可以成功地抵制提出的变革。与粗放农业有关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一个严重的阻力。可以看到, 人口密度高的地区(诸如伊博或巴米累克地区)比广大的人口稀少地区具有较高程度的发展。而且, 出口作物的发展也需要较高的人口密度。为什么这些具有潜在增长力的地区未能实现期望而收效, 其原因在于外围资本主义采取的总政策, 它们使自身局限于出口作物供应地或为种植园地区或城镇地区的现代化经济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地位。可是, 在日本, 大米生产方面出现了重要的进步, 因而有可能供应大量的城镇人口, 这是由于整个(自主中心的)经济政策促进了这一进步: 加强农学研究的结果, 有可能改进国内市场粮食作物的栽培, 改进这部分农业对于全面战略是很必要的一部分。

同样情况也适用于拉丁美洲、西亚的一些地区、印度次大陆的南部和东南亚(泰国、除爪哇以外的印度尼西亚, 等)。只有第三世界的少数地区(加勒比、埃及尼罗河流域、亚洲的三角洲地区、爪

哇)并非我所谓的人口不足地区。

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论点虽然不符合农业方面的事实，它在解释城市失业方面是否有点道理呢？那个论点认为：如果城市增长可以放慢，那么就业(相对数)和人均城市收入将会提高；这种看法忽视了两个事实。第一，居于体系中心的工业化吸收了增长率极高的城市人口(十九世纪时为3%，接近于今天的7%)，因为这种工业化是自主中心的。第二，外向发展造成资源分配的畸形，加上技术依附，形成了就业不足日益严重的根源，而不问城市增长的人口特点如何。因此，当人口增长较低时，生产的总增长率也较低。

贫穷化的重要现象是完全与人口无关的，它表明经济动力与人口动力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所以可能产生一种印象，认为人口大增成为发展的障碍。事实上，人口过剩只是暴露某种社会经济制度(即外国资本主义)的机能的外在表现。

节制生育运动的失败往往归因于使用的工具不足、人民的愚鲁以及负责推行该项运动的部门的不负责任。其实应当提个问题：在有关的家庭规模的水平上，减少子女数量是否合理。在贫穷化的背景下——即就业不足与贫困不断增加——实际上大家庭是社会保险的唯一形式。一项发展战略一定要包括有关人口的措施，放慢其增长或加速其增长。但是，只有当个人家庭动力与国家目标之间存在一致的情况下，这些措施才会生效。这要预计战略会遵循自主中心的独立发展目标。独立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知道如何利用它们所掌握的手段去影响人口这个变数。如果今天中国已成功地控制了 this 变数，那是因为它已经解决了制定一个独立发展战略的其他更为基本的问题。

根据“成本—效益”的一切计算都无视人口现象上重大的心理社会方面。一切已知的文明史都表明：每个重大的变革与发展时期都具有人口大增的特点。人口停滞的文明从来都不是进步的。

人口的挑战、它对两代人之间引起的矛盾、乐于吸收新思想、积极寻求新的解决办法等等说明了这一点。

世界上主张第三世界中节制生育的运动事实上表明发达国家面对受现有国际秩序之苦的各国人民对这一秩序提出激烈挑战的危险，心存恐惧。极而言之，当前制度自发趋势的发展将要求外围地区减少人口。这个制度内的当代科技革命事实上排除了有效雇用外围地区贫困群众的可能性。有关“环境”的文章已经使西方人警觉到他们开发自然资源（不但是他们本国的资源，而且是全球的资源）的速度。如果第三世界的群众可以收回这些资源并为自身利益而开发的话，中心地区资本主义制度活动的条件就会受挫。

中心与外围都属于同一个体系。要了解这套有关的现象，人们就应当不去考虑国别，似乎那是独立的实体，而应当考虑一个世界体系（阶级斗争的世界背景），它具有优点和弱点，那是最大限度矛盾之点。

有关不平等交换问题的争论是当代的主要问题。由于这个体系的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关系是统治的关系、不平等的关系，导致从外围流向中心的价值转移，那么世界体系应当以常用的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的概念来分析吗？如果从外围流向中心的价值转移导致中心国家工人报酬比其他情况下的更大增加，那么中心国家中的无产阶级是否应站在其本国资产阶级一边以便维持世界的现状呢？如果这种价值转移使外围国家中的工人报酬和本国资本利润额都降低，那么外围国家内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是否应当在争取国家经济解放的斗争中进行全国团结呢？

这种论点仍然限于“古典”内容，那就是说，它是前列宁主义的。关于这一点，我们的意思是：它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似乎世界体系只是国别资本主义体系的并列而已。实际上，阶级斗争不是在国别范围内进行的，而是在世界体系内进行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矛盾是：它存在于以主要生产资料（这成了资本）私人所有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因而是限制性的）以及生产力（在发展之中会反映生产组织的必要社会本质）。垄断资本把这个矛盾推到最高程度：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加以社会化的时机成熟了。这种成熟反映在垄断资本家日益求助于国家干预，需要协调垄断资本的活动并给以支持。因此，国家经济政策取代了自由放任，这只有在自发市场机制使它可能增加积累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进步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但是求助于国家并不能使矛盾消失。因为国家是垄断资本的国家，制度的理性仍然是资本主义的。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主要矛盾在社会上表现为该制度内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只要我们限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说理范围，事情仍然是很简单的。但是资本主义已成为一个世界体系。矛盾并不存在于各个孤立考虑的国家中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而是存在于世界资产阶级与世界无产阶级之间。但是这个世界资产阶级与这个世界无产阶级并不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它们属于一个资本主义中心与外围形态的体系。所以，问题是世界资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分别是由什么构成的？

关于世界资产阶级，这主要包括中心地区的资产阶级以及其次包括在它之后在外围地区形成的资产阶级。但是世界无产阶级位于何处呢？它的结构是什么？对马克思来说，那是毫无疑问的：在他的时代里，无产阶级的主要核心是在中心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那个阶段，不可能了解以后成为殖民地问题的全部含义。由于当时中心国家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也由于资本主义继续发展并变得垄断性，阶级斗争的世界条件改变了。这是列宁明确地表达了，现在那句话已被毛主义接过去了：“归根到底，斗争的结果

将由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俄国、印度、中国等国来决定。”这意思是说从今以后无产阶级的核心是在外围地区而不是在中心地区。

这个体系日益增大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在世界范围内抗击这种现象，只有一个办法：提高剩余价值率。外围形态的本质使之有可能把那里的剩余价值率提高到比在中心地区的高得多。其结果，外围地区的无产阶级就比中心地区的无产阶级受到更加严重的剥削。

但是外围地区的无产阶级有不同的形式。它并不完全或主要由现代化大企业中的工资收入者组成。它也包括被结合进世界贸易体系的农民群众，他们象城市工人阶级一样地付出不平等交换的代价。虽然这些农民群众生活的环境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表面上看来非常前资本主义），但他们最终都通过他们被结合进世界市场体系而无产阶级化了，或者正走向这个痛苦的命运。外围结构——提高剩余价值率的条件——也引起城市失业群众的不断增加。在当代世界中，这些群众“除了身上的镣铐以外不会失去什么。”显然，他们也是外围地区不完全无产阶级化的一些形式。他们的造反（这是最重要的）引起中心地区剥削条件的恶化，因为这是资本主义所掌握的弥补其势力范围缩小的唯一手段。

我们必须设法超越一种无效的争论。有些人认为中心地区的无产阶级仍然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主要核心，这不是列宁主义的看法：它否认这个体系的世界性质。提出所谓无产阶级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之间对立的论点也是否认这个体系的世界性质，否认外围地区造反必然对中心地区情况发生影响，并认为同样“受剥削的”外围地区的资产阶级（这样提法是不准确的，它只是在扩张范围上受到限制）会反对中心地区的资产阶级。但是主要造反活动的暴力行为正好说明情况相反；因为外围地区的资产阶级一定要让本国的无产阶级来为它支付所受掠夺的代价。

而且，把中心地区的无产阶级描绘成集体得到特权而必然同本国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剥削第三世界，这是把事情过分简单化了。的确，中心地区的无产阶级在生产率相等的情况下平均说来比外围地区的工人得到较多的报酬。但是资本为了抵制中心地区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就从外围地区以较低的工资输入劳工（让他们干最无人问津的活）以便使宗主国的劳工市场跌价。这种输入正在日益增大比重：在西欧和北美，从1960年以来，由外围地区来的移民一直接年率0.7%至1.9%的速度增加（视国别和年份而定）；换言之，其增长水平大大高于本国劳动力的平均增长率。这种额外的移民劳动力也是外围地区向中心地区的变相价值转移，因为外围地区承担了这些劳动力的培训成本。

同样，还有国内殖民地后备军的动员活动：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黑人的无产阶级化，黑人现在是北美许多大工业城镇无产者的大多数。这种制度的极端形式可以在种族主义国家中看到：南非、罗得西亚、以色列。因此，这个世界体系日益同它所剥削的群众混为一体，使得国际主义的必要性提高到空前的程度。与此同时，它利用这个混和过程，在“白种”工人中发展利己的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倾向。资本通过在中心地区的发展不断造成统一和分化。有利于主导资本的集中化机制也在不同的中心地区发生作用：资本主义在各地的发展意味着地区不平等的发展。因此，每个发达国家在自身内部产生了不发达国家：意大利南半部即为一例。不作这一分析，对当代地方主义运动的兴起就难以理解。现在，列宁所说的工人贵族的概念即使已经在事实上已被更为复杂的分化情况所取代，可是贵族国家的概念则掩盖了这些复杂的分化情况。

何塞·纳恩在提出贫穷化的理论概念时否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能说明这套新的具体的事实。他说，因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对纯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而外围地区所

特有的贫穷化则属于对社会形态的分析，这方面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只有轮廓的勾划，尚待加以完善。

肯定地说，《资本论》并不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理论。很明显，马克思首先提出要澄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这个主要之点。他也在关于原始积累的一章中分析这种生产方式起源时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不可能提出有关未来世界体系的理论。

这个必要的理论怎样建立呢？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何塞·纳恩勾划的，试图不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而提出这一世界体系的理论。纳恩一再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水准同社会形态的理论水准作对比，这是很清楚的。但在这里，正如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尔多索所观察到的，如果企图从生产方式所制约的规律之上得出一般的历史规律的话，历史唯物主义就变成形而上学了。不可能有社会形态的一般理论，而只有特定形态的理论或者一批相互有关的社会形态的理论。没有社会形态的一般规律，而只有一套可以制订特定形态的规律的科学概念。这些概念是生产方式、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相互联系、统治、实例以及各个实例的联结的概念。

那么我们怎么来进而推断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律（设想为形成结构的一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不论中心和外围都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主宰）呢？不是去找一些处在上述概念所规定的水平之外的特殊社会规律——例如，象纳恩所提出的那样去找一个特殊的“人口规律”——而只是使用有关的概念来具体分析这个制度的活动。然后我们注意到贫穷化的现象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具体条件下的表现。

正如卡尔多索所说，积累和贫困化的一般规律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倾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资本与

劳工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排除了以和谐的条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并使我们认识到:要求不断提高剩余价值率以补偿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这使得和谐的发展不可能。这个规律是在一个具体的历史结构内活动的。在马克思的时代,英国提供了这种结构,因为世界体系尚未建立。今天,这种结构已经扩大到包括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因此,在中心地区所取得的“和谐”(在那里可以提高剩余价值率)必须由外围地区日益增加的“不和谐”(在那里,要为资本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付出代价)所抗衡。这种不和谐是在许多“贫穷化”的现象中表露出来的,这种现象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在今天的表现。

最后一个问题是——贫穷化是否构成一个概念。事实上,这只是描述一种规律(资本主义积累的规律)在一个具体结构(今日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内活动所产生的一批现象,正如“产业后备军”的名称相当于对同一规律在不同背景内(马克思时代的英国)的影响所作的现实描述。所以,没有必要提出按功能主义看法的贫穷化的含义问题。今天的贫穷化和昨天的产业后备军都是这个制度的结果。它们的相同功能都是使剩余价值率提高。社会的不和谐对于这个制度的运转是必要的。

新的中心与外围形态

有关讲英语的北美洲以及“白人”自治领发展的起源问题最流行的理论就是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根据他的理论,这些国家所表现的动力是由于它们人民的新教思想,那是有别于拉丁天主教义的思想。

欧洲殖民者的殖民化总的逐渐形成了外围形态的一部分。在拉丁美洲,从一开始,它的作用就是建立外围结构,后来,其他地区的民族社会也趋向这种结构而形成了第三世界。马格里布和肯尼

亚的“贫苦白人”拓殖区也起了外国农业与商业资本主义的同样作用。只是在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具有某种特殊特点的南非、罗得西亚和以色列——欧洲拓殖者的殖民化结果却产生了新的中心形态。

总的说来，北美的英国殖民地并不是这种规律的例外。西印度群岛以及北美洲南部的奴隶殖民地和西班牙及葡萄牙殖民地并无不同。它们在同样的重商主义体系结构内完成同样的外围职能。例外的不是整个北美的英国殖民地，而只是新英格兰。这并未形成为重商主义体系中的外围：从一开始，它就是特殊的，不是被宗主国形成一个依附体的。新英格兰是英国无产阶级化过程的一个副产品。成为新英格兰人民的那些贫苦移民们对宗主国的重商主义不感兴趣，这使他们可以放手把自己组织起来求生存。他们组织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小商品经济是贫弱的，但是自主中心的。这类社会主要以简单商品生产方式为基础——整个历史上难得能实现的——具有产生资本主义的能力。就这样，新英格兰逐渐在美洲体系中取得了宗主国的职能。它取代英国而成为统治英国奴隶殖民地的新中心。这种替代只是局部的，到独立战争以前，然后就成为全部的了。美国摆脱了宗主国商人资本的垄断性控制以后，就成为羽毛丰满的一个中心，后来达到世界宗主国的地位。

当前的美国文学中有一个广泛的倾向，设法为南部“平反”，其手法就是把美国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归功于南部。其中，道格拉斯·诺斯说明南部出口棉花在十九世纪资助美国“起飞”方面起了战略性作用。这个制度的思想家们由此得出结论说：有可能依靠出口原料为基础的外向经济而取得发展。这种观点无视于这个决定性事实：十八世纪末以后为美国带来生机的是北部，而南部仍然是国内殖民地，这是南北战争所表明的。

加拿大的历史并无不同。同样，从法国和英国的观点看来，涉

及的不是一个外围，而是欧洲社会变革的一个明显副产品。根据1783年的巴黎条约，法国宁愿收回马提尼克而不是加拿大，法国在此二十年以前就已失去了加拿大，伏尔泰宣称这一选择是明智的：对法国重商主义来说，三万名黑奴要比没有任何东西出口的穷鬼们居住的“几千英亩雪地”有价值得多。

以小商品生产为基础的一个白人的大洋洲原先组成时大体也是这个方式。但在很长时期中，这个地方仍然主要是农业地区，向欧洲出口而不是向外围地区出口，如同北美的情况那样。由于这个原因，它在过渡到工业阶段去的时候就经历了更大的困难。但是再次可以看到，简单商品的生产方式不受到前资本主义方式所阻碍时，有能力走向工业阶段。在这里，值得把澳大利亚同阿根廷对比一下。在十九世纪末，这两个国家处于类似的形势：都是由独立生产者的商业经济所供应的农产品（肉类、羊毛）出口国。但是，在澳大利亚，黄金的发现导致工人阶级核心的产生。而阿根廷却坚持保护主义政策来维持其就业水平。这种保护主义改变了经济和社会的重心，从外向部门转向了自主中心部门，从而有可能进行整个的后来发展。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买办和拉普拉塔的牲畜繁殖者迫使阿根廷实行自由贸易；于是那个国家（在1900年时享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当时就开始向不发达的陡坡滑下去了。

白人的南非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一样的。家长制的布尔人经济起先是一个同十七至十九世纪的海运系统有关的简单商品经济；布尔人在类似欧洲宗主国新兴的资本主义农业的特点条件下为船只供应干肉。在那个阶段，白人社会同它并未剥削的周围黑人世界还是隔绝的：它把这个黑人世界赶回去，类似于早先对北美洲印第安人的同样方式。到十九世纪末，英国人征服了这个国家，不是由于布尔人的经济对他们有任何吸引力，而是为了去开发新近发现的金矿和钻石矿。为此，他们需要一支无产阶级，这就来自

于黑人。保留地制度是英国殖民政府制造出来的：英国人是种族隔离的创始者。布尔人在当时没有什么重要性；他们生活在一个自主中心的经济社会内，这就不可能为统治外向矿业部门的新的英国资本的利益而把他们无产阶级化。

可是，布尔人的小商品经济逐渐产生了一个本地资本主义，它虽然部分地嫁接在外向的殖民地经济之上，却是自主中心的。后来，它依靠自身的国家政权并为自身的利益而开发由保留地组成的国内殖民地，从而从英国资本手里取回了经济和政治控制权。

拉尔夫·霍维茨和塞奇·西昂等人对这个特定形态的分析中，南非种族主义显得不再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今天的经济制度可以设法消除的一种附属现象。保留地在服务于现代化部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供应廉价劳动力。此后的经济必须主要保持其外向性。理由是：国内市场受到非洲人的低工资所限制，而出口部门则能利用这些低工资，加上利用现代技术，就能产生特别高的利润。英国资本建立的矿业经济是从保留地和种族隔离制度中第一个得益的。家长制的布尔人农业经济（看来受到现代化和集中化的威胁）虽然技术落后，但由于有廉价劳动力而设法生存了下来。还由于国内市场有限而国家不得不带头建立自主中心的工业。这种完全一贯的制度不会由于经济结构（据说它对改善工资待遇感兴趣）与政治思想结构之间的所谓矛盾而自行垮台。对这个制度的自然解决办法是扩张主义，那就是说，扩大统治的领域以补偿国内市场的狭小。同罗得西亚的联系，南非对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图谋，对马拉维的经济吞并，赞比亚、马达加斯加和坦桑尼亚面临的威胁，表明南非十五年的增长使它到达这个情况。乐观主义者认为经济财富必然会导致社会畸形的减少，但南非提供了一个硬邦邦的批驳。

在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地也是中欧与东欧无产阶级化的副产品。它们也是组织在一个小商品生产经济之中，产生了

当地资本主义。在这里，国家也在这一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正是犹太工人总工会的犹太复国主义官僚机构为自身的利益而组织并利用这个资本主义。马考弗已经表明这里并没有“社会主义”性质，犹太工人总工会并不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工会。犹太工人总工会得到帝国主义（先是英帝国主义，然后是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并有国际犹太复国主义作为它的工具，它从所谓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中大大超乎比例的大量资金流入中得到好处，并对这种资金流入严密掌握。至于以色列工人阶级，他们是由移民组成的，他们按种族分层而排列上下（从中欧与东欧来的犹太人列为最高，从阿拉伯国家来的犹太人居于下层）并仍然保有在社会阶梯上爬出工人阶级的小资产阶级愿望。这个自主中心的社会里没有组成巴勒斯坦人民的阿拉伯人的容身之地。他们被灭绝或驱走。今天，以色列已经到达十字路口。一条道路是巩固这种自主中心经济，使之具有一个独立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地位（即使它是小规模，必须同其他帝国主义结盟，当一个小伙伴而不是当附庸），使阿拉伯世界为它的产品开门——换言之，它为自己从阿拉伯世界中挖下一份外围地区。另一条道路是建立一个国内殖民地，那就要扩大其版图以获得阿拉伯无产阶级。在两种情况下，扩张主义（或者是和平的手段或者是好战的手段）都是这个制度的规律。

我们必须小心，不要把这些以小商品形态为基础的新资本主义中心的产生模式同日本的模式混同起来。日本的模式和欧洲的模式并无不同。处在东亚纳贡制外围地区的前资本主义日本的社会形态，和处在古代东方纳贡制外围地区的欧洲的社会形态，是类似的。所以，从一开始，日本产生了自身的自主中心资本主义。它之所以后起，正可以使它从欧洲的发展中取得启发，对它并无任何害处；如果这个国家受到殖民地化，情况也会这样，因为它缺乏资源，欧洲人和美国对它没有兴趣，他们瞩目的是中国。

另外几个前资本主义社会也时间或长或短地逃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埃塞俄比亚、也门、阿富汗、泰国)。可是,这些社会处在前资本主义但并非不发达(外围资本主义),没有产生独立的自主中心的资本主义,因为它们原来的形态(中央纳贡型)不容许。这说明为什么它们或迟或早会让步,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走上不发达的道路。

第三节 争取一项过渡的战略

苏联生产方式

社会主义的当前立场是什么?如果我们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是商品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产品和劳动力不是商品的原则出发,那么苏联的生产方式就不能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当然,它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不但是产品的商品形式和资本的商品性质的普遍化,而且是剩余价值按投资资本分配,那就是说,剩余价值转为利润、价值转为价格。这个特点在苏联生产方式中并不存在,因为资本是完全由国家所拥有的而不是私人拥有的(那必然是分散的)。

这种不同被作为苏联制度是社会主义的理由。可是,这个含义正在把生产关系的概念归之为所有制关系的概念,那就是说,把社会归之为经济基础结构并抹杀了经济问题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问题与意识形态问题之间的关系。试图以这种方式来看事情的结果,就使得对纳贡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从苏联著作中消失。在那个生产方式里,生产关系不能归之为所有制关系,因为并没有土地占有,我们只能谈到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一种集体的控制,那就是说,由国家来行使的一种阶级控制。那么,苏联生产方式能够视为一种纳贡制方式吗?当然不能:纳贡制生产方式并不知道产

品和劳动力的商品形式；剩余按实物根据法律征收，与市场无关。

可是，把苏联的生产方式描述为国家资本主义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个名称指的是一组情况：一种发达的资本主义，资本的集中导致垄断以及国家与垄断资本之间互相渗透的特殊形式；这种形式，不同于初生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其中对于建立资本主义性质的新企业起到决定性作用；一些不发达国家所特有的情况，国家把不合适的私人企业接管过来；最后，在过渡时期所特有的情况，例如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俄国。

所以，我认为苏联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它的特点是：（一）主要的生产资料——这里指的是社会劳动所生产的设备——由国家所有；（二）劳动力是一种商品；（三）供消费的产品也是商品；（四）资本货不是商品，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虽然它们很快就变成商品了。

长时期来（在俄国事实上尚未结束），投资的分配是由计划控制的，不管市场和预计的利润平均化。这使得积累率的提高通过优先分配资源给用以生产其他资本货的资本货生产，而不是为满足当前的消费品最终需求。这个程序抹杀了在社会生产两大部分之间保持某种比率（这是市场所要求的）的需要；或者更确切些说，有可能推迟必须在这两大部分之间进行调整的时刻。这一程序的目的显然是过渡性的。

因此，一旦积累的主要目标达到以后，那个制度就开始趋于采用接近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那种资源分配规律。这种类型的生产方式的完全模式是由巴隆早在1908年制订的：他认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部是要取代市场的地位，它事先作出计划以导致类似于一个纯粹与完全竞争的经济中事后所取得的结果。苏联经济著作中的讨论完全是这个结构以内。提出了两个问题：（一）在过渡时期对第一部类的资源分配是不是加速积累的有效手段，

这种特意的歪曲可以实行到多大程度？（二）取得符合于市场法则的资源分配（即相等于资本收益）的最有效方法是什么：分散管理，还是（相反地）完全集中、加上严格依据中央计划部门所作的有关仿市场的计算？

可是，两个问题的这一个或另一个都不属于社会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并不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预见到这种解释的危险性，他们认为这是由于在工人运动中坚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缘故。巴隆为了证明他的理论，必须把生产问题同分配问题分开，并把基础结构问题（经济问题）同上层建筑问题（意识形态）分开。按照这一思路，俄国已经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国家的持续与加强显示了这种生产方式的阶级性以及这种生产方式所要求的各种问题联结的特殊性质。

苏联生产方式意味着意识形态问题占统治地位。在这方面，它标志着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决裂以及回复到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那种联结特点。一旦人们放弃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据这种意识形态，资本的客观收益是和社会阶级的收入分配有关的），剩余被国家阶级所控制和占有的事实就很明显了。如果一个国家阶级对剩余行使控制权的做法得到社会的认可，这个制度才能运转。然后，意识形态就成为再生产社会运转的条件的手段，例如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样。它的两个必要的基础是杰出人物统治论和民族主义。杰出人物统治论保证由少数人的阶级控制剩余得到承认。它指令以小范围尊重“知识”、“科学”和“技术”为基础的社会再生产程序。与此同时，它保护社会流动性的神话。组成国家阶级的杰出人物的作用是要保证国家的内聚力和力量。他们是否被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所认可，要看他们是否完成这一目标。所以，外部的成功对这个制度是生死攸关的。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民主出于该制度的两大内部需要：一

方面，私人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经济问题所占的统治地位和意识形态的经济主义性质。所以，俄国之没有民主和自由辩论并不是“偏差”或“缺点”的反映，更不是“过去的陈述”。相反，它是这样一个制度运转的必要条件，如果这个制度的杰出人物统治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受到质疑，就不能存在下去了。

积累的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经济进展“内在化”，在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经济进展并不是再生产的内在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个特殊性的根源就是竞争，竞争完全关注的是扩大再生产，这和以简单再生产为基础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不同的。恢复经济进步的“外在化”而使竞争消失，是社会恢复对其未来的控制的前提；这也是消灭异化的先决条件。在这方面，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恢复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不受经济问题统治的。但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苦于生产力不能发展，这使它们囿于简单再生产；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则可以指望扩大再生产，可是这有别于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因为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是受控制的。

苏联的生产方式——至少就资本货不是商品而言——并不包括竞争。为了“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加速最大限度积累这个目标是经济进步的主要动机，它直接反映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政治问题的统治地位通过把经济问题从市场限制中局部地解放出来从而使加速积累成为实际的可能。在这个阶段，苏联生产方式的主要规律是加速积累。这个生产方式的主要具体矛盾不在经济问题之中，而在经济问题和政治一意识形态问题之间。它使宣布的社会主义目标同加速积累的方法与目标发生冲突。

由于社会主义成分的减少以及越来越强调提出“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这个矛盾已经逐渐被超越了。这说明这个生产方式

为什么倾向于重建资本货的商品性。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竞争。当后者通过现实市场（例如在南斯拉夫）的媒介而实际上重新建立时，该社会的团结就发生破裂，许多竞争的工人集团在经济主义的商品思想中发生异化；社会主义目标看不见了，在经济机制中再次内在化的经济进展使社会失去对自身的控制。但是当竞争并未重新建立，（根据巴隆的理论）计划替代了市场时，那么经济进展仍然独立于经济机制而直接决定于政治问题。但是这种非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也是经济主义商品异化的一种意识形态，这是阶级社会再生成的前提。这种生产方式是由各个活动部门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所左右的：对加强主导的意识形态问题有重要性的那些部门的进展将得到有计划地偏袒它们的资源分配，而牺牲了其他部门的进展。这说明军事部门（这是民族主义的成功所必要的）以及为特权消费服务的部门（这是杰出人物统治所必要的）的重大成就，与此同时，其他部门，特别是和劳动力（它本身被作为一种商品）再生产所需的商品的生产有关的部门，则处在效率持续低下的情况。

由于俄国的落后状况，苏联的现象有时被解释为一种“堕落”。事实上，中心国家的自发趋势是向同一方向发展，可以说，一开始就是苏联方向的根子的经济主义思想来自发达的中心地区。

在本世纪初，俄国不是一个外围国家，而是一个落后的中心资本主义国家。它的结构不同于不发达的结构，即，不同于依附性资本主义的结构。因此，进行1917年革命的布尔什维克虽然想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却在资本主义积累模式不加基本改变的情况下使积累进程有可能加速。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而赞成国有制，就是这种加速的条件。历史已经表明，在俄国情况下，有可能完成积累任务，正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可能一样，但是所有制形式是不同的。这种可能性反映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革

命被视为所有制形式的变革，使后者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即：相应于已达到的工业化目标的潜在生产力）。这个理论产生了一个过渡的经济主义思想，其措辞是：重工业优先于轻工业，工业优先于农业；模仿西方的技术与消费格局等等，以便“赶上”发达国家。

由于英国是工业资本主义开始的地方。现在的所有其他发达国家都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和某个时期相对“落后”于它。但是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是曾经的外围国家。经过某段时滞以后，欧洲大陆和北美以类似的英国模式赶上（然后美国和德国又超过）英国。日本最后建成了完全资本主义的第一流模式；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过渡时期的种种形式已经显示了某些有意思的特殊性，特别在国家所起的中心作用方面。俄国用这种积累模式进行了最新的试验，只有在国家所有制并非仅仅是过渡形式这一点上是创新的。

在所有这些模式中，过渡时期的特点是使广大群众屈从，把他们沦为劳动大军的被动地位，使之逐渐转入现代化部门，这一部门建立并逐步扩大直至全社会被它吸收。集体农庄和行政压制完成了这一任务，在英国模式里，这一任务是由圈地法和贫民法来进行的。

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最大限度的增长反映在斯大林时代的这个口号中：“在所有的生产领域中赶上和超过美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以这种方式制定的这个目标，故意无视这个可以衡量的经济增长的内容。但是国情统计中衡量的这些总量只包括商品价值的大数，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感兴趣的价值。集中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思想忘记这个巨大数值最终可以通过破坏生产力——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来取得增长。事实上，生产力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手段，全部的目的是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以经济术语来说，“企业的成本与效益分析使外部经济效果内在化”——那些

外部经济效果正是从破坏人力和自然资源而产生的。这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什么具有固有的增长能力（在经济主义的意义上），不但大于以前的一切生产方式的能力，而且无疑大于社会主义的这种能力（如果社会主义把人放在追求利润之上的话）。

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类仍然在自然界受到异化，但是社会关系是明显的；因此意识形态问题居统治地位。贫困使人们局处于简单再生产的模式之中，但意识形态通过其“永恒主义的”世界观对这种模式提供一种正当的理由。因此人们建造金字塔和大教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经济方面的技术进步内在化，这就有可能加速积累，从而使人类从自然界的异化中解放出来。但与此同时，异化转移到社会方面。因为这种积累的代价是社会屈从于利润法则。这种屈从表现为人类不顾自然生态环境，降为劳动力。资本主义不再建造大教堂而不解放人。它一开始提出的短期前景是它无法控制的社会问题的根子。

经济主义把资本主义积累的前提条件作为不受外界影响的事物，它否认世界体系，认为世界体系只是各个国别体系的排列，发展水平不平衡，但不是按等级基础安排并结为一体的。就它而言，外围国家被谴责为处于堕落地位，即使一个具有社会主义目标的政治当局在那里偶然执政。社会主义革命的奇迹只能来自中心国家。这些观点中把生产力机械地推到显赫地位，这极其接近于最为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

事实上，从十九世纪末起，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用经济主义内容来解释马克思。一连串单线的机械主义概念从技术开始，发展到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觉悟，压倒了马克思在考虑基础结构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时所作的辩证分析。考茨基普及了这种机械主义思想，它不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落后地区而是在最发达的中心国家找到肥沃的土壤：在马克思主义伪装下的德国；在公开主张

折中主义观点的工党的英国，在更加受到自由派思想所异化的形式的美国。事实就是，中心国家里的工人阶级完全沉浸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中；他们象资产阶级一样接受商品拜物教的异化和经济主义。

考茨基关于工人阶级组织的思想同这种经济主义意识形态并非无关。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对外觉悟的党，精通并应用社会科学的一批精萃人物，这种想法是 1870 年以后欧洲工人阶级在表面上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产物。从那时以后所接受的工人的异化——直到 1870 年，无产阶级仍然坚持共产主义乌托邦——导致在所谓马克思主义政党中理论脱离实际，取消实践的哲学而支持经济主义的教条主义。可是，布尔什维克要使自己建立于那些组织形式的基础上，因为在压迫性的俄国（在那里，工人阶级是少数派，知识分子是反对派），集权是重大的实际需要——在德国，集权反映了精萃人士的经济主义思想。因此，对 1914 年考茨基的“背叛”感到吃惊的列宁和对此比较了解的罗莎·卢森堡之间出现“聒子的对话”。

所以，布尔什维克从 1917 年开始走上了通向今天俄国的道路。例如破坏性的内战、无产阶级的破裂、等等局势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刺激力，这是事实。同样确实的是，列宁对此感到关切；但是代表同一经济主义铜元的两面的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对此并不担心。前者等待西方的解放奇迹，后者认为在超过以前，必须模仿和“赶上”。中国的文化革命恢复了马克思的教义，对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提出了真正的含意，并摒弃了使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自发发展的路线。

中国的历史并不是唯一的事例来证明苏联模式更适合于发达国家而不是落后国家。在东欧，最有说服力的经济形势不是发生在落后的俄国（尽管搞了集权）也不是发生在同样落后的南斯拉夫

(尽管搞了分权)，而是发生在东德。中心国家的工人阶级被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异化所影响(例如他们信奉“经济主义”)，准备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而不使自己从这种异化中解放出来。因此它过去接受法西斯主义，因此它现在接受工会官僚政治，并接受杰出人物统治论的党作为接替资产阶级的候选人，它能运用集权来克服生产社会性和小规模私人所有制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制度的自发倾向

苏俄的历史经验提醒我们：资本主义制度的自发倾向不是产生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制度在它发展的某一阶段并非出于自觉的行动克服它特有的一些矛盾，与此同时，它保留其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商品的异化。然后我们进入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它决不是“最高阶段”，而只是更高阶段，在其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表现为一些新的形式。

在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内，知道自身属于一个社会集团(例如无产阶级)，并不会自然地成为阶级觉悟。后者可能是一种“改良主义的觉悟”。可是在外围国家，这类社会认识并不可能，因为该制度的客观作用并不团结群众。结果，对形势的认识必定导致反对该制度。那么，唯一的问题是：在某一国家和某一时期，无产阶级化的或者正在走向无产阶级化的人民群众是否把他们的命运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还是认为那是反常的或者是超自然的社会力量作用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政治行动必然停留在缺乏战略的造反阶段。

在中心国家，异化为“经济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觉悟，加上经济权力不断集中的规律，加速了向某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办法已经找到：其形式是有限公司，然后是托拉斯、控股公司

以及多行业综合大企业。社会民主党人和科技治国论者之间的联合，有可能使西方自由派资本主义渊源的制度和苏联渊源的制度“会合”起来。奥韦尔所著的《一九八四年》一书和马尔库斯所著的《单向度的人》一书向我们提出：这个前景根本不是不可能的，相反却形成了自发演变的一个特点。

外围国家的倾向是适应这种更高形式的依附。这类自发发展能不能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内（它在其中表现为一个必要的阶段）创造超越其自身的条件呢？它根据的模式事实上是再生成其自身条件的模式，人们对此是怀疑的。依附性外围发展的深化所走的道路在将来会构成高级不发达的主要形式。技术控制的表现，通过优先发展必须在国际上具有竞争性的部门（不论是出口部门或奢侈品部门），这些部门的发展反映了接受西方的消费模式。

在外围经济社会形成的早期，技术差距尚不大，占统治地位的中心资本为了保证该制度的运行有利于它，就必须控制它所推动的现代化部门。在这个阶段，政治的控制手段也是必要的，由此而产生了殖民主义。在外围发展的更加高级阶段，与当地社会阶层与阶级（通过它们的消费模式及其有关的意识形态而结合）的存在相联系的、以更加扩大的差距为基础的技术控制，可以在不控制投资和不进行直接政治干预的情况下保证资本主义制度再生成的条件。这就是新殖民主义或新帝国主义的含意。投资负担可以通过私人或（主要是）公共的当地储蓄来解决。所以，一个公共部门的发展（它在本国可以非常重要，甚至占统治地位）并不排除这个制度整体的依附性，包括公共部门对发达世界的依附性。这种依附性是通过当地各社会力量的互相作用而得到保证的，即便这些力量组织成国家资本主义并声称是社会主义的。在非常高级的阶段，我们可以想象重工业的发展作为整个依附性发展的当地后盾，采取的形式则是公共部门。作为依附性的本国国家资本主义的一

个工具，小资产阶级成了帝国主义统治的传送带，从而取代了大庄园买办资产阶级，后者是前一时期的依附性私人资本主义的工具。

如果资本主义制度享有足够长的寿命，那么外围地区的国家中那些最为发达的国家是否有可能最终使自己“摆脱”依附性而完全取得中心国家的性质呢？我们是否一定要把自主中心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景排除于半工业化国家——特别是巴西、墨西哥和印度，这些国家的幅员广大是有作用的——之外呢？墨西哥和加拿大难道不能成为美国充分发达的一些省份吗（意思是说，目前在那里比较明显的穷困现象将会减少而直至最终消失）？自主中心的发展不是由本国资本来确保而是由美国资本来确保的，有关国家可以较小份额来参加。在那种情况下，矛盾就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文化与政治领域。

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已经规定了不发达的三个征象：生产率的部门不平衡、脱节以及统治。脱节状况在巴西表现得不同于赤道非洲。在半工业化的拉美国家（巴西、墨西哥、阿根廷），一个紧密的工业综合体已经存在。这个综合体往往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成为自主中心：事实上，它并不以包罗全体人民的巨大国内市场作为基础，例如在发达国家中那样，而是以一个由人口中紧密的富裕阶层所组成的局部市场作为基础。所以，工业在市场上排除了组成大部分农村人口的穷人（以及他们的延伸——城市贫民窟）。农业在较早阶段已被结合进世界体系，现在仍然是外向的，因此农业劳动者工资水平非常低下。脱节状况并不表现在工业方面，而发生在全国范围的工农业之间。例如巴西的例子，由于这种现象而使外贸具有特殊的结构。出口模式完全是传统不发达国家的特点（以初级产品为主，特别是农产品），而进口则类似发达国家（主要是能源、半成品、资本货和食品，而不是消费制成品）。而且，我们必须问我们自己，通过把现在尚属贫困的部门结合进来而使脱节状况

逐步消失的情况下，不发达是否会沿着一条完全不同于我们所知的当前路线发展。

目前所见的前景并不说明在资本主义背景下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差距会不断缩小。跨国公司实际上正在利用这一差距（利用这一差距的结果，即劳动力报酬水平的不平等）。在台湾、南朝鲜、香港和新加坡，我们已经可以感到大量跨国公司在那里落脚的结果。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大规模转移（那些工业的产品是要出口到美国和日本去的）加速产生一种新的、仍然是不平等的分工。在这种新的分工中，外围地区继承了那些发展范围有限的工业，而中心地区则保有那些具有最大发展潜力的工业。

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导致了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的不断增长，这是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才外流”开始了这一趋势，这指的是那些具有高水平才干的人们。象往常一样，只要资本有需要，劳动力是随叫随到的。即使这些移民日益重要，资本仍然能利用存在的各民族的文化差别，目前在发达世界中移民工人的不平等地位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最糟糕的情况是这种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可以导致一种“内部殖民主义”，例如我们在南非所见的那样。

而且，跨国公司新的集中活动以及第三世界某些国家公共部门（特别在基础工业中）的发展，已经引起外围地区内部一种新型的等级发展。外围地区的某些地区由于奢侈品或资本货工业在地理上集中于它们的领土而“得利”，这种工业不但为它们的本国市场生产，而且为它们的邻国生产，这些邻国主要成为廉价劳动力的后备。这种前景不但在第三世界一些大国中得以明显（巴西是最好的例子，但我们也必须以此察看印度可能具有的这种作用），而且也存在于一些较小地区，在阿拉伯世界或者在黑非洲。

过渡的基本问题

对外围国家来说，它们的抉择事实上是这样的：或者是依附性发展，或者是自主中心发展，这在形式上必定是创新的，有别于当前的发达国家。在这里，文明的不平衡发展规律再次出现：外围国家不能仅仅赶上资本主义模式；它必须超过它。

事实上，它必须大大修改资源分配的资本主义模式并反对追逐利润的规则。因为在相对价格结构内（由于结合进世界体系而规定的）追逐利润的基础上作出的抉择保护并再生成了日益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因此也是贫穷化）的模式，使该国限制于资源分配的外围模式。采取改正资源分配进程的行动，必须不受市场规则的影响，根据对需求的直接估计：有关食品、住房、教育和文化等等的需求。

外围国家使自己摆脱中心国家政治统治的每一个严肃的行动都导向种种冲突而令人考虑社会主义前景的必要性，这并非偶然。确实，根据情况，这个前景的实现可能被延迟甚至歪曲和再次被驱散。但事实是，古巴不知不觉地开始了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古巴农民接受了俄国农民反对的集体化，在古巴的社会主义机会大于美国或欧洲。而且，马克思在中国已经被重新发现，这也并非仅仅出于机遇。

在全世界范围设想的过渡，必须以外围的解放作为开端。外围从一开始就必须记住一种初始的当地积累模式。所以，在当前各国间不平等的情况下，一种不仅仅是不发达的发展的发展，根据世界性的计划（外围是其中的一部分）一定既是民族的、大众民主的，又是社会主义的。

在资本主义已经具有全球性并在全世界规模上组织生产关系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只能在世界范围出现。所以，这个过渡将包括

社会主义目标(必定是全球性的)和过渡结构(仍然是国别性的)之间的一系列具体矛盾。但是,只有在成熟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觉悟的目标在任何阶段都不为经济进步的目标而作出牺牲的情况下,这个战略才能称为一个过渡的战略。过渡远远不止要求扩大公共所有制或扩大重工业。如果与此同时对经济抉择不加大大修改(即便这种修改会一定程度地放慢最大限度的增长率),那么这种扩大就会包含在外围国家使依附性发展模式永远存在的危险。目标应当是把最现代化的设施同立即改善大部分人口所集中的贫穷阶层的境况结合起来,把现代化技术用于立即改善生产率和群众的境况。这种立即改善,而且只有立即进行改善,才能把生产力和人的积极性解放出来并真正发动全体人民。现代化技术和立即改善群众境况之间的结合要求在科学技术研究的方向上进行巨大的变革。照抄发达世界的技术看来不能回答今天不发达世界的问题。但是过渡的这种具体辩证法并不意味着拒绝现代化的前景。西方的“抗议”运动已经通过它对日常生活的批判表明:不应当不惜任何代价地追求最大限度的增长率,并且已经试图恢复劳动密集型技术,这个运动的方式结合了嬉皮士思想,回到高尚的原始生活的神话,以及对资本主义世界现实生活的批判。正是在这种错误的基础上,有人错误地感到有权以自己的方式来解释中国政策的某些方面而脱离了他们对未来的概念。

社会主义的目标不能用经济主义的条件来加以规定,但是它是结合经济问题的。完全的社会主义必定将建立在具有高度生产率的现代化经济的基础之上。不这样想,就是认为“错误的是技术”而不是由于对这种技术提供目前结构的那个社会制度。事实上,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现代化有矛盾并歪曲了现代化的潜力。已有大量文章写到工业劳动分裂和单调的破坏性影响。在将来可以看到,这种形式的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它将

完成其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任务,从而为它自身的消亡铺平道路。当代的技术革命将以自动化来取代分裂的不熟练劳动——这是机器工业出现以来的主要劳动形式。它将提供更多的闲暇时间,并产生需要极高技能的新型工作。

目前的制度对这个前景作何反应呢?它从中没有看到人类解放的曙光,而是大规模失业的危险,看到一个只能结合少数人的制度中一部分人(特别在第三世界)日益加深的贫穷化。以利润作为目标的追逐利润的打算,把人类仅仅视为“人力”的经济主义异化的打算,自然会有上述的倾向。摆脱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强加于社会的那种意识形态以后,人类将解放它的生产力。

在经济增长和建设世界性社会主义文明之间是不会存在矛盾的。

参 考 书 目

第一章 前资本主义形态

第一节 生产方式

Centre d'Etudes et de Recherches Marxistes. *Sur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Paris, 1969.

———. *Sur le féodalisme*. Paris, 1971.

Dhoquois, Guy. *Pour l'histoire*. Paris, 1971.

Hobsbawm, Eric. *Introduction to Karl Marx, 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 London, 1964; New York, 1965.

Marx, Karl.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1973; New York, 1974.

Meillassoux, Claude. "Essai d'interprétation du phénomène économique dans les sociétés traditionnelles d'auto-subsistance." *Cahiers d'études africaines*, no. 1 (1960).

Melotti, Umberto. *Marx ed il Terzo Mondo*. Milan, 1971.

Rey, Pierre-Philippe. "Le Mode de production lignager." Office de Recherche Scientifique dans les Territoires d'Outre-Mer. Paris, 1968 (mimeo).

Sofri, Gianni. *Il Modo de produzione asiatico*. Turin, 1969.

Terray, Emmanuel. *Marxism and "Primitive" Societies*. New York, 1972.

Tokei, Ferenc. *Sur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Budapest, 1966.

Wittfogel, Karl A. *Oriental Despotism*. New Haven and London, 1963.

第二节 社会形态

Coquery, Catherine. "Research on an African Mode of Production." In P. Gutkind and P. Waterman, eds., *African Social Studies*. London, 1976; New York, 1976.

Genovese, Eugene 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lavery*. New York, 1965.

Leon, Abraham. *The Jewish Question: A Marxist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1971.

Pelletier, Antoine, and Goblot, Jean-Jacques. *Matérialisme historique et histoire des civilisations*. Paris, 1969.

Rey, Pierre-Phillipe. "Sur l'articulation des modes de production." *Prob-*

èmes de planification, no. 13 (Paris: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mimeo).

Silva Michelena, Héctor. "The Economic Formation: Notes on the Problem and Its Definition." Dakar: Institut Africain de Développement Economique et de Planification, 1971 (mimeo).

Vernant, Jean-Pierre. *Les Origines de la pensée grecque*. Paris, 1962. (To be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Monthly Review Press.)

第三节 社会各阶级: 各个问题的联结

Althusser, Louis. *For Marx*. London, 1969; New York, 1970.

Althusser, Louis, and Balibar, Etienne. *Reading Capital*. London, 1970; New York, 1971.

Miliband, Ralph. *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New York, 1969; London, 1969.

Poulantzas, Nicos.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London, 1973. New York, 1975.

Socialist Register. London and New York, 1965,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Articles by Anthony Arblaster, Isaac Deutscher, Hal Draper, Donald Clark Hodges, Monty Johnstone, John Merrington, Istvan Meszaros, Ralph Miliband, Rossana Rossanda, J-P. Sartre.

第四节 国家和民族集团

Stalin, Joseph. "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Selected Works*, vol. 2. London, 1953; New York, 1971.

第五节 远距离贸易以及封建关系的解体

Bairoch, Paul.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et sous-développement*. Paris, 1965.

Balazs, Etienne. *La Bureaucratie céleste*. Paris, 1969.

Chesneaux, Jean, ed. *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1840-1950*. Stanford, California, 1972.

Dobb, Maurice.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London, 1946; rev. ed., New York, 1964.

Lanternari, V. *The Religions of the Oppressed*. London, 1963.

Sweezy, P. M., Dobb, M., Hilton, R., Hill, C., and Takahashi, H.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London, 1954.

Weber, Max.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1958.

第六节 贸易社会形态发展的障碍

- Batuta, Ibn. *Travels in Asia and Africa*. 1929; reprint ed., New York, 1973.
- Bekri, El. *Description de l'Afrique septentrionale*. Paris, 1965.
- Bovill, Edward W. *Caravans of the Old Sahara*. London, 1933.
- Braudel, Fernand.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London, 1972; New York, 1972.
- Cahen, Claude. *L'Islam des origines aux débuts de l'empire ottoman*. Paris, 1970.
- Centre d'Etudes et de Recherches Marxistes. *Sur le féodalisme*. Paris, 1971.
- Cook, M.A., ed. *Studie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London, 1970; New York, 1970. Articles by Ashraf, Baer, Cahen, Chevallier, Davis, Ehrenkrentz, Labib, Lopez, Miskimin, Rodinson, Udovitch.
- Coquery, Catherine. "Research on an African Mode of Production." In P. Gutkind and P. Waterman, eds., *African Social Studies*. London, 1976; New York, 1976.
- Gray, John Richard, and Birmingham, David, eds. *Pre-Columbian African Trade*. London, 1970.
- Hamdan, Jamal. *Shakhsiya Miçr, dirasat fi abqariya al makan*. Cairo, 1970.
- Lacoste, Yves. *Ibn Khaldun*. Paris, 1965.
- Laroui, Abdallah. *L'Histoire du Maghreb*. Paris, 1970.
- Meillassoux, Claude, ed.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Trade and Markets in West Africa*. London, 1971. Articles by Arhin, Auge, Boutillier, Cohen, Coquery, Curtin, Daaku, Meillassoux, Wilks.
- Miguel, Andre. *L'Islam et sa civilisation*. Paris, 1968.
- Rodinson, Maxime. *Mohammed*. London, 1971; New York, 1971.
- Valensi, Lucette. *Le Maghreb avant la prise d'Algier*. Paris, 1969.
- Wahida, Çobhi. *Fi Ucul Al Masala al miçriya*. Cairo, 1950.

第七节 纳贡制社会形态发展的障碍

- Balazs, Etienne. *La Bureaucratie céleste*. Paris, 1969.
- Chesneaux, Jean. *Le Viet-Nam*. Paris, 1968.
- Chesneaux, Jean, ed. *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1840-1950*. Stanford, Cal., 1972.
- Grousset, René, and Léonard, Emile, eds. *Encyclopédie de la Pléiade: Histoire Universelle*, vol. 3. Paris, 1958. Chapters on India (Pierre

Meile), China (Roger Levy), Southeast Asia (Le Thành Khôi), Indonesia and Malaya (Jean Cuisinier).

第二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

第一节 中心资本主义形态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 Abdel Fadil, Mahmoud. "L'Ecole de Cambridge fait une critique radicale de la théorie économique officielle." *Le Monde*. November 30, 1971.
- Bairoch, Paul.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et sous-développement*. Paris, 1965.
- Bettelheim, Charles. *Economic Calculation and Forms of Property*. London, 1976; New York, 1976.
- Braun, Oscar. *Comercio internacional e imperialismo*. Buenos Aires, 1972.
- Denis, Henri, and Lavigne, M. *Le Problème des prix en Union soviétique*. Paris, 1965.
- Engels, Friedrich. *Anti-Dühring*. Moscow, 1954.
- . Preface to Karl Marx, *Capital*, vol. 3. Moscow, 1959.
- Godelier, Maurice.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in Economics*. London, 1972; New York, 1972.
- Jakubowsky, F. *Les Superstructures idéologiques dans la conception matérialiste de l'histoire*. Paris, 1972.
- Jobic, Bernard.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et la critique de l'économisme." *Critiqu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nos. 7-8 (1972).
- Kantorovitch, Leonid V. *The Best Use of Economic Resources*. Oxford, 1965; Cambridge, Mass., 1965.
- Marx, Karl. *Un Chapitre inédit du "Capital"*. Paris, 1971.
- Miliband, Ralph. *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New York, 1969; London, 1969.
- Mishan, E.J. *The Costs of Economic Growth*. London, 1969.
- Rey, Pierre-Philippe. *Colonialisme, néo-colonialisme et transition au capitalisme: L'expérience de la Comilog au Congo*. Paris, 1971.
- . "Sur l'articulation des modes de production." *Problèmes de planification*, no. 13 (Paris: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mimeo).
- Robinson, Joan. "The Measure of Capital: The End of the Controversy." *Economic Journal*, September 1971. Reprinted in *Collected Economic Papers*, vol. 4. Oxford, 1973; New York, 1972.
- . "The Relevance of Economic Theory." *Monthly Review*, January 1971.
- Sraffa, Piero.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

Cambridge, 1960; New York, 1960.

Sweezy, Paul.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ew York, 1942.

Tanzer, Michae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Oil and th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London, 1970; Boston, 1970.

Ward, Barbara, and Dubos, René. *Only One Earth*. New York, 1972.

第二节 中心资本主义形态中的资本积累

Baran, Paul, and Sweezy, Paul.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1966.

Critiqu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no. 3 (1971). Articles by Jean Bailly and Patrick Florian.

———. nos. 4-5 (1971). Articles by J. Valier and Roman Rosdolsky.

Denis, Henri. "Marchés nouveaux et accumulation du capital." *L'Homme et la Société*, no. 22 (1971).

———. "Le Rôle des débouchés préalables dans 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de l'Europe occidentale et des Etats-Unis." *Cahiers de l'Institut de Science Economique Appliquée*, no. 5 (1961).

Dehilez, J.-P. *La Planification dans les pays d'économie capitaliste*. Paris, 1968.

Gruson, Claude. *Origines et espoirs de la planification française*. Paris, 1968.

Horowitz, David, ed. *Marx and Modern Economics*. London, 1968; New York, 1968.

Laulagnet, Anne-Marie. "Les schémas de la reproduction du capital chez Marx." *Problèmes de planification*, no. 9 (Paris: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mimeo).

Lenin, V.I. "A Characterization of Economic Romanticism." In *Collected Works*. 4th ed., vol. 2. Moscow, 1960.

———. "On the So-called Market Question." In *ibid.*, vol. 1.

Luxemburg, Rosa.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New York and London, 1968.

Nagels, Jacques. *Genèse, contenu et prolongements de la notion de reproduction du capital selon Marx*. Brussels, 1970.

Robinson, Joan. *An Essay on Marxian Economics*. London, 1947; 2nd ed., New York, 1966.

———. *The Rate of Interest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1952.

第三节 自主中心式积累的条件: 货币制度的作用

- Amin, Samir.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2 vols. New York, 1975.
- Critiqu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no. 1 (1970).
- Dallemagne, J.-L. *L'Inflation capitaliste*. Paris, 1972.
- de Brunhoff, Suzanne. *L'Offre de monnaie*. Paris, 1971.
- Denis, Henri. *La Monnaie*. Paris, 1950.
- Friedman, Milton. *Studies in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Chicago, 1956.
- Hicks, John R. *Value and Capital*. 2nd ed. Oxford, 1946; New York, 1946.
- Laulagnet, A.-M. "Les schémas de la reproduction du capital chez Marx." *Problèmes de planification*, no. 9 (Paris: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mimeo).
- Lenin, V.I. "A Characterization of Economic Romanticism." In *Collected Works*, 4th ed., vol. 2. Moscow, 1960.
- . "On the So-called Market Question." In *ibid.*, vol. 1.
- Luxemburg, Rosa.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New York and London, 1968.
- Mattick, Paul. *Marx and Keynes*. London, 1971; New York, 1973.
- Modigliani, Franco. "Liquidity Preference and the Theory of Interest and Money." *Econometrica*, vol. 12, no. 1 (January 1944).
- Nogaro, B. *A Short Treatise on Money and Monetary Systems*. London, 1949.
- Patinkin, Don. "Price Flexibility and Full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1948.
- Robertson, D.H. *Money*. Cambridge, 1948.
- Schumpeter, Joseph.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1934.
- Von Mises, Ludwig.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New York, 1934.
- Warburton, C. "The Misplaced Emphasis in Contemporary Business-Fluctuation Theory." In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Readings in Monetary Theory*, London, 1952.
- Wicksell, Knut. *Interest and Prices*. London, 1936; reprint ed., New York, 1965.

第四节 自主中心式积累的形式: 从周期到危机形势

- Aftalion, A. *Les Crises périodiques de surproduction*. Paris, 1913-1914.
- Angell, James W. *Investmen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New York, 1941.

- Baran, Paul, and Sweezy, Paul.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1966.
- Dobb, Maurice.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London, 1937; reprint ed., New York, 1972.
- Harrod, Roy F. *Towards a Dynamic Economics*. London, 1948; New York, 1948.
- Hicks, John R.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the Trade Cycle*. London, 1950; New York, 1950.
- Kaldor, N. "A Model of the Trade Cycle." *Economic Journal*, March 1940.
- Kalecki, Michal. *Studies in Economic Dynamics*. London, 1943.
- Mockers, J.-P. *Croissances économiques comparées: Allemagne, France, Royaume-Uni, 1950-1967*. Paris, 1967.
- Néré, Jacques. *La Crise de 1929*. Paris, 1969.
- Sartre, Léon. *Esquisse d'une théorie marxiste des crises périodiques*. Paris, 1937.
- Sweezy, Paul.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ew York, 1942.

第五节 国际关系与国家形态的相互联系

- Aftalion, A. *Monnaie, prix et change*. Paris, 1935.
- Balogh, Thomas. *Unequal Partners*. 2 vols. Oxford, 1963; New York, 1963.
- Bye, Maurice. *Les Relations entre les structures nationales et l'investissement international*. Lectures, 1950-51. Paris, Faculté de Droit.
- . *La Transmission internationale des fluctuations économiques*. Lectures, 1952-53. Paris, Faculté de Droit.
- "Capitalism in the 1970s." Tilburg Conference. September 1970 (mimeo). Note especially the contribution by Victor Perlo.
- Chang, T.C. *Cyclical Movements of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Cambridge, 1951.
- Clark, Colin, and Crawford, J. *The National Income of Australia*. London, 1936.
- Critiqu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no. 2 (1971). See "La Crise du système monétaire international."
- Graham, Frank D. "International Trade Under Depreciated Paper: The U.S.A. 1862-1879."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36, no. 2 (February 1922).
- Haberler, Gottfried. *Prosperity and Depression*. 3rd ed. Geneva, 1941.
- Hayter, Teresa. *Aid as Imperialism*. London, 1971; New York, 1971.

- Hirschman, Albert O. "Devaluation and Trade Balanc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November 1945.
- "Imperialism." Elsinore Conference, Danish Institute for Peace and Conflict Research, April 1971 (mimeo).
- Iversen, Carl.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vements*. London, 1936; reprint ed., New York, 1967.
- Kindleberger, Charles. *Balance of Payments Defici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for Liquidity*. Princeton, 1965.
- . *International Short-Term Capital Movements*. New York, 1943.
- L'Huillier, J. *Le Système monétaire international*. Paris, 1971.
- Lobel, Eli. "Liquidités internationales et éléments d'une politique monétaire de l'Afrique." *Le Mois en Afrique*, May 1969.
- Machlup, Fritz.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National Income Multiplier*. New York, 1943.
- Meade, J.E.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Vol.1: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London, 1951.
- Metzler, Lloyd A. "The Transfer Problem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1942.
- Mosak, J.L.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Bloomington, Ill., 1944.
- Nurske, R.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Finance*. Geneva, 1945.
- Ohlin, Bertil G. *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London, 1933; rev. ed., Cambridge, Mass., 1967.
- Robinson, Joan.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Employment*. 2nd ed. Oxford, 1947; New York, 1962.
- Taussig, F.W. *International Trade*. 1927; reprint ed., New York, 1966.
- Tinbergen, Jan. "Some Measurements of Elasticities of Substitu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 August 1946.
- Triffin, Robert. *Gold and the Dollar Crisis*. Rev. ed., New Haven, 1961.
- . *Ou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New York, 1968.
- Viner, Jacob.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 1953.
- .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ondon, 1937; reprint ed., New York, 1965.
- Wallich, Henry C. *Monetary Problems of an Export Economy*. Cambridge, 1950.
- Williams, John H. *Argentine International Trade Under Inconvertible*

Paper Money, 1880-1900. Cambridge, Mass., 1920.

Wolff, Richard. "L'expansion à l'étranger des banques américaines." *Critiqu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nos. 4-5 (1971).

Zakaria, Ismail. *Change, commerce extérieur et équilibre économique international.* Paris, 1953.

第三章 从专业化到依附

第一节 国际专业化的基础

Amin, Samir.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2 vols. New York, 1975.

Balogh, Thomas. *Unequal Partners.* 2 vols. Oxford, 1973; New York, 1963.

Baran, Paul, and Sweezy, Paul.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1966.

Bastable, C.F.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4th ed. New York, 1928.

Bukhatin, Nikolai. *Imperialism and World Economy.* New York, 1973.

Ellsworth, M. *International Economy.* New York, 1950.

Emmanuel, Arghiri. *Unequal Exchange* New York and London, 1972.

Graham, Frank D. "Some Aspects of Protection Further Considered."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ebruary 1923.

——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Values Re-examined."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November 1923.

Haberler, Gottfrie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ondon, 1936; reprint ed., New York, 1968.

Heckscher, Eli F. "The Effects of Foreign Trade o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Ekonomisk Tidskrift*, vol. 21 (1919).

Lenin, V.I. *Collected Works.* 4th ed., vol. 2. Moscow, 1960.

Leontief, Wassily W. "The Use of Indifference Curves in the Analysis of Foreign Trad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May 1933.

Lerner, A.P. "The Diagrammatical Representation of Cost Condition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Economica*, August 1932.

Marshall, Alfred. *The Pure Theory of Foreign Trade.* 1897; London, 1930; New York, 1967.

Ohlin, Bertil G. *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London, 1933; rev. ed., Cambridge, Mass., 1967.

Palloix, Christian. *Problèmes de la croissance en économie ouverte.* Paris, 1969.

Preobrazhensky, Evgeny. *The New Economics.* Oxford, 1965; New York, 1965.

- Rachmuth, I. *Problèmes de planification*, no. 84 (Paris: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mimeo).
- Samuelson, Paul A. "The Gains from International Trad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May 1939.
- Taussig, Frank W. *International Trade*. 1927; reprint ed., New York, 1966.

第二节 不平等交换的理论

- Brown, Michael Barratt. "Imperialism and Working-Class Interests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In *Essays on Imperialism*. Nottingham, 1972.
- Critiqu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no. 3 (1971). Articles by E. Chatelain, P. Florian, J. Bailly.
- L'Homme et la Société*, nos. 12, 15, 18, 19 (1969-1971). Articles by A. Emmanuel and C. Palloix.
- Marx, Karl. Letter to Engels, 8 October 1858. In S. Avineri, ed., *Karl Marx on Colonialism and Modernization*. New York, 1969.
- Politique aujourd'hui* (1969-1970). Articles by A. Emmanuel, H. Denis, A. Gramon, G. Dhoquois, and C. Bettelheim.

一种基本贡献

- Bettelheim, Charles. "Présentation et remarques théoriques dans l'ouvrage d'Emmanuel." *Le Monde*, November 11, 1969.
- Braun, Oscar. *Comercio internacional e imperialismo*. Buenos Aires, 1972.
- Emmanuel, Arghiri. *Unequal Exchange*. New York and London, 1972.
- Van de Klundert, M. *Labour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 Reformulation of the Theory of A. Emmanuel*. Tilburg Institute of Economics publication no. 26 (1970).

是否可能出现一个国际交换的经济理论?

- Arrighi, Giovanni. "Labor Supplies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Study of the Proletarianization of the African Peasantry in Rhodesia." In Giovanni Arrighi and John Saul,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frica*. New York, 1973.
-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hodesia." In *ibid.*
- Bukharin, Nikolai. *Imperialism and World Economy*. 1930; reprint ed., New York, 1972.
- Lewis, W. Arthur.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The Manchester School*, May 1954.
- Palloix, Christain. *Problèmes de la croissance en économie ouverte*. Paris,

1969.

Preobrazhensky, Evgeny. *The New Economics*. Oxford, 1965.

不平等交换的其他阐述和方面

Durand, Daniel. *La Politique pétrolière internationale*. Paris, 1962.

Owen, Geoffrey. *Industry in the U.S.A.* Harmondsworth, 1966; Santa Fe, N. Mex., 1966.

Peyret, Henri. *La Stratégie des trusts*. Paris, 1966.

Semonin, Paul. "Nationalization and Management in Zambia." Lusaka: University of Zambia, 1971 (mimeo).

第三节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主义

前资本主义的和重商主义的对外贸易

Cook, M.A., ed. *Studie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London, 1970; New York, 1970.

Mauro, Frederic. *L'Expansion européenne (1600-1870)*. Paris, 1964.

Meillassoux, Claude, ed.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Trade and Markets in West Africa*. London, 1971.

Williams, Eric. *Capitalism and Slavery*. 1944; London, 1964; New York, 1966.

资本的国际流动

Bairoch, Paul. *Evolution 1900-1967 et perspectives à court terme de l'économie du Tiers Monde*. Colloquium at Vienna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June 1968.

Bertin, Gilles-Y. *L'Investissement international*. Paris, 1967.

Cairncross, Alexander K. *Hom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1870-1913*. 1953; reprint ed., Clifton, N.J., n.d.

Clark, Colin.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 London, 1940.

Feis, Herbert. *Europe, the World's Banker, 1870-1914*. 1930; reprint ed., Clifton, N.J., n.d.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eneva). *Annual Reports on World Trade*.

Hobson, Charles K. *The Export of Capital*. 1914; reprint ed., New York, 1963.

Hobson, J.A. *Imperialism*. 1903; reprint ed., New York, n.d.

Imbert, Jean. *Histoire économique des origines à 1789*. Paris, 1965.

Jalée, Pierre. *Imperialism in the Seventies*. New York, 1973.

Kuznets, Simon. *National Income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Na-

- 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46.
- Lary, Hal B. *Imports of Manufactures from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New York, 1968.
- Layton, Christopher. *Trans-Atlantic Investments*. 2nd ed. Boulogne-sur-Seine, 1968.
- League of Nations Secretariat, Economic Intelligence Section. *The Network of World Trade*. Geneva, 1942.
- Lenin, V.I.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In *Collected Works*. 4th ed., vol. 22. Moscow and London, 1964.
- Lewis, Cleona. *America's Stak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Washington, D.C., 1938.
- Magdoff, Harry. *The Age of Imperialism*. New York, 1969.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aris). *L'Aide au développement*.
-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 *Les Flux internationaux de capitaux*. New York, 1952.

贸易比价的问题

- Bairoch, Paul. *Diagnostic de l'évolution économique du Tiers Monde, 1900-1968*. 4th ed. Paris, 1970.
- Imlah, Albert H. "The Terms of Trade of the United Kingdom, 1789-1913."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10, no. 2 (November 1950).
- Kindleberger, Charles P. "The Terms of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50, no. 1, part 2 (February 1958).
- Prebisch, Raul.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le Problems*. New York, 1950.
- . *Change and Development: Latin America's Great Task*. New York, 1971.
- Richta, Radovan. *Civilization at the Crossroads: Social and Human Implications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White Plains, N.Y., 1969.
- Singer, Hans Wolfgang. "The Distribution of Gains Between Investing and Borrowing Countries Revisited." Brighton: University of Sussex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71 (mimeo).
- Van Haeverreke, André. *Rémunération du travail et commerce extérieur. Essor d'une économie paysanne exportatrice et termes de l'échange des producteurs d'arachides au Sénégal*. Louvain, 1970.

资本主义扩大市场的固有倾向

- Cox, Oliver C. *Capitalism as a System*. New York, 1964.
- Denis, Henri. "Marchés nouveaux et accumulation du capital." *L'Homme et la Société*, no. 22 (1971).
- Heckscher, E. "The Effects of Foreign Trade o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Ekonomisk Tidskrift*, vol. 21 (1919).
- Lenin, V.I. "A Characterization of Economic Romanticism." In *Collected Works*. 4th ed., vol. 2. Moscow, 1960.
- . "On the So-called Question of Markets." In *ibid.*, vol.1.
- Luxemburg, Rosa.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New York and London, 1968.
- Samuelson, Paul A.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Equalization of Factor Prices." *Economic Journal*, June 1948;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price Equalization Once Again." *Economic Journal*, June 1949.

资本的国际流动

- Amin, Samir. *L'Afrique de l'Ouest bloquée*. Paris, 1971.
- Baran, Paul, and Sweezy, Paul.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1966.
- Bertin, Gilles-Y. *L'Investissement international*. Paris, 1967.
- Magdoff, Harry. *The Age of Imperialism*. New York, 1969.

外围地区的职能

- Alavi, Hamza. "Imperialism, Old and New." In Kathleen Gough and Hari P. Sharma, eds., *Imperialism and Revolution in South Asia*. New York and London, 1973.
- Braun, Oscar. *Comercio internacional e imperialismo*. Buenos Aires, 1972.
- Coquery, Catherine. "De l'impérialisme britannique à l'impérialisme contemporain: l'avatar colonial." *L'Homme et la Société*, no. 18 (1970).
- Lee, George. "A Marxian Model of an Assimilating Imperialism." Tilburg Conference on Imperialism, 1969 (mimeo).
- . "Rosa Luxemburg and the Impact of Imperialism." *Economic Journal*, December 1971.
- Magdoff, Harry. *The Age of Imperialism*. New York, 1969.
- Palloix, Christian. *Problèmes de la croissance en économie ouverte*. Paris, 1969.
- Schmidt, Alfred. *Imperialism and Economic Crisis of the Classical Epoch Before World War I in Theory and Practice*. Elsinore Conference on Imperialism, April 1971.

第四节 外向积累和依附性

Bettelheim, Charles. "A propos du 'Marxisme de Mao': lettre à Rossana Rossanda." In R. Rossanda, ed., *Il Manifesto. Analyses et thèses de la nouvelle extrême-gauche Italienne*. Paris, 1971.

第四章 不发达的起源与发展

第一节 向外围资本主义过渡的理论

Arrighi, Giovann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lonial and the Class Structure. A Critique of A.G. Frank's The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Dar-es-Salaam, 1969 (mimeo).

Avineri, Schlomo, ed. *Marx on Colonialism and Modernization*. New York, 1969.

Baran, Paul, and Hobsbawm, Eric.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Kyklos*, no. 2 (1961).

Frank, Andre G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Underdevelopment or Revolu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1969.

———. "Towards a Theory of Underdevelopment." Centro de Estudios Economicas y Sociales, Santiago de Chile, 1970 (mimeo).

———. "W.W. Rostow: Ode to Underdevelopment." *Tricontinental* (English edition), no. 7 (1968).

Szentes, Tamá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nderdevelopment*. Budapest, 1971.

第二节 不发达经济社会的外向性

历史根源: 经济史

Amin, Samir. *The Maghreb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1970.

———. *L'Afrique de l'Ouest bloquée*. Paris, 1971.

Amin, Samir, and Coquery, Catherine. *Histoire économique du Congo, 1880-1968*. Paris, 1969.

Clairmonte, Frederick. *Economic Liber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Bombay, 1960.

Dutt, Rajani Palme. *India Today*. London, 1940.

Frank, Andre Gunder.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1967.

Issawi, Charles, e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Chicago, 1966.

Rey, Pierre-Philippe. *Colonialisme, néo-colonialisme et transition au capitalisme. L'expérience de la Comilog au Congo*. Paris, 1971.

Riad, Hassan. *L'Égypte nassérienne*. Paris, 1964.

历史根源: 外国投资

Adam, György.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the Early 1970s: New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World-Wide Sourcing and Dedomesticating." Belfast: Queen's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June 1971 (mimeo).

———. "The World Corporation Problematics." In Hungarian Scientific Council for World Economy (Budapest), *Trends in World Economy*, no. 5 (1971).

Arrighi, Giovanni.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 Labor Aristocrac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ropical Africa." In Giovanni Arrighi and John Saul,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frica*. New York, 1973.

De Cecco, Marcello. "The Influence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on the Economic Policies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Tilburg Conference on Capitalism in the 1970s, September 1970 (mimeo).

Hymer, Stephen. "The Efficiency (Contradictions)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70-72 (mimeo).

———. "Excerpt on Mercantilism III: The Age of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70-72 (mimeo).

———.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and Its Aim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70-72 (mimeo).

———.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and the Law of Uneven Develop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70-72 (mimeo).

Hymer, S. and Resnick, A.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Uneven Develop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70-72 (mimeo).

Hymer, S. and Rowthorn, 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ligopoly: The Non-American Challen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70-72 (mimeo).

Jenkins, Robin. "Imperialism in Mozambique." Elsinore Conference on Imperialism, April 1971 (mimeo).

Martinelli, Alberto, and Somaini, Eugenio. "Les États nationaux et les firmes multinationales." Congrès des sociologues de langue française Hammamet (Tunisia), September 1970 (mimeo).

Miller, R.E., and Carter, P.R. "A Modern Dual Economy: A Cost-Benefit Analysis of Lamco Cy." Monrovia Conference on Planning in

- Liberia, April 1971. Dakar, Institut Africain de Développement Economique et de Planification, 1973 (mimeo).
- Sunkel, Osvaldo. "Intégration capitaliste transnationale et désintégration nationale en Amérique latine." *Politique étrangère*, no. 6 (1970).
- Szentes, Tamás. "Socio-Economic Effects and Patterns of Foreign Capital Investment." IDEP, Dar-es-Salaam Seminar on Foreign Capital, April 1972 (mimeo).
- Tanzer, Michae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Oil and th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London, 1970; Boston, 1970.

历史根源: 进口替代的工业化

- Furtado, Celso. *Development and Stagnation in Latin America: A Structural Approach*. New Haven, 1965.
- Tavares, Mario Conceição, et al.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Import Substitution in Brazil." In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ica*, vol. 9, no. 1 (March 1964).

历史根源: 技术依附

- Amin, Samir. *Le Développement du capitalisme en Côte d'Ivoire*. Paris, 1968.
- . *L'Economie du Maghreb*. Paris, 1966.
- . *Trois expériences africaines de développement: le Mali, la Guinée et le Ghana*. Paris, 1965.
- Cooper, Charles. *The Transfer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to th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Brighton: University of Sussex,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71 (mimeo).
-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Public Finance Surveys*.
- Issawi, Charles P. "Egypt Since 1800. A Study in Lopside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March 1961.
- Meillassoux, Claude. *Anthropologie économique des Gouro de Côte-d'Ivoire*. Paris, 1965.
- . "Essai d'interprétation du phénomène économique dans les sociétés traditionnelles d'auto-subsistance." *Cahiers d'études africaines*, no. 1 (1960).
- Müller-Plantenberg, Urs. "Technologie et dépendance." *Critiqu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no. 3 (1971).
- Rey, Pierre-Philippe. *Colonialisme, néo-colonialisme et transition au*

- capitalisme. L'expérience de la Comitlog au Congo*, Paris, 1971.
- Riad, Hassan. *L'Égypte nassérienne*. Paris, 1964.
- Singer, Hans Wolfgang. *The Distribution of Gains Between Investing and Borrowing Countries Revisited*. Brighton: University of Sussex,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71 (mimeo).
- . "The Foreign Company as an Exporter of Technology." Brighton: University of Sussex,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71 (mimeo).
-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for Trade and Development. *Guidelines for the Study of Transfer of Technology to Development Countries*. Geneva, 1972.
-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 *La Dette publique 1914-1946*. New York, 1948.
- Vaitsos, Constantine. *Bargaining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Returns in the Purchase of Technology by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for Trade and Development, 1971.

生产率的部门不平衡

- Amin, S., Pinto, A., and Smith, A.D. *Les Problèmes de la politique des salaires dans l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Paris, 1970.
- Baran, Paul, and Sweezy, Paul.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1966.
- Kalecki, Michal.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ynamics*. London, 1954; 2nd ed., London, 1965, New York, 1968.
- Robinson, Joan.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London, 1933; New York, 1969.
- Sraffa, Piero.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 Cambridge, 1960; New York, 1960.

外围地区对生产技术的选择

- Allais, M. *Economie et Intérêt*. Paris, 1947.
- Balogh, Thomas. "A Note on Deliberate Industrialization for Higher Incomes." *Economic Journal*, June 1947.
- Bettelheim, Charles.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Planning*. Bombay, 1959; New York, 1968.
- Chenery, Hollis B. "The Application of Investment Criteri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ebruary 1953.
- Dobb, Maurice. *On Economic Theory and Socialism*. London, 1955; reprint ed., New York, 1965.
- Galenson, W., and Leibenstein, H. "Investment Criteria, Productiv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ust

1955.

- Harrod, Roy F. *Towards a Dynamic Economics*. London, 1948; New York, 1948.
- Kahn, R.F. "Investment Criteria in Development Program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ebruary 1951.
- Massé, Pierre. "Pratique et philosophie de l'investissement." *Economie appliquée*, vol. 5, no. 4 (October-December 1952).
- Polak, J.J. "Balance of Payments Problems of Countries Reconstructing with the Help of Foreign Loa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ebruary 1943.
- Sen, Amartya K. *Choice of Techniques*. 3rd ed. London and New York, 1968.

不平等的国际专业化

- Aftalion, A. *Les Crises Périodiques de surproduction*. Paris, 1913-14.
- Goodwin, *The New Economics*. New York, 1948.
- Haberler, Gottfried. *Prosperity and Depression*. 3rd ed. Geneva, 1941.
- Hirschman, Albert O.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Haven, 1958.
- Keynes, John M.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1936; New York, 1965.
- Klein, Lawrence R. "Theories of Effective Demand and Employ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pril 1947.
- Lange, Oskar. "On the Theory of the Multiplier." In *Papers in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Oxford, 1970.
- Mattick, Paul. *Marx and Keynes*. London, 1971; New York, 1973.
- Perroux, François. *L'Economie des jeunes nations*. Paris, 1962.
- . *L'Economie du XXe siècle*. Paris, 1969.
- Stolper, W.F. "A Note on the Multiplier." *Economia Internazionale*, vol. 3, no. 3 (August 1950).

第三节 贫穷化

- Amin, Samir. *L'Economie du Maghreb*. Paris, 1966.
- . *Le Développement du capitalisme en Côte d'Ivoire*. Paris, 1968.
- . *L'Afrique de l'Ouest bloquée*. Paris, 1971.
- Amin, Samir, and Coquery, Catherine. *Histoire économique du Congo, 1880-1968*. Paris, 1969.
- Baran, Paul, and Sweezy, Paul.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1966.

- Chamberlin, Edward H. *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1933; 8th ed., Cambridge, Mass., 1962.
- Clark, Colin.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 London, 1940.
- Kuznets, Simon. *Les Aspects quantitatifs de 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des nations*.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1963.
- Mumford, Lewis.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London, 1934; New York, 1963.
- Riad, Hassan. *L'Égypte nassérienne*. Paris, 1964.

第四节 依附

商业依附，金融依附和技术依附

- Pearson, Lester B. *Partners in Development.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New York, 1969.
- Theoretical studies on Latin America:*
- Caputo, Orlando, and Pizarro, Roberto. "Imperialismo, dependencia y relaciones económicas internacionales." *Centro de Estudios Sociales* (Santiago de Chile), nos. 12-13 (1971).
- Cardoso, F.H., and Corrêa Weffort, F. *Sociología de la dependencia*. Santiago de Chile, 1971.
- Cardoso, F.H., and Faletto, E., *Dependencia y desarrollo en América latina*. Mexico, 1969.
- Dos Santos, Theotonio. "Dependencia y cambio social." *Centro de Estudios Sociales* (Santiago de Chile), no. 11. (1970).
- . "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1970.
- Furtado, Celso. "Dépendance externe et théorie économique." *L'Homme et la Société*, no. 22 (1971).
- . *Los Estados Unidos y el subdesarrollo de América Latina*. Lima, 1971.

对非洲的各项研究

- Africa Research Group, *International Dependence in the 1970s*. Cambridge, Mass., 1970 (mimeo).
- Clower, W., Dalton, G., Harwitz, M., Walters, A. *Libertia: 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 Evanston, Ill., 1965.
- Chrensaft, Philip. "Semi-Industrialized Capitalism in the Third World." University of Dar-es-Salaam, 1971 (mimeo).

- Ghai, Dharam. "The Concept and Strategies of Economic Independence in African Countries." Committee of Director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nstitutes in Africa, Nairobi, February 1971 (mimeo).
- Green, Reginald H.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70 (mimeo).
- . "Notes Toward a Strategy for Achieving Economic Independenc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Imperialism, New Delhi, March 1972 (mimeo).
- Guruli, Kassim. *On the Concept of Socialism and Self-Reliance in Tanzania*. University of Dar-es-Salaam, Economic Research Bureau, 1970.
- Harvey, Charles. "Economic Independence: A View from Zambia." CODESRIA meeting, Nairobi, February 1971 (mimeo).
- Saul, John. "The Political Aspects of Economic Independence." CODESRIA meeting, Nairobi, February 1971 (mimeo).
- Sutcliffe, Robert Baldwin. "Outlook for Capitalism in the 1970s. The Peripheral Capitalist Countries." Tilburg Conference on Capitalism in the 1970s, September 1970 (mimeo).

国际收支的逆差倾向

- De Vries, Margaret G. "The Magnitudes of Exchange Devaluation."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vol. 5, no. 2 (June 1968).
- Harrod, Roy. *The Dollar*. London, 1953; New York, 1963.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Annual Reports*.
- . *Balance of Payments Yearbook*.
- Kindleberger, Charles P. "The Dollar Shortage."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53; 5th ed., Homewood Ill., 1973.
- Lambert, Denis. *Les Inflation sud-américaines*. Paris, 1959.
- League of Nations. *Documents sélectionnés sur la distribution de l'or*. Geneva, 1939.
- . *L'Expérience monétaire internationale*. Geneva, 1939.
- Prebisch, Raul.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New York, 1950.

外围国家货币体系的作用

- Allen, George C. *A Short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Japan, 1867-1970*. 3rd ed. London, 1972.
- Amin, Samir. *L'Afrique de l'Ouest bloquée*. Paris, 1969.
- . *Le Monde des affaires sénégalais*. Paris, 1969.
- . "Pour un aménagement du système monétaire des pays africains de

- la zone franc." *Le Mois en Afrique*, no. 41 (1969).
- Amin, Samir. *Trois expériences africaines de développement: le Mali, la Guinée et le Ghana*. Paris, 1965.
- Bloch-Lainé, F., ed. *La Zone franc*. Paris, 1956.
- Chabert, Alexandre. *Structure économique et théorie monétaire*. Paris, 1956.
- de la Fournière, Xavier. *La Zone franc*. Paris, 1971.
- Felix, David. "Structural Imbalances, Social Conflict and Inflation (in Chil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January 1960.
- Greaves, Ida. *Colonial Monetary Conditions*. 1950; reprint ed., New York, n.d.
- Lambert, D. *Les Inflations sud-américaines*. Paris, 1959.
- Loxley, J. "The Monetary Systems of Tanzania Since 1967." Dar-es-Salaam, 1969 (mimeo).
- Newlyn, Walter T., and Rowan, D.C. *Money and Banking in British Colonial Africa*. Oxford, 1954.
- Ryelandt, Bernard. *L'Inflation au pays sous-développé (Congo, 1960-1969)*. Kinshasa, 1970.
- Schmidt, H.D. *Monetary Policy and Social Conflict in Indonesia*. Berkeley, 1969.
- Seers, Dudley. "A Theory of Inflation and Growth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Latin America."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 14, no. 2 (1962).
- Than Van Thuan. *Les Fondements socio-économiques de la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du Japon*. Lausanne, 1966.
- Wallich, H.C. *Monetary Problems of an Export Economy*. Cambridge, 1950.

外国在世界危机形势运动中的作用

- Clark, Colin, and Crawford, J. *The National Income of Australia*. London, 1936.
- Haberler, Gottfried. *Prosperity and Depression*, 3rd ed. Geneva, 1941.
5. *The Blocking of Transition*
- Amin, Samir. *L'Afrique de l'Ouest bloquée*. Paris, 1971.
- . *The Maghreb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1970.
- Amin, Samir, and Coquery, Catherine. *Histoire économique du Congo, 1880-1968*. Paris, 1969.
- Riad, Hassan. *L'Égypte nassérienne*. Paris, 1964.

第五章 外围地区的当代社会形态

第一节 当代外围地区的历史形态

Boeke, J.H. *Indische Economie*. Amsterdam, 1940.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Chicag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Frank, Andre Gunder. "The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In *Latin America: Underdevelopment or Revolu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1969

美洲的外围形态

Braun, Oscar. *Desarrollo del capital monopolista en Argentina*. Buenos Aires, 1970.

Cardoso, F.H. *Capitalismo e escravidão no Brasil do Sur*. São Paulo, 1962.

———. *Politique et développement dans les sociétés dépendantes*. Paris, 1971.

———. *Sociologie du développement en Amérique latine*. Paris, 1971.

Cardoso, F.H., and Faletto, E. *Dependencia y desarrollo en América latina*. Mexico, 1969.

Chaunu, Pierre. *L'Amérique et les Amériques*. Paris, 1964.

Dominguez Noceto, José, et al. *El proceso económico del Uruguay*. Montevideo, 1969.

Ferrer, Aldo. *The Argentine Economy*. Berkeley, 1967.

Frank, Andre G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Underdevelopment or Revolu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1969.

Furtado, Celso. *L'Amérique latine*. Paris, 1970.

———. *Un Projeto para Brasil*. Rio de Janeiro, 1969.

Germani, Gino. *Política y sociedad en una época de transición*. Buenos Aires, 1968.

Gonzalez Casanove, Pablo. *Democracy in Mexico*. New York, 1970.

Ianni, Octavio. *Estado e capitalismo, estrutura social e industrialização do Brasil*. Rio de Janeiro, 1965.

Instituto Latino-Americano de Planificación Económica y Social. *Dos polémicas sobre el desarrollo de América latina*. Mexico, 1970.

Laclau, Ernesto. "Feudalism and Capitalism in Latin America." *New Left Review*, no. 67 (1971).

Ortiz, Ricardo M. *Historia económica de la Argentina, 1850-1930*. Buenos Aires, 1964.

- Roci, Virgilio. *Historia social y económica de la colonia*. Lima, 1970.
- Silva Herzog, Jesus. *La Révolution mexicaine*. Paris, 1968.
- Stavenhagen, Rodolfo. *Sept thèses erronées sur l'Amérique latine*. Paris, 1973.
- Sunkel, Osvaldo, and Paz, Pedro. *El subdesarrollo latinoamericano y la teoría del desarrollo*. Mexico, 1970.
- Vilela Luz, Nícia. *A Luta pela industrialização do Brasil, 1808-1930*. São Paulo, 1961.
- Williams, Eric. *Capitalism and Slavery*. 1944; London, 1964; New York, 1966.

阿拉伯和亚洲的外围形态

- Amin, Samir. *The Maghreb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1970.
- Bettelheim, Charles. *India Independent*. London, 1968; New York, 1969.
- Clairmonte, Frederick. *Economic Liber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Bombay, 1960.
- Cook, M.A., ed. *Studie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London, 1970; New York, 1970.
- de Planhol, Xavier. *Les Fondements géographiques de l'histoire de l'Islam*. Paris, 1968.
- Dutt, Rajani Palme. *India Today*. London, 1940.
- Dutt, Romesh C.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1906; reprint ed., New York, n.d.
- Fistie, Pierre. *La Thaïlande contemporaine*. Paris, 1967.
- Furnivall, John S. *Netherlands India. A Study in Plural Economy*. London, 1930.
- Haccou, J.-F., and Scholte, G. "L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de l'Indonésie." Institut de Science Economique Appliquée, *Cahiers de l'I.S.E.A.*, no. 87 (1959).
- Hilan, Rizkalla. *Culture et développement en Syrie et dans les pays arabes*. Paris, 1969.
- Hussein, Mahmoud. *Class Conflict in Egypt: 1945-1970*. New York, 1974.
- Issawi, Charles, e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Chicago, 1966.
- "Egypt Since 1800: A Study in Lopside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March 1961.
- .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Middle East*. Columbia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1971.
- Issawi, Charles, ed. "Middle East Economic Development 1815-1914. The

- General and the Specific." In M.A. Cook, ed., *Studie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London, 1970; New York, 1970.
- Laroui, Abdullah. *L'Idéologie arabe contemporaine*. Paris, 1967.
- Mukherjee, Ramkrishna.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1958; London and New York, 1974.
- Riad, Hassan. *L'Égypte nassérienne*. Paris, 1964.
- Thorner, Daniel. *Peasant Unrest in South-East Asia*. Bombay, 1968.

非洲的外围形态

- Afana, Osende. *L'Économie de l'Ouest africain*. Paris, 1966.
- Ameillon, B. *La Guinée, bilan d'une indépendance*. Paris, 1964.
- Amin, Samir. *L'Afrique de l'Ouest bloquée*. Paris, 1971.
- . *Le Développement du capitalisme en Côte d'Ivoire*. Paris, 1968.
- Amin, S., and Coquery, Catherine. *Histoire économique du Congo, 1880-1968*. Paris, 1969.
- Arrighi, Giovann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hodesia." In Giovanni Arrighi and John Saul,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frica*. New York and London, 1973.
- Arrighi, Giovanni, and Saul, John. "Soci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ropical Africa." In *ibid.*
- Balandier, Georges. *Daily Life in the Kingdom of the Kongo: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1968.
- Barry, Boubacar. *Le Royaume de Waalo*. Paris, 1972.
- Bénot, Yves. *Idéologies des indépendances africaines*. Paris, 1969.
- Berg, Elliot J. "The Economics of the Migrant Labor System." In Hilda Kuper, ed., *Urbanization and Migration in West Africa*. Los Angeles, 1965.
- Brunschwig, Henri. *L'Avènement de l'Afrique noire du XIXe siècle à nos jours*. Paris, 1963.
- Coquery, Catherine. "De la traite des esclaves à l'exportation de l'huile de palme et des palmistes au Dahomey, XIXe siècle." In Claude Meillassoux, ed.,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Trade and Markets in West Africa*. London, 1971.
- . *Le Congo au temps des compagnies concessionnaires, 1890-1930*. Paris, 1973.
- Cournanel, Alain. "Le Capitalisme d'Etat en Guinée."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Paris, 1969.
- Crowder, Michael. *West Africa Under Colonial Rule*. London, 1968;

- Evanston, Ill., 1968.
- De Andrade, Mario, and Olliver, Marc. *La Guerre en Angola*. Paris, 1971.
- Dike, Kenneth Onwuka. *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Niger Delta, 1830-1885*. Oxford, 1956.
- Fitch, Bob, and Oppenheimer, Mary. *Ghana: The End of an Illusion*. New York and London, 1966.
- Gann, L.H., and Duignan, Peter.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 I: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Colonialism, 1870-1914*. Cambridge, 1969.
- Gérard-Libois, J. "The New Class and Rebellion in the Congo." *Socialist Register 1966*. London, 1966.
- Hill, Richard Leslie. *Egypt in the Sudan, 1820-1881*. London, 1959.
- Holt, P.M. *The Mahdist State in the Sudan, 1881-1898*. Oxford, 1958.
- Horwitz, Ralph.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uth Africa*. London, 1967.
- Lewis W. Arthur.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The Manchester School*, May 1954.
- Markovitz, Irving, ed. *Af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New York, 1970.
- Meillassoux, Claude, ed.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Trade and Markets in West Africa*. London, 1971.
- Merlier, Michel. *Le Congo de la colonisation belge à l'indépendance*. Paris, 1962.
- Oliver, Roland, and Mathew, Gervase, eds. *History of East Africa*. Oxford, 1963.
- Pankhurst, Richar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thiopia, from Early Times to 1800*. London, 1951; Atlantic Highlands, N.J., 1961.
- Person, J.-Y. *Samori*. Dakar, IFAN, 1970.
- Ranger, T.O., ed. *Aspects of Central African History*. London, 1968; Evanston, Ill., 1968.
- Rey, Pierre-Philippe. *Colonialisme, néo-colonialisme et transition au capitalisme. L'expérience de la Comilog au Congo*. Paris, 1971.
- Rodney, Walter. "African Slavery and Other Forms of Social Oppression on the Upper Guinea Coast in the Context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7, no. 3 (1966).
- Rweyemamu, Justinian 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nzania."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1971.
- Szereszewski, R.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Economy of Ghana, 1891-1911*. London, 1965.

- Trimingham, John S. *Islam in the Sudan*. 2nd ed. London, 1949.
- Thion, Serge. *Le Pouvoir pâle: Essai sur le système sud-africain*. Paris, 1969.
- Van Haeverreke, André. *Rémunération du travail et commerce extérieur. Essor d'une économie paysanne exportatrice et termes de l'échange des producteurs d'arachides au Sénégal*. Louvain, 1970.
- Vansina, Jan. *Introduction à l'ethnographie du Congo*. Kinshasa, 1966.
- . "Long-distance Trade-routes in Central Africa."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3, no. 3 (1962).
- . "Notes sur l'origine du royaume de Kongo."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4, no. 1 (1963).

第二节 外围形态的一般特点

农业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

- Amin, Samir. "Le Développement du capitalisme en Afrique noire." In Victor Fay, ed., *En partant du "Capital."* Paris, 1968.
- Bergmann, Theodor. "Réforme agraire et révolution verte: le cas de l'Inde." *Economie Rurale*, no. 88 (April-June 1971).
- Bondestam, Lars.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n Awash Valley*. Economic National Institute, Addis Ababa, 1971.
- Boserup, Ester. *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 The Economics of Agrarian Change Under Population Pressure*. London, 1965; Chicago, 1965.
- Brown, Lester R. "The Green Revolution, Rural Employment and the Urban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February 1970.
- Chayanov, A.V. *On 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 Homewood, Ill., 1966.
- Delbard, Yves. "Les Dynamismes sociaux au Sénégal." Dakar: Institut de Science Economique Appliquée, 1964 (mimeo).
- Dikoume, Cosme. *Les Problèmes fonciers du Cameroun oriental*. Duala: I.P.D., 1970.
- Dobb, Maurice.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London, 1946; rev. ed., New York, 1964.
- Dumont, René. "Notes sur les implications sociales de la révolution verte dans quelques pays d'Afrique." Geneva: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1971 (mimeo).
- . *Paysanneries aux abois: Ceylan, Tunisie, Sénégal*. Paris, 1972.
- Dumont, René, and Mazoyer, Marcel. *Socialisms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1973.

Gutelman, M. *L'Agriculture socialisée à Cuba*. Paris, 1967.

———. *Réforme et mystification agraires en Amérique latine. Le cas du Mexique*. Paris, 1971.

Hill, Polly. *Studies in Rural Capitalism in West Africa*. London, 1970.

Jacoby, Erich H. *Man and Land: The Fundamental Issue in Development*, London, 1971.

Karim, A.K.N. *Changing Society in India and Pakistan*. Dacca, 1950.

Mukherjee, Ramkrishna. *The Dynamics of a Rural Society: A Study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in Bengal Villages*. Berlin, 1957.

Myrdal, Gunnar. *Asian Drama: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 London, 1968; New York, 1971.

N'Dongala, E. "Mutations structurelles de l'économie traditionnelle dans le Bas-Congo sous l'impact de la colonisation." In *Cahiers Economiques et Sociaux* (Leopoldville), vol. 4, no. 1 (March 1966); and "Développement rural et fonction coopérative dans l'agriculture congolaise avant la décolonisation." in *ibid.*, vol. 4, no. 4 (December 1966).

O'Brien, Donald B. *The Mourides of Senegal*. Oxford, 1971.

Post, Kenneth. *On "Peasantisation" and Rural Class Differentiation in Western Africa*. The Hague, 1970.

Raulin, Henri. *La Dynamique des techniques agraires en Afrique tropicale du nord*. Paris, 1967.

Saul, John, and Woods, Roger. "African Peasantries." In Giovanni Arrighi and John Saul, eds.,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frica*. New York, 1973.

Schumaker, E.J. "Bureaucracy, Party and Rural Commercial Reform in Senegal, 1957-1968."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Thorner, Daniel. *Peasant Unrest in South-East Asia*. Bombay, 1968.

Thorner, Daniel, and Thorner, Alice. *Land and Labor in India*. New York, 1962.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rade and Development. "A Selection of Readings on the Green Revolution." Geneva, 1971 (mimeo).

Warriner, Doreen. *Land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2nd ed. London, 1962.

外国资本所强加的限制

Amin, Samir. *Le Développement du capitalisme en Côte d'Ivoire*. Paris, 1968.

- . *Les Revenus susceptibles d'épargne et leur utilisation en Égypte, 1938-1952*. Thesis, Paris, 1965.
- Esseks, J, ed *African States' Quest for Economic Independence The First Decade*. To be published by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 Frank, Andre Gunder. *Lumpenbourgeoisie: Lumpendevlopment: Dependence, Class and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1972
- Robinson, Ivor. *The Petit-Bourgeoisie. An Analysis of Its Socioeconomic Origins and Its Contemporary Role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Kenya*. University of Nairobi, January 1971 (mimeo).
- Shivji, Issa. *Class Struggles in Tanzania*. London, 1976; New York, 1976.
- Verhaegen, Benoit. "Social Classes in the Congo." *Revolution*, no. 10 (1964).
- Wallerstein, Immanuel. *The Colonial Era in Africa. Changes in the Social Structures*. Montreal: McGill University, 1972 (mimeo).
- Waterman, Peter. *Nigeria as a Neo-colony*. Zaria (Nigeria): Ahmadu Bello University, 1971 (mimeo).
- Who Controls Industry in Kenya?* East African Publishing House, Nairobi, 1968.
- 向本国官僚机构发展的当代趋势
- Alavi, Hamza. "The State in Post-Colonial Societies: The Case of Pakistan and Bangladesh." In Kathleen Gough and Hari P. Sharma, eds., *Imperialism and Revolution in South Asia*. New York, 1973.
- Althabe, G. *Oppression et libération dans l'imaginaire. Les communautés villageoises de la côte orientale de Madagascar*. Paris, 1969.
- Arrighi, Giovanni.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 Labor Aristocrac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ropical Africa." In Giovanni Arrighi and John Saul,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frica*. New York, 1973.
- Arrighi, Giovanni, and Saul, John S.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In *ibid*.
- . "Soci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ropical Africa." In *ibid*.
- Aron, Raymond. *La Lutte des classes*. Paris, 1964.
- Bézy, F. "La situation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Congo-Kinshasa." *Cultures et Développement*, no. 3 (1969).
- Burnham, James.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London, 1942; reprint ed., Westport, Conn., 1972.

- Galbraith, John K.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New York, 1967.
- . *The Affluent Society*. Boston, 1958.
- Ryelandt, Bernard. *L'Inflation au pays sous-développé. Congo, 1960-1969; Kinshasha*, 1970.
- Silva Michelena, José. *The Illusion of Democracy in Dependent Nations*. Boston, 1971.

无产阶级化和贫穷化

- Allen, Christopher. *Unions, Income and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mimeo).
- Amin, Samir. *Le Développement du capitalisme en Côte d'Ivoire*. Paris, 1968.
- . *L'Economie du Maghreb*. Paris, 1966.
- Axelsson, Sigbert. *Culture Confrontation in the Lower Congo*. Falköping, Sweden, 1970.
- Bagú, Sergio. *Industrialización, sociedad y dependencia en América latina*. Santiago de Chile: Facultad Latino-Americana de Ciencias Sociales, 1970.
- Boserup, Ester. *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 The Economics of Agrarian Change Under Population Pressure*. London, 1965; Chicago, 1965.
- Cardoso, F.H. *Comentário sobre os conceitos de superpopulação relativa e marginalidade, Estudo I*, São Paulo: Centro Brasileiro de Planejamento, 1972.
- Clairmonte, Frederick. *Zambia: Wages, Income and Employment*. Addis Ababa: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1972 (mimeo).
- Cline, William R. *Potential Effects of Income Redistribution on Economic Growth: Latin American Cases*. New York, 1972.
- de Navarrete, Ifigenia Martínez. *La Distribución del ingreso y el desarrollo económico de México*. Mexico, 1960.
-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A Program of Action for Ceylon*. Geneva, 1971.
- . *Towards Full Employment: A Program for Colombia*. Geneva, 1970.
- Nun, José. "Sobrepoblación relativa, ejército industrial de reserva y masa marginal." *Revista Latino-Americana de Sociología*, vol. 5, no. 2 (July 1969).
- Quijano, Anibal. *Redefinición de la dependencia y marginalización en América latina*. Santiago de Chile: Centro de Estudios Sociales 1970 (mimeo).

- Stewart, Frances, and Streeten, Paul. "Conflicts Between Output and Employment Objectiv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 23, no. 2 (1971).
- Thorbecke, Erik. *Unemployment and Underemployment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New York: Columbia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1970 (mimeo).
- Turnham, David, and Jaeger, Ingelies. *The Employment Problem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Paris, 1971.
-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Estudios sobre la distribución del ingreso en América latina*. 1967.
- 新的中心与外围形态
- Arrighi, Giovann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hodesia." In Giovanni Arrighi and John Saul,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frica*. New York, 1973.
- Chaunu, Pierre. *L'Amérique et les Amériques*. Paris, 1964.
- Gray, John Richard. *The Two Nations: Asp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Race Relations in the Rhodesias and Nyasaland*. London, 1960.
- Hanegbi, H., Machover, M., and Orr, A. "The Class Nature of Israeli Society." *New Left Review*, February 1971.
- Horwitz, Ralph.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uth Africa*. London, 1967.
- Jiryis, Sabri. *The Arabs in Israel, 1948-1966*. New York, 1976.
- North, Douglass C.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60*. Englewood Cliffs, N.J., 1961.
- Thion, Serge. *Le Pouvoir pâle: Essai sur le système sud-africain*. Paris, 1969.

第三节 争取一项过渡的战略

苏联生产方式

- Amon, Pierre.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et le marxisme." *Que faire*, no. 5 (November 1970).
- Barone, E. "The Ministry of Production in the Collectivist State (1908)." In F.A. Von Hayek, ed.,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London, 1935.
- Bettelheim, Charles. *Economic Calculation and Forms of Property*. London, 1976; New York, 1976.
- Brus, Włodzimierz. *The Market in a Socialist Economy*. London, 1972; Boston, 1972.
- Critiqu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no. 6 (1972). See article by Roman Ros-

- dolsky. In nos. 7 and 8 (1972), see articles by G. Tibert, B. Jobic, M. Ducombs, Tatsuo Tomochika, E. Germain, and C. Samary.
- Denis, Henri, and Lavigne, M. *Le Problème des prix en Union soviétique*. Paris, 1965.
- Horvat, Branko. *An Essay on Yugoslav Society*. New York, 1969.
- Jakubowsky, F. *Les Superstructures idéologiques dans la conception matérialiste de l'histoire*. Paris, 1972.
- Rossanda, Rossana. "Mao's Marxism." *Socialist Register 1971*. London, 1971.
- Socialist Register 1965-1971*. See articles by Miliband, Hodges, Johnstone, Merrington, Deutscher, Rossanda, Sartre, Draper, Meszaros, and Arb-laster. London, 1965-1971.

资本主义制度的自发倾向

- Capitalism in the 70's*. Tilburg Conference, September 1970 (mimeo).
- Imperialism*. Elsinore Conference, Danish Institute for Peace and Conflict Research, April 1971 (mimeo).
- Lewis, Oscar. *The Children of Sanchez: Autobiography of a Mexican Family*. London, 1962; New York, 1961.
- Mattick, Paul. *Marx and Keynes*. London, 1971; New York, 1973.
- Mauro Marini, Ruy. *Subdesarrollo y revolución*. Mexico, 1969.
- Mumford, Lewis.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London, 1934; New York, 1963.
- Richta, Radovan. *Civilization at the Crossroads: Social and Human Implications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White Plains, N.Y., 1969.
- Tsuru, Shigeto, ed. *Has Capitalism Changed?* Tokyo, 1961.
- Ward, Barbara, and Dubos René. *Only One Earth*. New York, 1972.

过渡的基本问题

- Abdel Fadil, Mahmoud. "Modèles dynamiques d'intraversion dans les pays en voie de développement." *Economie appliquée*, no. 4 (1971).
- Amon, Pierre.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et le marxisme." *Que faire*, no. 5 (November 1970).
- . "Révolution culturelle et dialectique du centre et de la peripherie." *L'Homme et la Société*, no. 21 (1971).
- Bettelheim, Charles. *La Transition vers l'économie socialiste*. Paris, 1968.
- Falkowski, M. *Problèmes de la croissance du Tiers Monde, vus par les économistes des pays socialistes*. Paris, 1968.

- Mahalanobis, P.C. *The Approach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to Planning in India*. Calcutta, 1963.
- Meadows, Donella H. et al. *The Limits to Growth*. London, 1972; New York, 1972.
- Müller-Plantenberg, Urs. "Technologie et dépendance." *Critiqu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no. 3 (1971).
- Socialist Register*, 1965: see article by Hamza Alavi; 1968: article by K.S. Karol; and 1970: article by V.G. Kiernan. London, 1965, 1968, 1970.
- Sweezy, Paul M., and Bettelheim, Charles. *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New York and London, 1971.

人名译名表

三 画

马尔库斯 Marcuse
马尔萨斯 Malthus
马克卢普 Machlup
马赫迪 Mahdi
马歇尔 Marshall
马考弗 Machover

四 画

巴洛夫, 托马斯 Balogh, Thomas
巴杜塔, 伊本 Batuta, Ibn
巴利, 博巴卡 Barry, Boubacar
巴斯塔布尔 Bastable
巴隆 Barone
巴伦 Baran
贝特尔海姆, 查尔斯 Bettelheim, Charles
贝, 阿里 Bey, Ali
瓦尔拉 Walras
扎赫兰, 萨德 Zahran, Saad
韦伯, 马克斯 Weber, Max

五 画

卡尔多索, 费尔南多·恩里克 Cardoso, Fernando Henrique
卡尔多 Kaldor
卡尔顿, 伊本 Khaldun, Ibn
卡米尔, 穆斯塔法 Kamil, Mustafa
卡德尔, 阿布德尔 Kader, Abdel
卡莱基 Kalecki
卡斯尔 Cassel
布洛赫-莱内 Bloch-Lainé
布哈林 Bukhaim
布朗, 奥斯卡 Braun, Oscar

弗里德曼, 米尔顿 Friedman, Milton
弗兰克, 安德烈·冈德 Frank, Andre Gunder
卢森堡, 罗莎 Luxemburg, Rosa
加尔布雷思 Galbraith

六 画

伊曼纽尔, 阿吉里 Emmanuel, Arghiri
伊斯迈尔 Ismail
伊萨维 Issawi
考克斯, 奥利弗 Cox, Oliver
考克利, 凯瑟琳 Coquery, Catherine
考茨基 Kautsky
米切莱纳, 席尔瓦 Michelena, Silva
米泽斯, 冯 Mises, von
西斯蒙第 Sismondi
西昂, 塞奇 Thion, Serge
多夸, 居伊 Dhoquois, Guy
多布 Dobb
托洛茨基 Trotsky
刘易斯 Lewis, W.A.
伏尔泰 Voltaire

七 画

阿里·帕夏, 穆罕默德 Ari Pasha, Mehemet
阿里基 Arrighi
阿巴斯, 费尔哈特 Abbas, Ferhat
阿夫塔利昂 Aftalion
阿卜杜拉 Abdullah
里昂儒夫 Leontief
里贝罗, 达西 Ribeiro, Darcy
里亚德, 哈桑 Riad, Hassan
杜德, 帕梅 Duff, Palme

杜德 Dutt, R.C.
克莱尔蒙特, 弗雷德里克 Clairmonte,
Frederick
克拉克, 科林 Clark, Colin
希克斯 Hicks
希兰, 里兹喀尔·阿 Hilan, Rizkall a
麦克纳马拉 McNamara
库尔诺, 奥古斯丁 Cournot, Augustin
别依, 阿里 Bey, Ali
纳恩, 何塞 Nun, José
坎梯隆 Cantillon
李嘉图 Ricardo
纽林 Newlyn

八 画

罗德尼, 沃尔特 Rodney, Walter
罗宾逊, 琼 Robinson, Joan
罗旺 Rowan
法里德, 穆罕默德 Farid, Mohammed
法莱托, 恩佐 Falleto, Enzo
帕洛克斯, 克里斯琴 Palloix, Christian
帕维尔 Paver
佩鲁, 弗朗索瓦 Perroux, François
迪亚斯, 波菲里奥 Diaz, Porfirio
金德尔伯格 Kindleberger
拉赫穆斯 Rachmuth
庞巴赫克 Böhm-Bawerk
林达尔 Lindahl
凯恩斯 Keynes

九 画

洛拉格奈, 安娜·玛丽 Laulagnet, An-
ne-Marie
洛贝尔, 伊莱 Lobel, Eli
洛克 Locke
哈罗德 Harrod
哈伯勒 Haberler
胡赛因, 马哈茂德 Hussein, Mahmoud
胡赛因, 塔哈 Husayn, Taha
费赛尔一世 Faisal I
费希尔 Fisher

威廉, 赖希 Wilhelm, Reich
威克塞尔 Wicksell
施马尔茨 Schmaltz

十 画

诺斯, 道格拉斯 North, Douglass
诺加罗 Nogaro
特里芬, 罗伯特 Triffin, Robert
格雷夫斯, 艾达 Greaves, da
莫迪格利阿尼 Modigliani
埃奇沃思 Edgeworth
隆德贝格 Lundberg
根哲尔 Göncöl
钱伯林 Chamberlin
夏贝尔 Chabert
陶西格 Taussig
配第 Petty

十一 画

梅拉苏 Meillassoux
梅茨勒 Metzler
萨伊 Say, J.B
康德拉季耶夫 Kondratiev

十二 画

博塞拉普, 埃斯特 Boserup, Ester
博桑凯 Bosaquet
博丹 Bodin
斯拉法, 皮埃罗 Sraffa, Piero
斯威齐 Sweezy
斯密, 亚当 Smith, Adam
富拉斯蒂埃 Fourastié
富尔塔多, 塞尔索 Furtado, Celso
普雷奥布拉泽斯基 Preobrazhensky
普雷维什, 劳尔 Prebisch, Raul
奥韦尔 Orwell
奥林 Ohlin

十三至十七画

雷伊 Rey
熊彼得, 约瑟夫 Schumpeter, Joseph
魁奈, 弗朗索瓦 Quesnay, François
赫克歇尔 Heckscher

缪达尔 Myrdal
霍维茨, 拉尔夫 Horwitz, Ralph

霍罗维支 Horovitz
戴克, 昂吴卡 Dike, Onwuka

BÙ PÍNGDĒNG DE FĀZHǎN

不平等的发展

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埃及] 萨米尔·阿明 著

高 铭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7-100-03183-4/F·399

1990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0 年 8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张 12 ½

印数 4 000 册

定价：17.00 元

近期推出：

动态经济学

〔英〕 罗伊·哈罗德 著

经济增长理论

〔英〕 阿瑟·刘易斯 著

各国的经济增长

〔美〕 西敏·库兹涅茨 著

国家兴衰探源

〔美〕 曼维尔·奥尔森 著

经济发展思想史

〔澳〕 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 著

发展经济学

〔印度〕 苏布拉塔·雷塔克 著

改造传统农业

〔美〕 西奥多·W.舒尔茨 著

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美〕 罗伯特·M.索洛等 著

不平等的发展

〔埃及〕 萨米尔·阿明 著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

〔英〕 海韦尔·G.琼斯 著

ISBN 7-100-03183-4



9 787100 031837 >



ISBN 7-309-03863-4/D·109 定价: 17.00元